



河姆渡文化研究

杭州大学出版社



河姆渡文化研究

浙江省文物局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
河姆渡遗址博物馆

杭州大学出版社
0036152

河姆渡文化研究

浙江省文物局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

河姆渡遗址博物馆

*

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市天目山路 34 号)

*

余杭华兴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0.75 印张 269 千字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ISBN 7-81035-572-4/K·066

定价:18.00 元

2000.2.12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邮 购

序

毛昭晰

自 1973 年 6 月初河姆渡遗址发现至今,已经有 25 个年头了。其间 1973 年 11 月至 1974 年 1 月和 1977 年 10 月至 1978 年 1 月进行过两次发掘。1978 年发表了第一期发掘报告。1980 年发表了《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第二期发掘报告,因为整理报告的几位学者后来都担任了繁忙的行政职务,影响工作的进行,所以这个报告到现在还没有付梓。但河姆渡遗址丰富的物质文化遗存,却已经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为了纪念河姆渡遗址发现 20 周年,1992 年浙江省文物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考古学会和余姚市,后来还有宁波市的一些同志经过多次讨论,打算在 1993 年下半年召开一次学术讨论会,并且成立了筹备委员会。由于主客观的种种原因,这次学术讨论会最后于 1994 年 4 月在河姆渡遗址所在地的余姚市召开。可惜学术讨论会召开的时候,我正应聘在日本京都任职,由于我在日居留的手续和归国的手续来不及办理,因而未能参加盛会,到现在还感到非常遗憾和抱歉。

这次学术讨论会的论文,我们请作者作了修改。有些文章当时是简单的提要,也请作者整理成文。所以现在呈现在读者诸君面前的这本论文集,包含了 1994 年之后的若干科研成果。

在河姆渡文化中,最引人注意的是稻作农业。这不仅仅是

因为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谷数量多,保存完好,还因为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的农具,这是其他任何遗址所不及的。在河姆渡稻谷发现之后不久,游修龄、周季维等先生曾经进行过专门的研究。近几年对河姆渡稻谷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第一是发现了四粒野生稻,证实了河姆渡可能是稻作农业的发源地之一。第二是根据植物硅酸体的分析以及稻的叶绿体 DNA 基因片段图谱的分析,河姆渡的稻谷主要是粳稻。用扫描电镜观察河姆渡出土稻谷外稃的双峰乳突,也发现粳型谷粒。这和以前游修龄先生以稻谷长宽比例测定的结果不同。据此,对稻谷传播的路线也产生了与以前不同的看法。第三,由于彭头山、贾湖、玉蟾岩等遗址发现了比河姆渡更早的稻谷遗存,所以在稻作起源问题的研究方面也有了新的进展。这些问题在游修龄、郑云飞、严文明、张文绪、汤圣祥、刘军等先生的文章中作了很有意义的探讨。

石兴邦、吴汝祚等先生则从生产工具、建筑遗存、日用器皿、原始崇拜等等方面对河姆渡的稻作文化进行阐述。石兴邦先生还对河姆渡文化的溯源和追流提出了很有见地的意见,使人很受启发。

张之恒先生研究了河姆渡的社会经济形态。根据河姆渡的干栏式建筑,结合民族学的资料进行推测,认为河姆渡文化早期阶段尚处在母系氏族的繁荣阶段。

河姆渡遗址有如此丰富的物质文化遗存,它不可能是孤立的史前聚落。刘军、蒋乐平、林士民、王海明等先生介绍了与河姆渡文化有关的宁绍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并论述了它们与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及良渚文化的关系。要搞清楚这种关系,首先应该弄清河姆渡遗址各文化层的内涵。刘军、蒋乐平两位先生认为河姆渡遗址第三、四层文化内涵的独特性与成熟性充分体现了河姆渡文化的精义。有的学者也认为河姆渡文化应

以第三、四层为限。安志敏先生提出河姆渡遗址的第一、二层“不宜归入河姆渡文化,当与马家浜文化或良渚文化有着更密切的联系”。而刘军、蒋乐平先生则明确地认为“良渚文化钱塘江以南类型的提法可以成立”。林士民先生也提出了“钱塘江以南地区良渚文化的××类型”的概念。相似的观点也见于林华东等先生的论文。把河姆渡文化遗址和邻近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进行综合对比研究,这是非常有价值的。这样的研究最终打破了“良渚文化不过钱塘江”的旧观念。

有的学者把视野扩展到更大的范围。林华东、韦立立先生把河姆渡文化和越文化联系起来,论述了稻米和有段石镞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的道路,以及古代中国和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的关系。曾骐先生认为河姆渡人是舟楫发明和征服海洋的先导。杨成铨先生也认为河姆渡人是越族先民,海洋是他们的驰骋之所,是他们带着水稻向东海和东南亚发展。这是可以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关于河姆渡遗址的年代问题,黄宣佩先生把遗址各层年代作了系统的排比,并与江浙地区和国内其他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进行比较。根据出土器物、动植物群以及植物孢粉作分析,认为原有的年代测定偏晚,河姆渡上限的年代似和裴李岗文化相当,可能处于距今 7800—7100 年阶段。这也是值得重视的新观点。

在这本文集中,有许多民俗考古学的文章。如蒋卫东先生对涡纹、湖沼崇拜和鸟形器的研究,刘军先生对河姆渡原始雕塑的研究,俞为洁女士对猪形塑及猪形图案装饰器的研究以及黄渭金先生对无头葬及肢骨不全葬的探讨,都很有价值。陆洲、华光先生研究了河姆渡出土的骨哨,认为 7000 多年前的河姆渡先民已掌握了孔位和音高之间的关系规律,并且已具有对某种音

阶的认识,这使人非常感兴趣。不过河姆渡出土的骨哨并不如他们所说的是“世界管乐之祖”。因为1986年至1987年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了10多件骨笛,大多为7孔,其年代距今7600年以上,比河姆渡的骨笛要早。而在欧洲的英国、法国、乌克兰等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中则发现了更早的骨笛,在前苏联的摩尔达维亚曾发现一支用雄鹿角做成的笛子,一面有4个孔,另一面有2个孔,年代在1.2万年至1.5万年之前。在英国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Kent's Cavern也发现用兔子胫骨制作的一支骨笛,上面有6个孔,年代也很早。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当然希望中国有许多创造发明的“世界之祖”,但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最早的管乐器并不在河姆渡。

在这次学术讨会上还有许多很好的学术论文,如刘为纶、周子康等先生关于古气候的论述,叶树望先生关于原始历法的研究,邵九华先生根据古代传说对河姆渡文化的探讨,以及其他许多先生的文章,我们都刊载在这本集子里。这些论文反映了参加讨论的学者们对河姆渡文化的研究成果,希望它能够有助于读者对河姆渡文化的了解。

最后,要感谢宁波市副市长陈守义先生、余姚市副市长蒋赣平先生、浙江省文物局副局长陈文锦先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军先生对这次学术讨论会的大力支持。刘军先生和考古所的蒋卫东先生为文集的出版和校对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张萍女士为河姆渡文化编制了文献目录,给今后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方便,在此一并致谢。

1998年5月于杭州花园北村

目 录

河姆渡文化——我国稻作农业的先驱和“采集

农业”的拓殖者	石兴邦(1)
河姆渡遗址浅析	安志敏(18)
从羽人纹饰看羽人源流	毛昭晰(20)
河姆渡野生稻发现的意义	严文明(32)
河姆渡稻谷研究进展及展望	游修龄 郑云飞(37)
水稻品种和河姆渡出土稻谷外稃乳突的扫描 电镜观察	张文绪 汤圣祥 刘 军(47)
河姆渡遗址的几个问题	吴汝祚(57)
关于河姆渡遗址年代的讨论	黄宣佩(76)
宁绍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若干问题探讨	刘 军 蒋乐平(84)
从宁绍地区的遗址看河姆渡文化的发展	林士民(100)
河姆渡文化和舜耕历山	邵九华(118)
河姆渡文化渊源思考	王海明(128)
论河姆渡暨越文化的海外传播	林华东 韦立立(141)
河姆渡遗址文化与越族先民	杨成鎰(175)
河姆渡文化原始雕塑	刘 军(188)
河姆渡文化猪形塑及猪形图案装饰器新探	俞为洁(197)
河姆渡先民的原始历法	叶树望(209)

试论河姆渡无头葬及肢骨不全墓·····	黄渭金(217)
涡纹·湖沼崇拜·鸟形器·····	蒋卫东(227)
原始艺术科技的结晶——河姆渡出土骨哨 ·····	陆 洲 华 光(243)
未来气候变暖的经验模式 ——浙江河姆渡古气候·····	刘为纶 周子康 吴维棠(248)
河姆渡地区中全新世温暖期古植被和古气候 的研究·····	周子康 刘为纶 吴维棠(258)
河姆渡人在中华文化缔造中的贡献·····	曾 骢(269)
河姆渡文化发现的意义·····	张之恒(278)
河姆渡文化文献目录·····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资料室(285)

河姆渡文化——我国稻作农业的先驱和“采集农业”的拓殖者*

石兴邦

一、河姆渡文化发现的意义

河姆渡文化的发现,是 70 年代中国新石器时代研究史上的突破性成果之一。当时我国有三个具有突破性的重要发现:一个是下川细石器文化遗存(1970~1973),当时认为是典型的中石器文化;另一个就是河姆渡文化(1973)^①,它是稻作农业文化最早而内涵丰富的文化遗存;还有一个便是磁山—裴李岗文化,它是前仰韶文化的首次露头(1976~1979)。其所以叫它们的显世为突破性的发现,是因为这些文化遗存及其包含物,正是农业起源研究中的几个环节,而且是关键性的环节,它们填补了这个缺环,所以引起了当时学术界的特别重视:下川文化提供了由采猎经济向采集农业过渡性的文化丛体;磁山—裴李岗以及老官台文化提供了早期粟作农业的垦殖者和彩陶的发明者;河姆渡文化却是早期稻作农业的典型代表。这三个文化本身的内涵和特征,确定了它们在中国史前文化史研究上的地位和作用。从

* “采集农业”一辞,是 1996 年初,田昌五同志与作者讨论问题时提出来的。我觉得他提的很有理论意义,并从实践中加以论证。

此,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研究,不论在南方还是北方,一下开拓了视野,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把农业起源的研究,提到议事日程,并迅速地开展而取得成果。

河姆渡文化发轫滋长于钱塘江南岸的宁绍平原,聚落散布在滨江沿海和山麓下的平地 and 山坡上。这里是早期人类生活的最佳的丰富的食物采集区,很宜于早期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而河姆渡人本身居住的聚落,赋有优越的地理条件,这里海拔低,地下水位高,文化层长期浸泡水中,隔绝了土壤中的空气,大面积的腐殖质形成4~5度酸性成分,起着良好的防腐作用,使大量的文化遗存和品种丰富的动植物枝叶和遗骸,完好地保存下来。给我们留下探讨这一文化的珍贵资料。

根据发掘者的记录,河姆渡聚落遗址,分四个文化堆积层,第一、二层是晚期遗存,第三、四层是早期遗存,特别是第四层时间最早而包含物最丰富,是河姆渡文化得以命名的文化实体的存在层,代表了这一文化的主体文化面貌和模式。其内涵所体现的工艺技术之精,生产力水平之高和内涵的丰富多彩,是任何一个稻作文化聚落遗存所不及的。所以,自发现20多年来,以其独特之内涵,丰富之埋藏,年代之久远和价值之珍贵而享誉学坛,播扬寰宇。

二、有关稻作农业文化的讯息及物化形态

河姆渡文化是早期稻作文化的遗存,其丰富的埋藏,给我们提供了这一文化完整模式的各种讯息和载体。

(一)保存了诸多与农业起源有关的植物标本和遗迹^②

这里发现了丰富的稻作遗存,特别在主体文化堆积层中,普遍存在稻谷、谷壳、谷秆和枝叶的堆积,厚达20~50厘米,最厚

达1米,有的还保存谷粒,有的已炭化,有的还保存叶、秆的原形,连壳上的稃毛和叶脉都依稀可见。其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实属罕见。经过鉴定,属于籼亚晚稻型水稻,是我国最古老的稻类实物遗存,此外还有野生稻种子、菱角、橡子、桃子、菌类、藻类、葫芦等植物,其中有些已为人们所栽培^③。

(二)有一套木制、骨制和石制的稻作农业工具

其中木制和骨制工具特别突出,这是其他居址所缺乏或不多见的。它的数量多,且保存完整,有数千件之多,种类有耜、铲、刀、斧、镑、凿、镞、锥、针、锯、匕、桨等,其中以骨制的耜为最典型。^④数量多,形制新颖,制工精巧,表示农业生产水平高。这种骨耜,是用大型哺乳动物的肩胛骨和胯骨制成的,是采用竖长安柄的方式使用,正面中间修出一道浅的凹槽,柄部有横穿的长方形孔,耜面刃上两侧穿凿两个圆孔,用以扎捆柄体,柄部手握部分作成了T字形或透雕成三角形把手,便于手持使用,是十分技巧而科学的工具。这种工具的作用,在水田中工作,能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它证明了河姆渡人是最早的耜耕农业者。

(三)制备了一套水乡定居生活的各种设备和条件

1. 干栏式的居室和聚落结构。

河姆渡人居住的是栽桩架板式的干栏建筑,结构形制都相当进步,其营造技术,并不亚于今日南亚一带人住的干栏房屋。这种建筑是用圆柱、方柱和板桩作桩木,其上架横板和竖板,桩架交接处用卯榫套节,再上立柱,架梁,盖顶,高于地面。整个建筑呈长屋式。在早期遗存中,发现一座长23米、宽7米,前廊还有1.3米的过道,作西北—东南走向。这种建筑形式,体现了大家族式的社会组织。

另外还有一种居室是平地栽桩式的地面建筑,用木板垫作柱础,红烧土块和碎陶片铺地,层层加垫打实,然后再在其上建

筑,这是晚期的居室,这时可能气候变得干燥些,人们舍干栏而就平居。

在干栏建筑的遗存中,发现出数千件木质构件,这里面有长达6米、直径23厘米的圆木立柱,板桩中有宽10~50厘米,厚2~4厘米的规则板材。从其结构看,榫卯构件都是垂直相交。在承托木梁、屋梁柱头和柱脚上,还保留近似方形的榫头和卯眼。其中较进步的是燕尾榫和带梢钉孔的榫,可以防止构件受拉脱榫,在两侧伸出规整的齿口的木板,还在两侧向里刨出了规整的齿口的木板,据建筑学家研究,这是高精度的密接拼板技术。

2. 来源多样的丰富的水乡生活资料。

河姆渡人的生活资料,来源于居址附近丰富的自然库存。他们渔猎采集,获取各种品类的食物和衣着用品,主食是稻米,猎获的动物有48种之多,其中有十几种鸟类,七八种水生鱼类和蚌类,还有取之不尽的植物果实和叶茎、菱角、橡子等,这些生活资料能充分满足人类体质需要的蛋白、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等营养素,对人们的体力和智力发育大有补益,这也是河姆渡文化繁荣滋长的内在动力。

3. 轻便的水上交通工具。

河姆渡人居住在水乡,河流纵横交错,湖泊沼泽相望,往来交通多靠水路,发现的木桨证明舟楫之制早已制备。

根据河姆渡人制木工艺水平和对机械原理的理解水平(从木构榫接技术中可知),不只是用木筏或独木舟,可能制造用木板结构的较大的船体,航行水中、聚落和部落之间,畅通无阻,甚至远航到近海岛屿和更远的地方去。河姆渡人是古越人的先驱,他们是潜水的能手,潜水捕鱼为其文化特点之一。越人重纹身,其目的之一是在水中防鱼龙之害,所以习水性而乐于航海,

是水乡民族的性格之一。对原始人来说,山林是交往的一大阻隔,而水甚至是汪洋大海,不仅阻挡不住他们之间的交往,而且能促其接触。因此,近海民族之富于冒险和开拓精神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

4. 简朴实用的一组日用生活器皿。

河姆渡人的日用器皿,有形可据的是陶器。这些陶器,不算精美,造型古朴而很实用。从这些陶器上,表现出了河姆渡人独特的制陶工艺。她们创造的夹炭陶艺,在古代制陶工艺中独树一帜。这类陶器,是在烧造时,在陶土中麇和大量的草筋、植物杆碎叶和种子皮壳等有机物。烧成后,这些植物枝叶变成炭,陶器呈黑色,火候较低,器壁厚薄不匀,形制也不十分规整,表现出技术的原始性,器物种类以釜、罐、盆、盘、钵等常用器为主,还有少量的孟、豆和储火尊,此外还有器盖、器座。日常生活用的炊器、饮食器和储物器均有,以圜底器为多(原始性之一),主要器物是圜底釜,用支垫以供炊煮。这种支垫是河姆渡人的创造,以后向周围扩延,北可到淮海地区。可以想象,除陶器外,河姆渡人也用木制和编织的器物,其陶器中六角形口沿的盘,当是仿编织物或木制器物而制作的。

值得重视的是在这样的制陶工艺中,出现了彩陶,虽然是几块碎片,却不能忽视它的价值和意义。从迹象观察,彩陶制法,也较特别。它是在已饰绳纹或划纹的陶器外壁上,涂上一层稠浓的陶衣,打磨光滑后绘彩,烧成后,表面作灰白色的光亮面,纹彩则呈黑褐色或褐色。有着浓厚的地方特点,当为本地所制作。但从其纹样的风格看,很可能是与中原讯息交通后而制造的。这是我国稻作文化区最早的彩陶了。它的出现比白家文化的彩陶要晚数百年时间。

(四)有一套崇信的祭祀活动和信物

这些意识形态的物化形态,都体现在日用器物上并形之以图像,有陶器、象牙和骨板上刻划的动物和自然物的图像。过去总认为它们是一种艺术作品,实际它包含着寓意很深的观念形态,从已知的图像解释,至少有三种含义:

1. 祭祖意识,属图腾崇拜活动的遗留,主要是鸟类图形包含的寓意,有鸠和凤两种。这两种鸟是东南沿海地区,古代人们普遍的崇拜物^⑥。这些崇拜物图像,总是作为氏族的标帜和徽号刻划于日用器物和法器上。

2. 生产性的祭祀活动(农业和渔猎采集活动),以农业祭祀活动为主(播种或收获季节)。表现这类活动的图像,有丛生的谷物,盆中栽种的植物,家畜类猪的图形,旁边还有侍祭的鱼或鸟。

3. 崇拜太阳的祭祀。这是吴汝祚同志最近提出的一种看法^⑦。他认为,骨匕残柄雕刻的双头鸠中间的同心圆,就象征太阳。另一件双凤夹侍的周围有烈焰的同心圆也是太阳。这些图像,与中国古代的“鸟负日”的神话有联系。还有一个陶纺轮中间围绕圆孔,作一“十”字纹,外围以锯齿纹。根据民族学材料,这些符号是象征太阳和生命的,在纳西族东巴文中,太阳即⊕

三、有待探索的几个问题

河姆渡文化是发展阶段中的氏族部落文化,是相当成熟的稻作农业经济模式,这样一个典型的文化丛体,不论它存在多长时间,现在看来它还是孑然一身,与它相邻的诸文化及其特征,比较之下,尚难完全衔接起来,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究竟这是文化系统的不同,还是发展阶段的断隔,都需要探索,对这个问题,学者多有论述,但未作定论。

就当前研究的现状看,长江下游的滨海地区,有两个主要的文化族群:一个是偏北的三角洲及太湖周围地区的马家浜文化传统;一个是杭州湾地区的河姆渡文化传统,前者是在这里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族群,后者却是有创造业绩的先驱。在学者们的论述中,大都认为河姆渡文化是马家浜文化的前身或组成部分。

文化类型品。

河姆渡文化的碳十四测年为距今 6730 ~ 6960 年,距今 7000 年左右,我们现在见到的陶器是跨了几个发展阶段而较为成熟的器用。根据已发现最早的陶器讯息。在它之前至少还有三四千年的发展历史。

中国陶器的起源,无疑是多源的。分布在各个文化形态下的氏族部落,以其自己地区的自然条件,生活习俗的需要和传统,而制造所需要的器用。目前全国发现几处 1 万至 1.2 万年前的陶器,各地区的文化各有特点,但其原始性和普遍型则是一致的。这些发现以南方稻作文化区的较多,所以在陶器的溯源问题上,在稻作农业文化中有最大的优势。

在稻作文化区发现较早的陶器遗址有广东英德的青塘遗址,距今 9000 ~ 7000 年,桂林的甑皮岩 9000 ~ 7600 年,特别是最近在万年仙人洞和吊桶杯遗址,出土的陶片有 1 万至 1.4 万年之久,是至今发现最早的陶器,这些陶片,胎体厚重,内夹粗砂,烧制火候低,表面用草具搓擦了紊乱的条纹装饰,多具陶制品原初形态的特征。还有一个地点是湖南道县寿雁镇白石寨村的玉蟾岩遗址^⑧,也发现早期的陶片和打制石器,发现同志认为它是旧石器,以及人工干预的野生稻和初期栽培稻遗迹,时间距今在 1.2 万年左右。这批资料我曾看过,有一大堆似为底器的底部,壁厚,色杂(黑褐夹灰褐,质松脆),内夹大砂粒,是用手捏成的,确为带原始性特征的陶器,我们把它视为最早的陶器标本。

从这些早期陶器的特点,与今日江西、湖南距今 6000 ~ 7000 年左右的陶器特征相比,相隔几个发展阶段,同样,河姆渡文化陶器的创始阶段可以上溯三四千年,从各地陶器特点看,都有自己的原初形态和特点。

制陶工艺专家,曾对中国早期陶器,作了分析研究^⑨,认为,河姆渡和罗家角陶器,较之其它稻作文化早期遗存的陶器精致而进步,陶质组成,除砂质陶和泥质陶外,还有颇有特色的夹炭陶和白陶,泥质陶以绢云母质粘土为原料,其中所含的绢云母晶片和石英颗粒都非常细,砂质陶是在绢云母质粘土中夹杂有颗粒较大的石英和长石,夹炭陶则是在绢云母粘土中夹有炭化的稻壳和植物的茎叶碎片,这种陶器中的 Fe_2O_3 含量只有1.42%,比商代以高岭土为原料的白陶要低,而且也比后代的越窑青釉瓷还要低。这种较纯的绢云母质粘土,就是浙江地区后来烧制青瓷所用的原料。

从烧成的温度看,河姆渡陶器的烧成温度是 $970^{\circ}\text{C} \sim 820^{\circ}\text{C}$ 之间,即 $800^{\circ}\text{C} \sim 1000^{\circ}\text{C}$,根据实验研究,在露天烧成的温度低,从甌皮岩,仙人洞和青塘等处发现的陶器,显微结构观察,陶片中的粗颗粒矿物角闪岩,云母石等结晶结构,保存十分完好,其温度大约在 $600^{\circ}\text{C} \sim 700^{\circ}\text{C}$ 之间,而在窑内烧的裴李岗陶器(粟作文化系统)则在 $820^{\circ}\text{C} \sim 920^{\circ}\text{C}$ 。河姆渡的陶温比裴李岗的还高,技术更为进步。但河姆渡陶器的原始性子遗还是很明显的,如圜底器、袋囊形器和仿木及编织物(六角形口沿即仿物制品)的制品,还保留着,因此追溯河姆渡文化的陶器祖源,要以本地区所具有的自然条件和文化物中所利用自然条件的程度和工艺技术所显示的迹象来作探索。

探索陶器的原初形态与制陶方法是相关连的。一般人均依恩格斯提出编篮涂泥,经火烧过而成形以为制陶之始的说法,实际这是有据而合理的推测,事实上陶器的出现,是人们在生活实践中,经过多少次试验过程及设想而实现的。人们的创造往往是从自然的和人工制造的各种事物的形制,功能和制作技术的领悟而发明的,可以见知的有如仿效自然物如葫芦、颅骨的自然

形状、皮囊和木制容器,在编织物中涂胶泥以防漏水,像几何印纹陶的形制及纹痕,只是远古制陶工艺中之孑遗。像在水乡的河姆渡人,当时用具在一些编织物涂泥以防漏水的事实是存在的,陶器的制法之一是采用这种办法有可能的,但不是因火烧后而偶发领悟而产生的,而是仿其形制而烧造的,恩格斯的说法是有民族学根据的。《事物的起源》(Origin of things)一书中,关于陶器的起源,说是仿照石制容器烧制的,又有一个故事说,人们用树叶卷起来盛水饮用的领悟而仿造的等等。人类最早使用的容器除自然物外,用石头制作是有可能的,对掌握制石技术的人,最早用石制造容器,比烧制陶器容易的多,但这必须在定居生活后,始能实现,我在希腊看到古代希腊墓葬里,为死者随葬一整套用石制的生活用的器皿。我想在生民初跻文化之域,用石头、木头和胶粘的泥土都作过容器,后来加火烧烤使之坚固而成陶制器皿。用火烧烤,使粘土硬坚成器,这在人们用火过程中是能体会到的。从发现早期的陶器形制中看,如玉蟾岩,陶器是随手捏成能容物的容器,形小而壁粗厚,后来技术进步了,才制造形美而壁薄的器物。

陶器发明的关键技术是火烧粘土使之成形而不至龟裂,所以在陶土中,加籾和料及掌握火候度,在人类原始技术史上,是弓箭发明之后的又一技术创造,这一创造对人类生活史的发展起了革命性的变化,这是人们在千万次的试误实验中得到验证才实现的,用火烧制陶器,是人类文化进步的一个标志,河姆渡人的这一技术,从后期的发展状态看,是相当早的,不会晚于其他氏族部落。

从河姆渡文化的陶器特点,以及与越系陶瓷的历史联系上看,它的发展序列是从夹炭陶——夹砂陶——泥质陶——几何印纹陶到原始瓷的出现,它是渊源有自而独成传统的陶瓷文化

体系,应有一个发展过程。我们的任务是追溯夹炭陶之前的始初阶段的粗厚而质朴的原始陶,只要探索寻觅,问题是能够解决的。

初民社会的人把火广泛地使用于生活方面,是在烧制陶器成功之后,因为陶器成形后,知道了火作用于泥土会发生的有益效应,最早用火炊煮,烧烤食品,烧造陶器,烧红烧土块(有砖的功能),以铺垫场地,烘烤居室以加固建筑等等,作了不少推进文化发展的创造活动。

(二)关于农业的起源

解决中国稻作农业起源,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地区是最有希望的地区,目前发现较早稻作起源证据的是在长江中游,有两个地点^③;即前面讲的仙人洞和玉蟾岩。仙人洞和吊桶杯的孢粉中,发现了类似水稻的扁形体,为探索稻作农业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在玉蟾岩遗址,发现两种稻谷遗存:一种是人工初期干预的野生稻;一种是栽培稻,兼具野生稻,籼稻,粳稻的特征,为一种由野生稻向栽培稻演化的古栽培稻类型,这是当前发现世界上年代最早的栽培稻品种,为水稻起源于我国增加了新的力证。

在我国南方野生稻普遍存在的情况下,水稻起源当是分头的,从现在稻作文化的资料讲,在河姆渡文化系统中找寻水稻起源较之其他稻作文化区当更有希望。

从理论上讲,实际上也是如此,栽培农业之前,还有一个“采集农业”阶段,它是高级采猎文化向农业文化发展的一个过渡阶段;第一,丰富的食物采集文化区的活动;是产生农业文化的重要条件,这两点河姆渡文化都具备。所以从河姆渡文化传统中,探索水稻起源的优势是,它所处的生态环境,是适于早期农业文化发展的丰富的食物采集地带;第二,它本身丰富的稻作农业文

化内涵,有一定的文化模式规范,能规律地探讨它的来龙去脉。

“采集农业”的存在与丰富的食物产区是相联系的。

美国学者索尔(Sarlo Saller)提出有关农业起源和传播学的一种新学说^⑩:农业不是起源于贫脊的食品缺乏的地区,因为在经常饥荒的情况下,人们无暇、也无力量从事有较长时间的试验或试误而获取食物的农业耕作,只有在较好的环境内,有丰富的食品来源,才能以选择的方式改进植物,以获取较好的不同的食物来源,所以农业的发明与出现“只能由在饥馑的水平之上有相当的余地来生活的人们来达到的”。这种富裕食物采集民族或部落领域是能够达到向农业转变任务的理想环境。索尔认为东南亚是具有农业最初起源的必要条件,植物和动物之显著的复杂性,以及具有淡水食物资源的森林、丘陵和山地的环境。他描写这些最早农人的生活图景是:“在淡水河边,温和气候之下生活进步的渔民……许多水路作为与其他村落彼此交往的路线,也就是新想法的交换与成长的路线。……水禽,河边的哺乳动物,以及水边的植物,使得食物不致单调。树枝和纤维用来作渔网和绳索,而且合适的木材可用来作船舟和木桨。”

索尔所谈的东南亚的生态环境,和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是类同的,是属同一类型的生态环境区。把东南亚早期农人的这一段描述,换成河姆渡遗址(任何东南沿海一个遗址都可以)那将是十分合宜的。

索尔所说的早期农业垦殖者的环境,正好与河姆渡人的生活环境相同,是典型的丰富的食物采集文化环境,河姆渡聚落揭示出我国稻作先民,从事采集农业过渡到耕植农业的一个试验场地,在这里给我们提供了:

1. 用于物质生活资料的丰富的动物资源^⑪:包括家生的、野生的动物有:狗、猪、水牛、羊、梅花鹿、麋(四不像鹿)、水鹿、犀

牛、象、虎、黑熊、貉、青鼬、猪獾、水獭、猫、灵猫、狸、黑鼠、豪猪、穿山甲等类。

鸟类有：鸕鹚、鸬鹚、鹭、鹤、野鸭、雁、鸦、鹰。

鱼类有：鲤、鲫、青鱼、鲢、黄颡鱼、鳊、裸顶鲷、鲮鱼。

爬虫类有：扬子鳄、乌龟、鳖。

蚌类有：无齿蚌等。

2. 植物性的食物有：稻类葫芦、菱角、酸枣、橡子、栎、苦槠、天仙果、细叶香桂、山鸡椒、江浙钓樟等，这些植物都是属于亚热带常绿落叶阔叶林植被的组成部分，从孢粉分析得出结果，河姆渡比现在温暖，气温相当于今日两广和云南地区，水域广阔，湖泊相连，森林密茂发育，林下多繁衍热带蕨类，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⑬

植物学家李惠林先生认为^⑭，这个地区的水生植物的菱角、茨菇、荸荠、菰、芹、茭、薏、蒲和灯心草等作物，在这一地区发展成为一种特殊的农业系统，即湿地农业。称为水植农业（Aquaculture）。这些作物，供给丰富的淀粉、糖质，富有蛋白质的果实、种子或多肉的地下茎，即在今日仍为主要作物被使用，在中国为人工栽培驯化为家生作物。

河姆渡人广泛地利用了附近环境所提供的条件，森林被覆的丘陵，布满沼泽的平原和淡水湖等各种地形中非常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创造了我国稻作农业文化的采集阶段而过渡到耕植阶段。

在河姆渡遗存中，发现的植物性食物中，由人工栽培的品种最多，水稻只是其中的一种，在其他任何一种稻作聚落文化遗存中，都没有它这样丰富而典型，李惠林先生所提出的水植农业，我想应该就是稻作农业的采集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从诸多栽培物中选择最优良而稳定的品种水稻加以耕植是很自然的事，因

此,在丰富的食物采集地区,农业的发展是经过采集农业阶段。

如何去探索这个“采集农业”阶段的源头呢?根据植物孢粉分析的证据来看,在10000~7000年期间,长江下游的自然环境没有多大变化,河姆渡人的先民在这样的环境中持续生活了三四千年,他们在改造自然的创造性劳动上,一定会留下足迹和创造品,因此,寻找河姆渡稻作文化的原初形态就在:

1. 附近的宁绍平原,再扩大到三角洲地带,对同样性质的文化遗存作深入的发掘和研究,不断地整合它们发展的序列,特别要多学科地分析研究发现物中之迹象和性质,以要充实和纠正我们对之不断发展的正确认识,以求取得最佳成果的解释。

2. 已有的证据证明,在农业文化之前,我国普遍存在过一个采猎经济时代,这一时代的特点是以细石器工具为特征的高级采集经济,农业是从它的发展实现的。因此,在长江下游特别是宁绍平原及其附近作一深入地勘查,寻找细石器文化遗存,并对洞穴遗迹特加重视,美洲玉米的最早遗迹是在洞穴堆积中发现的。上述我国其他几种早期遗存也如此。如果在这方面有所突破,那将有巨大的理论意义。

研究了河姆渡文化发展情况,并相应的考察了其他各民族部落文化。相较之下,我觉得河姆渡文化繁荣滋长的宁绍平原及其附近,与仰韶文化繁衍生息的渭水河谷的关中平原是稻、粟两大农作物诞生的摇篮,因为它们具有同样典型而不同类型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同样优越而不同特点的适于早期农业发展的生态环境。即适于采集农业发展的生物学条件。河姆渡已如上述,这里不再重述,仰韶文化与关中地区也是同型同格。在黄河流域再找不出像关中盆地那样形胜富庶之区,当时关中气候与今日长江流域相类,温暖而湿润,在东西狭长的小盆地中,横贯一条大河,两侧由数十条大小不同的羽状溪流汇注其中,集中散

穿在两岸不同高程的肥美原地之间。宁绍平原所呈现的山川河流、湖泊沼泽,一应俱全,每组溪流谷地,均可视为粮仓菜地,滋养着世世代代的仰韶儿女,成为粟作农业文化中,最丰富的食物采集区,因而由采集而跻于栽培的作物品种也多,有粟、黍、油菜、白菜和芥菜等富有营养价值的食物,健壮着居民的体质和智力发育,不断地促进文化的发展,终于成长为中华原始文化共同体中的主体组成部分。

我们把这样的探索,再广延到全国其他氏族聚落文化发展的中心地位,如河洛地区、江汉地区、海岱地区、淮海地区、湘赣地区、陇右地区、燕辽地区、闽台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等,我们就会找到更多的采集农业文化区,我们找到的源头越多,对其文化覆盖面及其内涵,了解的越广越深,族系间的融合关系越清楚,文化上的独创与借用,交流与传播的规律性也就越明确。这样,不论在指导研究实践,还是理论概括方面,都是很有意义的。

(三)关于追流问题

河姆渡文化的发展去向问题,也可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是原生文化的地区性承传;另一方面是衍生支系的分流和传播。关于前者,遗存本身晚期堆积层中,文化相似的一些因子与马家浜文化有相当明显的同一性,表现其两者之间有密切的关系,虽然中间还不能完全整合起来,但发展的趋势,当是融合马家浜文化传统之中,则是合理的,这一点,牟永抗同志在“论河姆渡文化”^⑨一文中,已作了详细的论证,兹不多赘。两支文化融铸在一起,必然会产生历史冲力和创造活力,会促进文化的迅速发展,这就产生了后来成为东南地区文明中心的良渚文化族群,他们在先驱们最早垦殖的这堆土地上,创造了一系列值得辉煌的文化珍贵品——玉器、原始瓷和金属制品,代表中国文明产生时代的重要标志。在进入历史时期后,这里一直是中国农业上最富庶、经济上最富饶、文化上最进步和繁荣的地区,造成这样的

历史必然,是优越的自然环境与人文智慧创造性的结合而出现的历史业绩。

至于文化的分流和传播问题,不少资料提供的线索,东方沿海地区的古代居民,其主要移徙方向,是附近海域和西南地区,即历史上古代越僚族系活动的地域,即今日江苏南部、浙江、福建、台湾、江西和两广地区。可据以探索的文化内涵有四方面:

1. 有干栏建筑结构形式及其工艺特点的文化遗存,工艺技术特点是有承传性的。形式结构是一定文化模式和生活方式的反映。虽辗转迁移,多保持固有特点。

2. 在有鸟类崇拜的文化遗存中探索,特别有鸠和凤类的遗存,这种意识形态的特征,往往比物质文化因素保存的牢固而长久。

3. 保存或采用耜耕农业的聚落文化中探索。相同的生产工具与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是有承传保守性的。

4. 日用器皿的典型性,与生活习俗和饮食习惯有关,是文化面貌的照片,最有典型代表性。

在文化分流过程中,同样的文化族群,因时移地异,不一定所有几种因素同存于一个聚落中,存在一二种或三四种亦可探其历史联系,究其移徙路线和时代序列。对古代越人先民的历史研究特别有价值。

科学的发展,总是不断前进的,考古学领域的诸多难题,也随着工作不断深入发展,逐渐为人们认识。新的发现,不断丰富和深化我们对问题看法和认识。新的科技手段和取得的成果,把古代文化与自然交互作用的辩证关系的规律性也被揭示出来,新的科研成果,也不断启示和提出深层次问题,使我们能有更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更深邃的理论来探讨阐明问题,河姆渡文化所涉及的农业起源问题,每个文化传统都会提出一些值得探索的问题,这样,我们就会对一系列提出问题,不断地探索,逐步会得到较彻底的理解和认识。

注释

- ①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博物馆：《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河姆渡遗址考古队：《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0年第5期。
- ②游修龄：《对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出土稻谷和骨稻的几点看法》，《文物》1996年第8期；宋兆麟：《河姆渡遗址出土骨稻的研究》，《考古》1979年第2期。
- ③⑤⑫浙江省博物馆自然组：《河姆渡遗址动植物遗存的鉴定研究》，《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 ④⑬宋兆麟：《河姆渡遗址出土骨稻的研究》，《考古》1979年第2期。
- ⑥石兴邦：《我国东方沿海和东南地区古代文化中的鸟类图像与鸟祖崇拜的有关问题》，《中国原始文化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234—266页。
- ⑦吴汝祚：《略论长江、黄河流域史前时期的太阳神崇拜》，《华夏考古》（郑州，1996年第3期）第75—72页。
- ⑧⑩谷菽：《95全国十大考古发现》，《文物天地》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2期第2—3页。
- ⑨李家治、刘志刚、邓择群、梁宝璠：《新石器时代早期陶器的研究——兼论中国陶器的起源》，《考古》1996年第5期。
- ⑪Carl Sauer: *Agriculture origins and Dispersals*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69, 第二版) PP. 20—24.
引自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社1995年版。第157—163页论述在《中国东南海岸的〈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一文。
- ⑭同注⑪，张光直：第161—162页 Han - Lui Li: "The domestication of plants in China Elogographical Consideration" in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guiion*. Ed by Darid N. Reightly (unirersih, ofcaleifornia prell 1983) PP. 43 - 46。
- ⑮牟永抗：《试论河姆渡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第97—100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河姆渡遗址浅析

安志敏

河姆渡遗址为建国以来的重大考古发现之一。它不仅填补了江南地区前期新石器文化的空白,对宁绍平原的史前文化内涵及其发展序列也提供了重要的论证。

河姆渡文化的命名,是我国考古学史上的一件大事。目前在认识上还有分歧:一种意见把河姆渡遗址的第一至四层,统称为河姆渡文化;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河姆渡文化应以第三、四层为限。议论纷纭,迄无定论。作者倾向于后一种见解,即河姆渡文化的内涵似应有所界定。

作为河姆渡文化的第三、四层堆积,特征突出,如以夹炭黑陶为主的陶器有着特定的器形,磨制石器的形制原始,繁多的骨耜和精湛的骨、木雕刻工艺,更罕有伦比,具有十分显著的文化特征,至于河姆渡遗址的第一、二层堆积,显然与马家浜文化及其以后的遗存有关,如粗红陶的鼎、盂、穿孔石器和进步的木耜等都代表新兴的形制,同马家浜文化相近似。特别是双袋足的异形鬲(即前面两个袋足,后面以巨型釜为支架的鬲形器),更系良渚文化的典型器物之一。从而河姆渡遗址的第一、二两层不宜归入河姆渡文化,当与马家浜文化或良渚文化有着更密切的联系。

河姆渡遗址的地层堆积,代表着宁绍平原的史前文化序列,由于地域性浓厚,故其文化面貌与杭、嘉、湖平原有所区别,但其演化发展规律基本上一是致的,同时以杭州湾南岸宁绍平原为

中心的马家浜文化已远达舟山列岛；这里的良渚文化也更向南延伸到达浙南的飞云江一带，与昙石山文化相接壤。因而宁绍平原的河姆渡文化及其后续诸文化的序列和文化特征，还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从羽人纹饰看羽人源流

毛昭晰

羽人亦称羽民。在我国古代典籍中最早提到羽人的大约是《山海经》，这本书对羽人的模样及生息之地有简单的叙述，如《大荒南经》：“有羽人之国，其民皆生毛羽。”《海外南经》：“海外自西南陬至东南陬者……羽民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一曰在比翼鸟东南，其为人长颊。”同书《海内西经》：“洋水、黑水出西北隅，以东，东行，又东北，南入海，羽民南。”^①

先秦两汉的其他一些著作中也多次提到羽人或羽民。《楚辞·远游》：“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东汉王逸注云：“山海经言有羽人之国，不死之民。”^②《吕氏春秋》卷二十二讲到禹为了求得贤人而四处奔走，曾经“南至……九阳之山，羽人裸民之处，不死之乡”^③。西汉刘安《淮南子》也有两处提到羽民。《淮南子·原道训》：“夫能理三苗，朝羽民，纳肃慎，未发号施令而移风易俗者，其唯心行者乎。”《淮南子·坠形训》：“洋水出其西北陬，入于南海羽民之南。”^④对于“羽人”的解释，有一种意见认为羽人就是仙人，人得道了，身上生了羽毛，变成了“飞仙”。宋代洪兴祖《楚辞补注》及朱熹《楚辞集注》都说“羽人，飞仙也”。但从《山海经》、《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等书的记载来看，“羽人之国”、“羽人裸民之处”、“南海羽民之南”等等都是方域专名，与得道成仙并无关系，所以王充在《论衡》中说：“毛羽之民，土形所出，非言为道身生毛羽也。”^⑤羽人身上“皆生毛羽”只是远古的传说，实际上所谓“身生羽”，是以羽毛作为装饰的一种习俗。根据《山海经》等著作所记载的传说，羽人所处之地，大体是在中原

之南或东南。有的学者指出：所谓羽人，就是我国云南、贵州、广东、广西以及越南、老挝等东南亚地区出土的古代铜鼓、铜钺、贮贝器、扣饰等青铜器上常见的头饰羽毛、羽冠或身披羽衣、羽饰的人物图像，由于这些人物以羽毛为饰，所以研究者统称为“羽人”。^⑥由此看来，古代的传说并非无稽之谈，它和近代考古发现所见的材料基本上是吻合的。虽然在位于中原的西安曾发现一件汉代的铜羽人，背部有卷云纹双翅，但它可能与汉代统治者“羽化登仙”的思想有关，而和上述古代文献中所说的“羽人”不是一回事。此外如江苏睢宁九女墩汉墓出土的画像石中采摘仙果的羽人及浙江东汉铜镜中的羽人，背上有翼，腿上垂羽，其性质亦和神仙思想相关，不属本文讨论的范畴。本文要探讨的是古代越系文化中的羽人。先从浙江鄞县的一面铜钺上的羽人谈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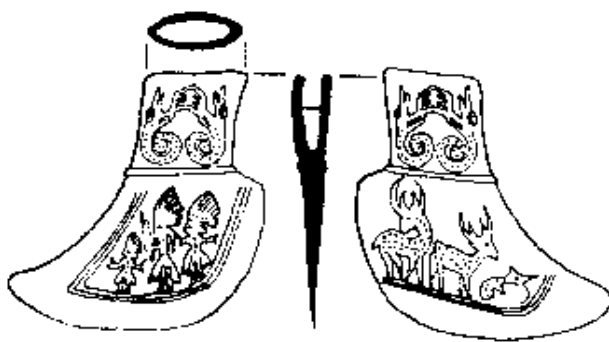
1976年浙江鄞县甲村石秃头出土一件铜钺。和铜钺一起出土的还有春秋时代的剑、矛各一件，其年代大致可定在春秋末期。^⑦铜钺略呈扇面形，正面高9.8厘米，刃宽12厘米，銎厚2厘米，一面是素面，另一面通体刻有纹饰。在边框线内，上部有两条匀称相对的龙，尾部向内卷曲，头向上，有角，龙身前部各有一足。纹饰下部以边框线表示船形，船上有四个划船的人，身上有点纹，头上有羽冠，羽冠的最后一根羽毛上有流苏。四人中最后一人头后部有明显的头髻，前面三人的头髻以图案的方式与后面的划船者相连，设计得十分巧妙（图一）。划船者身上的点纹较浅，拓片很难拓出，所以研究者多不注意。笔者仔细地察看了原件，羽人身上点纹可清楚地辨认。图一是笔者根据铜钺原件绘制的。

鄞县石秃头铜钺上的纹饰，使笔者很自然地想起越南东山文化的一件不对称形铜钺（靴形斧）^⑧（图二）。这柄铜钺的形状虽然和鄞县石秃头出土的铜钺不同，但是铜钺两面的上部都有匀称相对的两条龙，尾部向内卷曲，龙身和龙尾与鄞县石秃头的

铜钺一样都有点纹,头部也向上。所不同的是头上没有角;眼睛加上了两条线作为眼眶;相对的足有了分开的爪,两爪相连,而且龙足靠近胸部的地方有一空隙,说明每条龙伸出来的是两只足;另外,龙的向上的嘴是张开的。总的说来,越南这件铜钺的双龙纹饰比浙江鄞县石秃头铜钺的龙纹要复杂,可能是因为其年代比石秃头铜钺晚的缘故。但龙纹在铜钺上的位置以及两者的基本特征是相同的。从图二可以看到东山文化这件铜钺的下部,一面有两只带角的鹿和一只狐狸,身上都有点纹。另一面有三个站立的人,中立者在奏乐,旁立两人双手张开作舞蹈状,三人裙裾均为前后两幅。虽然鄞县石秃头铜钺上的羽人是坐着的,东山文化这件铜钺的羽人是站着的,但两者仍有非常明显的共同之处,例如所有的人都有羽冠,有流苏,有头髻,身上都有点纹。东山文化铜钺中最后一人羽冠下部和鄞县铜钺上的羽人一样有两排点纹。这两件铜钺的纹饰实在太相像了,它们只能属于同一种文化。



图一 浙江鄞县甲村石秃头出土羽人船纹铜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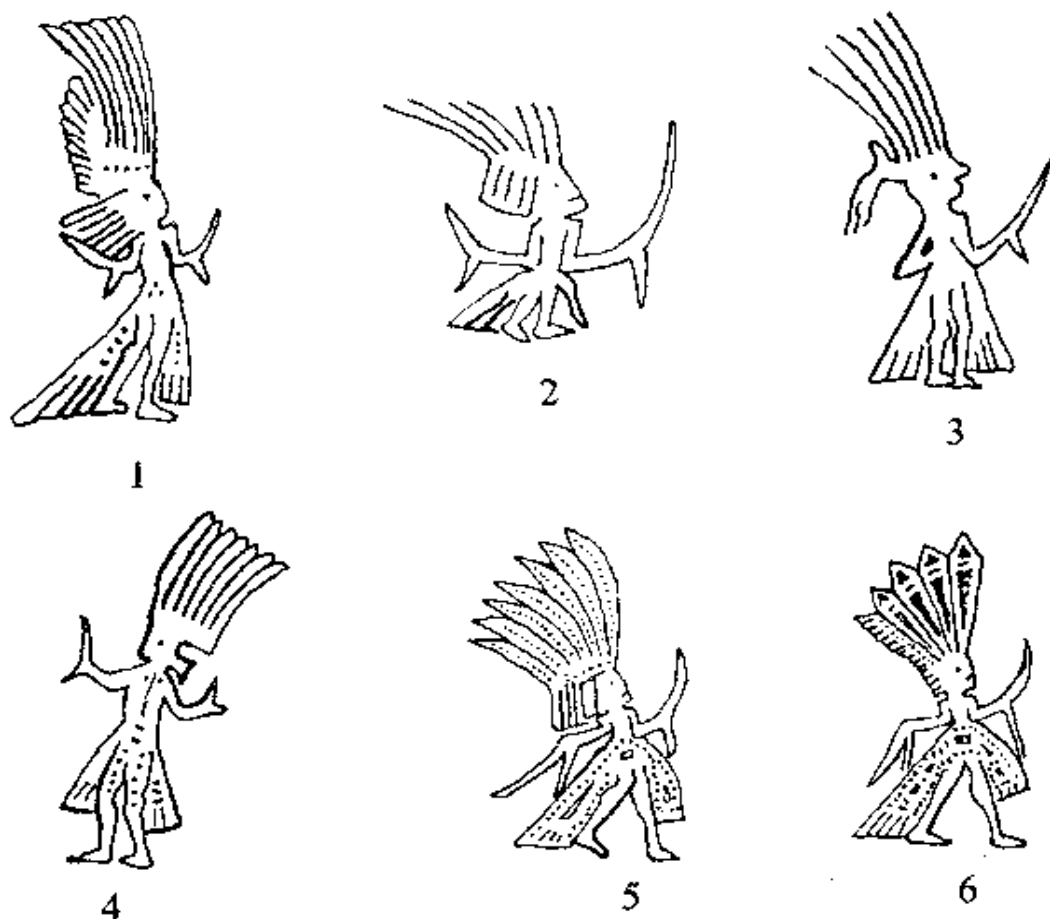


图二 越南东山不对称形铜钺

羽人纹饰多见于广西、云南、贵州、四川和越南的铜鼓上。最常见的羽人纹饰有两种,一是羽人舞纹,一是羽人船纹。上文所述的越南东山文化铜钺中的羽人纹饰是乐舞纹,而鄞县石秃头铜钺的羽人纹饰是船纹,正好代表了铜鼓上常见的两种主要的羽人纹饰。

如果把上述东山文化铜钺中的乐舞羽人和我国西南地区及越南铜鼓上的羽人乐舞纹相比较,可以看出它们之间也十分相似。例如广西西林普驮屯土 280 号鼓、云南江川李家山 M24:42B 号鼓、江川李家山 M24:60 号鼓、云南广南县广南鼓、广西贵县罗泊湾 M1:10 号鼓等铜鼓上的乐舞羽人,和图二越南东山文化不对称形铜钺下部的乐舞羽人一样,有下列共同之处:1. 头上都有羽饰;2. 下身的裙裾前后两幅分开;3. 双手舞蹈的姿势是大拇指和其他四指呈分叉状,大拇指多向下;4. 身上往往有点纹(图三),有时同一器物上有的羽人有点纹,有的没有。其中广西西林普驮屯土 280 号鼓,不但乐舞羽人的纹饰和图二东山文化铜钺相似,而且鹿的纹饰也极其相像。由于一个民族的服饰和舞姿常常能反映其文化生活的特点,所以我们不能不产生这样的看法,即我国两广、云南、贵州、四川等地铜鼓上所见的乐舞羽人纹饰和图二东山文化铜钺乐舞羽人纹饰也属于同一种文化或者受同一种文化的影响。

羽人乐舞纹有时和羽人船纹同在一个铜鼓上,例如晋宁石寨山 M1:1 号鼓、石寨山 M1:58 号鼓、罗泊湾 M1:10 号鼓等。^⑨最有代表性的是广西西林普驮屯土 280 号鼓,此鼓环腰饰十二组乐舞羽人,每组二人,乐舞羽人上面是十二组鹿纹,在鹿纹之上的铜鼓胸部是羽人船纹,共有船六条,每船载八、九、十一人不等,多为划船的羽人,也有站立的,头上均有羽冠,羽冠下部多有点纹,划船者中也有无羽饰而仅有头髻者。虽然划船者身上无



图三 乐舞羽人

1. 普驮屯土 280 号鼓 2. 江川李家山 M24:42B 号鼓 3. 江川李家山 M24:60 号鼓 4. 广南鼓 5、6. 贵县罗泊湾 M1:10 号鼓

点纹,但整个纹饰和鄞县石秃头铜钺上的羽人船纹仍十分相似。^⑩

关于羽人船纹中的船的用途,许多学者作了细致的比较研究。^⑪黄德荣、李昆声在《铜鼓船纹考》中把羽人所用的船按其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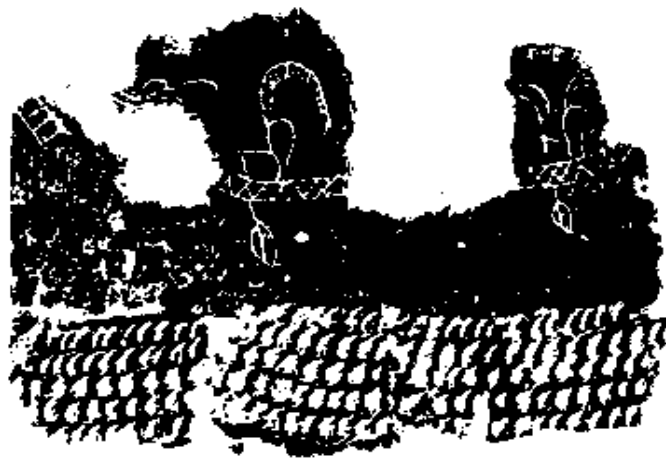
途分为渔船、交通船、祭祀船、竞渡船、游戏船、海船等类型。而李伟卿在《铜鼓船纹的再探索》一文中认为找不到航海的证据。非常引人注意的是晋宁石寨山 M14:1 号铜鼓的四条船纹中,有一条羽人所划的船,其船尾紧随着一只巨大的海龟(图四),据此,黄德荣、李昆声认为“此船当是海船无疑”。^②这一意见十分正确。从纹饰中可以看到此船船尾设一极长之橹,虽然橹在内河航行中是常见的动力设施,但海船亦可用橹,浙江沿海一带的岛屿间,至本世纪 60 年代还有一些小船和舢舨以橹作推进和掌握方向的工具,所以根据尾随的大海龟推断此船为海船是合乎情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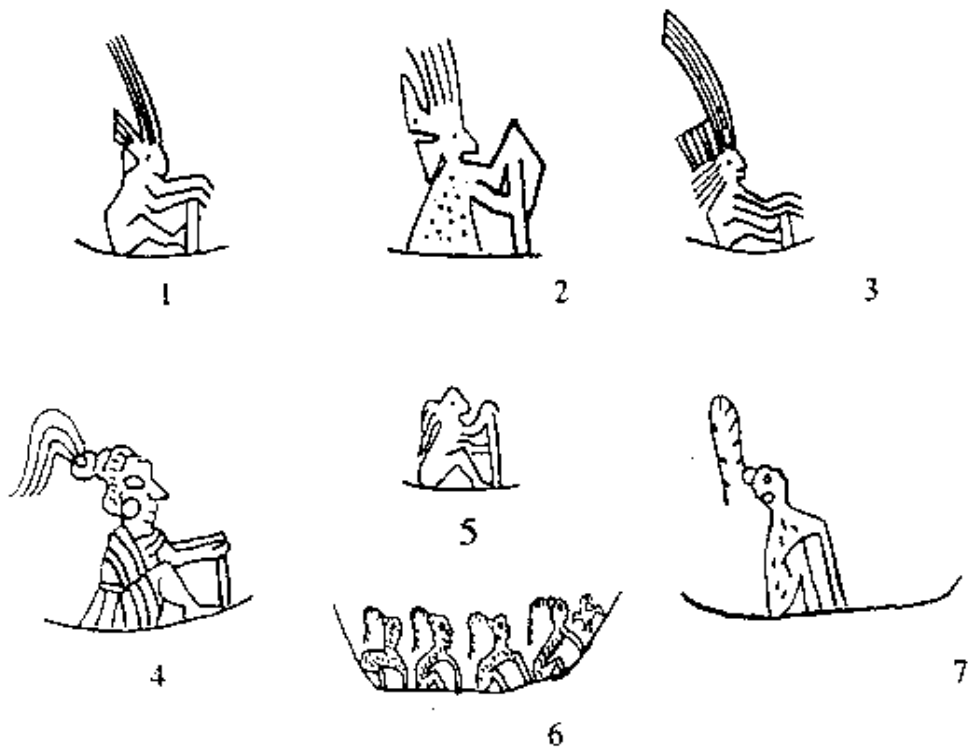
图四 云南晋宁石寨山 M14:1 号铜鼓上的羽人海船纹饰

石寨山在云南内陆,而石寨山铜鼓纹饰中却出现了海龟和海船,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纹饰的制作者或其祖先是来自海路到达中国西南的。至少他们的文化受到一种来自海路的文化的影响。这种文化就是浙江古代的越族文化。鄞县石秃头铜钺上的羽人纹饰的发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从年代来说,它比越南东山文化和中国西南地区铜鼓上出现的羽人纹饰都要早,究竟谁影响了谁,是不言而喻的。

十分有意思的是日本鸟取县淀江町的弥生时代陶器上也发现了羽人船纹^③,其构图十分简单,但划船者头上的羽饰却十分突出(图五),和鄞县石秃头的羽人船纹相比,羽冠的形状并不一样。但是在中国百越地区所发现的羽人船纹或羽人乐舞纹,其羽饰也有繁有简,并不都是一模一样的,有的和日本淀江町弥生



图五 日本淀江町弥生陶器上的羽人船纹拓片



图六 几种羽饰不同的羽人船纹

1.越南富川鼓 2.石寨山 M14:15 号鼓 3.越南庙门鼓 4.四川会理 3 号鼓 5.越南鼎乡 2 号鼓 6.石寨山 M1:1 号鼓 7.石寨山 M1:58 号鼓

陶器的羽人船纹一样,头上只有一根羽毛(图六),可见羽饰是最具有特征的东西,而并不在于其数量之多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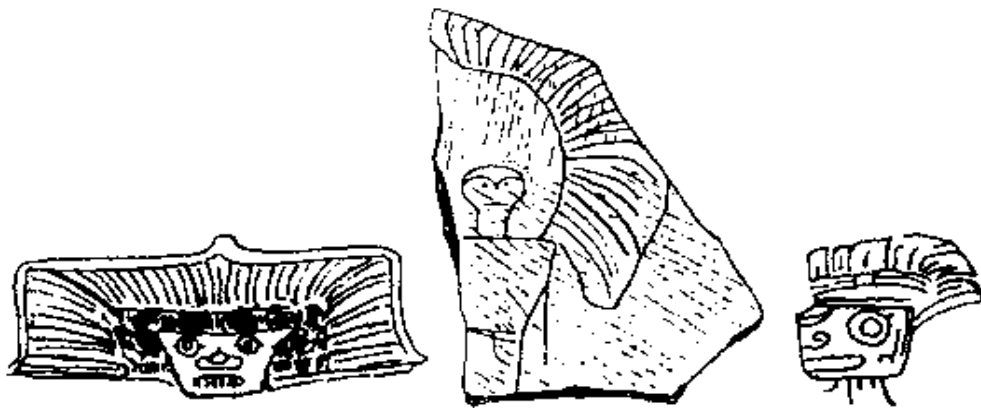
最早的羽人源于何处?从考古材料看,古代越系文化中羽饰的习俗,可以追溯到良渚文化时期,甚至可以追溯到河姆渡文化时期。

1986年浙江余杭反山和瑶山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玉器,有些玉器上雕刻着神人兽面纹,最引人注意的是反山12号墓中一件重达6.5公斤的大玉琮(反山M12:98)上的纹饰。在这一玉琮四面中间的直槽上雕刻了八个“神人兽面纹”,每面上下各两个,神人头上戴有宽大的略呈放射状的羽冠(图七)。日本奈良坪井陶器上羽人头像的羽冠与此有些相像(图八)。反山同一墓葬中出土的一件玉钺(反山M12:100)也有一纹饰相同的头戴羽冠的“神人兽面纹”。在其他一些玉器如冠形器(反山M15:7、瑶山M2:1)、璜(反山M22:20)、串饰(反山M22:8)、牌饰(瑶山M10:20)、柱形器(反山M12:8)的上面也可见到头戴羽冠的羽人,有的纹饰被简化了。在有些玉琮上,羽人头上的羽冠甚至被简化成平行的弦纹。反山16号墓出土的一件玉冠形器(反山M16:4)的兽面两侧各刻有一羽人线雕侧面像,大眼、宽鼻、阔嘴,头冠上的羽毛略向后倾(图九)。在良渚玉器纹饰中,像这样的侧面羽人像比较少见。

1989年浙江嘉兴大坟遗址发现一个崧泽文化时期泥质灰陶俑,头部后面有锥髻,而头顶偏后处有小孔,我认为这是用来插羽毛的。^⑩

再往前推,1977年河姆渡遗址第二次发掘时,在第三文化层曾出土几个泥质陶塑人头像,其中有三个人头塑像的头顶钻有横向排列的小孔:红陶双耳人头像[T242(3B):71]有五个孔,陶塑冲天鼻人头像[T234(3A):34]有六个孔,还有一个陶塑人

头像[T235(3B):42]有八个孔(图十),显然这些小孔也是用来插羽毛的,如果用于固定一般的头冠,那么只要一个小孔就足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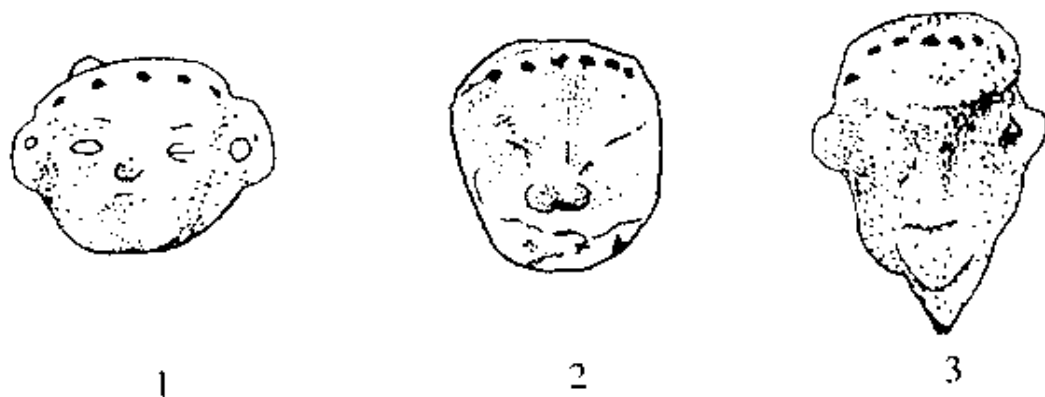
图七 反山
M12:98 玉琮上
“神人兽面纹”的
羽冠

图八 日本奈良
坪井遗址陶片的
羽人头像。

图九 反山
M16:4 玉冠形
器上的羽人侧面
像

了,甚至完全可以不用小孔而只要用泥土将头冠和头部捏在一起就行了,更不必把好几个小孔钻在头顶上排成横向的序列。如果在这些横向排列的小孔中插上羽毛,从正面看就会像良渚文化玉器上“神人兽面纹”头上呈放射状的羽冠。而从侧面看就会像前述那些铜钺、铜鼓上的羽人纹饰的羽冠或反山 16 号墓那件玉冠形器上的羽人线雕侧面像。由此可见,古代越族或越族先民在头上插羽毛的习俗,从河姆渡第三文化层的时期,也就是距今 6500 年至 6000 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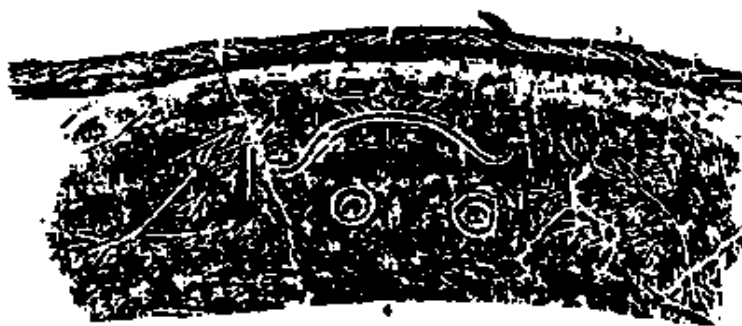
另外,在河姆渡第四文化层出土的一个刻划着鱼和水草的陶盆(T29④:46)上,有一组纹饰(图十一)很值得注意。^⑤这组纹饰下部有两个用两道线刻划成的圆圈,好像是两只眼睛。上部也用两道线刻划成一个弧形,好像是人的头顶。头顶中间是一个形状像帽子似的東西,两边各有几道斜线向上呈放射状倾向两侧,很像良渚文化玉器中“神人兽面纹”的羽冠。这组纹饰很



图十 河姆渡遗址第三文化层出土的头顶有小孔的泥质陶塑人头像

1. 红陶双耳人头像 [T242(3B):71] 2. 陶塑冲天鼻人头像 [T234(3A):34] 3. 陶塑人头像 [T235(3B):42]

可能是一个简化了的羽人头像。如果这一假设能成立,那么古越族(或越族先民)最早的羽人纹饰可以追溯到距今 7000 年至 6500 年前。



图十一 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出土的陶盆 (T29④:46)上的刻划花纹拓片(局部)

为什么古越族会产生羽饰习俗,许多学者已经指出,这和古越族的鸟图腾有关。古越族的鸟图腾反映在许多器物的纹饰中,也反映在中国古籍所载的“鸟田”神话中,而“鸟田”则和稻作

农业有着密切的关系。

根据羽人纹饰的比较,说明在古代的东海和南中国海存在着海上的道路。以古代越族的发源地浙江为起点,一方面出东海向南到达南中国海和越南,其中一部分人到两广后溯江而上,最后到达贵州、云南、四川等地。另一方面从浙江经东海的舟山群岛顺海流或乘季风到达日本。

正因为存在着海上的道路,所以《山海经》和《淮南子》等古籍在谈到“羽民”时,有“海外”、“南入海”、“南海羽民之南”等等与海有关的记载。不过除了海上的通道之外,也不能排除越系文化的羽饰习俗通过内河或陆路影响或传播到其他地区的可能。

注释

- ①本文所引《山海经》均出自袁珂校注《山海经》,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 ②参看:姜亮夫《楚辞通故》,齐鲁书社 1985 年出版;姜亮夫《重订屈原赋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对“羽人”一词的解释。
- ③《吕氏春秋》卷二十二《慎行论·壹行》。
- ④《淮南子》。
- ⑤《论衡》卷二《无形第七》。
- ⑥郑羽平:《羽人探谜》,《民间文学论坛》1987 年第 5 期。
- ⑦曹锦炎、周生春:《浙江鄞县出土春秋时代铜器》,《考古》1984 年第 8 期。
- ⑧ Peter Bellwood: *Man's Conquest of the Pacific—The Pre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and Ocean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186.
- ⑨参看:李伟卿《铜鼓船纹的再探索》,黄德荣、李昆声《铜鼓船纹考》,见《中国铜鼓研究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86 年版。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编《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文物出版社 1988 年版。

- ⑩参看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编《中国古代铜鼓》，文物出版社 1988 年版。
- ⑪《中国铜鼓研究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86 年版。
- ⑫黄德荣、李昆声：《铜鼓船纹考》，同上。
- ⑬大阪府立弥生文化博物馆编：《弥生文化——探寻日本文化的源流》（日文），平凡社，1991 年版。金关恕：《鸟夷和弥生时代的祭典》，见《稻》（日文），东亚文化交流史研究会，1990 年版。▶
- ⑭陆耀华：《浙江嘉兴大坟遗址的清理》，《文物》1991 年第 7 期。
- ⑮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姆渡遗址第一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 年第 1 期。

河姆渡野生稻发现的意义

严文明

据汤圣祥等报道,他们用浙江省博物馆提供的 105 粒出自河姆渡遗址的稻谷,抽取其中保存较好的 81 粒,利用浙江农业大学的扫描电镜进行观察,发现其中除 70 粒可断定为栽培稻外,还有 4 粒(一说 5 粒)普通野生稻。这一结果已经一再发表^①,为本次会议提供的报告则有比较详细的描述^②。这儿粒稻谷的外形较瘦长,有长芒,芒上的小刚毛又长又密,小穗轴脱落斑痕小而光滑,显系自行脱落的痕迹,凡此都落入普通野生稻特征的范围之内。这一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注意,认为是给稻作起源于长江下游说增加了支持^③。

河姆渡的稻谷遗存数量甚多,保存良好,为科学研究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又因其年代久远,形态变异甚大,与其共存的农具及相关的遗物特别丰富,因而对于研究稻作农业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正因为如此,在河姆渡稻谷遗存发现之后不久,学术界便提出了稻作农业的起源地应在长江下游及其附近的观点^④。从那以后,关于稻作农业起源的研究又有了长足的进展,新的考古发现一个接着一个。首先是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的发掘,把水稻起源的时间向前推进了 1000 多年^⑤,那是 1988 年秋季的事。在此以前,湖北宜都的城背溪、枝城北和陕西西乡的李家村也都发现过同时期的水稻遗存;稍后的澧县彭头山附近的李家岗、曹家湾、八十当、下刘家湾等地

同样也发现了同时期的稻谷遗存。这使得人们更加明确了长江中游在农业起源上的重要地位,从而提出长江中下游甚至华南都是稻作农业的起源地区的观点^⑥。不过上述遗址中的稻谷遗存大抵都是掺和在陶器泥坯中的碎稻壳末,或者是掺和在抹墙的泥土中的稻壳,因为房屋失火把墙壁烧成为像砖头一样硬的所谓红烧土,使稻壳的形状得以保存下来。这样的稻谷遗存因为太碎,即使完整也因受到挤压而变形,难于从形态上进行鉴定,因而有人曾经怀疑它们是否是野生稻^⑦。加上在这些出土稻谷壳的遗址中没有发现农具,也更加深了人们的怀疑。不过从另一方面看,既然出土稻谷遗存的遗址那么多,有些遗址中发现的稻壳数量也很不少,似乎人工栽培的可能性还是很大。如果说湖南等地区还可以采集到野生稻的话,陕西南部恐怕就不大可能了。所以大多数考古学家还是相信彭头山文化时期已经出现了栽培稻。1994年初,在北京大学地质系进修的陈报章对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的许多标本进行了检测和鉴定,发现了许多炭化稻米和水稻的植物硅酸体,并且认定它们属于栽培稻的梗型亚种^⑧。贾湖遗址属裴李岗文化,实测碳十四年代为公元前7041—5707年,大致和彭头山文化同时。贾湖位于淮河上游北纬33度36分,遗址中除发现稻谷遗存外,还有许多炭化粟粒,而裴李岗文化是普遍种粟的。遗址中也发现有裴李岗文化中常见的农具如带锯齿的石镰和带乳状足的石磨盘等,却没有发现稻作农具。也许初期的稻作农业不需要石质农具,而木质或其它有机质农具又不易保存,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彭头山等遗址至今没有发现农具的原因。1994年6月,在北京农业大学召开了一次贾湖稻作农业的研讨会。我在会上谈到稻作农业起源研究的历史时,说我们已经迈上了第三个台阶。第一个台阶是50年代屈家岭文化稻谷遗存的发现,暗示我国南方可能成为探

索稻作农业起源的地区之一。第二个台阶是 70 年代河姆渡稻谷遗存的发现,得知在公元前 5000 年就已经有了比较发达的农业,从而提出了长江下游及其附近应当是稻作农业起源地区之一的观点。第三个台阶就是彭头山和贾湖等一系列遗址的发现,把栽培稻产生的年代又提前了将近 2000 年。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还特别强调:我们现在正在向第四个台阶攀登,假如我们取得成功,中国稻作农业起源的问题就应该基本解决了。但是这一步很难,我们将尽全力冲刺。现在我可以这样说,我们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功。1993 年和 1995 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省道县玉蟾岩遗址进行发掘时,分别发现了几粒稻谷。据张文绪教授鉴定,其中一粒接近野生稻,另一粒则接近栽培稻。后者的粒形、稃毛和稃肩特征近于籼稻,粒长同于野稻而粒宽近于粳稻,双峰乳突也近乎粳稻^⑨。该洞穴遗址的年代估计已近公元前 1 万年。与此同时,在江西万年仙人洞同样早的地层中,也发现了近于栽培稻的花粉与植硅石。这两处发现至少给了我们一个强有力的信息,即稻作农业的起源可以上推到公元前 1 万年,而起源的地点似乎就在长江中游一带。其实江西万年已经位于九江口以东,应该属于长江下游的边缘了。照这么说,也可以把起源地定在中下游地区。不过长江下游的主体还应该是江浙地区,如果那里没有起源的可能,把中下游连在一起也还是有些勉强的。

本来长江下游起源说就是因为河姆渡的发现而提出来的,后来因为长江中游发现了更早的稻谷遗存,河姆渡在探索稻作农业起源问题上的重要性似乎降低了。人们一直期待江浙地区会发现更早的稻谷遗存,这一愿望虽然至今没有实现,却在河姆渡稻谷遗存中发现了野生稻,其意义当不亚于发现更早的栽培稻遗存。以前我在论证水稻的起源地可能在长江下游及附近地

区时,就是以当地原本是野生稻的分布区为前提的。我没有直接的证据,只好从古气候、生态环境和历史上有野生稻的记载来加以推测。现在河姆渡野生稻谷遗存的发现,无异是对那种推测的一个证实,从而也就是对长江下游起源说的一个支持。加上前面谈到的在中游地区的那些发现,把水稻的起源地区定在长江中下游应该还是比较合适的。

我们设想,无论从气候、土壤、地形和动植物群落等自然地理的一切因素来看,长江中游和下游都是不可分割的,所以在自然地理上都被划分为华中区。既然如此,当中游的江西、湖南发现野生稻时,也就意味着下游有生长野生稻的可能。何况在江苏和安徽都有一些线索。同样的道理,当下游的河姆渡发现了7000年前的野生稻时,也就意味着中游在几千年甚至更早以前就可能生长野生稻,不然在玉蟾岩和仙人洞的发现就不好理解了。不过在更新世早期,长江中下游的气候还比较温凉,野生稻不可能有大面积的分布。野生稻的中心区在华南,长江中下游不过是它向北分布的边缘地带。这里有一个食物比较缺乏的漫长的冬季,人们需要找到一种既能增产又耐储藏的食物,稻米正好就是这样一种理想的食物。如果将野生稻加以栽培,就能较好地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我过去提出的所谓边缘理论^⑨。河姆渡野生稻的发现和江西、湖南早期稻谷遗存的发现,都是对边缘理论的大力支持。

最近几年,关于稻作农业起源的研究进展十分迅速。除考古学界不断有新的发现外,农学家和遗传学家的研究也日益深入。对稻谷扇形体植硅石的研究曾经开辟了鉴别野生稻与栽培稻和栽培稻中籼稻与粳稻的新途径,但不甚精确。对双峰乳突植硅石的研究则大大提高了鉴别的准确率。同功酶和DNA分析在稻谷的种属鉴别和分类学研究上也都有了很大的进展。不

同学科间的合作的必要性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并且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现在的关键问题还是要在江浙一带发现更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和伴生的稻谷遗存,我们期待着这一发现的时刻早日来临!

注释

- ①汤圣祥、闵绍楷、佐藤洋一郎:《中国粳稻起源的探讨》,《中国水稻科学》第7卷第3期,1993年;佐藤洋一郎、汤陵华等:《中国江苏省某遗址和浙江省河姆渡遗址出土植物遗存的分析》,《东亚稻作起源与古代稻作文化》,日本佐贺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日文)。
- ②汤圣祥、佐藤洋一郎等:《河姆渡炭化稻中普通野生稻谷粒的发现》。
- ③游修龄、郑云飞:《河姆渡稻谷研究进展及展望》。
- ④严文明:《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1982年第1、2期。
- ⑤裴安平:《彭头山文化的稻作遗存与中国史前稻作农业》,《农业考古》1989年第2期。
- ⑥严文明:《再论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1989年第2期。
- ⑦和佐野喜久生:《东亚古代稻米与稻作起源》,载《东亚稻作起源与古代稻作文化》,佐贺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日文)。
- ⑧陈报章、张居中:《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稻作遗存的发现及古文化生态学研究》。
- ⑨张文绪:《湖南道县蛤蟆洞(即玉蟾岩)出土稻谷的鉴定报告》。
- ⑩严文明:《中国史前的稻作农业》,载《东亚稻作起源与古代稻作文化》,佐贺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日文)。

河姆渡稻谷研究进展及展望

游修龄 郑云飞

中国新石器时代出土有稻谷的遗址累积到 1970 年代初止,约 30 处;从 1973—1989 这 10 多年中又出土了 49 处,合计达 79 处。1989 以后至 1992 年止,共已达 112 处。稻作遗址的不断出现,促进了稻作起源研究的迅速发展,其中以河姆渡遗址带来的震动最大,研究的内容也最丰富。尽管以后又陆续发现较河姆渡遗址更早的遗址如湖南澧县彭头山、河南舞阳贾湖等遗址,但就遗址的内涵而言,都不及河姆渡那么丰富多样,使得河姆渡遗址迄今为止仍属中国乃至亚洲最丰富的稻作遗址。河姆渡遗址吸引了考古界以外的诸多学科如历史的、地理的、农业的、民族的、遗传学的学者都投入研究。从而在稻作的起源、分化、和传播方面取得很多的进展,提出了不少不同于以前的新观点,明白了以前未曾清楚的问题,也因而产生以前未曾想到的问题。本文是对此所作的一个简要的回顾,并结合我们的研究谈谈我们的看法,以供交流。

一、研究进展

(一)提出了长江中下游是中国稻作起源中心的新观点

截至 1992 年止的 112 处稻作遗址中,长江中下游占 86 处(76.8%),黄河和淮河流域共 12 处(10.7%),华南地区(广东、

福建、台湾)8处,云南4处,东北辽宁1处。^①由于长江中下游的稻作遗址年代远早于黄河流域、华南和云贵高原,因此考古界倾向于认为长江中下游是稻作的起源传播中心,由此而向北传入黄河流域,向东传入朝鲜、日本,南上传向华南、西南各地。^②这个观点,得到近来部分稻作学和遗传学者研究的支持(详下)。这和以前的渡部忠世^③、佐佐木高明^④、张德慈^⑤等提出的云南、阿萨姆起源中心的观点相反,引起了普遍的关注。

(二) 籼粳分化研究的进展

以河姆渡为代表的太湖地区新石器遗址出土的炭化稻谷(米),在形态上都有似籼似粳的不同,而黄河流域、长江中游和日本、朝鲜已知的出土稻谷都属粳型。华南和云南出土的稻谷虽也有籼粳之分,但数量极少,时间又较迟,因此,籼粳分化的研究都集中到太湖地区。以前对籼粳并存现象的解释是:原始的稻作群体是一种多型的杂合性群体,随着栽培技术的发展和环境条件的改变,才逐渐分化成为籼和粳;^⑥但随着鉴定技术的发展,带来对籼粳分化起源的新的看法。以前是用长宽比来区分稻谷或米粒的籼和粳,因两者有重合的部分,影响了准确度。近年来日本学者藤原宏志开创了植物运动细胞中硅酸体(也称植物蛋白石)的分离技术,把鉴定方法推进了一大步。^⑦长宽比只适用于谷粒米粒,而硅酸体技术可以在没有稻谷出土的情况下,从残存的稻叶堆积物或土壤中找到稻的硅酸体而同样可以获知籼和粳的存在。如湖南彭头山遗址最初是从红烧土块中找到稻谷的印痕进行报道的,但是我们在收到的彭头山遗址的土壤样本中始终找不到稻谷的印痕,起初我们以为是样本太少之故,但经我们改为试用硅酸体的方法进行寻找,最后终于找到少许水稻的硅酸体。最近我们从河姆渡遗址的稻叶堆积物和土壤样本中进行了硅酸体的测定,其结果如下^⑧:

	α 型 (%)	β 型 (%)	中间型 (%)	尖度
稻叶堆积物	22.6	73.1	4.3	0.85
土壤样本	21.6	74.4	4.0	0.86

硅酸体的测定结果同以前按长宽比测定的结果: 籼型占 72.1%, 粳型占 24.4% 不一致^⑨, 其原因较为复杂(详后), 有待进一步探究。

除硅酸体方法以外, 最近佐藤洋一郎等又进一步用分子遗传学的方法分析稻的叶绿体 DNA 基因片段图谱(通过限制性内切酶技术切断), 以鉴别籼和粳并探讨它们的起源问题, 结果提出了籼粳可能来自不同的祖先的观点, 即认为野生稻(*O. rufipogon*)本身已有籼粳分化的倾向^⑩。从而认为长江下游是温带型粳稻的起源地, 而籼稻则起源于热带的新观点。这与渡部忠世^⑪、冈彦一^⑫等的观点都不同, 渡部认为云南阿萨姆等地的原始稻作是一种水稻和陆稻以及籼稻和粳稻尚未分化的稻种, 以后才逐渐分化成水稻、陆稻及籼稻、粳稻; 冈彦一则以籼粳杂交试验证明籼和粳都来自同一野生稻祖先 *O. rufipogon*, 二者是同源的。佐藤根据各地水稻品种的 Hwc—2 和 hwc—2 这两个基因的地理分布, 发现温带型粳稻集中分布于从长江下游经朝鲜半岛南部至日本列岛这一区域。至于热带型粳稻则分布于整个亚洲, 日本的热带型粳稻是从南洋向北、经过逐个岛屿传入的, 但较次要。至于云贵高原的稻作则是一方面从长江下游向西南传入, 另一方面从南洋经由泰国、缅甸、老挝等传入的, 恰好与渡部忠世所绘指的路线相反。这是很值得注意的新观点, 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三) 河姆渡遗址野生稻的发现

河姆渡遗址的稻谷以前都认为是栽培种, 这当然是对的, 但

要问那时候是否也已有野生稻存在,从理论上推断是完全可能的,因为现在野生稻分布的最北界是江西东乡约北纬 28.14 度,河姆渡时候的气候条件相当于现在广西、海南的条件,即北纬 20 度上下,当然是野生稻生长最合适的条件。这个推论现在终于被证实了,中日学者共同在河姆渡的稻谷中发现了四颗混入的野生稻谷^③。据此,长江中下游的许多稻谷遗址既然在气候方面都同河姆渡相似、位于北纬 30 度左右,那么,在河姆渡遗址找到野生稻谷,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其他遗址中,将来也会有机会找到野生稻谷的。河姆渡野生稻谷的发现,也给稻作起源于长江下游说增加了支持。

二、问题讨论

以上是对河姆渡稻谷研究中的进展所作的简要回顾,可以看出由于多学科的参与,在探讨的广度和深度方面都取得很大成绩,明确了以前不知道的问题,特别是有关粳稻起源、分化和传播的新观点,富有启发和挑战性,非常有利于研究的深入探讨。我们从农学的角度看,觉得随着这些新观点的展开,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产生新一轮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研讨。主要有:

(一) 籼粳分化问题

我们注意到佐藤论文中把粳稻区分为温带型和热带型,并按 Hwc—2 和 hwc—2 基因的地理分布规律,得出这两种粳稻向朝鲜、日本传播的途径^④,这是从现状出发,倒溯历史所得出的结论,虽然很有启发和理由,但是把这一观点用于论证河姆渡的稻谷属于温带型粳稻以及长江下游是温带型粳稻的起源地时,则产生了一个时差问题,因为佐藤在文中已经明确指出河姆渡时期的气候条件相当于现在从海南至南洋的气候,那末,又怎样

理解在同样的热带气候条件下、从河姆渡及长江下游产生的是相当于现在的温带型粳稻、而在南洋产生的则是相当于现在的热带型粳稻呢？如果河姆渡或南洋的热带气候条件不是产生温带型粳稻或热带型粳稻的外界因素，那末起作用的因素又是什么？我们以为温带型粳稻只能产生于气候转凉之后，现代野生稻为什么退缩到北纬 28 度以南？即是因长江流域气候转凉之故。日本的稻作是在绳文晚期至弥生早期（约相当于中国战国早期，即约公元前 400 年）传入的，距离河姆渡时期已有 4000 多年，那时的气候要较河姆渡时期为低凉，接近现代的气温，才有可能分化出温带型的粳稻，所以弥生早期的粳稻同河姆渡时期的粳稻的时间差是应予考虑的。

另外，佐藤论文中有一张亚洲稻作的传播路线示意图，除去长江流域及以东的部分之外，在该图的南部，用箭头表示云南的稻作是从泰国、缅甸、老挝等地自南而北传入的，加上长江中下游的稻作也向西南传到云南，于是云南成了稻作传播的终点站。这同以前渡部忠世、张德慈、佐佐木高明等所主张的云贵起源中心向四方辐射的传播路线恰好是“背道而驰”，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也是迄今为止稻作起源研究中最富有针锋相对的观点，这是学术研究活跃的表现，有利于把问题的探讨引向深入。我们从民族学和铜鼓传播的历史角度来看，情况恰恰相反，稻作是随着民族迁徙和铜鼓的传播从云南向泰国、缅甸、老挝和马来亚岛直至印度尼西亚传播的。^⑭马来亚山区的 Temir 人中曾流传一个故事，说“粟王”(King of millet)同“稻王”(RiceKing)发生战争，结果粟王战败，稻王取代了粟王。^⑮这故事反映了马来亚山区早先是种粟的，以后稻传入了，经过一番抗拒，逐渐适应，才慢慢取代了粟。马来亚的稻作是从泰国自北而南传入，最后传向印尼等地的，其方向与佐藤所说的相反。民间的神话传说故

事不是历史事实,不足为证,但也并非无中生有。虽然最终我们要依靠考古学、遗传学等的研究作出判断,但如果能注意民族迁徙和传说的合理内涵,是同样很有价值的。所以传播的途径问题需要在不同学科之间继续交流,把问题的探讨引向深入。

(二) 籼粳区别问题

河姆渡稻谷是已经炭化了的,当时除了用长宽比判别其为籼粳以外,其他许多适用于活体鉴别的方法,都无法使用。植物硅酸体鉴别技术采用以后,既扩大了鉴别的材料范围,又提高了准确度,无疑是一个重大进展。但是笔者不同意认为长宽比是不可靠的这一看法。从农学的角度说,籼和粳是亚洲栽培稻(*O. sativa*)这个“种”(species)下的两个“亚种”(subspecies),彼此间的差异远小于种与种间的差异。换言之,从原始稻作驯化到现在,尽管经历了 7000 年以上的隔离和选择,至今的籼和粳仍然是既有可以互相区别的明显差异,又有未能截然分开的一面。也就是说,籼与粳的区别是很复杂的多因子综合体,用现在流行的术语说,带有某种数学上的“模糊”(fuzz)或物理学上的“混沌”(chaos)的意味。对于一种具有模糊或混沌性质的群体,用单一因素的分析标准去区别,只能是在特定的范围内正确,过此就会是谬误的。对现代活体的籼与粳,可资区别的方法可有 17 种之多,如谷粒形状(长宽比)、大小、颖毛分布、芒有无、颖尖色、颖色、米质(支链淀粉含量)、石炭酸反应、脱粒性、穗颈长短、分蘖力大小、顶叶角度、叶片宽度、叶色浓度、叶毛多少、花青素分布等^⑧。每一种判别方法都有可靠性,也都有例外,即谬误。比如,籼稻容易脱粒,粳稻则较难脱粒,一般地说是正确的,但是也有容易脱粒的粳稻品种。说籼稻的叶片绿色较淡,粳稻的叶片色较浓,通常也是正确的,但是粳稻的叶片变异较大,有时也有叶色淡的,就难以区别了。所以拿这 17 种中的任何一种方法去

鉴别,总有可靠的一面,也存在不足之处,即误断的可能。同样,用硅酸体的方法测定粳和籼,是一种新创的方法,它的准度较之粒形的长宽比为优,但也有其测不准的一面,虽然现在进一步从硅酸体的二维测定转为三维测定,并计算其“判别系数”,准确度又有所提高^⑩,但这只是可靠性的概率提高,即按统计分析有90%以上的可信度,仍有6%~8%的误差,这是因为方法本身仍然是单因素的测定。已如上述,任何单因素的分析,都将难以克服一定概率的例外。这不是方法本身的不完善,这是粳籼之间本来就存在的“边界”不清的模糊现象之故。用单一因素的分析方法总是无法概括多因素的复杂内含。当我们努力探寻并改善鉴别方法时,对粳籼之间存在的“边界”模糊或交错现象必须有所考虑。

再一点是,长宽比也好,硅酸体也好,其他分子遗传的分析也好,都是从现代粳籼品种的差异分析入手,以所得的结果作参照,用来判别7000年前稻谷或稻叶遗存的粳籼属性,对于7000年以来稻谷所经历的生殖隔离和人工选择压力所起的作用,都被忽略了。我以为这种“时差”(timedifference)是必须要予以考虑的。原始稻作群体的多型性现象只有较现在为复杂,分析其原因及演变,较之鉴别粳籼同样是不可少的。

(三)民族迁徙问题

佐贺大学的和佐野先生也赞成长江下游起源说,他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南迁的方向表明了水稻的传播是从长江下游出发,自北而南进行,云南是最后到达的地方。^⑪他最近对中国各地及周边国家出土的炭化稻谷进行测算的结果,也认为稻是从长江流域向西南传播的。我们认为这里面也有一个时差的问题,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少数民族迁徙,都是属于有史以来直至秦汉以后一直存在的现象,他们本来就是种稻的民族,他们所

到之处,自然要以种稻为生。他们迁入的新区,往往是未有人住的山区,他们迁入了,经过开辟,才有了稻作,这是事实。但这不等于广大的南方、特别是沿江河、湖泊、沼泽之地都没有人种稻,不知道种稻,要他们来了才学会种稻。

至于史前的传说,黄帝同蚩尤大战,那时候黄河流域已经知道种稻了,蚩尤战败,部落分散向南方撤退时,南方也是已经种稻的。如要等到蚩尤战败的部落把水稻带到南方各地,那就变成黄河流域的稻作要早于南方、自北而南地传播了。问题是,文献中有关少数民族迁徙的记述很多,而南方固有的民族情况反而不够详细,这方面的研究无疑需要加强。

(四)野生稻的问题

河姆渡以前未发现野生稻时,也无所谓野生稻的问题。现在终于发现了野生稻谷,除了明确河姆渡时期这一带有野生稻这个事实以外,连带就引出一系列问题。众所周知,栽培稻的祖先种野生稻 *Oryza rufipogon* 是多年生的,根据佐藤等新提出的观点,野生稻中本来就有籼粳分化的倾向,也就是说,河姆渡的粳型稻是起源于野生稻中粳型倾向的那些基因群体,而热带籼稻则起源于野生稻中籼型倾向的那些基因群体。那么,为什么在同样的热带气候条件下,在河姆渡的野生稻是粳型倾向的,而在南洋的野生稻却是籼型倾向的?当我们考虑稻作起源、分化和传播时,实际上我们已经把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包括地理的生殖隔离)两方面的压力都考虑进去了,如果排除人工选择的作用,那怎么谈得上农业起源呢?如果多年生野生稻不是在人工的选择压力下发生分化,那么,是否光凭自然选择压力就可以发生分化呢?如果这个设想得以成立,岂非稻作的起源和分化不是从多年生野生稻开始,而是从现成的野生稻中的粳型倾向稻开始了,人们所施加的压力也是很轻而易举的了。又,在多年生

野生稻以外,还有一年生和中间型野生稻的与稻作起源的不同观点问题,所以有关野生稻的问题,需要继续探索的还很多。

总之,河姆渡遗址稻谷遗存的发现、其深远的意义除了一致公认的、证明了长江流域的稻文化是与黄河流域的粟文化相互交融渗透、共同孕育、创造出灿烂的中华文明以外,就稻作的本身而言,近 20 年来多学科和跨学科环绕河姆渡稻谷展开的探讨,已经把亚洲稻作的起源、分化和传播的研究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在这些方面,既有不断的新发现和新观点出现,又有不少需进一步深入探索的问题,这样的相互交流促进,已经创造了一种不妨可以称之为是“原始稻作学”的专门领域。这是其他农作物所不能比拟的,诚非始料所及。同时,这也非常有利于农业起源的深入理解。值此河姆渡遗址发现 20 周年之际,我们预祝原始稻作以及亚洲稻文化的研究将会有更多的进展、以迎接即将到来的 21 世纪。

注释

- ①严文明:《中国史前的稻作农业》,论文抽印本,作者赠。
- ②严文明:《再论中国稻作起源的几个问题》,《农业考古》1989 年第 2 期。
- ③渡部忠世著,尹绍亭等译:《稻米之路》(中译本)第五章 “‘谓公系列’的水稻群”。
- ④佐佐木高明:《日本文化の基层を探る》,第 77 页,日本放送出版协会 1993 年版。
- ⑤Chang, T. T. Domestication and spread of the Cultivated Riccs see Foraging and Farming - The Evolution of Plant Exploitation, D. R. Harris & G. C. Hillman pp. 408 - 417, 1989.
- ⑥游修龄:《太湖地区稻作起源及其传播和发展问题》,《中国农史》1986 年第 1 期。
- ⑦藤原宏志:《ブテン・オパール分析法の基礎的研究(1)》,《考古学自然

科学》, 1976 年第 9 期, 第 15—29 页。

⑧郑云飞、游修龄等:《河姆渡遗址稻的硅酸体分析》,《浙江农业大学学报》1994 年第 1 期, 第 81—85 页。

⑨周季维:《长江中下游发掘出土稻谷考察报告》,《云南农业科技》1981 年第 6 期。

⑩佐藤洋一郎、藤原宏志:《イネの发祥中心はどこか》,《东南アジア研究》, 30 卷 1 号, 1992 年。

⑪渡部忠世, 同③, 第八章 “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和传播”。

⑫Oha, H. I. (冈彦一) *Origing of Cultivated Rice*, chapter 7, pp. 164.

⑬汤圣祥、闵绍楷、佐藤洋一郎:《中国梗稻起源的探讨》,《中国水稻科学》7(3):129—136, 1993 年。

⑭佐藤洋一郎:《日本におけるイネの起源と传播にすゐ—考察—遗传学の立場から—》,《考古学と自然科学》第 22 号—日本文化财科学会志—1990, 第 1—11 页。

⑮游修龄:《百越稻作与南洋的关系》,《农业考古》1992 年第 3 期。

⑯Hill, R. D., *Rice in Malaya, A Study in Historical Geography* 1977 pp. 1—13.

⑰参见中国农业科学院主编:《中国稻作学》第二章“稻作资源”, 第 52 页, 农业出版社 1986 年版。

⑱藤原宏志:《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 中译本及:

Tetsuro Udatsu & Hiroshi Fugiwara, *Application of the Discriminant Function to Subspecies of Rice (O. Sativa) Using the Shape of Mortor Cell Silica Body*. ETHNOBOTANY Vol. 5, 1993, pp. 107—116. 作者见赠。

⑲和佐野甘喜久生。1990 年 5 月 15 日笔者参加佐贺市日中文化史交流研究会期间, 和佐野先生提出这一看法。

(作者附注: 本文是笔者在 1994 年余姚河姆渡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稿, 经补充修改而成。)

水稻品种和河姆渡出土稻谷外稃 乳突的扫描电镜观察*

张文绪 汤圣祥 刘 军

出土炭化稻谷的籼粳鉴定以往主要根据谷粒形状,即谷粒长、宽和长宽比的形态方法^{⑥⑦⑧}。若干千年前的出土稻谷长期埋于地下而炭化,某些特征如颖壳、稃毛、芒等已不同程度破损,因而仅依谷粒或糙米形状以判断出土稻谷的籼粳属性,难度较大。笔者曾对稻谷外稃双峰乳突进行了扫描电镜观察,发现籼粳稻间有明显的差异^{③④}。本文试图对双峰乳突的形态结构作进一步研究,找出相应的数量参数,将其作为一种识别籼粳亚种的科学判别指标,应用于出土稻谷的鉴定之中。

一、材料与方法

(一)材料

籼稻品种:乌壳、马尾籼、西瓜红、泸红早1号、湘中籼2号、特青、IR36和Jasmine85等8个。粳稻品种:白壳稻、野猪咀、红须梗、旱梗子、农虎6号、秀水11、02428和越富等8个。

河姆渡出土稻谷共11粒,均为第四层的出土稻谷($6950 \pm 130\text{BP}$)顺序编号从1至11号,其中5号粒为米粒,对1、4、8号等谷粒较完整,颖壳较清晰,粒形稍长似籼的3粒进行了扫描电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栽培水稻的起源与演化”资助项目。

镜观察。

(二)方法

1.扫描电镜观察

将完整典型的供试谷粒,粘于观察铜台上,真空喷金后置于S—450型扫描电镜下,观察铜台倾斜60°,放大300倍和1000倍,对外稃中段的双峰乳突进行观察拍照,随后全部材料于1994年春天播种,秋天收获后用新种子以同样的方法再重复观察一次。河姆渡1、4、8号出土稻谷的观察方法同上。

2.特征测定

水稻谷粒的长度和宽度用卡尺测量。出土稻谷的长度和宽度,先用普通照片和实物进行测量,再用扫描电镜照片的比例尺换算互相对比校正求得。

双峰距的测定。双峰距为双峰乳突单体两峰间的距离,在放大300倍的扫描电镜照片上选取焦距清晰、形状正常的双峰乳突单位10个进行实测,按以下换算方法求得,单位为微米(um)。

$$\text{双峰距(um)} = \frac{\text{图像量度值(cm)}}{\text{比例尺量度值(cm)}} \times \frac{\text{比例尺显示值(um)}}{1000}$$

垭深度的测定。垭深度是以两峰尖的连线为底边,垂直于垭的最深处的长度值。在300倍和1000倍的扫描电镜照片上采拮数据,单位为微米(um)。换算方法同上。

距/深比为双峰距与垭深度的比值,是表征垭的平缓程度的参数指标,数值愈大,垭愈平缓,反之愈陡。

峰角度的测定。峰角度是以乳突峰两侧的切线为边,在放大300倍和1000倍的扫描电镜照片上用量角器实测的角度,单位为度。是表征角度锐钝程度的参数指标。

垭角度的换算。垭角度为两峰内边的夹角,单位为度,是形

象表征垭的平缓程度的参数指标,依以下公式求得:

$$\text{垭角度} = \tan^{-1} \times \frac{1/2 \text{ 双峰距}}{\text{垭深度}} \times 2$$

3. 统计分析

因不同品种扫描电镜照片上形态正常而又清晰的双峰乳突单体数量存在差异,大多数情况下取 10 个样本,少数则不足此数。差异显著性的测定,采用平均数间差异显著性公式。即:

$$\text{平均数机误: } SE = \delta / \sqrt{n}$$

$$\text{平均数差异机误: } SE_{\Delta 1.2} = \sqrt{(SE1)^2 + (SE2)^2}$$

二、结 果

(一) 籼粳亚种间双峰乳突的特征和类型

1. 双峰乳突的双峰距差异

8 个籼稻品种的双峰距变异幅度为 19.7—27.2 μm , 变异是连续的(表 1)。8 个粳稻品种的双峰距变异幅度为 27.4—41.4 μm , 变异也是连续的。显著性测验表明, 籼稻和粳稻各 8 个品种双峰距成对比较, 绝大多数(64 对中有 58 对)的差异显著性皆达 0.05 和 0.01 水平。仅粳稻品种野猪咀(农家地方品种)与 5 个籼稻品种(马尾籼、Jasmine 85、乌壳、IR36 和西瓜红), 粳稻农虎 6 号(现代品种)与籼稻西瓜红品种差异不显著。

籼稻品种的双峰距明显小于粳稻品种, 形成一个从小到大的连续变异系列, 这一现象显示了籼稻和粳稻在双峰距演化上的不同趋势, 为双峰乳突的分类提供了基础。

2. 双峰乳突的峰角度差异

8 个籼稻品种峰角度的变异幅度为 64.5°~72.8°, 品种间呈连续分布。8 个粳稻品种峰角度的变异幅度为 81.3°~

107.3°, 品种间亦呈连续分布(表 1)。野猪咀的峰角度最小, 秀水 11 和旱梗子峰角度最大。8 个籼稻和 8 个粳稻品种峰角度之间成对比较的差异显著性全部达到 0.01 极显著差异水平。粳稻明显大于籼稻, 显示了两类完全不同的双峰乳突特征。水稻双峰乳突的峰角度大小呈连续分布, 约以 80° 为界可将其分为两群, 为双峰乳突的分类提供了客观基础。

表 1 籼、粳稻和河姆渡出土稻谷外稃的乳突结构

品种(编号) Variety	双峰距 Bi-peak distance (μm)	峰角度 Peak angle (degree)	垭角度 Col angle (degree)	垭深 Col depth (μm)	距/深比 Ratio of BPD/CD *
籼稻 Indica					
(1) 泸红早 1 号 Luhongzhao 1	19.7	72.9	139.4	3.6	5.4
(2) 特青 Teqing	20.5	68.2	142.3	3.5	5.9
(3) 湘中籼 2 号 Xiangzhongxi-an 2	23.0	65.2	136.3	4.6	5.0
(4) 马尾籼 Maweixian	25.8	64.5	139.6	4.8	5.4
(5) Jasmine 85	26.4	67.7	128.4	6.4	4.1
(6) 乌壳 Wuke	26.7	67.7	134.0	5.7	4.7
(7) IR36	27.0	67.8	154.7	3.0	8.9
(8) 西瓜红 Xiguahong	27.2	72.7	142.1	4.7	5.8
粳稻 Japonica					
(9) 野猪咀 Yezhuzui	27.4	81.3	147.8	4.0	6.9
(10) 农虎 6 号 Nonghu 6	30.2	89.3	172.3	1.0	29.6
(11) 越富 Yuefu	33.4	93.3	172.7	1.1	31.2
(12) 02428	34.5	87.5	152.7	4.2	8.2
(13) 红须根 Hongxugen	35.8	91.1	169.0	1.7	20.7
(14) 白壳稻 Baikedaao	35.8	88.0	168.8	1.8	20.5
(15) 旱梗子 Hanjingzi	36.8	107.3	172.5	1.2	30.7
(16) 秀水 11 Xiushui 11	41.4	97.5	176.1	0.7	59.2
河姆渡 Hemudu					
1 号谷 NO. 1	27.3	85.0	158.1	2.6	10.3
4 号谷 NO. 4	24.0	87.0	165.4	1.5	15.9
8 号谷 NO. 8	28.0	97.5	160.0	2.5	11.3

* BPD/CD: Bi-peak distance/Col depth

3. 双峰乳突类型

水稻外乳双峰乳突的特征,可用双峰距、垭距、距/深比、峰角度和垭角度等数量指标描述。据此,可将双峰乳突归为两种基本类型:即“锐型”和“钝型”。

“锐型”双峰乳突的基本特征:双峰距较小($<27.5\mu\text{m}$),垭较深,距/深比在10以下,峰角度小于 80° ,垭角度小于 150° ,构成一种较锐的形象。籼稻的双峰乳突多属此类(图1,A)。

“钝型”双峰乳突的基本特征:双峰距较大($>27.5\mu\text{m}$),垭较浅,距/深比在10以上,峰角度大于 80° ,垭角度大于 150° ,构成一种较钝的形象。粳稻的双峰乳突多属此类(图1,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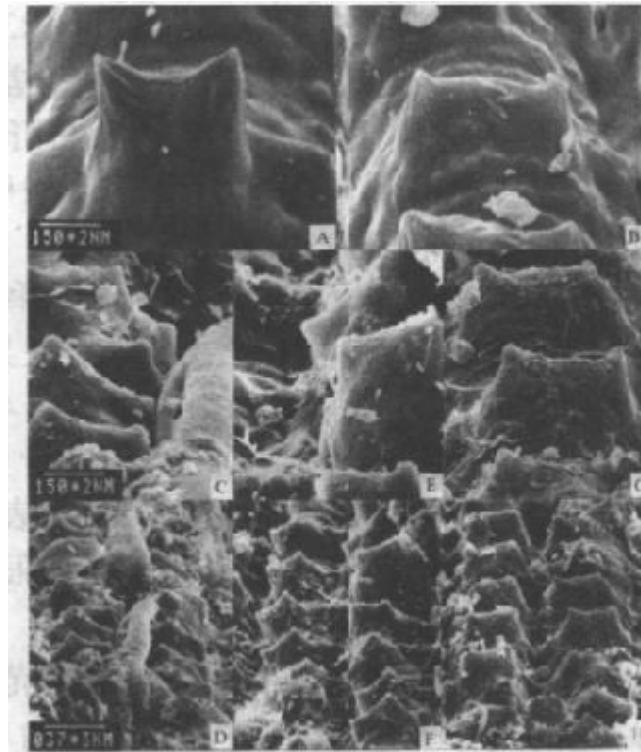


图1 籼、粳品种和河姆渡出土稻谷的乳突结构

A. 马尾粘(籼稻); B. 白壳稻(粳稻);

C-D、E-F、G-H 河姆渡出土稻谷1号、4号和8号

个别品种的一些双峰乳突特征间于籼粳之间,表明一种交叉过渡现象。但综合观之,绝大多数品种的双峰乳突均可客观地划分为“锐型”或“钝型”。因此,上述分类可作为识别籼、粳亚种和鉴别出土稻谷的一种有效方法,即双峰乳突鉴别法。

(二)河姆渡出土稻谷的特征和双峰乳突的类型

1. 河姆渡出土稻谷双峰距的特点

3粒河姆渡出土稻谷的长、宽比分别为:1号,7.3mm、2.6mm,和2.8;4号,8.1mm、2.9mm和2.8;8号,7.5mm、3.0mm和2.5。从粒形看,三粒出土稻谷似籼。从表1可见,3粒出土稻谷双峰距变异幅度为24.0~28.0 μ m,4号出土稻谷双峰距与8个籼稻品种比较,大于泸红早1号(1)和特青(2),差异显著性达0.01水平,但明显小于乌壳(6)、西瓜红(8)和IR36(7),差异显著性达0.05水平,与其余3个籼稻品种无显著差异,而与8个粳稻品种比较则明显较小,其差异显著性除与野猪咀(9)达0.05水平外,与其他7个品种皆达0.01水平。表明4号出土稻谷的双峰距处于籼稻的范围内,与籼稻较相似。其1号和8号出土稻谷与8个籼稻比较,双峰距比8个籼稻品种都大,但仅与泸红早1号(1)、特青(2)和湘中籼2号(3)的差异显著性达0.01和0.05水平,与其余品种的差异则不显著。与8个粳稻品种比较,除与野猪咀(9)相近而无显著差异外,皆显著小于其余的7个品种。差异显著性达0.05或0.01水平,表明1号和8号出土稻谷的双峰距介于籼稻的高限和粳稻的低限之间,但较近于籼稻。

总的看,3粒出土稻谷的双峰距分布在籼稻的范围内,与多数籼稻品种双峰距的差异不显著,仅与双峰距小的籼稻品种存在显著差异;而与多数粳稻品种的双峰距存在显著差异。

2. 河姆渡出土稻谷峰角度的特点

3粒出土稻谷双峰乳突角度的变异幅度为85.0°~97.5°,其中以8号谷最大,它与1号和4号谷的差异显著性达0.05水

平。

3 粒出土稻谷的峰角度明显大于籼稻, 与 8 个籼稻品种峰角度比较, 均达差异极显著水平。而与 8 个粳稻品种峰角度比较, 其中 1 号谷除显著小于越富(11)、秀水 11 号(16)和旱梗子(15)三个品种, 4 号谷显著小于秀水 11(16)和旱梗子(15)两个品种, 差异显著性分别达到 0.05 和 0.01 水平外, 与其余粳稻品种皆无显著差异。8 号谷的峰角度明显大于野猪咀(9)、02428(12)、白壳稻(14)和农虎 6 号(10), 差异显著性分别达 0.01 和 0.05 水平, 与其余峰角度较大的 4 个粳稻品种无显著差异。表明河姆渡 3 粒出土稻谷的峰角度在粳稻的变异范围内。

3. 河姆渡出土稻谷双峰乳突的类型

从表 1 的各项参数和图 1-C、D、E、F、G、H 的特征看, 3 粒出土稻谷的双峰距相对较窄, 处于籼粳稻变异的过渡区域。但峰角度为 $85.0^{\circ} \sim 97.5^{\circ}$, 超过 80° 指标; 垭角为 $158.1^{\circ} \sim 165.6^{\circ}$, 超过 150° 指标; 距/深比为 $10.3^{\circ} \sim 15.9$, 超过了 10 的指标; 皆大于籼稻而近于粳稻双峰乳突各项指标的变异范围。垭深 $1.5 \sim 2.6\mu\text{m}$, 也在粳稻的变异范围内。因此综合来看, 3 粒出土稻谷的双峰乳突基本属“钝型”。

表 2 河姆渡出土稻谷与籼、粳品种双峰距和峰角度的比较

品种 Variety	河姆渡出土稻谷 Hemudu excavated grain							
	双峰距 Bi-peak distance				峰角度 peak angle			
	μm	No. 4	No. 1	No. 8	Degree	No. 4	No. 1	No. 8
		24.0	27.3	28.0		87.0	85.0	97.5
		± 3.1	± 2.7	± 3.2		± 8.4	± 5.8	± 5.0
籼稻 (1)	19.7 ± 0.9	**	**	**	72.9 ± 9.0	**	**	**
Indica (2)	20.5 ± 1.6	**	**	**	68.2 ± 8.6	**	**	**
(3)	23.0 ± 4.6	ns	*	*	65.2 ± 8.7	**	**	**
(4)	25.8 ± 1.7	ns	ns	ns	64.5 ± 6.4	**	**	**
(5)	26.4 ± 2.7	ns	ns	ns	67.7 ± 5.9	**	**	**
(6)	26.7 ± 2.9	*	ns	ns	67.7 ± 5.9	**	**	**

(续见下页)

品种 Variety	河姆渡出土稻谷 Hemudu excavated graing							
	双峰距 Bi-peak distance				峰角度 peak angle			
	μm	No. 4	No. 1	No. 8	Degree	No. 4	No. 1	No. 8
* *	(7)	$27.0 \pm 3.1^*$		ns	ns	$67.8 \pm 7.2^*$	* *	* *
* *	(8)	$27.2 \pm 4.4^*$		ns	ns	$72.7 \pm 4.5^*$	* *	* *
梗稻	(9)	$27.4 \pm 3.4^*$		ns	ns	81.3 ± 3.9	ns	ns
Japonica	(10)	$30.2 \pm 2.6^*$		*	ns	89.3 ± 5.1	ns	ns
ns	(11)	$33.4 \pm 2.4^*$		* *	* *	93.3 ± 5.3	ns	*
* *	(12)	$34.5 \pm 6.7^*$		* *	* *	87.5 ± 4.3	ns	ns
ns	(13)	$35.8 \pm 5.4^*$		* *	* *	91.1 ± 8.8	ns	ns
* *	(14)	$35.8 \pm 3.6^*$		* *	* *	88.0 ± 6.8	ns	ns
ns	(15)	$36.8 \pm 4.8^*$		* *	* *	$107.3 \pm 13.9^*$	* *	* *
ns	(16)	$41.4 \pm 3.8^*$		* *	* *	97.5 ± 5.5	*	* *

* 和 * * 表示 0.05 和 0.01 差异水平。

三、讨 论

(一) 扫描电镜观察和研究水稻外稃双峰乳突的条件

为了采撷代表品种特征的双峰乳突参数,遵循以下 4 个条件是必要的。即:(1)观察材料是成熟的颖果;(2)观察的区域是外稃正面的中段;(3)观察的角度是将观察铜台倾斜 60° 以上;(4)数据的采括为照片中部焦距清晰区域的正面完整的双峰乳突单体。

谨在此提出供研讨,以便研究结果有一个可比性共同基础。

(二) 双峰乳突的参数指标及其分类问题

笔者曾观察到双峰乳突类型的差异和籼粳稻之间的平行关系^③。为把双峰乳突的分类建立在稳定的科学基础上,经多项数量特征的测量,发现双峰距、垭深、距/深比、峰角度和垭角度等五项指标较能完整地表征双峰乳突的征象。由于双峰距和垭

深是计算距/深比这一表征垭的平缓程度的参数,故不单独作为分类的指标提出。依多个品种多次研究的结果,初步提出距/深比为 10,峰角度为 80° ,垭角度为 150° 作为分类的指标,凡低于这些指标的定为“锐型”双峰乳突,高于这些指标的定为“钝型”双峰乳突。依此标准,所研究的 8 个籼稻品种除 IR36 有 1 个指标较高外,皆属“锐型”双峰乳突。8 个粳稻品种除农家品种野猪咀有 2 个指标较低外,皆属“钝型”双峰乳突。表明用这一套指标识别亚种是可行的,从而为鉴定出土稻谷和识别水稻籼、粳亚种提供了一个有效外稃双峰乳突鉴别法。

(三)河姆渡出土稻谷的类型问题

在河姆渡出土稻谷($6950 \pm 130\text{BP}$)的最初鉴定中,曾定论为“栽培稻的籼亚种中的晚稻型水稻”^⑥。随后许多文献都引用这一结论^{⑦⑧⑨}。也有部分文献依谷粒长、宽和长宽比三项指标判断是籼粳并存,以籼为主的混合群体^{⑩⑪}。

粒形似籼的 1、4、8 号 3 粒河姆渡出土稻谷。依据双峰乳突的鉴定,本研究认为基本属“钝型”双峰乳突。虽然,它们的双峰距较小,尚停留在籼稻(或野生稻)的变异域内,但峰角度已明显“钝化”,进入粳稻的变异域。处于籼、粳两向分化的“十字路口”。水稻从野生稻深化为栽培稻的过程中,在 7000 年前正经历一个形态变异和分化的初期阶段,除粒形变化外,双峰乳突也经历着变异和分化。但这些变化不是同步的,其中出现一种双峰乳突偏粳而粒形似籼的类型,正是向籼粳型方向演化的早期现象之一,是一种被历史“固定”的似籼偏粳的古栽培稻特征,也是与充分分化了的现代栽培稻有所不同的特征。现存的某些较原始的、隔离较好的农家地方品种,其谷粒形态也有籼、粳模糊的特征。因此,“先有籼或先有粳”的命题,笔者认为并不妥当。在笔者稍前的研究中^⑫,曾认为河姆渡出土稻谷是由类籼、类粳及中间类型组成的原始混合群体。本研究从颖壳双峰乳突的结构证实,7000 年前的河姆渡地区确实存在类似粳型的稻谷,这

为粳稻起源于我国的学说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致谢:在制样和照片洗印中,中国农业大学电镜室的贾君镇、李美清做了许多工作,谨表感谢。

注释

- ①丁颖:《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农业学报》1957年第3期第243—260页。
- ②王象坤:《云南光亮稻与疣粒野生稻和普通野生稻谷粒的电镜比较研究》,《北京农业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第13—14页。
- ③张文绪:《水稻颖花外稃表面双峰乳突结构的初步观察》,《北京农业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第143—146页。
- ④汤圣祥、张文绪:《三种原产中国的野生稻和栽培稻外稃表面乳突结构的比较观察》,《中国水稻科学》1996年第1期第19—22页。
- ⑤汤圣祥、佐藤洋一郎、俞为洁:《河姆渡碳化稻中普通野生稻谷粒的发现》,《农业考古》1994年第35期第88—91页。
- ⑥游修龄:《对河姆渡第四文化层出土稻谷和骨耜的几点看法》,《文物》1976年第8期第20—23页。
- ⑦浙江博物馆自然组:《河姆渡遗址动植物遗存鉴定研究》,《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75—107页。
- ⑧严文明:《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1982年第1期19—31页,1982年第2期第50—54页。
- ⑨张德慈:《谷类及食用豆类之起源与早期栽培》,《农业考古》1987年第1期第273—282页。
- ⑩林承坤:《长江、钱塘江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地理与稻作的起源和分布》,《农业考古》1987年第1期第283—291页。
- ⑪周季维:《长江中下游出土古稻考察报告》,《云南农业科技》1981年第6期第1—6页。
- ⑫陈文华:《中国汉代长江流域栽培和有关农具的成就》,《农业考古》,1987年第1期第90—114页。

河姆渡遗址的几个问题

吴汝祚

中国的田野考古工作, 70 年代以前, 是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开展的, 认为只有把黄河流域地区内的史前时期文化搞清楚, 才能对其它地区的史前考古学文化的认识、了解有了一个可靠的基础。在这样的思想认识的影响下, 总是认为长江流域发现的史前文化遗存是要比黄河流域的晚, 更不可能要早, 如对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内发现的家蚕丝织品——绢, 有人虽然认为是属良渚文化的遗物, 但其年代要晚到商殷; 也有人持否定态度, 认为不可能是良渚文化时期的, 即为明显的例证。而不知黄河、长江两流域内的考古学文化是属不同的文化体系, 它们之间既有联系, 又有明显的区别。那时, 虽然有人提出长江流域史前文化不一定要比黄河流域的史前文化要低的观点, 可惜, 对考古学界影响不大。直到 1973 年发掘余姚河姆渡遗址, 在它的第四文化层发现了大量的遗迹、遗物, 其中主要的有堆积厚达 20—50 厘米的稻谷遗存, 以及骨耜、象牙器、漆器, 还有数量可观的各种不同榫卯结构的木构件。这些遗存就全国范围来说, 在当时是见所未见, 闻所未闻, 对河姆渡遗址不能不刮目相看。因此, 这座遗址的遗存, 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深入分析, 本文仅对此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见, 有不当之处, 请指正。

一、什么是河姆渡文化

1973 年河姆渡遗址的发掘,在它的第四文化层发现了大量的遗迹、遗物,其中主要的有一组形制新颖的器物,陶器的质地以夹炭黑陶为主,到第三文化层时逐渐减少,增添了夹砂灰陶和少量的泥质灰陶;到第二、一文化层时,演变为以夹砂灰红陶为主,还有泥质红陶和泥质黑陶。第四文化层的陶器表面,除打磨光亮的素面外,纹饰以绳纹和刻划纹为主,到第三文化层时,除继承第四文化层的纹饰外,又有锥刺纹等,到第二、一文化层时,又有堆纹、镂孔等纹饰。器形有釜、双耳罐、敛口双耳钵、支座和木质、石质或象牙的蝶形器等。这样一组器物,第三文化层基本上承袭第四文化层,而第二、一文化层的釜、罐,与第四、三文化层的同类器物有演变关系,唯双耳钵的双耳演变呈鸡冠形,数量少,逐渐降为不能作代表性陶器;同时,鼎、豆有相当数量的发现,豆在第四、三文化层中偶有所见,数量少,难于作为代表性陶器,到第二、一文化层时上升为代表性陶器。这种变化,与延续的时间从距今约 7000 年到第一文化层时为 5500 年左右,经历了 1000 多年。这样长的时间内,早晚期的代表性器物上稍有变化,是可以理解的。

上述河姆渡遗址第四、三、二、一文化层的陶器的陶质、纹饰和器形的演变关系上,可以明确是连续发展着的,都是河姆渡文化的内涵,这是较多学者的共识,也有的学者认为河姆渡遗址第四、三文化层为河姆渡文化,第二文化层为马家浜文化,第一文化层为崧泽文化,正如《史前研究》编辑部说的:“长江下游(包括钱塘江流域)地区 1976 年命名的河姆渡文化,使这一地区的史前学跨上了新的台阶。现在认为这一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发展序

列是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但有人认为马家浜文化另有来源,它应和河姆渡文化的年代基本相当。这个问题,尚需进一步研究”^①。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得解决河姆渡文化是否发展到马家浜文化,也包括河姆渡遗址第二文化层是否属马家浜文化;“马家浜文化另有来源”的这个源是什么?其次,河姆渡遗址第一文化层是否属崧泽文化。

马家浜文化是否从河姆渡文化发展来的呢?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就得了解马家浜文化的基本特征是什么?马家浜文化的一组代表性陶器是釜、鼎、豆、盃,尤其是釜,都有一周较宽的腰沿,以这一特点称为腰沿釜,器身有呈圆腹的,也有呈筒形的(图一,2、3、6)。这种腰沿釜,河姆渡遗址第四、三文化层中未见,第二文化层中只发现1件,就是这类陶釜的碎片难于找到,而它主要的是敞口釜,卷沿或折沿,深腹微鼓,腹部饰绳纹,如T₂₈④:52,为卷沿、口部下有双耳(图二,2),它与第二、一文化层的釜有着演变关系;其次是敛口釜,一般器身较高,腹较圆,有绳纹,如T₂₆④:34,口缘部有花瓣形纹(图二,1),与马家浜文化的腰沿釜,是属两个文化系统的器物,两者之间没有继承、演变关系,那么河姆渡遗址第二文化层发现的那件腰沿釜,是怎么回事呢?釜身有一周宽沿的产生,在第四、三文化层的陶器中是找不到它的渊源,怎能会突然产生的呢?这与隔钱塘江相望的太湖地区分布着的马家浜文化,腰沿釜是它的主要代表性陶器之一,应是受它的影响下产生的。所以,这件腰沿釜不能作为河姆渡遗址第2文化层的代表性陶器,也就不能将第二文化层是马家浜文化的一个依据。

陶鼎,河姆渡遗址第2文化层只在1977年第2期发掘时发现完整的和可复原基本完整的2件。1件是盆形鼎(T₂₃₂②:4),口部残缺、折肩、扁腹,腹上部饰弦纹,扁锥形矮足(图二,3);另

1件是釜形鼎(H17:2),敞口、扁圆腹,腹部饰弦纹,两组弦纹间有短斜线纹,近圆底处有绳纹,三足略呈圆柱形而微向内收(图二,4)。马家浜文化的鼎,如草鞋山 M₁₃₈:1 的鼎,为圆腹,腹中部饰堆纹一周,三足呈扁锥形而微向外伸(图一,1)。这两类鼎,不论在器形上、纹饰上,都有区别。

陶豆,河姆渡遗址第二文化层的豆,在 1977 年第 2 期发掘时发现可以复原完整的有 2 件,1 件是盘形豆(H8:1),宽沿浅盘,较矮的喇叭形圈足(图二,5);1 件钵形豆(T₂₄₃②:12),口微侈,细高把,喇叭形圈足(图二,6)。马家浜文化的豆也有盘形和钵形两种,盘形豆为侈口,喇叭形圈足,口沿部内侧饰锥刺形纹一周(图一,8);钵形豆为敛口、喇叭形圈足较粗壮(图一,4)。

陶罐,河姆渡遗址第二文化层中,“完整器和复原器很少,其中有 3 件值得提及,一是泥质黑陶罐,口沿残,广圆肩,斜腹下收,小平底,上腹最大径处饰齿状附加堆纹并横安两组对称的窄鼻梁牛鼻耳;二是件泥质灰陶敛口罐,溜肩,圆腹,小平底,腹中部横安鸡冠耳一对;三是件泥质灰陶小口罐,口沿略外翻,球腹,小平底,腹下部饰一对横向牛鼻形器耳”^②。马家浜文化的有颈双耳罐和腹双耳罐两种器形,颈双耳罐为口微敛,腹微向外鼓,大平底;如草鞋山 M₂₀₂:1(图一,5)。这类双耳罐,在河姆渡遗址第四、三文化层中常有与此相似的器形发现,腹部往往饰有绳纹,这在马家浜文化中未见。腹双耳罐为侈口、颈部较斜直、圆腹、小平底,腹中部有对称的两牛鼻形耳,如吴江梅堰遗址出土的(图一,7)。

从上述的釜、鼎、豆、罐这一组陶器分析,河姆渡遗址第二文化层与马家浜文化有明显的区别,尤其是釜更为突出,再结合埋葬习俗分析,河姆渡遗址第二文化层发现墓葬 3 座,其中一座墓骨骼较齐全,为侧身屈肢葬,另两座墓,由于下肢残缺,只能辨明

是侧身葬,与马家浜文化的葬俗以俯身葬为主的,显然有别,应是分属两个考古学文化。

为了进一步辨明马家浜文化不是从河姆渡文化发展来的,不能不对桐乡罗家角遗址发现的遗存^③,进行分析研究。这处遗址在地层上可以分为四个文化层,经碳十四测定年代的有两个数据,都是取材于 H16(属第四文化层),一是距今 7040 ± 150 年(校正年代,以下同),一是距今 6905 ± 155 年;又以热释光对 H16 的 3 块陶片进行测定的平均年代为距今 $6890 \pm 10\%$,还以 H18(属第四文化层)5 块陶片平均测定为 $7170 \pm 10\%$ 。两种测定方法取得的年代大体相当,说明其年代的可靠性,所以,罗家角遗址第 4 文化层的年代大约是距今 7000 年左右。

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经碳十四测定年代的也有两个数据,一是距今 6960 ± 100 年,一是距今 6725 ± 140 年,未见超过 7000 年。因此,罗家角遗址的下限年代,有稍早于河姆渡遗址的可能。

从陶器上分析,罗家角遗址的陶器,在陶质上以夹砂夹蚌陶为主,第四、三层有少量的夹炭陶,第二、一文化层有少量的泥质陶。陶色在第四至二文化层中,以灰红色陶为主,红色陶在第三至一文化层中占第二位,黑灰色陶在第四文化层中较多,约占三分之一以上,自下而上逐渐减少,灰白色陶自下而上逐渐增加。器表以素面为主,有红衣、纹饰有捺窝纹、镂孔较多见,在第四、三文化层有少量陶釜的腹部拍印绳纹,或在一些陶器的显著部位刻划三叶形纹、斜线纹、米点形纹和戳印圆圈纹等。器形有釜、罐、盆、盘、豆、钵、鼎、盂、匜、壶、碗、篦圈架、支座等。

河姆渡遗址的陶器,在第四、三两文化层以夹炭黑陶为主,夹砂黑灰色陶次之,到第二文化层时演变为以夹砂灰红色陶为主,还有泥质红陶和泥质黑陶。器表在第四文化层除打磨光亮

外,常见比较繁复的纹饰,主要有拍印的绳纹和刻划纹,到第三文化层及其以后逐渐演变为以素面为主,纹饰渐逐简略,器形有釜、支座、罐、盆、盘、鼎、豆、钵、盂等。

从上述的罗家角和河姆渡两遗址陶器的陶质、纹饰上分析,区别是明显的;陶器的器形类别上两者大体相似,但是,具体到器形的形态上,就有明显的差别,如釜,是长江中、下游史前文化中常见的一种陶器。不同的考古学文化,釜的形制各异。罗家角遗址第四文化层的腰沿釜,与马家浜文化的腰沿釜有着演变上的关系,而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的釜为敞口釜、敛口釜,未见有腰沿的器形。又如支座,在河姆渡遗址的各文化层中都有相当多的数量发现,并且从早到晚有着演变关系,是河姆渡遗址的一种代表性陶器。罗家角遗址共发现 8 件,以第三文化层居多,能复原的仅 2 件,不能作为这遗址的代表性器物,有可能是受河姆渡文化影响下产生的。

由此可见,河姆渡遗址第四、三文化层不可能发展为马家浜文化。河姆渡遗址的第三文化层发展为第二文化层,是河姆渡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不是马家浜文化。罗家角遗址的第四文化层,是目前所知最早的马家浜文化的遗存。所以,河姆渡文化发展为马家浜文化之说,是欠妥的。

河姆渡遗址第一文化层与第二文化层的关系,从物质文化上分析,有着演变上的关系,第二文化层我们已分析明确不是马家浜文化,第一文化层不可能是崧泽文化。从陶器的特点分析,未见崧泽文化具有特征性的花瓣形圈足器、多节形把的豆等,鼎的形制也不相同。以此观之,河姆渡遗址第一文化层不是属于崧泽文化,应是明确的。

二、揭开了长江流域,尤其是长江下游地区 史前时期历史的新篇章

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发现的大量遗物,尤其是有榫卯的木建筑构件,根据它功能的不同,有柱头榫、柱脚榫、双凸榫、有卯孔的转角立柱、双叉榫、梁头榫、燕尾榫、有卯孔的转角榫、有梢钉的榫和直榫方木等,并且还有难度相当大的企口拼接技术,它是在木板的“两侧各凿出一道宽 1—2.5 厘米、深 2.3 厘米的企口,企口内插入砍削成的梯形截面木块,衔接不见通缝,是密接拼板的一种较高工艺”,“标志着此时木结构已有相当丰富的经验”^④,逐渐的在成熟起来。这样进步的建筑术,不仅在黄河流域史前遗址中未见,就全国范围内来说,也是这样。

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发现的 10 多种建筑上用的榫卯构件,在制作上相当巧妙,在结构上已是相当的完善,它可以承受各种拉、推、压力,以保证房屋的不受损害,为中国木构建筑的发展奠定基础,也对世界建筑史上有着卓越的贡献。

这些木构件,主要用于干栏式房屋建筑上,这种房屋建筑,适合于当时河姆渡人生活着的自然环境——多沼泽的潮湿地带。第一期发掘中发现的干栏式建筑遗迹,有 13 排桩木,其中 8、10、12、13 等 4 排桩木,保存较好,所用的木材相同,排列方向基本一致,应是一座干栏式建筑遗迹。从这座建筑的遗存分析,8、10 和 10、12 这三排桩木的间距大致相等,各约 3.2 米左右。若以 8 号排桩至 12 号排桩计算,其进深约 7 米左右,而 12 号排桩至 13 号排桩的间距仅有 1.3 米,比上述的排桩的间距要小,约为其五分之二,以此推测,应是这座干栏式建筑的前廊过道。总之,它是一座前廊后屋的干栏式建筑。这座干栏式长屋建筑

的长度,以保存最长的 10 号排桩计算,其长度约为 23 米,其南北两端还未到头,据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资料表明,有可能长达百米以上。它的高度,据“10 号排桩中段板桩部分有受压弯折的迹象,结合这一折线的高程和地板中最高一层的位置推测,原来地板比室外地面高出 80—100 厘米。地板支座以上应为梁柱结构,柱高据 59 号构件推定约为 263 厘米”^⑤。这座建筑从地面到屋顶的高度在 3.5 米以上。这座既长又高的干栏式建筑,耸立在这片平原上,是相当壮观的。当然,这样的长屋,还得分隔为若干房间,可分配给各家族或家庭居住,或作公共活动的场所。

居住在干栏式长屋内的河姆渡人的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是稻作的农业生产,发现的农业生产工具,主要的是耜耨,在第一期发掘中发现的有 79 件,它是一种翻土工具,这表明了农业生产已脱离了刀耕火种(或称为砍倒烧光)的生产阶段,已进入了耜(耨)耕农业的阶段,上了一个新台阶。

耜(耨)耕农业生产的主要特点是用耜、耨等工具来翻松土地,改变土壤的团粒结构,以增强肥力,有利于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河姆渡遗址第四层上部较普遍的有一层至数层谷壳、稻秆、稻叶等遗存的堆积,其间还有烧成炭的稻谷。这正是反映了进入耜耕农业之后,生产蓬勃发展、蒸蒸日上的情景。

综上所述,在距今 7000 年前的河姆渡人,在建筑上使用了相当完备的各种榫卯结构,尤其是企口的拼接工艺,使前来参观的专家、学者无不赞叹不已,认为这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是勤劳、勇敢、有进取精神的河姆渡人创造出来的,是合乎科学的一种发明。

稻作农业在当时来说,发现有实物证据的,不仅国内是最早的,在世界上也是最早的一处遗址。这样的一个事实,充分说明

了中国无疑是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之一,再结合手工业的精巧的工艺技术,等等,长江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摇篮之说,提得更为响亮有力。中国的两大河流——黄河、长江,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和文化的发展上,都是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三、野蚕开始驯化为家蚕,对中国也是为世界文明史上作出重要的贡献

蚕原是一种野生的昆虫,人们发现它吐出来的丝,可供利用,于是把它驯化为家蚕。中国养蚕的开端,以往一般人都认为是黄帝妻嫫祖发明的。这一传说,已有学者提出疑问,并加以否定。

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发现一件象牙小盅(?) (T₂₄₄③: 71)口沿处有两个对称的小圆孔,孔壁有清晰的罗纹,外壁刻有编织纹和蚕纹一周。这蚕纹若是作为驯化蚕的开始时期,距今已有 6500 年,其后在宁绍地区史前文化中还未发现有驯化蚕的遗迹,其原因可能是河姆渡遗址是这地区内发掘面积最大的一座遗址,而其它的遗址发掘面积还不大,就不容易发现这类遗存。但是,与其隔钱塘江相望的太湖地区的史前文化中,还有迹象可循,如距今约 6000—5500 年的崧泽文化时期,在崧泽遗址中层的孢粉鉴定:“此时孢粉组合中桑树花粉数量非常多,说明除了附近山地植被中有桑树外,在当地的一些高岗地带也有较多的桑树生长。为何崧泽地区此时桑树频繁生长,是否此时此地人类活动曾经一度有养蚕的活动”^⑥。这样大面积的栽培桑树,而桑树的功能是为养蚕提供桑叶。这样大规模的养蚕业,有可能野蚕已驯化为家蚕。崧泽文化时期蚕的驯养,是受河姆渡

人影响下产生的,还是其自身发展来的,有待以后其它资料来证实。

崧泽文化之后是良渚文化,在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发现家蚕丝的残绢片、丝带、丝线等遗物,确证良渚文化时期已由野蚕驯化为家蚕,不排斥在年代上还得向上推的可能性。

从河姆渡遗址第三文化层到良渚文化时期,在时间上经历了 1000 多年的驯化过程,成为家蚕是完全可能的。

近年来,在河南荥阳青台仰韶文化遗址的瓮棺葬内发现纺织品实物,经鉴定是家蚕丝织品。这一发现,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以往在山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内发现的半个蚕茧的争论,对它持怀疑论者,在理解上或可有所帮助。青台仰韶文化丝织品的年代,据碳十四测定的,为距今 5100—5300 年左右,而钱山漾良渚文化的年代为距今 4800 年左右,两者相差约三五百年;若以崧泽文化时期已驯化为家蚕推算,则较青台仰韶文化早数百年。

再从野生蚕驯化为家蚕的过程分析,在长江下游地区从河姆渡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演变关系较明确;而黄河中游的青台仰韶文化家蚕丝的渊源还不够清楚,不过据郑州市文物工作队张松林先生告诉笔者说,光山县发现有野蚕,能吐黄、白等色的丝。以此,我们可以认为中国蚕丝的起源,是长江、黄河这两条大江河的史前人们共同缔造的结果。

蚕的驯化与农作物粟、水稻、稷、麻的驯化以及猪、狗、牛、羊的驯化为家畜,在性质上有所不同,后两者是要解决人们的衣食问题,前者也可以缝制衣服以暖身,而它的主要功能可能不是成衣以暖身,而是与礼仪上的需要有关。这是由于蚕吃了桑叶,能吐出延绵不断的长数百米,甚至达千米或千米以上洁白而带有光泽的丝,在当时人们的认识领域来说,是无法理解的。再从蚕

的生活史分析,由成虫(蛾)产下的卵,到明春天暖时孵化出幼虫(蚕),蚕长大后,吐丝作茧,蛹居其中,蛹再蜕化为成虫(蛾)。蚕的这种生活史,与家畜猪、狗、牛、羊的显然不同,又是难以理解的一个问题。在认识上无法理解的时候,就不得不归之于神的恩赐。神恩赐的物品,自然要把蚕丝作为神物。《说文解字》:“叕,日初出东方汤谷所登转桑,叕木也,象形。”又说:“桑,蚕所食叶木,从叕木。”这表明了桑是一种神木,蚕吃了神木的叶后能吐出来的丝,也就成为神物。神物的丝织品,不能人人都能享有,只能是沟通神人之间的巫师和氏族、部落的领导者等人,才能享有。

丝绸是人们所喜爱的织物。丝织成的绢帛,有人难以想像的轻盈、柔软,绚丽多彩。所以,其后丝绸向东传至朝鲜、日本,和向西传至希腊、罗马时,都赞口不绝,把沟通中西文化上、商业上往来的大道,称为“丝绸之路”,迄今还是为学术界关心的一个重大课题。

四、海上交通的开拓,加速了 各地区间的文化交流

史前时期各地区、各考古学文化并不是孤立的、老死不相往来的,而是互有来往,彼此间在经济上、文化上有着交流,影响关系。这种相互间来往、交流的范围,随着时间上的向前推进,文化方面的日益进步,生产的不断发展,它的空间范围也随着由近而远的向前扩展。各考古学文化相互接触面的扩大,吸取他人之长的有利因素也可增多,丰富其文化内涵,促进和加速社会生产的发展进程。

这种经济上、文化上的交流,主要是依赖交通的发展。交通可分为陆路、内河、海上交通3种。以往对后者很少论及。河姆渡遗址的发掘,又在1982年渤海湾口的大竹山岛附近的海域内,打捞起1件陶釜,器形为侈口、宽沿、腹下垂呈扁圆形,有绳纹。这种形制的陶釜,在渤海湾沿岸及其附近一带地区的史前文化中所未见,恰与河姆渡遗址第一文化层的釜相类同。这一事实说明河姆渡遗址第1文化层时期的人们,沿海道到达了渤海湾后遗留下来的遗物,距今已有五六千年了。其后,1985年对江苏灌云大伊山遗址的发掘,在38座墓葬中,发现玉璜4件、玉玦1件。这种璜、玦等玉器,其中包涵有河姆渡文化的因素。具有这种文化因素的遗物,不在内陆性遗址内发现,而是在滨海性的大伊山遗址内出现,正是说明了已开拓海上交通的产物。大伊山墓葬的年代,距今约6000多年。这就表明了6000多年前的河姆渡人、大伊山人之间已有了海上交通,到五六千年时,河姆渡人再向前进,绕过山东半岛,到达渤海湾,是海上交通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趋势。

河姆渡遗址发现的海上交通工具有木桨,我们认为还有独木船的可能。用木桨划的独木船能否在海上航行;笔者对此已有论述,认为是完全可以的^⑦。史前时期的人们,不仅在内河航行使用独木船,航海也用独木船,这一方面,民族志资料可以得到证实。

海上交通的扩展,对河姆渡文化的社会生产起到了加速的向前发展。

五、取得水源的另一个途径——水井的开凿

中华民族利用地下水资源的凿井技术始于何时,据《世本》

记载：“黄帝见百物，始穿井”。《周书》：“黄帝穿井”。以此观之，黄帝时已能凿井。再从考古资料分析，目前发现的水井，以河姆渡遗址第二文化层（距今约 6000 年左右）发现的木结构的水井的年代为最早，它呈方形竖井，每边各长约 2 米，面积为 4 平方米。它的开凿方法是利用原有的水坑，在其中部打入 4 排呈方形的木桩，然后把木桩内的泥土挖去，深度为 1.35 米，为了防止桩木向内倾倒，再在 4 排桩木上套有一个方框。井口用 16 根长圆木组成的井架以加固。在水井的外围有一圈栅栏，呈辐射状的长圆木和苇席等残片分析，在水井上应盖有简陋的井亭。

这座水井作什么用的呢？发掘者认为是满足人们的用水。考察遗址的所在地的西部和南部紧邻河道，对河姆渡人的用水是相当方便的，为什么还要在水坑内凿井取水呢？这个问题难道我们不应该深思？笔者认为当天旱时，水坑浅，而地下水位下降，坑中的水容易成为枯竭状态，这时江河内的水仍可取用。江河的水总感觉到不及水坑内的水来得清、好喝。正如 3 世纪时刘熙《释名》：“井，清也；泉之清洁者也。”河姆渡遗址第二文化层的人们可能已认识到饮用井水比江河中的水为佳。

从这口水井的开凿技术，我们可以看到河姆渡遗址第二文化层时期的人们，已有了一定的物理学知识，如水是向低处流的，地下水通过土壤的渗透作用，可以流入井内，使井水可以源源不断地供应人们使用；井边的 4 排桩木，是保护和加固井壁用的，与其后出现的井圈的作用是相同的，这应是他们已认识到井壁四周的土壤受到压力，容易坍塌，遭到破坏；一根根直立桩木的抗压力是有限的，为了要增强抗压力，在桩木的顶部加套一个方木框，不仅把每排桩木，而且也把 4 排桩木结合为一个强大的抗压力量，同时也说明了当时的人们对土壤的性质已有一定的认识。

六、大量的动植物遗存,是不可忽视的一份重要的文化财富

河姆渡遗址发现的动植物遗存,是其它史前遗址无法与其相比的。正如裴文中先生说的:“这遗址出土的兽骨很丰富,不仅数量多,门类也多,值得好好研究。通过对它的研究,对了解当时人食物的来源和成分,对恢复当时的古地理,古气候和建立我国新石器时代动物考古学都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其中存在第四纪古老的动物——犀牛和印度象,它解决了历史上的一个大问题。为此,在修改《石器时代文化》一书时,我特别加了一段河姆渡文化。”^④可见河姆渡遗址动物骨骼群的重大意义了。

河姆渡遗址发现的动物骨骼,“经过详细鉴定共有 61 个属、种,无脊椎动物仅 3 种,脊椎动物有 58 种(属或未定属、种者),包括鸟类、鱼类、爬行类及哺乳类,其中尤以哺乳类的种类最多,占 34 个属、种,除了小哺乳动物仅 2 种,种类比较少之外,其它各门类比较齐全,个体数量也相当多,可视为这一遗址中有特色的代表动物”^⑤。在哺乳类动物中属于家畜的有猪、狗、水牛三种。对中国何时有家畜牛的问题,以往总是未能得到解决。河姆渡遗址和罗家角遗址的发掘,都有大量水牛遗骸发现,经鉴定为家畜,这就开始解决了中国牛的饲养始于距今约 7000 年左右的长江下游地区。开始驯养的是水牛。这种水牛的“形态特征和圣水牛是一致的,角短、向外向后伸展”。“水牛可能已被利用来代替人力。”对于四不像鹿的角发现的有 500 多件,其特点是非自然脱落的而且年青个体的较多,完整的角仅有 1 件。这些现象,再结合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曾被驯养,“或许可以设想这种动物被驯化的时代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⑥。

河姆渡遗址还发现大量的植物遗存,有稻谷、小葫芦、橡子、菱角、酸枣、芡实等一些果实,还发现各种叶片,如稻叶、稻秆、壳

斗科的赤皮稠、栎、苦槠；桑科的天仙果；樟科的细叶香桂、山鸡椒、江浙钓樟；虎尔草科的溲疏比较种等。在发现的植叶片中，以樟科植物的为最多，显然是人工采集来的堆积。樟科植物中有不少种类是可供药用，当时人们是否已懂得用它来驱虫防病，值得今后进一步探讨。又从孢粉的分析鉴定，有木本和草本等多种植物，从这些植物的发现，结合河姆渡遗址地区内的地形特点，越姚江为山峦起伏的四明山和遗址东的小山丘上有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主要树种有蕈树、枫香、栎、栲、青岗、山毛榉等，林下地被层发育，蕨类植物繁盛，有石松，卷柏、水龙骨、瓶尔小草、树上缠绕着狭叶海金沙和柳叶海金沙。在花粉谱中既有禾本科草原植被，又有森林植被两类植物关系，这与河姆渡遗址背山面水又有大片的沼泽地的自然环境相一致，并“认为花粉谱中出现的禾本科植物花粉，其大多数应系栽培谷类作物”。

从出土的动植物遗存分析，动物遗骸中爪哇犀、苏门犀和亚洲象等，可以证明这地区是属南亚热带气温，再结合植物遗存分析，有属热带的狭叶和柳叶的海金沙，瓶尔小草等。这些植物，目前分布于两广、海南岛和台湾。以此推断，河姆渡遗址当时的气候，“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 4°C ，1 月份平均温度可达 $10\sim 12^{\circ}\text{C}$ ，属于热带和南亚热带气候”。这样的气温，又有充分的雨量，对动植物的繁殖生长，十分有利。动植物的繁盛，在地理环境上是有山有水，有平原又有沼泽，是一幅美丽的人文景象，也可以说是动物王国中的一个乐园，同时也为人们提供了必要的生活资料。

由此可见，河姆渡遗址发现的动植物群，确实“值得好好研究”，需要作深入的分析，并且以此为基础，对裴文中先生提出的建立中国新石器时代动物考古学的建议，是十分有意义的。

此外，河姆渡遗址发现的象牙器、漆器、玉器等，为中国传统手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还有象牙蝶形器等器物上刻划的双鸟朝阳的纹饰，它不仅是一件珍贵的艺术品，也是

当时人们对太阳神崇拜的反映；又如稻穗纹陶盆、猪纹方钵等器物，可能是与农业和狩猎等生产活动中举行的巫术仪式的用器，等等，在此不再分析阐述。总之，河姆渡遗址两次发掘出土的遗存，给我们带来需要进行分析研究的课题是相当多的，我们能把这些资料吃透、真正的能消化掉，再结合其它的有关资料，必能对中国六七千年时期的史前史，作出一定的贡献。

在这里还得提出来探讨的是通过上述的物质文化所反映的精神生活外，对当时人们有哪些基本的科学知识，也应该要有充分的认识或有一定的了解。由于河姆渡遗址两次共发掘面积只有 2600 多平方米，当然不能反映河姆渡遗址的人们，更不能反映河姆渡文化人们的全部科学知识。还有其它的一些局限性，要影响到这一方面的认识，如有些反映科学技术方面的资料不能全部保存下来，能保存下来的在我们当今的识辨能力下，可能有些还未能认识到或认识它的深度还不够；同时一个遗址不能代表整个河姆渡文化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虽然如此，但是，从河姆渡遗址发现的遗存中进行分析，还是可以折射出当时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一个侧面，有时可能还是一个重要的侧面。

从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发现的木建筑构件中的榫卯结构分析，梁、柱榫卯的受压、受拉的不同，其结构也随之而异，是符合受力的基本原理，有的还加有梢钉的榫，以防止拉力过大而脱榫，说明了已有初步的力学知识，尤其是企口的密接拼合技术，不见通缝，更要有相当的数理知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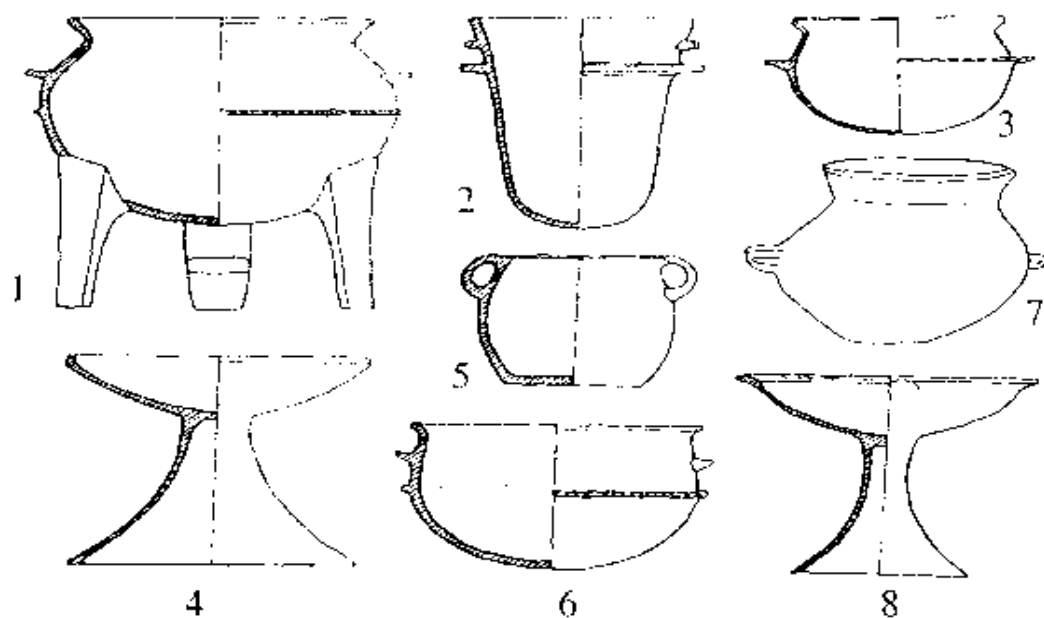
从干栏式长屋建筑的地理位置上分析，是在西南有小山和东北沼泽之间的缓坡地段，河姆渡人取背山面水的西北向东南走向，使长屋的纵轴得以在等高线上，反映了他们已有一定的地理知识，巧妙的利用这块沼泽地来建立村落。

对昆虫——蚕的饲养，说明了对蚕的生活史，由成虫(蛾)——卵——幼虫(蚕)——蛹，蛹再蜕化为成虫(蛾)，已有一些了解；对植物中的樟科类叶片的采集堆积，做什么用呢？樟树植物中有不

少种类是可作药用的,有可能已认识到它能驱虫防病的作用。又如漆树液汁的可利用性而加以开发,等等,都表明了已有一些生物学知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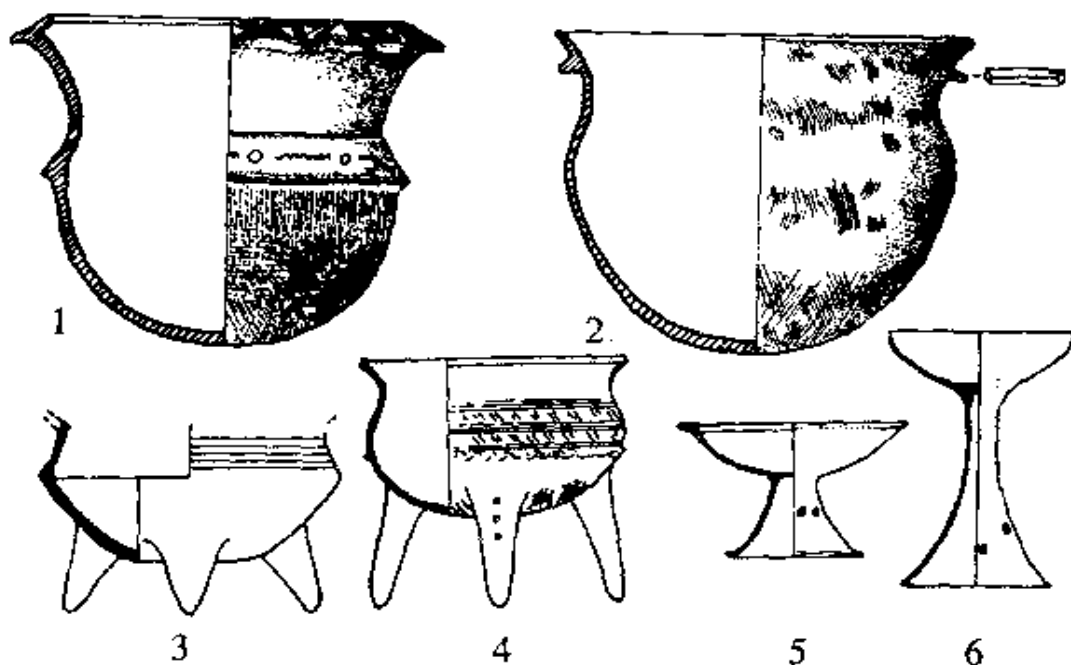
凿井技术的开创,地下水的利用,能认识到水有向低处流的性质,井中的地下水不断地利用,可以把它周围附近一带的地下水能源源不断的向井中流,以保持地下水的整个水平面,对水的性质的理解而加以利用,是很可贵的。

由此可见,有些人认为史前是很落后的,自然知识那就更不用说,不可能有这方面的知识,而实际的事实是怎样的呢?从上述的分析就说明了他们以聪明又敏感的观察力,再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自然知识,应用到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得到不断的改善,也就是说为他们自己造福。



图一 马家浜文化陶器

草鞋山:1. 鼎(M₁₃₈:1), 2. 釜, 4. 豆, 5. 双耳罐, 6. 釜, 8. 豆
罗家角:3. 釜(T₁₃₀②:4)
梅堰:7. 双耳罐。



图二 河姆渡陶器

1. 敛口釜(T₂₆④:34), 2. 敞口釜(T₂₈④:52), 3. 盆形鼎(T₂₃₂②:4), 4. 釜形鼎(H₁₇:2), 5. 盘形豆(H₈:1), 6. 钵形豆(T₂₄₃②:12)

(注释)

- ①《史前研究》编辑部:《蓬勃发展的中国史前学研究——纪念新中国建立四十周年》,《史前研究》(辑刊)1989年。
- ②刘军、姚仲源:《中国河姆渡文化》,第3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 ③罗家角考古队:《桐乡罗家角遗址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报》,文物出版社第1981年版。
- ④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 ⑤同注②第5页和注④。
- ⑥《崧泽——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第135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 ⑦吴汝祚:《中国沿海史前文化的交往与海上交通》,《东南文化》1993年第2期。
- ⑧《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动物群·前言》,海洋出版社1989年版。
- ⑨同注⑧第90页。
- ⑩同注⑧第98—99页。
- ⑪浙江省博物馆自然组:《河姆渡遗址动植物遗存的鉴定研究》,《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关于河姆渡遗址年代的讨论

黄宣佩

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遗址,发现于1973年,由于它是建国以来江浙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年代最早的一处遗址,该遗址的遗存,又大部分位于地下水线以下,保存良好,在其中,有大批稻谷、带榫卯或企口的干栏式建筑木构件、耜、桨等木、骨生产工具以及漆碗和木架井,都为全国年代最早或罕见,因此名闻国内外。对于遗址的年代,它的早期(第四层)据碳十四测定最早距今 6955 ± 130 ;(经树轮校正,下同),最晚为 6570 ± 120 ,测定所选的标本既有单年生的橡子和菱角,也有掺和在陶胎中的炭末,甚至还采集了当地的现代标本作参考,可以说是谨慎可靠,所以把它的上限定为距今7000年左右。但是如果把这一遗址的各层年代作一系统排比,以及与江浙地区甚至国内其他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作一比较,笔者以为上列测定还偏晚,现提出讨论如下:

一、河姆渡各层的碳十四测定,年代大多偏晚

河姆渡遗址内含四个文化层,各层的特征都较明显:

第一层 石斧为舌形、厚实、无孔,石锛作平背长条形或弧背的小锛,石耜上的穿孔,使用琢制,未见管钻,都与马家浜晚期或崧泽文化早期相似或一致。饰件有玉石制作的玦、璜、管、珠、

坠等, 玦在这一地区是马家浜文化的典型器, 至崧泽早期以后即不见, 璜作长条形, 未见半环或半璧形, 亦属崧泽早期形制, 但所见陶器, 小罐可能已采用轮制, 轮制陶器在崧泽文化中至晚期始见, 鼎足有扁方形侧足、凿形足、三棱形足等, 都与崧泽文化的中、晚期相似。至于浅盘鼎、浅盘豆和竹节形豆把, 以及一种腰鼓形圈足杯亦为崧泽文化晚期常见器形, 所以第一层年代大体与崧泽文化相当。崧泽文化的年代据碳十四测定与地层分析, 约在距今 5900—5100 年之间, 河姆渡第一层碳十四测定为 5330 ± 130 , 只属于该层下限的年代。

第二层 石斧作长条形, 厚重无孔, 两面刃对称, 石铤均为体厚弧背, 双孔刀的钻孔使用琢制, 饰件有玉钺, 无璜(原报告的璜, 仅为残件, 两端无穿孔痕迹, 按弧度与璜剖面形状, 更似钺)均早于崧泽文化; 陶器使用泥条盘叠法制作, 少数可能已用慢轮修整, 夹砂红陶的砂粒不匀, 器壁厚重, 泥质红陶, 外红内黑, 器表常见红褐色陶衣, 还出现了表面打磨光亮, 表里一致的泥质黑陶, 器形有弧腹腰沿圈底釜、牛鼻耳罐、外红内黑高把豆、圈足簋形器、以及大量鼎足, 而且腰沿釜的沿面平伸而非斜翘, 罐类器中已出现圈足, 豆把中除有小圆孔外尚见大三角孔, 鼎足中除带双目的圆锥足外, 尚有扁形足, 这些都与马家浜遗址的上层、邱城遗址的下层、崧泽遗址的下层特征相似。上列遗址的年代, 约为 6200—5900, 现河姆渡第二层所测 5660 ± 130 、 5840 ± 130 和 6015 ± 135 , 除后一数字外, 都进入本址第一层的年代。

第三层 石器有长条形、厚实, 双面刃的斧、铤和凿以及刮削器, 制法琢磨兼用, 器上遗留打琢痕迹。陶器以夹炭黑陶为主, 夹砂灰陶次之, 并偶见泥质灰陶, 制法采用泥条盘叠法, 未见轮修, 器类有腰脊釜、双耳罐、甑、钵、盆、盘和豆、碗、杯等, 与第二层相较变化较大, 不相衔接, 是早于马家浜遗址下层的古文

化。此层所测年代为 5950 ± 120 、 6010 ± 130 、 6210 ± 110 、 6265 ± 110 和 6860 ± 130 ，前四个数据都属于马家浜遗址的上层与本址第二层年代，仅后一数字能反映第三层年代。

第四层 石器硬度高，采用黑色变质岩、辉绿岩和硅质泥岩等石料制作，磨制不精，打琢痕迹清晰，器类与第三层相似，陶器胎质单一，均为夹炭黑陶，制作处于泥条盘叠法还很不成熟阶段，器形往往不甚规整，尤其是第四层下部有不同程度的歪、斜、扭、偏，器表处理粗糙，有的内壁没有抹平，有的外壁未经打磨，在一些罐的底部还有粗厚的泥条痕，烧制火候也较低，器表常有粉末状斑驳，有的底部有烂底现象，器类上甗尚未出现，豆属偶见，腰脊釜和双耳罐，器形变化不大，这一层无论石器和陶器都呈现早期特征，年代应早于第三层的 6860 ± 130 ，而且堆积厚达 100~165 厘米，自身尚有(4)A 与(4)B 层之分，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今所测年代，最早在距今 6900 年前后(6955 ± 130 ； 6945 ± 190 ， 6905 ± 220)，有两个在 6800 年前后(6850 ± 120 ； 6895 ± 130)，四个在 6700 年前后(6740 ± 130 ； 6720 ± 140 ； 6715 ± 130 ； 6700 ± 130)，一个为 6570 ± 120 ，除三个 6900 年前后的可作为第四层下限以外，其它都进入了本址第三层年代。所以据上列分析本址各层的碳十四测定都显偏晚，第四层上限应早于距今 7000 年。

二、河姆渡第四层的上限年代， 早于罗家角第四层

1979 年底发掘的浙江桐乡罗家角遗址，位于杭嘉湖地区，与河姆渡文化的分布区相邻，文化面貌亦相近，如以大文化圈观

察,两者似为一类文化的二种类型,所以在年代上有很大可比性。罗家角的遗址同样有四层,第一、二层所见腰沿釜、平底盂、喇叭形圈足豆、细长圆锥形鼎足、以及鼻尖稍宽的牛鼻耳,与马家浜遗址的上下层、邱城遗址的下层属同一类型,年代与河姆渡第二层相当。第三、四层有较多夹炭陶和腰脊釜,与河姆渡第三、四层关系密切。同为江浙新石器时代年代最早的文化层之一,罗家角第四层所测年代,芦苇的碳十四为 6905 ± 155 与 7040 ± 150 ,陶片的热释光平均年代为 $7170 \pm 10\%$,似与河姆渡第四层同期或略早。

但以河姆渡第四层与罗家角第四层的遗物作比较,前者显示早于后者:河姆渡的石器石质坚硬,磨制不精,有的还以琢代磨,器物种类不多,仅见斧、凿和刮削器,并且以斧而论,两面刃不对称,处于斧铤难分的状态,而罗家角的石器,虽然在制作水平与河姆渡近似,但种类出现了刀,石质有了较软的页岩,从石器的发展规律来看,硬度由高而低,种类由简单而复杂,反映河姆渡石器较罗家角更为原始。在陶器方面,河姆渡的陶质仅有夹炭黑陶一种,尤其是第四层下部陶胎中所夹砂粒粗大,制作处于泥条盘叠的初级阶段,甚至有的还使用捏制,烧制的火候不高。对比罗家角第四层,除以夹蚌夹砂陶为主以外,尚有与河姆渡同类的夹炭黑陶;泥条盘叠技术也较成熟,器形比较规整,器类除以腰沿釜为主以外,还包含河姆渡的腰脊釜,反映罗家角接受河姆渡的影响,而且罗家角的腰沿釜,外凸的边沿近似较宽的腰脊,腰脊与腰沿可能还有一种前后继承与发展关系,以此观察河姆渡第四层,陶质单一,制作方法原始,应该处于更早一阶段。

再以两者的动物群与植物孢粉作分析,在动物中,河姆渡有生活在热带、亚热带的红脸猴、猕猴、犀牛和亚洲象,在罗家角除亚洲象以外,其他热带动物未见(亚洲象在江浙地区,直到良渚

文化时期,尚能偶见)。河姆渡的孢粉有目前只分布于广东、台湾、马来亚群岛、泰国、印度和缅甸有狭叶海金沙及柳叶海金沙,这些在罗家角也不见,因此据分析河姆渡第四层的气候相当于现在我国华南的广东与广西的南部,而罗家角第四层只比本地现代略为暖和,接近马家浜遗址。从气候分析,河姆渡第四层年代亦早于罗家角第四层。

三、河姆渡上限的年代,似和裴李岗文化相当

河姆渡第四层的年代,还可以和下列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比较:

1. 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遗址,该址同在长江以南华东地区,所见石器,石料采用砂石、燧石和石英石,打制石器占 40%,磨制石器占 60%,所谓磨制,仅在天然的河卵石上钻一孔,或打击磨出刃部,种类只有刮削器、砍砸器、棱形器、石核石器或有孔石器,无明确分工和固定形制。陶器全为灰红色夹砂陶,质地粗糙,龃和的石英粒大小不等,有的大至一厘米,都用手制,陶片剖面可见片状分层结构,系用贴塑法制造,器壁厚薄相差 0.4—1.4 厘米,内壁凹凸不平,火候低,质松易碎,发掘所见均为碎片,陶色不匀,同一陶片上往往有红褐、灰黑等色,器类只有罐形器一种,直口或直口微侈,无唇沿、耳、把、圈足,都为圜底,器表有绳纹,有的在绳纹上还涂砾或刻划格纹,碳十四年代未经校正为 8825 ± 240 (校正后约为 9500 左右) 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最早的遗址之一,河姆渡第四层与之比较,石器虽然硬度高,但已经磨制成一定的器形,陶器的陶质单一,并且贴塑法尚未绝迹,但已进入泥条盘叠的初级阶段,而且器类较多,器形有了唇、沿、颈、腹、耳、把之分,因此,虽然仍有许多早期因素,而显

然晚了一大段。

2. 湖南省澧县彭头山遗址,是略晚于万年仙人洞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石器有细小燧石器、大型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三类,选用河卵石作石料,以打制为主,器形只能以刮削器、锥形器、雕刻器、砍砸器和石锤等分类,但从棒形坠饰和石管等饰件的制作来看,有的已经通体细磨对钻成孔,掌握了一定的磨制技术,文化层似包含较长阶段。陶器仅有夹炭灰黑陶一种,小件采用捏制,大件使用贴塑法,工艺粗糙,器形常见歪斜,器表凹凸不平,器类有釜、罐、盘、钵、碗、碟、盆等种,普遍为圜底,厚胎厚底无沿,但已见颈、耳、三足和小突纽,炊器使用支座,有的支座有三角形镂孔,碳十四测定年代未经校正为 7815 ± 100 和 7945 ± 170 (校正后约为 8500 左右),这一遗址石器和陶器的制造技术与仙人洞接近,但从石饰件的磨制与钻孔技术,陶器的种类已经较多以及器形多圜底,器表有绳纹,和使用支座等因素来看,它的下限已与河姆渡第四层相当接近。

3. 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遗址,石器已经以磨制为主,并且制作较精,只有少量打制石器,器类有明确分工,有磨盘、磨棒、铲、镰、刀、斧和小形燧石器。陶器的陶质有夹砂陶和泥质陶之分,陶色除以橙红橙黄为主,也有少量灰陶,制法似用泥条盘叠,但还比较粗糙,陶胎厚薄不匀,器形不很规整,烧制温度据测定为 $950 \sim 960^{\circ}\text{C}$ 高于河姆渡的 850°C ,夹砂陶大多为素面,有的有篦点纹,划纹或乳丁纹,不见绳纹,器类有鼎、罐、壶、钵、碗,器形有圜底、平底、附双耳、三足、假圈足等,碳十四测定未校年代除去一个 9040 ± 1000 偏高以外,为 7445 ± 200 、 7185 ± 200 、 7145 ± 300 、 6435 ± 200 ,校正年代约为 8000—7000 年,以河姆渡与裴李岗比较,裴李岗的石器制作较精,分工亦细,陶器的胎质已有炊器与用器之分,器形复杂,因此似更为进步。河姆渡的年代应

与之相当或略早。

值得一提的是裴李岗与河姆渡虽然两地相距千里,而在年代上却具备可比条件;以两地的古文化序列分析,河南为裴李岗—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河南龙山—二里头文化。浙江为河姆渡与罗家角—马家浜—崧泽—良渚—马桥文化,两地古文化的年代;二里头与马桥文化相当,在马桥中有二里头因素,在二里头中亦见马桥器物,两者碳十四年代也相近。河南龙山与良渚文化相当,良渚器物见之于山西襄汾陶寺等龙山文化,及山东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庙底沟类型与崧泽文化关系密切,在庙底沟类型中有崧泽型的陶豆与玉璜,而崧泽中亦见庙底沟的彩陶片与陶环,碳十四年代同样相近,而马家浜与半坡类型的中晚期碳十四测定相比,处于相似发展阶段。河姆渡的第三层与半坡类型早期应相当,所以第四层应与裴李岗文化可以相近。依据上列分析,笔者以为河姆渡第四层的年代应早于 6955 ± 130 ,可能处于 7800—7100 年阶段。

注释

- ①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 年第 1 期。
- ②河姆渡遗址考古队:《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0 年第 5 期。
- ③牟永抗:《试论河姆渡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79 年版。
- ④浙江省博物馆自然组:《河姆渡遗址动植物遗存的鉴定研究》,《考古学报》1978 年第 1 期。
- ⑤罗家角考古队:《桐乡县罗家角遗址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学刊》1981 年。
- ⑥浙江省博物馆自然部张明华:《罗家角遗址的动物群》,《浙江省文物考

古所学刊》1981年。

- 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81）》，文物出版社出版。
- ⑧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崧泽一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出版。
- ⑨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嘉兴马家浜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考古》1961年第7期。
- ⑩梅福根：《浙江吴兴邱城遗址发掘简介》，《考古》1959年第9期。
- ⑪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试掘》，《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
- ⑫江西省博物馆：《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文物》1976年第12期。
- ⑬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文物管理所：《湖南澧县彭头山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8期。
- ⑭新郑县文物管理委员会、郑州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裴李岗遗址一九七八年发掘简报》，《考古》1979年第3期。
- 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1979年裴李岗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2年第4期。

宁绍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 若干问题探讨

刘 军 蒋乐平

一

钱塘江——杭州湾以南宁(波)绍(兴)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因 70 年代余姚河姆渡遗址的发掘轰动学术界。

河姆渡文化的确立是在与浙北杭嘉湖地区原始文化的联系、比较中渐趋完善的。河姆渡文化独具个性的器物群主要见于遗址的第三、四层。第一期发掘报告的编写者认为:“在文化面貌上,第三、四文化层有别于我省以前发现的任何新石器时代遗存,是一个完全新颖的文化类型,我们暂将其命名为‘河姆渡文化’。”而第二和第一文化层的时代与内涵相当于太湖流域的马家浜文化类型和崧泽文化类型。^①70 年代末期后,我们提出了第二种观点,即河姆渡遗址早期(第四、三层)和晚期(第二、一层)间,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发展缺环,但仍有一脉相承的联系,属统一的河姆渡文化。^②其中最主要的依据是河姆渡遗址四个文化层中自始至终存在着陶炊器上的绳纹装饰;浙北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中,绳纹仅见于马家浜文化早期的个别遗址。另外,陶釜的形态差异及其作为主要炊器被陶鼎取代的时间,也成为判别两支文化的重要特征。

河姆渡遗址第二、一层的遗存面貌既体现了河姆渡本地文

化传统的延续,又兼具马家浜—崧泽文化的因素,现在看来,这一现象至少表明了该阶段宁绍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复杂构成,对其性质的界定实际上牵涉到对这一地区新石器文化发展趋势的把握。在过去的认识中,河姆渡遗址第三、二层间(即早、晚期间)的内涵差距更多地被认作是一段时间上的空档,是可以以用适时的遗址作填充的文化缺环。实际的情形似乎是,这一文化缺环是在一定的历史、自然条件作用下形成的一种文化错位,探寻其间的关系,在研究视角和意义开掘上都应超越原有的范畴。

宁绍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从70年代河姆渡遗址两次发掘之后,又有了新的进展。田野工作包括慈城慈湖遗址(1988年)、慈城小东门遗址(1992年)、奉化名山后遗址(1989、1991年)、象山塔山遗址(1990、1993年)这四处遗址的六次正式发掘。^③这些遗址在地理位置上由北向南分布,较理想地反映了宁绍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一个侧面。遗址均属山前地带型。值得注意的是,四处遗址的早期遗存的时间及内涵都与河姆渡遗址第二层相当,侈沿、多角沿绳纹圜底釜及泥红陶喇叭形圈足豆引人注目。有理由认为,宁绍地区的史前居民,在跨入距今约5900年(河姆渡遗址第二文化层年代上限)之后,不但在文化内容的创造方面发生了变异,而且在生活区域的开拓和人口繁衍上,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名山后、塔山等遗址所共有的、相当于良渚文化类型的后续地层中,绳纹一如既往地附著于部分陶炊器的底腹部,陶釜亦继续是重要的炊器之一。诚然,我们不能因此无限制地延长河姆渡文化的延续时间。这样,对宁绍地区新石器文化发展的轨迹与趋向,便要作出新的分析与把握。

河姆渡遗址第四、三文化层所示的内涵特征,可以归纳为这几个方面:以夹炭黑陶为主的形态独具的陶器群,主要有釜、盘、罐、钵、豆以及陶支架、器座等种类;成批的以骨耜为主体的骨制工具;干栏建筑所反映出来的木构建筑技巧及其作为居址的民族聚落特征;稻作农业发生的谷物证据;丰富的动植物遗存所能提供的当时的生态环境。

我们认为,河姆渡遗址早期遗存(主要为第四文化层)的文化特征体现出一种原始性与成熟性的统一,其文化成就代表了一种隶属于特殊环境的原始文化在一定条件下的阶段性总结。

河姆渡遗址第四层的陶器十分丰富,器物形态别具一格。带颈脖的有脊釜、方形带耳钵、方形或圆形的盖顶孟、六角花瓣形盘、浅盘内附半环形钮的器盖等,均成为河姆渡文化陶器的特色性器物;豆的少量存在说明圈足器与更大宗的圈底器、平底器并见于河姆渡早期文化,但这时圈足的功能往往由独立制作的器座代替,这种特殊的“圈足器”现象有别于中国史前文化的其它种系。这说明了河姆渡文化具有独立的发展渊源。另外,河姆渡遗址第四层盛行陶器装饰,技法分刻划、压印、拍印、戳印、堆贴等类,纹样有绳纹、几何纹、谷粒纹、贝齿纹、波浪纹、锯齿纹、篦点纹和禾叶纹等类。统而观之,河姆渡早期陶器的造型、装饰作风颇为繁缛,离素朴甚远,更与其烧陶技术上的粗陋不相称。据有关专家研究:“当时的烧成温度不高,一般在 800℃ ~ 850℃ 之间,最高也不超过 900℃。夹炭黑陶的烧失量高达 13%,是新石器时代各地出土陶器中所没有见过的。”^④“各类陶器均为手制,造型不规整。”^⑤这种反映在陶器上的精致繁复与

粗陋低质并见的矛盾现象,表明了河姆渡文化在相对封闭的文化环境中独特的生长机理。就其本身而言,文化发展到了一定的高度,表现出相当充分的成熟性,但放在更宏阔的历史长河中,只能算是别有意义的文化歧变。

河姆渡早期遗存中精美的骨、牙雕刻艺术在同时期的史前文化中独树一帜,堪称一绝。一件体现鸟·日崇拜的象牙雕刻,更是具备神秘宗教意涵的原始艺术珍品。象牙的硬度不亚于普通石料,作为艺术品的加工要求当然更高,但是,河姆渡遗址第四、三层的石制工具十分简陋,生产工具只有斧、凿和磨石等少量几种,斧铤不分,留有明显的打制痕迹。而同时期的马家浜文化早期,石器的数量与种类均较丰富,斧、铤、凿、刀等基本器形特殊明确,磨制、抛光程度较高;采用娴熟的管钻法钻孔,相比之下,河姆渡文化略逊一筹。但有一种叫“蝶形器”的石器,形似蝴蝶,两翼展开,制作甚精。“蝶形器”的用途各有说法,其中“鸟图腾”说^⑥较为流行。概言之,河姆渡文化存在着对实用石器制作的草率、而对原始宗教艺术品格外偏重的特征心理,从文化进化的原则考察,这一现象反映了一种异常的价值取向,于是出现这样的观点:“尽管河姆渡文化曾发现精美的骨器、珍贵的象牙雕刻和漆器等特殊品(着重号由作者另加),但从整体文化发展水平来衡量,则杭嘉湖地区文化系统要高于宁绍地区文化系统”^⑦。将精美的象牙雕刻等工艺制品视作“特殊品”处理,原因何在?一言以蔽之,河姆渡文化或因某种内部的机制障碍,或受外部条件制约,是一种未能得到健全发育(夭折了)的文明(文化)模式。

楼式结构的干栏建筑群体常被认作是对沼泽环境的被动适应,其实更应将其视作河姆渡人在较优裕的经济条件下改善生存空间的主动创造。史前人类在旧石器时代末叶从山地洞穴向

平地泽畔进发,本来就是在认识和改造自然方面的一次极富意义的生存选择。河姆渡先民显然在适应和利用古宁绍平原优裕的自然资源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从事渔猎采集,并在长期的实践中获得了畜牧和农业生产的经验。

河姆渡遗址早期堆积中大量的动物骨骼的鉴定结果和植物孢籽分析说明,当时的宁绍平原气温较现在高,气候条件大致与现在的华南相似,遗址周围水域宽阔,有茂密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作为地球资源的早期开发者,河姆渡人所能利用的自然资源当然非今日可比,猪、狗、牛、羊、梅花鹿、四不象、水鹿、鹿、獐、犀牛、象、獾、水獭、虎、熊、猫、穿山甲、鸦、鹰、鲤、鲫、青鱼、鲢鱼以及葫芦、橡子、菱角、酸枣、麻栎果等兽、禽、果实,均在捕猎、采集之列。

对动物资源的利用构成了河姆渡文化的重要特色。遗址早期遗存中骨(角)制品的发达程度在中国史前遗址中是绝无仅有的。这些骨(角)器品种繁多,磨制精细,往往还雕饰各种各样的图案。骨耜、骨镰用于生产、采集;骨镞、骨锥、骨哨充当渔猎工具;骨针、骨梭、纬刀(骨匕)意味着纺织这一手工业的诞生。其它还有两头槌状器、蝶形器、靴状器等。笄、管、珠、坠饰等人体装饰品亦大多取材于动物骨、角。值得注意的是,河姆渡遗址第四层中的骨(角)器十倍于石器。河姆渡人十分熟习各种动物骨骼的形状、质地,善于因材施用,这必得依赖漫长的生存实践。骨角用料的丰富来源有赖于相应规模的渔猎经济;而制作成品的分类更是直接反映着河姆渡人经济生活的广博内容,这一信息的连锁辐射为渔猎(采集)这一自然经济对河姆渡文化的支撑作用加上了着重号。

据历史地理学家称,宁绍平原在第四纪更新世所遭遇的第三次海侵(卷转虫海侵)高潮发生在距今 6500 年左右,而第二次

海侵(假轮虫海侵)的海退时间为距今 2.5 万年前。^⑧由此可见,正是这两次海侵的间隔期,保障了河姆渡先民足够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会。在稳定而富足的生态环境的怀抱中,河姆渡文化诞生了!

古宁绍平原富足的采集——渔猎资源似乎印证了一种农业起源的假设:“在饥荒的阴影下生活的人们,没有办法也没有时间来从事那种缓慢而悠闲的试验步骤,好在遥远的未来从中发展出来一种较好又不同的食物来源——用选择的方式改良植物以对人类更为有用的是只能由在饥谨的水平之上、有相当大的余地来生活的人们来达到的。”^⑨显然,河姆渡人成功地进行了农业栽培的实验。河姆渡遗址第四层发现了大量的稻谷遗存,经鉴定为人工栽培的籼稻和粳稻。

稻作农业的确认大大提高了河姆渡遗址在史前文化研究中的地位,加上农用骨耜的存在,“耜耕农业”的说法几被普遍接受。但怎样去证明农业在河姆渡文化早期经济生活中的决定性地位,仍是一个复杂的学术问题。农业是否在它发生的初始阶段即可轻易取代采集——渔猎经济,从而成为史前人类主要的经济来源呢?这在逻辑上要作否定的回答。农业经济在起初阶段对史前经济的冲击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地中海沿岸地区,一些已经引进农业经济的史前遗址的居民们后来又被抛入狩猎——采集者的行列。^⑩这说明农业在当时并非是神通广大,而是非常脆弱的。有学者对骨耜的结构、功能进行多方考证,认为不宜作挖土工具,进而提出河姆渡农业尚处于“刀耕火种”的初级阶段^⑪,可谓一家之言。另有学者从另外角度对浙南地区(含宁绍平原)史前文化发展水平持低调态度:“……其中最重要的特征是绳纹圜底釜和石磨盘的共存。它证明了与农业共存的采集业在这一地区曾延续了很长时间。”^⑫对“石磨盘”的确认及其对

经济形态的反映方式尚未见到令人信服的证述,笔者未敢苟同。值得注意的是对河姆渡文化经济生活构成的特殊感觉。张光直比较台湾大坌坑文化与河姆渡文化,认为在“形态学上说他们都是住在类似的自然环境中从事农耕以外多种食物采集活动的同样的早期谷物农民。”^⑩——这里的河姆渡文化主要指河姆渡第四、三层文化。

应当说,在农业文明赖以生长的富饶的生态环境尚未改变的情况下,河姆渡的早期居民不会盲视更方便、更直接、攫取技术更为娴熟的取之不尽的野生资源。数量惊人的可食性动物遗骸及骨制工具的大量发现,还有酸枣、菱角、麻栎果、橡子——当然还包括野生谷物——作为食物依据的存在,都对此作了很好的注脚。河姆渡文化孕育出原始的农业文明,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但由于自然资源的慷慨赐予,河姆渡文化在农业文明已相对成熟的情况下,还存在着对野生资源的特殊依赖与倚重,从而也是对生存环境的特殊倚重。

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就能对河姆渡文化中原始性与成熟性并存的矛盾现象作出较为合理的解释:受制于自然食物资源而生长起来的文化模式因缺乏富有生命力的创造机制,在历史的运动进程中也缺乏坚韧的应变能力,它可以达到特定环境中的文化辉煌,但这种辉煌因缺少合乎历史逻辑的坚实基础,又具有歧变与短暂的特点。

河姆渡和马家浜文化因地理位置的一水之隔以及文化因素上的相似特点,赋予了两地新石器文化研究中特殊的比较意义。罗家角遗址早期遗存陶釜上绳纹的存在,反映了两地文化在渊源继承上的共同性;这种共同性还表现在木构建筑、稻作农业、夹炭制陶术等方面。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距今 7000 年之际,两地间文化已出现明显的分化趋向。马家浜文化似乎接受了北部

更为活跃的文化因素的影响,其炊器光素的装饰风格可与北辛——大汶口文化传统连成一片;而河姆渡文化则直接继承、发扬了先河姆渡——罗家角文化传统。似乎没有理由对并非不可逾越的钱塘江赋予如此重要的意义,但自此以后,宁绍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滞后性、被动性与浙北地区极富生机的发展势头形成了很明显的对比。

河姆渡文化盛极而衰,这在遗址的第三文化层中已初露端倪:陶器上繁缛的装饰作风淡化了;庞大而发达的骨器家族大大减员——不应该将这一现象简单归结为遗址保存上的偶然。其中骨器的减少背后隐藏着一个原因:可供捕食的动物群稀少了!生态环境发生了变化,食源出现了危机。有关距今 6500 年开始的卷转虫海侵达到高潮的地质学证据因此有了来自文化史方面的有力支持。但海侵导致大规模水淹并不确切,“第三文化层孢粉中水生植物和湿生植物花粉减少,耐旱的榆、松等木本及草本植物花粉增加,说明当时的气候虽然温暖,但较为干旱”^④。

气候的变化,对倚重于自然食物资源河姆渡文化来说,不啻是“釜底抽薪”。它开始衰落了!第二文化层是河姆渡人走上更为艰难的农业文化历程的开始。

三

河姆渡遗址第二文化层、慈湖遗址下层和象山塔山、奉化名山后、慈城小东门遗址的早期遗存,代表了宁绍地区新石器文化发展的又一个阶段。这一阶段的文化面貌还零星反映于余姚朱山、下庄,宁波妙山、八字桥,定海白泉等遗址的调查材料中。

不可否认,宁绍地区在这一阶段的史前文化面貌明显地继承了河姆渡早期文化的重要因素,从总的发展轨迹看,不失作为

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系统而存在。但两阶段文化因素的变异同样显而易见。

河姆渡遗址第四、三层中相当典型的骨制工具、干栏建筑在这一阶段近乎消失；水井第一次在河姆渡遗址第二层出现。看来，气候的变化、环境的干燥程度不容低估。而这正是文化变异的主要原因。陶系已明确分作夹砂（炭）和泥质两大类，从而与东南地区陶系构成正式趋合。曾经独霸一时的夹炭陶让位于夹砂陶、泥质陶，仅占 10% 左右。以有脊釜、凸棱折腹盘、半环形双耳罐、器座、带把钵为代表的早期文化典型器物群被侈口（多角沿）圜底釜、双目式足釜形鼎、内黑外红镂孔喇叭形圈足豆及束颈翻沿釜、钵形釜、侧把盃、簋等取代。河姆渡遗址早期繁复的陶纹装饰作风所剩无几；绳纹仍是釜（鼎）类器的主要纹饰，但素面炊器的数量增加。塔山遗址早期墓群中，釜、鼎类随葬品绳纹与素面各占 50% 左右。

绳纹是河姆渡文化的重要特征。应当说，这一特征的确立主要在与马家浜文化的比较中才具备特殊的意义。绳纹并非河姆渡文化独有。东南一带，浙南、闽北、赣南、南粤一带所取得的新石器时代考古资料中，绳纹也是陶炊具上的重要装饰。从发生时间看，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是最早发现绳纹的遗址。炊器与绳纹的结合在宁绍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中表现得十分典型，但仍属于文化大环境中的产物，不足视为考古学文化铁定不移的依据。

那么，我们发现，与第四、三层相比，河姆渡遗址第二层文化面貌已发生很大的变化。第二层典型器侈口圜底釜的形态在第四层已经出现（标本 T242④B:384），但到第二文化层，这类釜已然成为最流行的炊器款式，多角沿釜是其衍生形态。名山后、塔山遗址中都见有数量不多的夹炭红衣敛口釜，未见完整器，但其

颈脖以上与河姆渡早期的带脊敛口釜相近。上述两类及其绳纹装饰,体现了对河姆渡早期文化因素的继承和延续。鼎是新出现的器物,在马家浜文化中,鼎最初见于草鞋山遗址⑨层和圩墩遗址的早期墓葬中。草鞋山⑨层的碳十四测定年代早于河姆渡二层;河姆渡遗址二层、名山后遗址和塔山遗址早期出土陶鼎除部分饰有绳纹外,整个造型与足部特征均与太湖地区相类。豆在河姆渡第四层有发现,器身短小,夹炭质;但到第三层,豆的形制变得硕大,类似侈口釜与盘、钵的叠合形式。第二层出土的内黑外红喇叭形圈足豆在整个宁绍地区极为普遍,不少在喇叭形圈足上镂有圆形、楔形孔;此类豆同样风行太湖流域,在时间上最早见于草鞋山遗址⑩层。罐在宁绍地区复原较少,但其牛鼻耳的特征与太湖地区相同,并且都可在河姆渡的罗家角遗址的早期找到其祖型,曾被视作马家浜文化的典型器之一。盂分平底盂、实足盂、袋足盂诸种;盂在钱塘江南北的器形分布尚未有规律性认识,一种观点认为袋足盂的侧把形式源于罗家角遗址第三层的实足盂;^⑮从数量上看,以太湖流域占优势。另外还有钵形釜、多带釜,在造型上不能排除来自马家浜文化筒形腰沿釜的影响。

上面,我们从骨器(包括动物遗骸)、干栏式建筑的消亡和水井的出现窥见宁绍平原腹地生态环境的变化,因而也是自然食物资源匮乏的标志——这是文化变异的原因;转而分析陶器群的不同构成——这是文化性质判断的依据;进而我们发现石器已成为该阶段的主要生产工具;磨光石器是新石器时代的主要标志之一,它为农业经济提供了生产能力的保证,但在河姆渡早期文化中,骨器、木器是主要生产工具,石器数量极少,且制作粗糙。如果说骨器是曲折反映了狩猎经济对河姆渡早期文化形态的制约与影响,那么该阶段的石器正是真正的、更为艰难的农业

生活的指代物。河姆渡遗址第二层、塔山遗址、名山后遗址、小东门遗址的早期遗存所反映的文化面貌趋向质朴实用,远没有河姆渡早期文化绚丽、夺目。这一阶段遗址的分散以及数量的增加,也说明环境对生存的压力。但这是一条正常的文化演进之路,以后的发展轨迹已然与太湖流域保持同步。

河姆渡遗址第一文化层、名山后遗址第⑧、⑨层和塔山遗址⑦层下墓葬相当于太湖一带的崧泽文化阶段。共同的特征表现在泥质灰陶在陶系中的突出位置,数量仅次于夹砂红(褐)陶。泥质灰陶镂孔矮圈足盘,黑衣陶竹节把豆,宽形足、三棱形足的夹砂陶鼎、圆锥足钵形鼎等是典型器。圈足器发达,泥质类陶器的突棱装饰亦相当普遍。除上述与崧泽文化的可比因素外,地区性特征仍较强。绳纹继续存在,口沿内凹的侈口圜底釜是炊器的主要形态。三棱形鼎足足面的刻划图案有河姆渡文化传统的神秘性。

至良渚文化阶段,宁绍与太湖地区的文化差异已处次要位置。绍兴马鞍、仙人山遗址的下层,名山后遗址③~⑦层,塔山遗址⑤、⑥层,慈湖遗址上层及小东门遗址、岱山孙家山遗址等都发现良渚阶段的文化遗存。泥质黑皮陶竹节把豆、宽把杯、双鼻壶,鱼鳍形、T字形足的素面盆形鼎以及各种形式的石犁,有柄石刀、耘田器等,都与太湖流域良渚文化面貌一致。但鱼鳍形、T字形足的盆形鼎仍非该地区的唯一炊器,绳纹釜、绳纹釜形鼎仍在多数遗址中顽强存在。值得注意的是,诸遗址受良渚文化影响的程度有所不同。就绳纹而言,马鞍、仙人山遗址下层未见绳纹;慈湖遗址、名山后遗址绳纹统计在5%以下;塔山遗址则在15%左右。仙人山、马鞍遗址的发掘材料未见公布,但与太湖流域尚有区别。^⑩塔山遗址反映在石器上的良渚文化因素更明显些;器表呈磨光状态的鱼鳍足(T形足)盆形鼎数量不

多;有一定数量的双鼻壶及竹节把豆。遗存较丰富的是名山后遗址,夹砂夹蚌的盆形鼎数量较多,鱼鳍形、T字形鼎足亦有相应的数量;泥质黑皮陶竹节把豆亦甚发达,并有一定比例的细刻鸟纹图案,其中一件豆盘残片镂有十分精致的“鸟首盘蛇体”图案,这种图案在太湖流域福泉山遗址、草鞋山遗址的大墓中亦有发现,因此可认作良渚文化复杂化了的文明因素的表现之一。无独有偶,名山后遗址良渚文化层下发现人工土台,东西长达数十米,土台南部被砖瓦厂取土破坏。在奉化文管会办公室向砖瓦厂征集的文物中,一组磨制锃亮的钻孔石斧引人注目。大型土台的作法无疑是对良渚文化土筑“金字塔”的文化认同,精制的钻孔石斧(钺?)的出土应当说明了较大型墓葬的存在。名山后遗址在距今 5000 年之际已达到较高的文化发展水平。

关于该地区良渚文化的存在问题,这里不准备具体展开。我们所要揭示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从距今 6000 年略晚的时间起,宁绍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大体跟上太湖地区的文化发展节奏,晚期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的长长影子构成了该地区历史线索的灵魂。因此也就强调了河姆渡遗址第三、二层之间的文化分野。

随着距今 6500 年左右开始的生态环境的恶化,也许第三文化层结束阶段的一次水灾^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生活在河姆渡、童家岙等地区的居民发生了一次较大规模的人口疏散,以适应自然资料日益吝啬的供应困境。一个稳定而封闭的文化系统一旦丧失其生存基础,就很快进入瓦解状态。浙北马家浜文化便乘虚而入。塔山遗址早期墓葬群中有专门随葬泥红陶喇叭形圈足豆的一组,可视为宁绍地区接纳北部文化的一例,这种接纳应当伴随有居民的迁徙行为。但墓葬的葬俗仍有别于马家浜文化,在所有的材料中,河姆渡遗址第三、二层埋葬形式保持一致,

流行单人侧身屈肢葬,头向东或东北。塔山、名山后遗址的同时期墓葬多仰身直肢,头向东南为主,也有东向或东北向,与马家浜文化的北向俯身葬有别。这说明来自太湖流域文化侵袭的复杂化结果。

四

通过上述篇幅的描述与分析,我们将宁绍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内容的演化分作两个大的历史阶段。河姆渡遗址第四、三层是第一阶段的典型代表,其文化内涵的独特性与成熟性充分体现了河姆渡文化的精义。

莱斯利·A·怀特指出:“就特殊优势论,一种文化或文化类型将通过加强其适应性确立自己在一个特殊环境里的地位,它是作为能最有效地利用那一环境的类型而生成的……”^⑩河姆渡文化正是在这一特殊的、有充分的自然食物资源作保障的优化环境下生长并完善的。可以作这样的推测:在距今 7000 年前的一段时间里,河姆渡先民为熟悉、利用古宁绍平原的亚热带低丘泽林环境,亦曾有过艰难的适应性过程,但当他们自由地融入这一片辽阔、宁静而富饶的环境之中,并成为其中的一分子后,便得到了优厚的回报。这一过程的另一后果是导致了河姆渡人对环境的特殊依赖。汤因比在论述挑战与应战对文明生长的影响时认为:“我们现在也许建立了一个真理,这就是安逸对于文明是有害的。”^⑪河姆渡人依靠自然的荫庇与自己的创造能力取得了物质和精神文化上的高度成就,但当生存环境发生了变化,它也就衰落了!

不容忽视的是,河姆渡文化并没有就此结束。尽管宁绍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后一阶段具有钱塘江以北文化的烙印,但

河姆渡文化一些重要因素却顽强保留下来。例如绳纹,绳纹的生命力在后来印纹陶时期的向北扩展中充分体现出来。宁绍地区新石器晚期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南部更广阔的绳纹传统区的文化营养。这样,就面临着对该地区距今 5900—4000 年这一漫长时段的文化定性的困难。这一时期的文化发展状态颇似两个文化传播圈边缘重叠区域的复杂情形。就目前已掌握的资料看,只能是河姆渡文化在时间纵向的文化发展与马家浜文化系统横向的空间扩展造就的结果。这一结果其实便是我们在文化史研究中所习见的文化融合。如果说在马家浜、崧泽阶段,宁绍地区只是部分地接受北邻文化的影响,那么到了良渚文化阶段,两地间的文化差异已缩小到了最低程度。我们认为,通过文化征服拓展文化分布的区域范围,这一习见的文化现象同样适合于史前考古学文化。因此,良渚文化钱塘江以南类型的提法可以成立^⑩。但总的说来,钱塘江南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趋同是一个长时间的融合过程,起码在河姆渡遗址第二层就已开始。

从概念上说,融合的各方应当有主次之分,钱塘江南北文化系统的互动与重叠具有怎样的表现形式?我们看到的显性现象是钱塘江北系物质形态的南侵^⑪,是否亦存在南系观念形态的北渐呢?河姆渡牙雕中所潜伏的鸟·日崇拜意识是否在千余年后良渚文化的“神徽”崇拜中注入了亲缘的血液呢?我们似乎有许多理由将既矛盾又统一的钱塘江两岸纳入一个特殊的历史地理区域,关于吴越文化的讨论即是其中之一。

吴越同俗,这一特殊的关系可上溯到什么时候呢?我们发现,几何印纹陶的发生区恰恰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南方绳纹分布区。进而就可建立新石器文化南方绳纹分布区——几何印纹陶发生区——百越文化分布区(自会稽至交趾)的逻辑联系,这一逻辑联系亦将我们引向历史因果关系的探索。会稽一带(今

绍兴一带)是百越文化的前沿;商周以降,于越是百越中的佼佼者,这一特殊的优势地位是怎样确立的呢?最大的可能性莫过于与北部发达文化区的直接对垒与接触。如前所述,太湖流域马家浜文化系统陶器的非绳纹传统,当是接受了北部文化圈(指东部沿海)的直接影响,这一结果亦将钱塘江北岸推至北部文化势力的前沿,南北文化的交流与渗透,导致两岸文化相似性的扩大,从而造就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吴越文化区,但同俗不同族,彼此的差别为商周以降该地区历史的丰富内容埋下了伏笔。

注释

- ①《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 ②刘军:《河姆渡文化再认识》,《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 ③《宁波慈湖遗址发掘简报》、《奉化名山后遗址第一期发掘的主要收获》,均载《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象山县塔山遗址第一、二期发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1997年版。
- ④⑭转引自林华东《河姆渡文化初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 ⑤姚仲源:《二论马家浜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 ⑥宋兆麟:《河姆渡遗址出土蝶形器的研究》,《中国原始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 ⑦牟永抗:《浙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初步认识》,《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 ⑧陈桥驿:《越族的发展与流散》,《东南文化》1989年第6期。
- ⑨⑬转引自张光直《中国东南沿海的“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上海博物馆集刊》第四辑,1987年。
- ⑩[美]A·M·摩尔:《近东农业起源研究:八十年代的新模式》,《农业考古》1988年第1期。
- ⑪汪宁生:《河姆渡文化的“骨耜”及相关问题》,《东南文化》1991年第1

期。

⑫⑮牟永抗：《钱塘江以南的古文化及其相关问题》，《福建文博》1990 年增刊。

⑮⑰王海明：《河姆渡文化与马家浜文化关系简论》，《东南文化》1991 年第一期。

⑮[美]托马斯·哈定等：《文化与进化·序》，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⑮[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上），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⑳《宁波慈湖遗址发掘简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㉑补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近年在海盐王坟、嘉兴南河浜等遗址的崧泽文化阶段遗存中发现较多的绳纹陶釜、风格与宁绍地区同时期遗物接近，说明这种文化传播是相互的。

从宁绍地区的遗址看 河姆渡文化的发展

林士民

河姆渡文化已为国内外学者所重视,典型的河姆渡遗址面积为4万多平方米,“在我国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中最多称个中型遗址”,两次发掘的面积2630平方米,规模也不大,而发掘收获特别丰富,这种情况在考古工作中是不多见的。为了进一步开展对河姆渡文化的研究,考古工作者对宁绍地域史前文化遗址进行调查、试掘与发掘,本文就发现的遗址对河姆渡文化有关的问题进行一些探索,供专家学者参考。

一

河姆渡文化,典型的遗址与典型的内涵当推河姆渡遗址。该遗址第一期发掘^①,有四个相叠压的文化层,将第四、三文化层命名为“河姆渡文化”,第二文化层时代和文化面貌相当于嘉兴马家浜和邱城下层;第一文化层文化面貌和时代相当于邱城中层和崧泽中层墓地^②。1977年《考古》第四期《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一文第222页中,作者指出“余姚河姆渡遗址,其上层(即第一、二层)与崧泽下层文化相当,测定年代为 $3710\text{BC} \pm 125$ 。而河姆渡下层(即第三、四层)则更早。文化面貌也与上层有所不同。它的两个年代数据为 $5005\text{BC} \pm 130$ 、

• 100 •

4770BC \pm 140,两者平均值是 4887 \pm 96。河姆渡下层文化是前所未见的,可称之为“河姆渡文化”。作者在叙述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文化的排列顺序和绝对年代时又说:“这个马家浜文化,来源于较早的‘河姆渡(下层)文化’。”1977年,在南京召开的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后所出的《文物集刊》第一集《关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系统的区分》一文中,作者除赞同河姆渡遗址第一文化层相当于崧泽期,第二文化层相当于马家浜期的同时,又提出河姆渡遗址的第三文化层是河姆渡文化向马家浜文化过渡阶段,第四文化层才可定为“河姆渡文化”的论点。上述这些观点受到了1977年该遗址第二次2000平方米面积发掘资料的检验。《文物》1980年第5期《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提出了“河姆渡文化不能仅限于类似河姆渡遗址第三、四文化层的内涵,实应包括河姆渡遗址的第一、二文化层的内涵。河姆渡遗址第一、二、三、四文化层应是一脉相承的一个文化整体”。《三十年来浙江文物考古工作》中明确主张,河姆渡文化不能只局限于第三、四文化层,还应包括第一和第二文化层。同时指出河姆渡第二层有某些马家浜文化的因素,第一层亦有良渚文化的早期若干相似之处。但河姆渡四个地层之间前后的因袭关系很清楚,一些基本文化特征贯穿四层的始终。因此,我们不能轻易地将它们同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等同起来,应是单独地命名为“河姆渡文化”。当然,河姆渡文化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每个阶段早晚总是有所变化,特别是陶器的演变、器物种类和形制都有自身的发展过程。有的变化小些,如球腹釜、钵、罐式盂、甑等;有些器物变化大些,各期特征显著,如釜、支座和盘。河姆渡文化与马家浜文化存在着不少共性,这些共性主要表现在经济形态、居住形态等方面,如以稻谷为主体的耜耕农业;以养猪为主体的饲养业;以榉卵为特征

的木结构建筑等。这些共性是因为它们都处在滨海地区与发展阶段上的同步性所致,但它们各有自己的风格、特征和发展源流。如河姆渡遗址第四、三文化层,以夹炭黑陶为主,夹砂灰黑陶次之,以肩脊釜为代表,绳纹装饰为贯穿始终。所以从形制、装饰均与马家浜文化迥然有别,盘、盆等造型、装饰(动植物刻划图)亦与马家浜文化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所以说是两支完全不同的文化。

河姆渡文化每层通过碳十四测定,第四文化层(第一期文化)包括 4A 和 4B 层,其绝对年代距今 7000 - 6500 年;第三文化层(第二期文化)包括 3A、3B 和 3C,其绝对年代距今 6500 - 6000 年;第二文化层(第三期文化),包括 2A 和 2B,其绝对年代距今 6000 - 5500 年;第一文化层(第四期文化)绝对年代距今 5500~5000 年。^③有鉴于此,笔者于 1990 年 6 月在江苏张家港召开的“中国滨海地区古代文化学术讨论会”上发表的《宁波沿海地区原始文化初探》一文中,认为河姆渡文化典型的文化内涵应包括四个文化层,即第一至四期文化。

二

河姆渡文化是宁绍(包括舟山)地区新石器时代有着独特风格的土著文化。作为考古学的文化,它不但要有一组特征明显的器物群,而且必定存在着一定的分布地域。因此,考古工作者继河姆渡遗址发掘后,对宁绍地区的原始文化遗存进行了调查,并通过三年文物大普查又进行了核实,至目前宁绍地区(包括舟山)已发现遗址(遗存)共 90 余处。按遗址的内涵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分别属于河姆渡文化的遗址(详见表 1)。典型的有慈溪市童家岙遗址、朱山遗址、董家姚遗址、牛头山遗址等。

表 1 河姆渡文化的遗址

编号	遗址名称	地 址	文化期	资料来源
1	童家岙遗址	慈溪市童家岙	(1)、(2)	《宁波市文物普查资料》,省考古所《学术交流》1980年第1辑;《宁波沿海地区原始文化初探》、《东南文化》1990年第5期
2	乐安遗址	余姚市云楼乡	(4)	
3	帽山遗址	余姚市双河乡	(4)	
4	朱山遗址	余姚市梅溪乡西岙	(2)、(3)	
5	坑山遗址	余姚市丈亭镇下徐塔村	(3)、(4)	
6	傅家遗址	余姚市陆埠镇傅家	(4)	
7	支溪盍遗址	余姚市沿江乡支溪岙	(4)	
8	张界遗址	余姚市江中乡张界村	(4)	
9	田屋遗址	余姚市江中乡方家村	(3)、(4)	
10	云山遗址	余姚市二六市云山东麓	(4)	
11	下庄遗址	余姚市罗江泊罗村	(3)	
12	周家汇头遗址	余姚市罗江乡浪墅桥村	(3)	
13	吴家岙遗址	余姚市双河乡吴家岙	(3)、(4)	《文物普查资料》 《考古》1979年第6期 《鄞县文物普查材料》 宁波《文物与考古》第128期,《考古》1983年第1期, 1973年兴建百沥河发现并经过发掘 《文物与考古》第128期 《文物普查资料》
14	罗浦遗址	余姚市罗江乡罗浦村	(4)	
15	八字桥遗址	宁波市江北区八字桥	(3)、(4)	
16	屛蛟遗址	鄞县屛蛟乡芦家桥	(3)、(4)	
17	董家姚遗址	鄞县茅山董家姚村	(2)、(3)	
18	白泉遗址	舟山市定海白泉村	(3)、(4)	
19	牛头山遗址	上虞市城关东北部	(2)、(3)	
20	五星遗址	宁波市妙山五星村	(3)	
21	红庙山遗址	象山县城关西门外	(3)、(4)	

慈溪市童家岙遗址,试掘表明,陶器以夹炭黑陶(掺和稻谷壳)和夹砂(夹炭)灰黑陶为主。陶器全系手制,火候较低。主要的器形有釜、罐、钵、尊、豆以及支座、器盖,器表多打磨刮削,装饰上在腹部拍印绳纹,偶见锥刺纹和弦纹。石器有锛、斧之类,与第四文化层一致。这组器物年代与河姆渡四个文化层接近,豆类则具有第三文化层特点。

朱山遗址试掘表明,有上下两个文化层,下层夹炭黑陶与夹砂黑陶两个陶系,装饰纹样有绳纹、弦纹和锥刺纹等,与河姆渡遗址第三层同类器物如出一辙。上层陶器以夹砂灰陶、夹炭黑陶和泥质陶为主,主要器形成釜、鼎、豆、罐、钵、器盖及支座等。里红外黑的喇叭形圈足豆、牛鼻耳罐、猪嘴状支座等明显与河姆渡遗址第二文化层相同。

董家姚遗址、牛头山遗址等均与朱山遗址类同,属于河姆渡遗址第一、二文化层的有白泉、红庙山等遗址7处,属于第二文化层的有五星、下庄等3处,属于第一文化层的有罗甫、云山等遗址7处。

第二类,河姆渡文化以上的文化遗址(详见表2)。典型的有绍兴马鞍遗址,经发掘表明,分上下两层,上层有的器形与上海马桥遗址第四文化层相同,如黑陶豆和小敞口鼓腹凹底罐。下层文化面貌多为良渚文化的特征。余姚茅湖遗址,以夹砂陶、泥质灰陶和泥质黑陶为大宗,典型的有镂孔黑陶豆,石器有斧、刀、镞、有段石锛。此类遗址还有舟山市定海区的大支、湖面、马面,嵊泗县菜园镇、后墩等遗址7处。

第三类,植根于河姆渡文化,其上为新的文化堆积(详见表3)。此类遗址典型的有16处,它们一般有上下两层。下层为河姆渡第三期文化的遗址有6处,属第四期文化的10处。现择典型的遗址作一简析。

表 2 河姆渡四期文化以上的文化遗址

编号	遗址名称	地 点	包 含 物			资料来源
			陶 器	石 玉 器	其他	
1	马鞍遗址	绍兴马鞍乡市桥村	①夹砂红陶、泥质灰陶、泥质黑皮陶为大宗;装饰主要有镂孔、附加堆纹,但多素面。 ②主要器形有豆、罐、盆、盘、壶、杯、瓮、鼎等;T形和鱼鳍形足鼎、大圈足盆和形式多样的豆最具特色。	钺、粗冠(耘器)、铤、有段铤、凿、刀、镞、砺石、玉管、珠、镯等	田石、砺石、三片红底黑彩陶片	《中国考古学》1985年
2	仙人山遗址	绍兴马鞍乡陆江仙人山	早期,典型器物以夹砂红陶鱼鳍形足鼎、黑皮陶镂孔竹节把豆等。晚期,夹砂绳纹鼎、甗、内凹底罐及支座(前为良渚,后为马桥文化)。	早期破土器、台阶型有段铤。晚期凹槽形有段铤、半月形石刀(双孔)		1985年省考古所资料
3	五星村遗址	上虞市夹塘乡	典型的为夹砂釜(敞口、束颈、鼓腹圈底)器表饰绳纹。	耘田器、石刀		调查资料
4	马慢桥遗址	上虞市马驿乡	典型的黑皮陶鬲(三瘦长袋足、腰束、口微敛,前后对称位置按管状流与宽扁形器把。			调查资料
5	茅湖遗址	余姚市低家姚镇严家村	夹砂陶、泥质灰陶、泥质黑陶为大宗。典型的有泥质黑陶豆、圈足有圆形、长方形镂孔。	石斧、石刀、石铤和有段石铤	兽骨、鹿角、木炭	普查资料

续表 2

编号	遗址名称	地 点	包 涵 物			资料来源
			陶 器	石 玉 器	其他	
6	东岙遗址	余姚市梅东岙村	典型的有夹砂鱼鳍形足鼎及陶罐	柳叶形石铍		省考古所调查资料
7	三岔路遗址	象山县南庄乡	泥质黑皮陶盆、豆等陶片			省地质队资料
8	上杜山遗址	嵊县普义乡	陶罐、陶豆、鱼鳍形足鼎等	石斧、石锛、石铍及槌		绍兴市考古学会刊 1990 年 2 期
9	孙村遗址	嵊县普义乡		石斧、石锛、铍通体磨光		
10	沙溪遗址	北仑区沙溪村	夹砂陶釜、鼎、泥质红陶罐、盆及圈足器	磨光的有段锛、斧		宁波市文管会掘
11	马目遗址	定海马目乡				舟山区文物普查资料
12	大支遗址	定海大支				
13	湖面遗址	定海湖面				
14	蛤蟆山遗址	岱山大巨岛				
15	馒头山遗址	岱山东沙镇				
16	菜园镇遗址	嵊泗菜园镇				
17	后墩遗址	岱山大巨岛				

表3 迭压在河姆渡文化上的文化堆积遗址

编号	遗址名称	地 点	包 含 物				资料来源
			河姆渡文化(期)	④期以上文化遗存			
				陶 器	石器	其他	
1	前溪湖遗址	余姚市相东乡	④	夹砂红陶敞口釜、扁锥形、鱼鳍形、圆锥形、凿形足鼎。泥质罐、黑皮陶竹节把豆等	有段石铍、石铎	骨锥	余姚市普 余姚市普 文物资料 考古学 所《交 流》第 一辑
2	兵马司遗址	余姚市双河安山桥	④	三棱形(“+”符号)、鱼鳍形足鼎、象鼻形支座、浅杯形钮器盖。黑皮陶有竹节把豆、罐、盆	石铍		
3	黄家山遗址	余姚市双河桐湖村	④	鱼鳍形、羊角形、三棱形、圆锥形、扁凿形足鼎、袋足器、夹砂釜、泥质圈足盘、黑皮陶豆、象鼻形支座	石铎		
4	翁家山遗址	余姚市梅溪湖田湾	③	夹砂红陶、圆锥形足鼎、黑皮陶圈足器等			
5	新周家遗址	余姚市大寺前王	④	鼎、釜、盆的口沿与鱼鳍形足鼎、豆把、圈足器			
6	王家遗址	余姚市江中田屋	④	鱼鳍形、T字形足鼎、象鼻形支座、敞口釜、黑皮陶豆、圈足器及表面施红衣的大口罐			
7	相山佛堂遗址	余姚市李家村	④	鱼鳍形足鼎、釜与泥质红陶豆、黑皮陶圈足器			
8	车厩一中遗址	余姚市车厩中	④	鱼鳍形足鼎、象鼻形支座、泥质红陶、灰陶罐、豆	有段石铍		

续表 3

编号	遗址名称	地 点	包 含 物				资料来源
			河姆渡文化(期)	④期以上文化遗存			
				陶 器	石器	其他	
9	王其弄遗址	余姚市罗江乡王其弄	④	鱼鳍形足鼎、釜、器盖, 泥质红陶豆、罐	残石器		
10	唐家墩遗址	舟山市定海乡	④	陶釜、鼎、罐等, 鼎多为鱼鳍形足鼎			
11	孙家山遗址	舟山市岱山乡	④	泥质双鼻壶、夹砂红陶罐	破器、土石、冠、石带、石刀	猪骨、贝壳、兽骨	《考古》1983年第1期
12	慈湖遗址	宁波市慈城	③	详见本文介绍		稻谷	正文有注
13	妙山遗址	宁波市妙山	③	详见本文介绍		稻谷	
14	名山后遗址	奉化市南渡山后	③	详见本文介绍		稻谷	
15	塔山遗址	象山县城关	③	详见本文介绍		稻谷	
16	小东门遗址	宁波市慈城	②	详见《考古年鉴》1993年			

宁波市江北妙山遗址^④。该遗址经过试掘可分为三个文化层。第三文化层以夹砂灰陶为主,占 40.2%;夹砂红陶次之,占 31.7%;还有夹炭黑陶和泥质红陶,占 28.1%;主要的陶器有釜、鼎、罐、盘、器盖、支座及制陶工具陶拍等。第二文化层夹砂红陶、灰陶占 25%,泥质红陶占 60%,灰陶占 15%;主要的陶器有釜(鼎)、豆、罐、盆、盘、钵、盂以及器盖、支座。第一文化层以泥质黑陶为主,泥质红陶次之。典型的打磨光滑、乌而发亮的泥质黑皮陶豆和施红衣的泥质红陶豆与罐。石器通体磨光的,有段石锛、双孔石刀、石斧、石纺轮和石管。

宁波市江北区慈湖遗址^⑤。该遗址经过试掘和发掘可分为上下两个文化层。下层陶系,有夹炭(有色)陶、夹砂陶和泥质黑陶,夹炭陶占总数的 72.6%。小型器物采用手制成型,器壁厚薄不匀;大器为泥条迭筑,装饰盛行附加堆纹间以刻划纹、细绳纹、篮纹,器类以圜底最多,圜足、三足器也有。主要器物有釜、罐、盆、盘、钵、豆、器盖、支座及鱼鳍形足鼎。其中夹炭陶敞口、宽沿、束颈、圆腹、圜底,腹部施绳纹釜和喇叭口、细颈、圆肩、深弧腹、圜底,腹部施篮纹的罐为大宗,也最富于特征。上层陶系,主要有泥质黑皮陶和夹砂灰陶。陶器手制和轮修相兼,纹饰以素面为多,镂孔、绳纹成为主要纹样。器类平底、圜足、三足和袋足器均有,主要器形有鱼鳍形足的釜形鼎,圆形、方形、三角形镂孔圜足豆,圜足盘、浅腹盆,敛口钵,双鼻壶,宽耳杯,带槽罐等。

宁波奉化市名山后遗址^⑥。该遗址经过二次发掘,文化层划分为 12 层,文化内涵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包括第八、九、十、十一、十二文化层,其中第十、十一、十二文化层出土的典型器物,有夹砂陶多角口沿圜底釜、圆锥体和半圆锥足鼎、泥质牛鼻耳罐、泥质红陶喇叭形圜足豆等。第八、九文化层出土的器物,有泥质陶镂孔圜足豆、假腹豆、镂孔圜足盘、泥质灰陶盆、菊花瓣

足杯、鱼鳍形足鼎。

晚期包括第二、三、四、五、六、七文化层,其中以第五文化层和 H14 为代表。该段陶系以夹砂红陶为主,泥质灰陶、泥质黑皮陶次之,夹炭灰陶和泥质红陶占有一定数量。陶器以素面为多,主要纹饰有刻划纹、弦纹和绳纹,尤其引人注目的黑皮陶豆上细刻“鸟头蛇身”和鸟纹。主要器形有夹砂红陶盆形鱼鳍形足鼎、罐形 T 字形足鼎、夹炭陶鱼鳍形足鼎、泥质黑皮陶竹节把豆、泥质红陶圈足盘、夹炭圈足罐、宽沿盆等。第四文化层及其以后的文化层,其陶系与第五文化层以上相比,唯夹砂红陶中的一部分夹介壳末的数量减少,夹炭陶的数量也下降,而夹砂黑陶

三

上述前三类遗址的文化面貌,第一类因为它们分别是属于河姆渡文化第一至四期文化内涵,我们无须再讨论;第二类的文化堆积均与河姆渡文化的遗址没有直接的迭压关系;文化内涵则与第三类植根于河姆渡文化而又有新内涵的遗址有许多相同之处,故第三类遗址是我们探讨的重点。

(一)妙山遗址

其第二层的侈口釜、敞口罐、浅腹圈足盘、泥质红陶圈足上饰方形、圆形、三角形镂孔和戳印纹豆、象鼻形支座、喇叭状器盖等,这组器物明显属于河姆渡第一文化层(即第四期文化)。第三层中的敞口釜和腹部安有鸡冠耳的侈口釜、猪嘴状支座、敞口盆和腹部安有牛鼻式器耳的罐等,属于河姆渡第二文化层(即第三期文化),其中的夹炭黑陶罐、钟状器盖,时代可能早于河姆渡第三期文化,时代为距今 6000—5100 年之间。

(二)慈湖遗址

其下文化层就其陶器胎质而言是夹炭陶,掺和稻秆、稻叶和谷壳等禾本科有机物与河姆渡第三、四文化层没有多大区别。陶器手制,纹样有刻划纹,尤其在釜等器物上施附加堆纹、浅绳纹均与河姆渡第三文化层同,器物中敞口圜底釜、猪嘴形支座、镂孔圈足豆和木耜等器物都与河姆渡遗址第二文化层出土物相似,所不同的是慈湖不见平底器、多圜底器;同时出土的还有足尖外撇的早期鱼鳍形足鼎。河姆渡遗址第三期碳十四测定年代平均值为距今 5713 年,同慈湖碳十四测定距今 5745 年也相吻合。因此,它属于河姆渡第三期文化。

(三)名山后遗址

早期典型的夹砂多角沿圈底釜、圆锥形足鼎、泥质牛鼻耳罐、喇叭状圈足豆与河姆渡第三期文化的器物同。泥质镂孔圈足豆、盆及鱼鳍形鼎等与河姆渡第四期文化相同,当属河姆渡文化。时代为距今 6000 - 5300 年之间。

(四)塔山遗址

早期,典型器物泥质红陶喇叭形圈足豆、双目式鸭嘴形足鼎、夹炭敛口釜、多角沿绳纹釜、猪嘴状支座等,这组器物具有河姆渡文化特征,“年代上相当于河姆渡遗址三期”,距今约 6000 年,这无疑比河姆渡三期碳十四平均值 5713 年还早些。以上文化堆积充分说明,它们的早期植根于河姆渡文化。

现在再研究晚期文化的面貌。

1. 妙山遗址的河姆渡四期文化,直接迭压着以黑皮陶豆、泥质红陶豆、罐以及通体磨光的有段石铤、石斧、石刀等石器,虽有四期文化延续因素,而出土器物又均有它自己的特征,在河姆渡文化中所未见。时代约为距今 5100 年左右。

2. 慈湖遗址上层陶色以泥质黑皮陶和夹砂灰陶为主,器物组合以鼎、豆、罐为主。典型的如扁圆形、宽肩形、鱼鳍形足鼎,圈足浅腹盘、双鼻壶、宽耳杯和口沿饰针刺纹的罐。这组器物中除鱼鳍形足鼎与河姆渡四期文化有延续关系外,其它的器物为四期文化中所未见。时代为距今 5365 ± 125 年,实际上也为距今近 5100 年左右。

3. 名山后遗址晚期,夹炭、夹砂鱼鳍形足鼎、罐形 T 字形足鼎、夹炭圈足罐、泥质黑皮陶竹节把豆及泥质红陶圈足盘,它们中鱼鳍形足鼎、竹节把豆等与河姆渡四期文化有一定的延续因素,其它均为河姆渡文化所未见。时代距今为 5465 ± 286 年与 5305 ± 90 年,平均值在 5100 年左右。

4、塔山遗址中层,从陶色看也和慈湖遗址一样,以泥质黑皮

陶为主。鱼鳍形足盆形鼎、圈足矮宽的豆与河姆渡文化有一定的延续演变关系,高瘦竹节把豆、双鼻壶、T字形足鼎等为河姆渡文化中所未见。时代距今约 5100 - 4900 年左右。

综上所述,典型遗址早期文化,属于河姆渡文化,碳十四测定在距今 6000 - 5300 年之间。晚期,部分器物在形态上有一定的延续因素。例如鱼鳍形足鼎在河姆渡第三期文化至第四期文化的演变是明显的,陶色以夹砂红陶、泥质灰陶、泥质黑皮陶为主。新出现的一组器物,如鱼鳍形、T字形足鼎、双鼻壶、宽耳杯、竹节把豆、锥刺纹罐等和有段铤、穿孔斧、“破土器”、“耘田器”等石器在河姆渡四期文化中均未见,从总体面貌看器物组合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唯绳纹釜沿存在,黑皮陶则有别于典型良渚文化中的黑陶。遗址中没有发现玉器,该期年代距今约 5100 - 4900 年左右。

四

(一)河姆渡文化的发展

河姆渡文化发展源远流长,经历了 2000 年左右。早期,即第一、二期,文化遗址除河姆渡遗址外,还有慈溪市童家岙遗址,该遗址出土文物是第一期偏晚至第二期文化。属于第二期文化的遗址也只有余姚市朱山、鄞县董家姚和上虞市牛头山 3 处,属于河姆渡第三期文化的遗址 18 处,比第二期增加了 5 倍。四期文化遗址达 24 处,四期文化以上的遗址和文物点 60 余处,它所分布的范围,在四明山会稽山以北、钱塘江南岸的宁绍平原,东达舟山群岛,东南至象山港南岸,西到钱塘江,西南伸入嵊县。遗址大多集中在四明山北麓向平原过渡地段和钱塘江南岸沿古海岸线的丘陵地带,遗址群分布成波浪形向东西延伸。这证明

了时代越早,反映出区域特征的范围越小;时代越晚,反映出区域特征的范围越大。

河姆渡文化,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也与邻近的文化进行交融,河姆渡第三期文化中除腰檐釜、多角沿釜、垂罐式盂、三角形大镂孔豆外,同时,出现牛鼻耳罐里红外黑豆和双目式足鼎,这些器物的形态是与马家浜文化交融中吸收而来的。马家浜文化这类器物属于早期,而到了距今 6000—5500 年时,才被河姆渡先民所吸收,因此只能说“有某些马家浜文化因素”。河姆渡四期文化,即距今 5500—5000 年之间,釜仍然是主要炊器,炊器上绳纹未变,但所出现的泥质灰陶轮制杯、镂孔豆、“竹节形”豆等具有“良渚文化若干相似之处”,足见河姆渡文化交往已非前期可比。

(二)对新出现的内涵如何看

主要指河姆渡第四期之上的文化内涵。有学者认为:“时代相当于良渚文化,但器物还有一定区别。典型的是余姚前溪湖遗址上层(下层属河姆渡第四期文化),出有分阶式有段石铤和鱼鳍形鼎足,伴出的轮制黑皮陶豆和良渚文化还有一定区别。由此可知,继河姆渡第四期文化之后,似乎还存在着相当于良渚文化的第五期文化。”^⑨也有学者认为河姆渡第四期文化以后,直接传承是良渚文化。主要依据是像余姚历山乡的茅湖遗址出土的黑陶器皿,与良渚的毫无差别;有段石铤、石斧、石刀、石镞等也有是良渚时期常见的石制工具……慈湖遗址五层与河姆渡相当,有牛鼻式双耳罐、喇叭式圈足镂孔豆、夹炭黑陶釜、猪嘴形陶支座等;中层属于良渚文化,有鱼鳍形足陶鼎、黑陶贯耳壶、黑陶直口小罐、柳叶形石镞等;上层可能相当于马桥四层的“后良渚”,有卷沿短方格纹圜底罐,表明了良渚文化上联河姆渡上层,下接“后良渚”的直接延续关系^⑩。1993 年在温州召开的浙江省

考古学会年会上,有学者提出“分布于宁绍平原迭压于河姆渡文化之上的河姆渡后续文化命名为良渚文化茗山后类型”的观点^⑩。以上几种观点有一个共同点:其文化的年代相当于良渚文化时期,至于命名为“良渚文化”还有不同的看法。

笔者在宁绍地区众多文化遗址中,择典型的妙山、慈湖、茗山后、塔山等遗址的文化面貌进行剖析,认为它们的早期(下层)文化,分别相当于河姆渡第三期文化或第四期文化(详见表3),与晚期(上层)文化面貌有明显的区别,也可以说从陶系、器形、装饰纹样与各式磨制精致的石器与河姆渡文化完全有别。这就是说,同样文化层的直接迭压,并不意味着它们有直接的继承关系,晚期新出现的文化,并非都是由早期文化演变发展而来。同时也说明,文化在交融和发展当中,在各自保留某些特征的情况下,总是由比较先进的文化起主导作用。

河姆渡文化发展到距今 5100 年左右时,可以说文化内涵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与河姆渡固有的文化相比已发生了质的变化,因此不能再归入河姆渡文化范畴,就得重新考虑它的命名。笔者认为,根据新出现的文化内涵命名为钱塘江以南地区良渚文化的××类型为好,以有别于浙北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也正由于“一种新文化出现,面貌并不都是绝对一致的”,因为文化的运动发展,如果没有差别那才是不可思议的。这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黄宣佩先生《良渚文化特征分析》^⑪一文论述的特征与宁绍地区“良渚文化”比较,除陶、石器器物群、装饰纹样基本相似外,良渚文化显著特征之一的内大量用玉,则在宁绍平原(作为礼器的玉琮、玉璧)至今未发现,作为原始宗教的神像(图形多为人兽结合)和进入文明时代的迹象(如高墩)等仅在茗山后遗址有发现,但面貌确实不都绝对一致。

最后谈一下宁绍地区“良渚文化”的时代问题。黄宣佩先生

在《论良渚文化的分期》^③一文中,根据大量材料和测试的年代进行科学的研究后,把良渚文化分为五期,根据碳十四测定数据提出年代为距今 4900—4100 年,不包括过渡阶段。而宁绍地区的典型遗址,它们的年代均在 5000 年以上。而河姆渡四期文化中已孕育着“良渚文化”相似的器物了,这与妙山、慈湖、茗山后等“良渚文化”的年代是同步交错的,将这些遗址中出土物与良渚文化典型遗址余杭安溪、嘉兴雀幕桥、金山亭林等遗址出土物作对比,看成是良渚文化涌入宁绍平原的结果,这是不确切的。因为这些遗址可以说它们的年代都较晚,良渚文化碳十四测定以四个地点七个标本,除有几个标本被排除外^④,可参考的吴兴钱山漾 T16(3)4710±140、T13(4)4580±135,余杭安溪 4820±180,嘉兴雀幕桥 M 14330±145,上海金山亭林 4200±145。由此可见,宁绍地区“良渚文化”典型的慈湖、茗山后等遗址,它们不但从时代上比钱山漾、安溪、雀幕桥和亭林遗址出土物早得多,而且在文化面貌上也有差异,这是因为慈湖、茗山后等遗址的“良渚文化”层,正处于“良渚文化”的过渡阶段,即距今 5100—4900 年左右。

综观宁绍平原,从距今 7000 年的河姆渡文化不断地发展,到距今 6500—6000 年之间仍以自身的发展为主向前推进,至距今 6000—5500 年之间与相邻的文化交融面不断扩大,并吸收先进的因素,从距今 5500—5000 年之间,河姆渡文化发展更快,大约在距今 5100 年左右时(20 余个遗址)在先进因素的促使下,产生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河姆渡文化终于被一种新兴的“良渚文化”所代替。

注释

- ① ②《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第39、92—93页。
- ③《中国河姆渡文化》第4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 ④宁波市文管会编，《文物与考古》第104期，第5页。
- ⑤⑥⑪《宁波市文管会资料》、《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1993年10月版，第104、119页；《宁绍平原良渚文化初探(提纲)》1993年浙江省考古学会论文及《东南文化》1993年第1期第92页。
- ⑦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象山县塔山遗址首期发掘成果报告》第2—6页1991年10月29日。
- ⑨《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第4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4月版。
- ⑩《良渚文化》，载《余杭县文史资料》(第三辑)第27—28页，1987年12月版。
- ⑫《上海博物馆集刊》第5期，第5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0月版。
- ⑬⑭《上海博物馆集刊》第6期第370、37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0月版。

河姆渡文化和舜耕历山

邵九华

余姚有“舜耕历山,禹藏秘图”^①的传说,而舜耕历山的传说在国内分布很广,《辞海》“历山”条择要罗列了山东、山西、浙江、湖南四省境内的九处,因此舜是否在余姚耕耘过很难定论。本世纪 50 年代以来,余姚市境内陆续发现一批新石器时代的遗址,特别是 70 年代初,举世闻名的河姆渡遗址的发现,揭开了余姚的上古历史,这为研究舜耕历山(指余姚的历山,下简称舜耕)提供了翔实的物质资料。笔者希冀通过对舜耕传说的认识,阐述河姆渡文化对余姚及浙东地区原始文化的影响。

一、骨耜、稻作、舜耕

作为文学艺术作品的传说故事离不开人类生活的源泉,它的流传同样需要一定的生活基础和社会基础。舜耕传说反映的是舜教百姓耕作的故事,内容比较简洁:“很久很久以前,历山还是海中小岛,后来海水退去,才成了小山。柯鱼佬没有鱼柯无法生活,这时来了舜。带领大家耕耘,老百姓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②传说字数不多,但时空跨度很大,它反映的是原始人从渔猎发展进入农耕经济时期的社会历史。河姆渡遗址是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表现这个历史阶段社会生活的典型遗址,考古获得的实物资料充分说明舜耕的传说是有深厚的生活基础。

河姆渡遗址位于余姚市罗江乡河姆渡口北侧,遗址总面积4万平方米,已发掘2800平方米,出土文物7000多件。遗址由上下迭压又前后承接的四个文化层构成,经碳十四测定和树轮校正,4个文化层距今年代分别是7000年、6000年、5600年和5000年。^③遗址出土文物包括了河姆渡先民拥有的大部分生产、生活资料,其价值首推人工栽培水稻和木建筑构件。在第一次考古发掘的630平方米内,稻谷堆积物的面积达400余平方,厚度在20—50厘米,据估测,稻谷的数量多达120吨。^④最近农学家从出土的人工栽培稻谷中分辨出少量混杂的野生稻谷粒^⑤。这样更进一步证实河姆渡是我国栽培稻的发源地之一。伴随稻谷,出土数量众多、门类齐全的农具,有骨耜、木耜、石耜、骨镰、木杵四五种,数百件。骨耜是主要的耕作农具,在第一次考古发掘区第四文化层出土就有89把^⑥,它用水牛、鹿、四不象等偶蹄类动物的肩胛骨敲凿磨制而成。形似斧,顶端柄部较厚、窄,末端刃部宽、薄,由于所取的动物不同,骨耜的大小也参差不齐,顶端宽约4—5厘米,末端10—15厘米,高约13—25厘米。多数骨耜的上端凿有横穿的方孔,中间骨面也凿着两个平行的长圆孔,上下孔都用来固定木棒,二者组合起来类似铲,适宜南方水田劳动。出土的骨耜因长期使用显得十分光滑,柄及背部绳索绑扎过紧痕迹清晰可见,刃部磨蚀较多,呈平铲状、半圆舌状,叉状或波浪形,大型骨耜的发现表明生活在河姆渡遗址第四层时期的先民已经脱离了刀耕火种阶段,而进入到锄耕(耜耕)阶段^⑦,笔者作过一次骨耜仿古复制实验,选用的材料是一根长28厘米的现代家养水牛肩胛骨,用石块截切和磨砺的方法制作成长21厘米,顶部宽6厘米,底下刃部宽13厘米的骨耜。修正骨耜外形整整用了一上午的时间,比较难的是打凿骨面和柄部的圆孔,最后用钻头钻成的。通过仿制,可以知道河姆渡先民制作

骨耜是一件十分艰巨的劳动,而且进一步认识,正是为了翻土的需要先民才把肩胛骨底部长度在 7—8 厘米的薄面部分先行截去,故此现在所见的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骨耜一般都在 20 厘米左右,骨耜作为翻土工具是毋庸置疑的,以骨耜为标志的稻作文化是河姆渡文化的特征。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动植物资料证明,在以捕猎为主要食物来源的时候,原始人的生存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出土的虎、豹、野猪等猛兽的遗骸比较少。水牛、鹿、四不象、猴子等温驯动物遗骸众多,说明捕获较多,它们之中又以老弱幼小对象居多,实际上原始人要捕猎到一只大型动物是非常艰难的。经历了漫长的积累,人类终于发明农业栽培技术,这在人类历史上又是一次划时代的进步。它不仅仅改变了原始人的生产方式,更主要的是为人类的生存、繁衍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使人类有充裕的时间改造环境,拓宽生活,促进社会的进步。

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还发现大批纵横交错的木构件,密密层层布满了整个发掘区,考古学家鉴定它们是底层架空,上面居住的干栏式建筑遗迹。在建筑技术上,河姆渡先民已学会使用榫卯结构,其榫卯形式都基本符合受力情况的要求,尤其是梢钉的使用和企口板的发明,标志着此时的木结构已有了相当丰富的经验。^④这里还出土了大量驯养的狗、猪、水牛等家畜的遗骸,数百件纺轮和编织用的纬刀、木梭,直径不到 2 毫米的有孔骨针,几万件陶片和一大批稚拙的原始艺术品。由此可以肯定,在距今 7000 年前河姆渡先民已经结束了游弋状态,进入比较稳定的耜耕农业阶段。这以后农耕技术逐渐扩散到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⑤。在距今 4000 多年前,稻作农业已成为我国广大南方地区的主要经济部门。近几年从姚北平原到象山港的浙东沿海地区发现大批相当于河姆渡第一、二、三文化层的遗址,内涵比

较丰富的有余姚鲋山、慈溪童家岙、宁波八字桥、鄞县蜃蛟、奉化名山后、象山塔山等。^⑩在余姚,与河姆渡遗址第一、二文化层相似和稍后的原始文化晚期的遗址有二十几处,其中以历山以南,姚江以北的山丘高阜上最密集,计有茅湖、兵马司、西柳家岙、吴家岙、西竹山、翁家岙、鲋山、新周家、王杨车、黄家山、黄沙湖农场、市水稻原种农场和童家岙(慈溪市)13处。它们之中文化内涵相当于河姆渡遗址第三文化层的只有童家岙、鲋山二处,多数相当于河姆渡第一文化层,从地理位置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原始先民的活动范围呈现向杭州湾滨海地区发展的趋势。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茅湖遗址,它位于历山镇茅湖边上,出土文物除陶器、石器、人骨、兽骨外还有稻谷。据村民反映,先前他们经常能挖掘到木板和木桩,省文管会认为这是古越州地区最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⑪汪济英先生把茅湖遗址的出土文物归属于良渚文化的范畴之中^⑫。那么它在时间上略晚于河姆渡遗址第一文化层而接近舜耕的时代。余姚目前发现的原始文化遗址尽管在文化内涵上有差异,即时代的发展带来的变化,但是遗址的位置都选择在背山面湖的山前台地上,其田实际上是湖水后退形成的淤田,所谓舜耕也就是原始人用骨耜、木耜、石耜在淤田上耕作播种,栽培稻谷。舜耕的传说是蓬勃兴起的原始农业的反映。农学家认为:“农业允许更加密集的食物种植,供应更加密集的人口,因而允许更大的社会集团的存在。”^⑬根据这个论断,结合出土文物资料,可以推断古籍《竹书记年》、《风土记》和《会稽旧记》中提及的“姚丘”、“姚墟”应是姚北山丘和散落其间的原始村落的总称。“姚丘”、“姚墟”名称的来历,上述著述者以为“舜姓姚”的缘故。虽然考古发现还未能证实这种说法的正确与否,但可以相信,在姚北山丘众多的先民中是会有他们拥戴的领袖。所以说,河姆渡文化推动了原始农业的发展,促进浙东平原虞越

民族的形成,也造就了舜耕千古传说。

二、水灾、水利、治水英雄

传说故事的产生和流传除了社会生活的基础外,还必须有强烈的生活事件、尖锐的矛盾冲突,才能构成传说的核心,吸引千千万万、世世代代的民众。纵观中国远古时代的传说故事,自然灾害和战争是它的两大主题。那么舜耕传说属于哪一个主题呢?强烈的生活事件又是什么呢?根据余姚市 20 多个原始社会遗址的考古资料分析,出土文物中的利器主要是作为劳动生产工具的石斧、石凿、骨耜,骨针、木梭及箭镞之类,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木器有千余件,但是有棱有角,可以用于搏击的木棍却没有发现。虽然曾出土数件鸟形象牙匕首,但是从遗址性质总体考虑,考古学家倾向把它作为氏族首领权力的象征,这样战争的因素可以排除掉。从自然灾害方面分析,隐约有线索可查:河姆渡遗址发掘中曾发现遗址第一文化层的表面有一段被洪水冲刷的痕迹,另外还发现一段鹅卵石溪滩,今天遗址周围河流纵横交错,但已找不到溪滩。经浙江省水文大队对这一带的古地貌勘察,认为距今 5000 年前遗址的东、西、北三面是湖泊和沼泽,南面与四明山相连接,有一条溪流源于遗址东南 10 公里的四明山芝村,经过遗址向北注入湖泊。^⑩现在夹在遗址与四明山麓之间的姚江,当初是在遗址西面 24 公里,今天余姚市区龙泉山西面向北注入杭州湾。姚江全长 109 公里,在余姚市区中游段河面宽还只 40—50 米,到了河姆渡遗址边上宽已 100 多米,深 10 多米,不是特大的灾害,原始人是无法开掘的。考古学家通过对长江流域东南地区原始社会遗址的多年考察,认为距今 4500 年前后,曾发生过一次全球性的气候变异,这种说法是有一定的根

据。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动植物遗存中还有今天生活在热带丛林中的大象、犀牛、红面猴等动物及海金沙等植物孢粉。^⑩说明那时候河姆渡的气温和今天的广东、云南相仿,比现在要高4—5摄氏度,其次文化层之上的表土层厚只有70—90厘米,证实今天河姆渡的自然风貌形成的年代还比较短。对于这场气候变异

工具,表明农耕捕捞技术的进步,所以历山周围丘陵高阜的原始人应是迁移而来的河姆渡人后裔。这场气候变异带来的特大洪水,给河姆渡先民的影响是非常的深刻,洪水退去后先民面对的是房屋毁塌、田园荒芜、浊水四溢的破败景况。经过漫长的奋斗和胼手胝足的艰巨劳动,终于重新建立家园。在这场人与自然的悲壮冲突中产生了许多许多的英雄和传说故事,舜耕只是其中一个罢了。“那时候姚江经常做大水,他又带领大家治理姚江,所以姚江又叫舜江”^⑩,这是舜耕的矛盾冲突。

水曾给原始先民提供丰厚的资源财富,河姆渡遗址出土文物,除了水生动植物外,还有船桨、水井、水罐,河姆渡文化的滋生得益于充沛的江南丰水。这场特大洪水也给先民深刻的教训,从而创水利大业。虽然今天已无法考查原始的水利设施,但是余姚现在所知的最早水利工程大沽塘确实在历山发端,还有例如石堰、梁堰等有关地名保留了古代的水利建设的资料,舜耕的传说也是这里流传较广、较深。

三、舜、舜迹、文化交流

上面的考古资料说明余姚舜耕的传说并非杜撰,也不是后世传入,而是土生土长,有深渊的社会基础和鲜明的地方特色。现在又要回到老问题,即舜是否在余姚耕耘过?这个问题涉及到舜的身世籍贯和到余姚的目的原因。舜是传说中我国远古时代部落联盟的领袖,是开创中华民族历史的杰出人物,位于三皇五帝之列。舜的籍贯历史上有司马迁的冀州人和孟子的东夷人说。孟子、司马迁都是世纪前的人物,但是距舜的时代也有2000多年之远,他们的笔下舜的事迹亦采自民间传说,可见舜的传说在那个时候已经非常的广泛。余姚也有“舜生于冯诸”的

传说。余姚市长丰乡冯村,传说是诸冯古墟,村民多姓赵,村口立有明嘉靖年间所刻的“明考古赵先生故里”石碑。村民中已无人知道这个传说了。在历山,会讲舜耕故事的老年人却坚持认为舜是外地来的。那么舜是为什么来余姚的呢?笔者新近查到一则舜的传说解答了这个问题。“……尧的儿子丹朱出还争夺帝位,于是带人去刺杀舜。文武百官知道这个消息后,派人告诉舜,叫他赶快逃命。舜向东海方向逃,丹朱在后面追,一日到了虞山脚下,丹朱也追到山下,舜连忙避进谷底,等丹朱过后才出来。他怕丹朱回转来寻人,就翻过道婆岭到了历山。”舜承尧位是禅让还是武力夺取,战国时期百家有争议,从另一侧面看这个传说反映了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南北文化的交流。如果能够从考古上证实这个立论的成立,那么假定舜是中原部落的代表的话,是可以来到余姚,向余姚的先民学习稻作栽培技术,交流先进农耕经验。考古工作者在广东曲江石峡遗址和辽东半岛渤海庙岛群岛中的大竹山岛南的海底都发现了侈口、圆腹而下垂、饰有绳纹的陶釜。“这种陶釜,在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及其邻近地区的史前文化中均未见,而与在太湖地区的崧泽文化和宁绍地区的河姆渡遗址的第四期的陶釜相类同。反映了石峡文化、山东地区史前文化与崧泽文化和河姆渡文化的影响关系。”^⑩考古学家认为在7000年前,河姆渡先民对外的交往主要通过海上途径实现的,在河姆渡遗址内发现的鱼骨中有海鱼裸顶鲷和滨海河口鱼类的鲻鱼,加上木器中发现的6支木桨,说明了河姆渡先民有海上捕鱼的可能。海上捕鱼的出现,为海上航行创造了条件。所以考古学家认为:“崧泽文化和河姆渡遗址第四期的居民既是向北航行可以到达渤海湾,那末,他们向南走也有可能到达广东沿海一带。……这并不排斥还有陆路交往的可能性。”^⑪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以后,这种文化交流当然是更多、更密切。

浙江省博物馆汪济英先生认为历山茅湖遗址出土的黑陶器皿与良渚出土的毫无差别,在段石镞、石斧、石刀、石镞也是这一时期常见的石制工具。^①但是考古工作者对茅湖遗址的文化归类上还未能统一起来,1987年春在宁波市慈城镇发现的慈湖遗址以后,这种分歧更加扩大。慈湖遗址的地层堆积可分三个时期:下层与河姆渡的上层相当,中层属于良渚文化,上层的情况不甚明了,可能是相当于马桥四层的后良渚。这种地层上下迭压的文化层,内涵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是考古界的很多同志还是认为它是河姆渡文化的延续。^②因此还是用交流发展的观点认识更正确。由于交流范围的扩大,交往的频繁,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从而更具时代特色。河姆渡文化从它开始之初就处于对外的交流之中,到了舜的时代则是愈加广泛与密切,舜到余姚来,不存在交通上面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传说中开创中华民族历史的三皇五帝之中,浙东地区最崇拜的还是舜、禹二帝。据调查,在绍兴、余姚、上虞三县境内,方志和其它文献中记载的舜、禹故迹有18处,其中舜出生处二、舜母出生处二、舜耕处一、舜渔处一、舜葬处一。^③这在全国是少见的,从民族学看,舜曾对浙东地区有过重大的影响,随着考古学的深入,舜的实物资料一定会有更多的发现。

注释

①秘图山,在余姚市府大院内,相传禹把水利图藏于此山。

②③《舜的传说》,《余姚市民间文学集成》。

③④《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④严文明:《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

⑤1991年8月31日《浙江日报》。

⑦吴汝祚:《我国早期种植水稻的民族部落》,《史前研究》1985年第1期。

⑧杨鸿勋:《河姆渡遗址早期木构工艺考察》,《建筑考古论文集》,文物出

版社 1987 年。

⑨李再华、李放：《略论百越早期稻作文化》。

⑩浙江省文物局《文物考古资料》1986 年第 4 期，《文物简讯》1990 年第 2 期，1991 年 1 月 1 日《宁波日报》。

⑪《历山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1956 年 9 月 22 日《余姚报》。

⑫⑬汪济英：《良渚文化的回顾与探讨》。

⑭马克·纳森·柯恩：《人口压力与农业起源》，《农业考古》1990 年第 2 期。

⑮⑯《河姆渡遗址动物遗存的鉴定研究》，《考古学报》1978 年第 1 期。

⑰王开发：《根据孢粉分析推断上海地区近六千年以来的气候变迁》，《大气科学》1978 年第 2 期。

⑱《绍兴水利史概要》，《绍兴学刊》1990 年夏季号。

⑲⑳吴汝祚：《良渚遗址发掘的意义》。

㉑林士民：《宁波地区原始文化初探》，《东南文化》1990 年第 5 期。

㉒《历史时期宁绍平原城市的起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 3 辑，1988 年。

河姆渡文化渊源思考

王海明

1973年,河姆渡遗址第一次正式发掘;1977年河姆渡文化命名^①;河姆渡文化发现被认为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飞跃发展的一大标志^②。20年来,各有关学科的专家学者从考古学、动植物学、气候气象、农学、建筑学、宗教、艺术、美学等方面对河姆渡文化进行了多学科、多角度的分析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随着田野考古调查发掘工作的深入开展,新资料不断出现与积累,大大丰富充实了河姆渡文化内涵;余姚耆架山遗址第四文化层的发现^③,填补了河姆渡遗址第三文化层与第二文化层之间的发展缺环;对河姆渡文化的内涵、特征、分期、分布范围及与周边史前文化的关系等方面的认识考古界已基本一致。但河姆渡文化渊源问题至今仍是个不解之谜!河姆渡遗址发现后,除稍后发现发掘的桐乡罗家角马家浜文化早期遗址年代与其大致同时或稍早外,20年来在史前遗址考古研究中时代上没有更大的突破,与邻近省市史前考古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相比,我们浙江显得相对落伍了。探索浙江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揭示河姆渡文化渊源是我们面临十分重要又非常紧迫的课题。

诚然,田野考古发现有很大的偶然性,现阶段配合基本建设工程开展考古工作更有严重的局限性和盲目性,似乎可遇而不可求?但我们同时认为基于一定事实基础,应用严密逻辑而得出的科学预见和假设对实际工作的指导作用亦是不容置疑的。

本文拟就河姆渡文化渊源问题展开讨论,探讨河姆渡文化渊源指什么?在何处?如何才能有效开展探索工作等问题。不揣浅陋,力陈管见,希望引起大家重视注意,抛砖引玉,以推动问题尽快解决。

一

在河姆渡文化渊源问题讨论展开之前,首先必须对“渊源”有个界定,明确本文讨论范畴。严文明先生根据我国新石器文化发现状况及年代将我国新石器时代早中晚分期年代匡定为早期公元前 7500—6000 年左右;中期公元前 6000—5000 年左右;晚期公元前 5000—3500 年左右^④。据此,上限距今 7000 年左右的河姆渡文化已属新石器时代晚期之文化。河姆渡文化内涵本身亦表明她绝非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她已进入定居的耜耕农业阶段;农具和手工工具已有一定的分工,大量栽培水稻,这都反映出河姆渡文化已是相当发达的新石器文化。河姆渡文化渊源狭义讲应是指前河姆渡文化;本文取广义,即泛指全新世以降宁绍平原以至整个钱塘江以南地区早于河姆渡文化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年代与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相当或略早的桐乡罗家角遗址早期马家浜文化堆积是否与河姆渡文化有着相同源头?两者之间是否有渊源承继的“血缘关系”?河姆渡文化以绳纹陶釜为代表、马家浜文化以筒腹腰沿釜为代表的不同陶器群,并各有自己的演变发展轨迹的事实已对此作出了否定的明确回答。它们是钱塘江两岸独立存在,并行发展的两支原始文化,各自应有自己文化源头。绳纹肩脊釜在罗家角遗址早期地层的发现只能表明两文化间有交往、联系和影响,并非同出一源的证据。河姆渡

文化是宁绍平原土著的史前文化,其渊源亦应在此。

二

宁绍平原是浙北平原的一部分,由钱塘江与杭嘉湖平原相隔。其范围大致是钱塘江以南,杭州湾南面东西长约 130 公里,南北宽 35 公里,面积约 4000 平方公里。它是由泥沙在滨海和湖沼环境中堆积形成,海拔一般在 10 米以下。平原依山临海,其南崇山峻岭,自西而东依次有龙门山、会稽山、四明山、天台山等山系,平原南缘为低山丘陵区。与山脉走向基本平行的钱塘江、浦阳江、平水江、曹娥江、姚江、奉化江自南而北流经平原注入杭州湾和东海。滨海地带是至今海岸尚在波动的淤积滩涂。这里群山、河流、湖泊错落其间、地理环境十分优越,且气候四季分明、雨量充沛,是史前人类生息繁衍的理想之处。

第四纪以来,本地区先后经历了二三次海平面变化的影响。随着末次冰期的结束,世界气候迅速变暖,海平面急剧上升,进入全新世以来,距今 1.2 万年至 7500 年,海平面除短时间有小幅回落外是个持续上升阶段,从海拔 -50 米位置上升到 -10 米处,有学者根据河姆渡遗址底界标高(-1.5 米)及该遗址最古老第四文化层碳十四测年(6960 ± 170 年),经潮位校正,推算距今 7000 年海平面位置已在 -4 米处^①。这期间,由于海面上升速率超过了泥沙供给正常速度,海岸步步后退,海水沿钱塘江等其它古河道入侵,淹没整个平原。海水的入侵给河口上部或海湾湾顶带来海水沉积物,导致泥沙淤塞古河道,并逐渐沼泽化,最终致使河流改道。根据地质部门钻探资料分析研究^②,第四纪初期,钱塘江古河道在嘉善西塘、平湖及嘉兴王店一带,经上海金山至奉贤一带汇入“古长江”。晚更新世早期(Q_3^1),主流走

向发生重大转折,在杭州一带折向东去,进入现杭州湾。古河道主线在袁浦—杭州—靖江—新湾一线。浦阳江古河道主流线自诸暨姚公埠、萧山城厢镇、新湾,往东北汇入古钱塘江;平水江古河道的主流线自平水镇经绍兴豆姜至孙端一线,往东北汇入古曹娥江;曹娥江古河道主流线自章镇经曹娥、上虞(百官)至沥海一线,往北汇入古钱塘江;姚江古河道主流线在马渚—泗门—长河—庵东一线,后曾稍向东摆动至周行—长河一线。奉化江以姜山—奉化分水岭为界,东部为奉化东江古道,经雅应、邱隘,向北延伸;西部为奉化西江、鄞江、大雷溪、大隐溪等古河道,分别经宁波庄桥向北延伸。姚江改道东行与奉化江汇合成今日的甬江已是全新世高海面后的事,时间大致不会超过 6000 年。宁绍平原之 Z 型大致形成于距今 7000—6000 年间,至宋代基本形成今日平原之格局。杭州湾南岸滩涂至今仍在迅速淤积是人类筑堤围垦造成的。

三

大家知道,古人类的居住面在水平方向上和垂直方向上分别严格地受海陆分布和海面位置所控制。根据大量钻孔揭示,浙江全新世海相层的厚度从几米到几十米不等,正常情况下最大厚度在 45 米左右。^⑦奉化县前江(今江口)埋深 19 米的牡蛎壳堆积碳十四测年 $8235 \pm 120(2K392 - A)$ ^⑧,它指示距今 8300 年左右这里是河口滨海环境,同时也意味着当时海平面发生过短暂的停顿或下降。因为沿岸沙堤和贝壳堤是滨海平原发展过程中岸线停顿或略有后退的产物,它们是古海面的指示物,也是古岸线的重要标志。河姆渡遗址周围地区钻探资料,距地表深 5 至 15 米是青灰色海相堆积^⑨,距地表深 4—4.5 米,普遍存在

一层厚约 20—30 厘米的含大量有机质的灰黑土,镜检揭示该层灰黑土中包含大量芦苇硅酸体^⑨。这启示海侵在此时有较长时间的停顿或回落,这里正发育着沼泽。河姆渡遗址就分布在这沼泽的边缘,茂密的森林,交错的湖泊沼泽为河姆渡文化提供了丰富的食品营养。

全新世以来的持续海侵使我们有理由认为:宁绍平原及其附近地区较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底界标高(-1.5 米)更低的地域在 7000 年前是不具备人类生存条件的,这里还是汪洋一片,尚未成陆;人类不是鱼鳖,不可能在一片汪洋中生活。遗址不曾存在,当然无法找到。的确,地质钻探资料亦表明,第四纪以前,今东海大陆架还是一片陆地,舟山群岛也是大陆一部分,但此时这里是否有人类存在尚是个大问题,假如存在,与探讨河姆渡文化渊源问题无涉。况且考古发现证明,旧石器时代早中期,人类还在深山密林中。

人类社会发展历程表明人类生存严格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史前人类对自然的依赖性更大,“靠天吃饭”即是当时人类生活的真实写照。人们只能顺应自然、适应自然,从而有条件改造自然。深山密林山地丘陵——平原地区是人类共同经历的变化过程,这已为大量考古发现所揭示。宁绍平原及其附近地区河姆渡文化遗址、良渚文化遗址分布也大体与上述人类生存环境变化发展规律相吻合。

宁绍地区发现的史前遗址和史前遗物采集点已达 50 余处,经正式发掘的遗址近 10 处。按遗址年代区分,50 余处遗址、文物采集点中属河姆渡文化第一、二期的遗址数量很少,除河姆渡遗址本身外,还有慈溪童家岙遗址、余姚西岙朱山遗址,即使将余姚崆架山遗址也归入此期,总共才 4 处。这 3 处遗址均与河姆渡遗址有着相似的地理环境,依山面水,附近有山麓小平原,

在当时都是滨海环境,沼泽附近。童家岙、蚶架山遗址文化层底界标高较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底界要高些,年代亦稍晚。河姆渡文化早期的遗址发现较少某种程度上反映河姆渡文化在当时分布范围十分有限,仅限于环山地理条件十分优越的地方,同时也折射反映出宁绍平原环境的恶劣,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不多。到河姆渡文化第三、四期,人类活动空间迅速扩大,遗址分布面较广,象山港、舟山群岛以至浙南都有河姆渡文化遗址发现。就具体遗址环境而言,一般分布在依托连绵大山的丘陵地带,普遍发现于低矮小山的山麓坡脚,均为山坡(麓)型遗址。如已经发掘的名山后遗址、慈湖遗址、象山塔山遗址均属这类遗址。塔山遗址离现在海岸才 5 公里,遗址年代上限为河姆渡文化第三期,遗址 9 层下发现的墓葬是目前所见的河姆渡文化第三期最早的遗存。塔山遗址发掘表明,至迟河姆渡文化第三期时,河姆渡文化空间已拓展到滨海前沿的象山塔山。1993 年冬,笔者在浙南进行浙南史前遗址专题调查,在永嘉坦下大小楠溪江交汇处地表下 3 米处发现厚 30 厘米史前文化堆积,现场采集的陶片有夹炭黑陶绳纹陶片、泥质红陶片等,器形可辨有釜、罐、盘等。发现石铤 2 件,现场所见砾石多经人工砸碎。陶器、石铤特征与河姆渡文化第四期遗存相似。

1990 年发掘的萧山跨湖桥遗址有必要稍加讨论。跨湖桥遗址建筑在湘湖的泻湖相沉积之上,遗址自上而下野外划分 8 个地层,发掘者认为 8 个地层大致属同一时期^①。发掘发现多层灰面迹象,并发现灰坑 25 个,多数为带木构坑口的窖穴,发掘者现场观察认为似已有地面建筑。出土陶器以夹砂黑陶、夹砂灰黑陶为主,少量夹炭陶,器形种类少,有侈口宽沿圆底釜、直口带釜釜(罐)、大喇叭圈足豆、直口双耳鼓腹罐等。陶釜上均饰有绳纹,其中交叉成菱格状的绳纹颇具特色。豆、罐类器大多施红,

色陶衣或橙红色陶衣。其年代发掘者认为大约相当于河姆渡第三期前后。跨湖桥遗址内涵独特,缺乏可资对比的材料,有待进一步认识。然由海洋二所测定的跨湖桥遗址碳十四测年数据超过 8000 年(HL91022,90XKT302(9)木头 7618 ± 242 未经树轮校正)^⑩这一信息打破了有待进一步认识平静局面,着实让人兴奋和激动,宁绍平原上终于发现了早于河姆渡文化的遗址;兴奋之余,也叫人感到不可思议,跨湖桥遗址果真是 8000 年前的遗址吗?其内涵一如碳十四测年那样古老原始吗?跨湖桥遗址所处的湘湖湮没干涸成陆亦是全新世持续海侵的结果,其成陆时间与河姆渡遗址附近地区大体同时;多层灰面迹象、带木构坑口窖穴、地面建筑的存在都说明人类在此聚居时该地已较干燥硬结,这可能意味着人类在此聚居的时间要明显晚于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地面建筑在河姆渡文化是营建技术进步的产物和标志,年代上一般认为至河姆渡文化第三期才出现。窖穴采用木构坑口较河姆渡文化早期简单挖坑保存贮藏橡子等果实要先进得多。北仑沙溪遗址发现木构窖穴时代属河姆渡文化第四期或更晚的良渚时期^⑪,良渚镇庙前遗址也发现良渚文化带木构窖藏(水井)^⑫;跨湖桥遗址陶器制作也较河姆渡文化早期规整,火候也高,凡此种种都有悖于 8000 年前的古老。看来 8000 多年的碳十四测年数据明显早于遗址真实年代。造成碳十四测年误差的因素和环节很多,我们不能仅凭一二个碳十四测年数据来否定通过考古学手段类型学排比研究得出的相对年代,我们认为发掘者大约相当于河姆渡第三期前后的年代推断是正确的。跨湖桥遗址内涵虽不能直接与河姆渡文化相比较,但绳纹陶釜是主要炊器等现象可能表明与河姆渡文化有着某种亲缘关系,抑或是河姆渡文化发展旁支(地方类型)。

到良渚文化时期,遗址数量多,分布更加密集,特别是处于

水网平原的孤山周围及其附近地区也发现了遗址、遗物。如已发掘的绍兴马鞍遗址、仙人山遗址、萧山河庄蜀山遗址^⑮，上虞道墟称山也发现了良渚文化鱼鳍形鼎足、有段石铤等遗物^⑯。这说明宁绍地区生存环境有了进一步改善。完全离开山地丘陵，在平原水网地带聚居生活，则是商周以后的事，绍兴昌安后白洋遗址^⑰、昌安门外鲍谷遗址^⑱颇具代表性。遗址位置地势仅略高于附近。两遗址年代在春秋战国时期。

舟山群岛史前遗址分布及其年代早晚是我们全面了解河姆渡文化时空发展变化又一批好材料。

舟山群岛由大小 1000 余个岛屿组成，以舟山本岛面积最大，岱山、六横、金塘、衢山、朱家尖、桃花等岛的面积相对较大。到目前为止，舟山群岛共发现史前遗址及史前文物采集点（有些文物时代可能属商周）50 余处^⑲，舟山本岛数量最多，岱山岛次之，衢山、金塘、桃花甚至泗礁岛都有发现。经小规模发掘的有定海白泉十字路遗址、衢山岛太平乡勤俭村孙家山遗址、定海马岙乡唐家墩遗址等。遗址内涵、年代，白泉十字路遗址出土半圆锥双目式足鼎等陶器^⑳明显具有河姆渡文化第三期同类陶器特征，遗址年代上限可早到河姆渡文化第三期；孙家山遗址出土遗物可明显区分为早晚两期，陶鼎、陶豆与河姆渡遗址第一文化层所见相似，破土器（石耨）、耘田器（除草工具）等石器则显然为良渚文化遗物^㉑。马岙唐家墩^㉒、金塘岛山潭乡四高墩^㉓所见以泥质红陶小口鼓腹圜底器为典型代表的这类遗存大陆目前仅见于北仑沙溪遗址^㉔。沙溪遗址看来是大陆文化向舟山群岛传播的一个“桥头堡”。沙溪遗址附近建造今 329 国道白峰轮渡码头当不是偶然的巧合。今日轮渡航线很可能即为古代先民从大陆到舟山的航海路线。泗礁岛菜园镇基湖村采集的陶片较碎小，夹砂陶、带黑釉印纹硬陶均有发现^㉕，因无文化层发现，难以了解

全貌。所见遗物有些当属商周之物,这至少说明,商周时期这里已有人类生活。舟山群岛至今未发现早于河姆渡文化第三期的文物,更无遗址发现,这也许就是舟山群岛开发历史的真实反映。

通过宁绍平原、舟山群岛史前遗址分布宏观考察、内涵、年代的排比梳理,河姆渡文化由山地丘陵向沿海平原拓展,渡海开发舟山的壮丽画卷已清晰展示在我们面前,河姆渡文化发展轨迹历历在目,河姆渡文化足迹清楚告诉我们:在河姆渡文化早期,人类主要在山前丘陵地带活动,至河姆渡文化晚期,由山前向沿海拓展、并渡海到达舟山本岛,河姆渡文化第四期时,河姆渡文化足迹遍布整个宁绍地区,并沿舟山本岛向东北扩展到了岱山岛、衢山岛。河姆渡文化时空发展变化这一轨迹给我们探索河姆渡文化渊源问题一个十分有益的启示:我们应该按照上述轨迹溯向追溯寻觅,河姆渡文化早期活动范围山前地带、半山区、丘陵区应是河姆渡文化渊源所在。

四

令人欣喜的是1989年奉化名山后遗址第一期发掘在河姆渡文化地层中出土一件燧石质细石器刮削器,参加发掘的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丁友甫先生在名山北侧山腰今日小水库旁采集到一件同样用燧石制作的细石器镞^②,尽管没有找到相应堆积地层和共生物,但名山后两件细石器的发现无疑具有十分重要意义,它揭示了旧石器时代末或新石器时代初已有人类活动在宁绍平原南缘山前丘陵地带,给我们探索河姆渡文化渊源问题以极大鼓舞,也为我们开展工作提供了重要线索。

由于劳动生产实践,世界上的一切人类群体都有能力进行

适应自身社会条件和自然环境的发明创造,而在相同相似条件下,不同社会集团就可产生相似文化因素。全新世以来持续海侵是全球性的,同处沿海的福建、山东等省的细石器、新石器文化发现情况对我们探讨河姆渡文化渊源不无启发和借鉴。

海岱地区旧石器文化、细石器文化、新石器文化发展序列比较完整明确,发展环节、变化轨迹清楚。已发现 30 万年左右的沂源猿人,3~5 万年的新泰智人。旧石器、细石器文化遗址和地点达一百几十处。新近考古发现表明,上限距今 9000 年左右的西河类型新石器文化分布的泰沂山北麓山前冲积平原是海岱地区新石器文化的一个发源地。泰沂山南侧的鲁中南地区先后发现有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新石器文化发展序列明确。在泰沂山南侧环山地带发现大批细石器地点和遗址,集中分布在鲁中南汶水、泗水流域和鲁东南的沂、沭河流域。仅沂、沭河流域发现的细石器地点和遗址至少有七八十处,就时代而论,似具有上中游年代稍早,中下游偏晚的变化态势,临沂青峰岭细石器遗址上层的年代已到全新世之初,临沂户台细石器遗址发现打制磨刃的石器。关于细石器年代,目前还不太明确,但大体上处于更新世之末、全新世之初阶段当无问题。然而,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细石器和新石器时代早期直接衔接的线索,因而难以肯定由细石器直接发展成新石器文化。张学海先生明确指出,泰沂山南侧环山地带发现细石器遗存是“鲁南、江苏淮北地区新石器文化的渊源应可肯定”^④。

地区九龙江畔福建漳州北郊台地及附近地区发现的“漳州文化”燧石质细小石器出于漳州地区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早期的红黄色砂质土中,分布范围方圆近百平方公里,正好是天宝山山麓以东、九龙江西溪和北溪之间隆起带,其中台地与漳州海积平原交接的珠里至竹林山一线最为密集,由此可见,当时人类活

动的台地之南是浩瀚大海^④。

五

宁绍平原、舟山群岛河姆渡文化时空变化发展脉络明确启示我们,河姆渡文化渊源应追溯河姆渡文化发展轨迹到山前丘陵地带探索,山东、福建考古发现也表明当时属滨海环境的环山丘陵区是全新世新石器文化发源地,地处丘陵的奉化名山后发现两件细石器一定程度上启示宁绍平原南缘丘陵区应是该地区新石器文化渊源所在,曙光已经出现。然这终究因没有前河姆渡文化发现客观现实仅仅是基于事实的逻辑推测,并非事实本身。但名山后发现细石器的事实使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既然旧石器时代末人已在平原南缘丘陵区活动,那么随旧石器时代结束而来的新石器时代的人类活动范围当不会有太大的差别,新旧石器时代交替过程是缓慢又漫长的。尽管由打制石器到磨制石器是个了不起的进步,但最初磨制的石器除了刃部稍加琢磨外与打制石器没有什么区别,生产力水平、经济方式更不可能有什么大的改变。

宁绍平原南缘丘陵、山麓是河姆渡文化渊源所在。发源于崇山峻岭自南而北流经平原入海的钱塘江、浦阳江、平水江、曹娥江、姚江、奉化江等水系上中游两岸台地、古河道两侧是我们注意的重点。不可否认,山前丘陵地带,特别是河道两侧台地因雨水冲刷,水土流失相当严重,地貌、地形变化剧烈,对遗址保存极为不利。加上新石器时代早期生产力水平低,采集渔猎是主要生活来源,流动性大,某一地点居住时间短,留下生活垃圾文化堆积较少较薄,不利因素很多,困难不少。功夫不负有心人,只要我们思路正确,方法对头,坚持不懈,相信在南缘丘陵地区

找到前河姆渡文化,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只是个时间问题,我们期待着!

谨以此短文献给河姆渡文化发现 20 周年;献给为河姆渡文化发现、研究作出贡献的前辈考古工作者。

注释

- ①夏鼐:《碳-14 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考古》1977 年第 4 期。
- ②夏鼐:《三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安志敏:《略记三十年来我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均载《考古》1979 年第 5 期。
- ③余姚鲞架山遗址位河姆渡遗址东北约 1 公里鲞架山东南侧,1993 年底,河姆渡遗址博物馆考古人员调查发现,1994 年上半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遗址博物馆联合组队发掘,发掘材料正在整理中。
- ④严文明:《中国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的考察》,《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89 年版。
- ⑤王宗涛:《海洋地质研究》2(1982) 79~88,转引自冯怀珍、王宗涛《全新世浙江的海岸变迁与海面变化》《杭州大学学报》第 13 卷第 1 期。
- ⑥茅维华、陈介胜:《浙江海岸带构造地貌及新构造运动特征》;张上麟:《长江三角洲第四纪地质概论》;舒绍虎:《浙江沿海平原的水文地质基本特征》;浙江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建队三十周年论文集》,铅印本。
- ⑦王宗涛、冯怀珍:《全新世浙江的海岸变迁与海面变化》,《杭州大学学报》第 13 卷第 1 期。
- ⑧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考古》1977 年第 3 期。
- ⑨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地基钻探资料,邵九华先生见告。
- ⑩中日合作钻探资料,正在研究整理中。
- ⑪《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文物出版社出版。
- ⑫承蒙芮国耀先生提供有关测年资料
- ⑬⑭本所发掘资料,1987 年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北仑沙溪遗址的试掘表明,沙溪遗址年代上限为河姆渡文化第四期,1994 年发掘未找到该地层,遗址最底部建于生土中的窖穴很可能为河姆渡文化第四期遗存。

- ⑭《余杭庙前良渚文化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文物出版社出版。
- ⑮1982年发掘资料待发表。蜀山遗址底部发现良渚文化墓葬，后蜀山开矿曾发现良渚文化玉璧等。
- ⑯1991年笔者进行杭甬高速公路沿线考古调查所见。
- ⑰1995年上半年发掘，资料待整理。
- ⑱1980年前后林华东曾作过发掘，1995年夏，绍兴县文保所又作小规模清理。
- ⑲统计资料由舟山市文物办公室提供。
- ⑳舟山市文物办公室调查资料。
- ㉑王和平、陈金生：《舟山群岛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3年第1期。
- ㉒王明达、王和平：《浙江定海县唐家墩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3年第1期。
- ㉓1994年底笔者参与调查，材料存舟山市文物办公室。
- ㉔笔者两次上泗礁调查该遗址。
- ㉕《名山后遗址第一期发掘主要收获》，《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刊》第二辑，科学出版社，1993年。
- ㉖张学海：《海岱地区史前考古若干问题的思考》，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论文，铅印本。
- ㉗尤玉柱主编：《漳州史前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论河姆渡暨越文化的海外传播

林华东 韦立立

古往今来,任何区域文化,抑或民族和国家,都不可能是孤立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是构成邻近区域间相互文化交流的原因。栖息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史前先民及至先秦时的吴越和汉初的闽越与南越民族,背靠亚洲大陆,面向太平洋,特定的地理环境,使之既具频繁的内陆文化交流,同时又成为中华文明向海外传播的先驱。基此,我们愿以管窥之见,就河姆渡文化的界定和中国东南沿海古代先民的早期海外文化交往问题作一讨论,以求教于方家。

一、河姆渡文化的界定

河姆渡遗址自 1973 年和 1977 年先后进行的两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以来,曾以其悠久的年代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轰动了国内外史学界,成为人们研究的热题。然而,时至今日,关于河姆渡文化的内涵和时空范围的界定,学术界仍存在着很大的分歧。由于文化的界定是一切研究的基础,故愿就此问题复议于下:

众所周知,河姆渡遗址是以第三和第四文化层的内涵最为丰富和最具特色,同时两者间的承袭关系也最为密切,其与马家浜文化早期阶段明显有别。第一和第二文化层之间关系较为密切,而第二和第三文化层之间则存在着文化缺环,这是考古学界公认的事实。尽管近年鲞架山遗址发掘后,有报道说可填补河

姆渡遗址第二和第三文化层之间的缺环^①,但我们仍然支持夏鼐、安志敏、苏秉琦、严文明和汪济英等先生的观点^②,即把以河姆渡遗址第三和第四文化层为代表的内涵称为“河姆渡文化”而将第一和第二文化层区别开来。现从三个方面加以论证。

1. 从陶器特征分析 首先从陶器的质地而言,按第二次发掘出土陶片的陶系统计为例(见表),我们不难发现作为第四和第三文化层典型特征的夹炭黑陶和夹砂黑陶,至第二文化层已明显骤减,前者只占 10%,后者则为夹砂灰陶和泥质陶所代替,而第一文化层夹炭黑陶和夹砂黑陶已绝迹,代之以夹砂红陶及夹炭桔红陶、夹砂灰陶与泥质陶。再从陶器群形制剖析,第三和第四层居主导地位的有肩有脊敛口釜和敞口釜至第二和第一文化层时已消失。第二文化层时不仅新出现了鼎和腰檐釜等等,而且其他器物的造型特点也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第三和第四层陶器十分盛行而突出的肩脊至第二层时也已演变为弱脊或暗脊。故牟永抗先生也指出,河姆渡遗址“第二层与第三层的陶器泾渭分明,断然有别”^③。至于原始艺术品和陶器装饰,按吴玉贤先生的统计表明,第三、四层同第一、二层之间,“不是简单的数字上的增减所表现出的量的变化,而是内容、风格、形式等方面所显示出质的变化”^④。既然第二和第三层的陶器泾渭分明,出现了“质的变化”,即么,倘再以各层釜腹上都有绳纹装饰为据,而把第二和第三层间的“明显差别”,解释是“事物的发展和进步”,恐与史实不符。

2. 从生产工具剖析 河姆渡遗址第三和第四层的生产工具是以骨器和木器为大宗,而石器出土数量相当少,器形也较小,其中的农具是以骨耜占绝大多数,故有学者指出当时已处于耜耕农业发展阶段,而为史学界所首肯。而石器出土数量相当少,器形也较小,且大多是属加工木器和骨器的工具。但到了第二

文化层时,骨器和木器骤减,这虽然与地下保存条件不无关系,但从石器的明显增加,且器形大而规整,器身通体磨光,以及第三、四层可见的梯形状宽刃石斧和柄部略呈圆柱状的石凿,至此几已绝迹来看,两者之间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

3.从居住形态和葬俗等方面看 河姆渡遗址第三、四层的居住建筑形式,按第二次的发掘资料显示,全为典型的干栏式建筑,既有高干栏,又有低干栏之分。但至第二文化层以后,便已逐渐被栽柱式地面建筑所取代。就墓葬特点来看,第三和第四层主要葬式是侧身屈肢葬,至第一文化层时则已几乎全为仰身直肢葬。再从文化地理角度讨论,第三和第四文化层属典型的沼泽型文化,这与第二和第一层之间的差异也是很清楚的。有关于此,在《河姆渡文化初探》一书中已有阐述,此不赘述。

综上,我们赞同苏秉琦等著名学者的主张,即“应当把河姆渡文化局限在第三、四层,不要把第一、二层划进去”^⑤。根据目前的考古调查表明,河姆渡文化的范围大致沿四明山脉以北和以东的滨海平原地带分布,也就是上虞市曹娥江以东、象山港以北的山会平原地区,距今年代为7000—6000年。

至于第一和第二文化层的内涵,尽管有部分器物确曾继承了河姆渡文化的衣钵,但我们应该看到第二层出土的腰檐釜、扁腹釜、牛鼻耳罐、外红里黑豆、喇叭形把上带小圆孔的泥质红陶豆、足根为双目式的鼎、异形鬻,均是马家浜文化的典型陶器。而带把手的三足盃和通体磨光的穿孔石斧也习见于马家浜文化。第一层出土的陶豆,把上盛行方形、圆形、三角形、弧边三角形、弧边菱形等环绕一周(少数为二周或三周)的镂孔装饰;同时,竹节形把的豆,花瓣式圈足,扁凿形、三棱形、厚边鱼鳍形和足脊捏成锯齿状的鼎足,以及杯、壶、扁平穿孔石钺、长条形石镞等等,都是崧泽文化的常见器物。特别是M4随葬的一件刻划

神秘图像的陶豆(M4:1),与崧泽中层出土的盘形豆(M52:5)所刻图像风格也较相近。所以,就其文化主体剖析,我们仍然主张第二文化层可归属马家浜文化,而第一文化层则可归入崧泽文化范畴。不过,由于河姆渡遗址第一、二层曾较多地吸取了河姆渡文化的营养,某些器物与装饰(如釜和绳纹及支脚等)也有明显的承袭关系。第二层中的腰檐釜和穿孔石斧(钺)所占比例较小,不见平底带把短嘴盂,网坠与石镞也很罕见。而崧泽文化习见的穿孔石斧(钺),凿形足的盆式鼎、罐形和碗形豆、花瓣形圈足的陶杯和陶壶,以及彩绘装饰等,在河姆渡遗址第一层则不见或很罕见。如此看来,说明第二层内涵同马家浜文化,第一层同崧泽文化之间又有一定的区别。^⑥因此,我们建议可把宁绍平原以河姆渡遗址第二文化层为代表的内涵称作马家浜文化的宁绍类型,而把第一文化层名为崧泽文化的宁绍类型,以示其两者间的大同与小异。随着今后考古发掘工作的不断开展和研究工作的细致深入,根据文化内涵的大同小异,并结合自然地理环境研究,把考古学文化再细分出若干区域类型,乃势在必行,故我们提出上述见解,供学术界参考。

二、先秦以前越人的造船业

大凡进行海外文化交流,总离不开水上交通工具,因之,我们必须率先对这一地区早期的造船成就进行一番简要的回顾。

1973年和1977年,在浙江省余姚河姆渡遗址中,曾先后出土有七支距今为7000—6000年前的木船桨和一条废弃后被利用来作板墙的独木舟遗骸。1979年在浙江省桐乡罗家角遗址中,也同样发现了二条残破的独木舟^⑦,这均是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舟楫实物。其次,在江苏省常州圩墩马家浜文化遗址中,也

有距今 6000—5000 年前的木船桨发现。到了良渚文化之时(距今 5300—4000 年),造船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在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杭州市水田畝遗址和江苏吴江梅堰龙南遗址中都普遍出土有木船桨。从钱山漾和水田畝遗址出土的大船桨分析。前者桨叶长达 96.5 厘米、宽 19 厘米,后者有的桨叶宽达 26 厘米,其迎水面大,推力也大,从而可推知至迟在当时应已出现了筏和大型的独木舟。

商代以降,我们从以象形闻名中外的甲骨文“舟”字作“Ⅱ”、“Ⅲ”或“Ⅳ”,笔画工整而对称,联系到《史记·周本纪》载昭王南征渡水,命百姓造船,百姓恨之,故意制成胶船,结果船至中流胶液船解而丧身的记述,可以认定殷商之时已出现了小型木板船。逮至西周,造船已很普遍,从天子、大夫到士,常用舟船来表示身份等级,国家有时还设有“舟牧”、“苍兕”等官职,来负责管理舟楫。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铁器的使用,中国造船业有了飞速的发展,各诸侯国为争霸称雄,纷纷发展了水军和战船。地处江南水乡的吴、越以及濒临江、湖、海的楚和齐、鲁等国,更以其擅长舟楫而著称海内。越王勾践曾自称其民是“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吴国则被称为是“不能一日而废舟楫之用”的国家,而齐国更享有“海上王国”之称。当时的吴越两国舟船规模大、种类多,不但设有舟师、大船军和习流,而且战船,还多命有专名。就其船体而言,有筏、独木舟、舫和木板船,笔者还主张当时已出现了帆船^⑧。故至西汉时,中国的船队便可远航到了印度洋,因已有专文,此不赘述^⑨。

正因为吴越有着悠久的造船业,所以学术界有人便提出早在距今 6000—3000 年前,吴越便同日本、台湾、美洲和大洋洲有了海上交通,这是必须认真辨正匡谬的。

三、联结中朝日的“稻米之路”

吴越同日本的海上交往始于何时这一问题,主要是由研究传入日本的“稻米之路”引起的。有学者认定早在 7000—6000 年前的河姆渡文化之时,已同日本的绳文时代有了海上交通。也有人从河姆渡及其后续为代表的江南史前文化,诸如稻谷,干栏式建筑、玉玦、漆器、木农具、木屐、半月形石刀(石庖丁),以及海流等等,来论证从河姆渡到良渚文化间,有一支“江南人曾从海路迁到了日本,也有的主张日本弥生时代的环境聚落、长脊短檐的高床建筑、铜剑、坟丘墓、瓮棺葬、隔形土器和绢等等,都是江南文化传入日本的结果^⑩。

其实,研究海上文化交往,切勿忽视当时所能具有的地理知识、航海能力和传播的机制,进行考古类型对比,自应择取制作复杂,形制独特的器物为是,并结合两地间某些相同或相近遗物、遗迹地理分布的连续性和年代的依次递减现象来全面剖析,同时还应注意文化的共性与个性,以及相似生态环境下容易出现的文化趋同现象。

• 考古发现表明:玉玦并非以河姆渡文化最早,也非江南文化独有。辽宁省阜新查海遗址就有 8000—7000 年前的玉玦出土,喀左县山嘴子乡道虎沟也有夏家店文化的玉玦发现,说明日本绳文时代的石玦(玦状耳饰)应从辽宁经朝鲜传入。再如漆器,虽然目前是以河姆渡的漆碗年代最早,但我们应看到至迟在夏商之际,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漆器就已盛行,在辽宁夏家店下层文化中也已出现漆器,所以日本绳文晚期的漆器由江南传入之说难以成立。日本弥生时代的田木屐和木农具,不但和浙江宁波慈湖遗址所出年代相差达 2000—3000 年之久,而且形制也不相

同。^①至如河姆渡与日本形同实异的干栏式建筑,呈现出来的是文化的共性,把相距遥远,年代相差很大的中日两地个别类似器物来对比,研究方法本身就有问题。

固然,河姆渡和罗家角都已出现了水上交通工具,但全属小型独木舟,更不可能说当时已有帆船和木板船。尽管山东长岛曾发现过类似崧泽文化的陶釜(见下文),广东曲江石峡遗址有与良渚文化相类同的陶器、玉器和石器出土,但这应是陆上文化传播的产物,并非海上文化交往所致。虽然舟山群岛有河姆渡遗址第二、第一文化层和良渚文化遗址分布,可确认当时先民已涉足海上,然舟山群岛紧挨大陆,勿需导航技能,绝不能与远航日本列岛相提并论。江南地区的土墩墓和日本弥生时代的坟丘墓,仅有相似的封土堆,而死者的葬具、葬式和随葬品完全不同,显非由吴越驾舟渡海传入。日本佐贺吉野ヶ里的环壕聚落与中国常州武进淹城的形制也是大异其趣。事实上,日本带有三重环壕的聚落不但在韩国庆尚南道检丹里有发现,而且最近在福冈县甘木市的平冢川添遗址也已揭露出六重环壕的大型聚落^②,故日本的稻作文化由吴越先民从长江口直接渡海传入之说无法令人信服。

其实,朝鲜半岛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就同中国东北地区有着密切的文化交流,是悠久的中华文化传播日本的文化桥梁,这已为众多的考古发现所证实。然就传入日本的“稻米之路”问题,我以为山东半岛很值得重视。山东的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及至岳石文化遗址中曾出土过有段石镞、贯耳壶、玉钺、玉锥形器,玉环、玉琮、半月形石刀,角质鹤嘴锄等属崧泽至良渚文化或稍后的遗物,长岛县庙岛群岛海域还发现过类似崧泽文化陶釜,而在江南的上海福泉山良渚文化遗址也出土过典型的大汶口文化陶背壶,浙江嘉兴雀幕桥良渚文化墓葬中也有山东龙山

文化陶鬲出土,足证长江下游至迟在崧泽至良渚文化时,已同山东史前文化有了交往。而在朝鲜半岛发现最早的稻谷遗存是在韩国南汉江骊州郡欣岩里遗址,年代为公元前 1260 年;其次是朝鲜平壤市三石区的南京遗址,年代为公元前 900 年左右;再其次为韩国扶馀郡的松菊里遗址,年代为公元前 600 年前后。此外,在韩国金海市府院洞和会岬里及陕川凤溪里、晋阳大坪里、山清江楼里等地,也有无纹土器文化时期的炭化稻米或印痕发现。^⑩日本的稻作农业始自何时?以前森荣一教授曾提出了绳文中期农耕论,贺川光夫教授也有绳文后期农耕论之说。1994 年初,高桥护教授在本岛的冈山县真庭郡美甘村森谷姬笹原遗址绳文时代中期陶片的胎土中,发现有距今约 4500 年的稻叶植物硅酸体,轰动了日本列岛,高桥氏支持了稻作农耕起源于绳文中期的主张^⑪,自应值得足够的重视。不过,此说目前争论较大,尚待学术界加以确认。大多数学者仍认定日本早期的炭化稻米多集中在与韩国隔对马海峡相望的九州北部发现,主要有福岡板付、曲久田和佐贺菜畑遗址下层,年代为公元前 450—400 年左右。然就我们看来,诸如石庖丁(半月形石刀)之类工具在绳文晚期业已出现,而弥生时代早期的石制和木制农具又已很先进发达,在他之前必有一段孕育和萌生的发展过程,故定日本稻作农业约始自距今 3000—2500 年前谅无大错。尤应注意的是,山东、朝鲜和日本发现的稻米都属短粒型的梗稻,因此,日本的稻作农业由韩国传入是可以定论的。

1989 年严文明教授曾从山东半岛、朝鲜半岛和日本九州的生态环境,早期稻谷分布和年代序列研究,提出了传入日本的稻米之路,“最大可能是从长江下游——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九州再到本州,这样一条以陆路为主,兼有短程海路的弧形路线,以接力棒方式传播过去的”主张^⑫,近

年又在大连的大嘴子遗址发现有距今 3000 年前的粳稻遗存^⑩, 严说可谓卓识。不过, 有些迹象颇值得深思: 首先, 朝鲜半岛最早的稻谷遗存是出土在韩国的欣岩里遗址, 年代不但早于靠北部的朝鲜南京遗址, 而且也比辽东的大嘴子遗址要早, 如稻米由辽东传入朝鲜及至日本, 则年代上的逆转现象难以解释。同时辽东纬度偏高, 早先传承的农耕经济是以种粟为主, 缺乏充分的种植水稻的生态环境, 而长岛史前则主要是采集渔猎经济。再者学术界公认有段石镞起源于河姆渡文化, 至良渚文化时获得空前发展, 大致在新石器时代末至商代, 江南地区出现了凹槽型有段石镞, 西周晚期至春秋又为凹槽形铜镞所代替, 尔后逐渐走向衰落。其器形发展演变序列是: 隆脊形——弧背形——斜脊形——台阶形——凹槽形。在珠江三角洲还出现有一种与台阶形同时或稍晚的有肩有段石镞。我们要提请大家注意的是: 山东和苏北大汶口文化的先民曾出现头部人工变形的拔牙及猎头习俗, 大汶口文化晚期还发现有弧背形、斜脊形和台阶形共存的有段石镞。同时在王因、呈子、大汶口遗址的一些墓葬中: “往往发现有朱土、红烧土渣和朱色痕迹”的特殊现象^⑪, 迨至青铜时代早期, 山东的大汶口和五莲县兰玉村都已发现了凹槽形有段石镞。而在朝鲜半岛和日本的绳文时代晚期也流行拔牙之俗。尤其是朝鲜平壤至汉城一带, 也常有斜脊形、台阶形和凹槽形有段石镞出土, 往南到汉江和锦江流域及光州、釜山一带, 则多为凹槽形和少量的台阶形有段石镞, 其自北向南传播和年代依次递减现象明显, 以致传入日本九州时则几乎全为凹槽形有段石镞(只福岡市内有少量台阶形有段石镞出土)。

更为重要的是, 本文的第一作者于 1994 年 9 月 13 日, 曾在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博物馆仓库藏品中, 发现有韩国庆尚北道庆州出土的二件无纹陶器时代的靴形石刀, 其器身扁平, 形如尖

锋状的靴形,通体磨光,色呈青黑。其中一件(京大编号:4390)稍大,器身一侧和下端均有双面刃,另一侧之中对钻有二个小圆孔,以利安柄捆扎。下端刃部微弧,“靴”前端尖刃稍残。通高15.7,上柄端横宽4.2、厚0.5,下端刃残宽7.5厘米(图1)。另一件(京大编号:2432)基本完整,器身较小,无钻孔。刃部在下端,为双面平刃,尖锋。通高10.2,上柄端横宽3.8,厚0.5,下端刃部宽9.4厘米(图2)。细审其形制和安柄特点,前者与1984年7月余杭市长命乡凤山出土的靴形石刀(图3),后者也与1986年6月余杭市石鸽乡出土的靴形石刀基本相同(图4)^⑩,它和半月形双孔石刀(实应称为石铎)一样,当是良渚文化或其后续北传朝鲜半岛的产物,此中蕴含的历史信息,大可玩味。

《汉书·地理志》载,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民“田、蚕、织作”。《诗经·商颂》也有“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的记述,而在殷代小型木板船也已出现。春秋时地处山东的齐国已通过海路由朝鲜输入文皮、毡服等,《说苑·正谏篇》也载:“齐景公游于海上而乐之,六月不归。”综上,说明至迟在春秋时享有“海上王国”之称的齐国,早已具备横渡黄海到达朝鲜的航海能力。再从《晋书·五行志》所记的“孔子履”可知,良渚文化的木屐也早已传入山东,朝鲜和日本所见的木屐当由此传入^⑪。再者,山东古为东夷居地,而东夷(如少昊)为鸟图腾崇拜,也早为学术界首肯。《礼制·王制》称:“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后汉书·东夷传》也说东夷“喜欢酒歌舞”,而古文献中则往往把倭人和南韩史事记在“东夷”条下,似也暗示其人系出自东夷。同时朝鲜和日本不但古代有鸟灵、鸟生信仰崇拜和文身习俗,而且马韩人也是“俗喜歌舞饮酒”,“儿生,欲令其头扁,皆押之以石(即头部人工变形)”;倭人更是“性嗜酒”,“冬夏食生菜”,“男子黥面文身”。

此外,在山东大汶口、邹县野店、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和日本佐贺吉野ヶ里都发现有猎头习俗,吉野ヶ里遗址 1002 号瓮棺内壁,还见涂抹朱色的特殊现象。

上述迹象大多数不见于辽东半岛,这向我们透露出山东和朝鲜及至日本古文化的亲缘关系。因此,与之同时或略有早晚的东传日本的稻米之路应是:长江下游——山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九州^⑧。至如秦代方士徐福率船队入海访求仙丹灵药而到达日本之说,也正是从江苏连云港至山东琅琊一带起航,横跨黄海顺韩国沿海一带到达日本的,也可为我们上述的稻米之路作补证。

四、越人向台湾的海外文化拓展

自台湾与大陆分离,成为我国东南海上的岛屿之后,由于她地处亚洲大陆与东南亚海岛的衔接地带,因之研究大陆与台湾的海上交往问题,便成为我们打开中国古代沿海先民与太平洋岛屿文化圈奥秘的一把钥匙。

台湾与福建隔海峡咫尺相望,最近距离仅 130 公里,毗邻的地理和相同的生态环境,尤其是越人娴熟的操桨驾舟技艺,更使之成为海上文化交往的先驱。早在 1943 年日本的金关丈夫和国分直一教授就曾指出,台湾的史前文化中有经过大陆东南沿海传入台湾的南方要素。鹿野忠雄教授也主张“台湾先史文化的基层是中国大陆的文化,此种文化曾分数次波及台湾^⑨”。张光直教授还提出台湾“龙山形成期文化”是由大陆不同的地方先后渡海而来的主张。台湾著名考古学家宋文薰教授进而推测台湾的南岛系民族(史前文化主人)从不同的故地,不同的时间来台后,割据自己的领域,保存或发展着自己的文化^⑩。随着海峡

两岸考古与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上述论点大多已得到学术界的公认。

台湾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以位于台北县八里乡大坌坑遗址命名的大坌坑文化,距今年代约为 7000—6000 年^④。美国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认为大坌坑文化的主人同大陆东南海岸的河姆渡文化一样,“都是住在类似的自然环境中,从事农耕外多种食物采集活动的同样的早期谷物农民”。大坌坑文化的陶器,“器口中侈,常在唇下有一圈凸起脊条,与河姆渡的相似”^⑤。William Meacham 则推测台湾大坌坑文化很可能是一群演变自以江西万年仙人洞,也许还有广东内陆的翁源和灵山,以及北越的一些遗址所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华南新石器时代中期地域性文化之一,可称为“越海岸新石器时代文化”^⑥。也有学者明确提出早在在大坌坑文化之时,大陆的东南和华南地区就同台湾有了文化交往。然就我们看来,此说倘指少数渔民于恶劣天气中在海上捕鱼,不幸连船带人被大风吹到台湾,当不可排除。但问题是有的学者是指族群有意识地迁居台湾,这样就不仅应辨明其迁徙的原因(何以作此冒险之举),而且其故地文化也必然会在台湾原始文化中反映出来,故上述主张的证据尚嫌不足。事实上大坌坑文化呈现的所谓大陆史前文化因素,是因在两地相似生态环境下,而出现相似的绳纹(器形并不相同)和渔猎采集活动,属于文化的趋同现象,何况当时先民所能具有的地理知识并不清楚,航海技能也不足以远航。

如果说大坌坑文化同大陆已有文化接触之说尚待今后的考古发现加以确认的话,那么继其之后分布在台北地区的芝山岩文化(下层距今年代约 4000—3000 年)和园山文化(距今年代约 4200—2000 年左右),以及分布在西海岸中、南部以绳纹红陶为主的牛骂头、牛稠子(均距今年代 4500—3500 年之间,部分文化

上限接近 5000 年)和营埔文化、凤鼻头文化(均距今年代为 3500—2000 年),已同大陆有着海上交往则是勿庸置疑的事实。藏振华、刘益昌先生对此早有论证,令人信服。钟礼强先生也通过对福建闽侯县昙石山文化的全面研究后指出,昙石山文化与园山文化及凤鼻头文化中的陶器无论从制作质料,颜色到工艺,还是彩绘纹饰和部位都很相似,两地所体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也很相近^②。在台北芝山岩、台中营埔里、台南屏東垦丁(距今年代约 4500—3500 年)等遗址中都发现过炭化稻米,说明其时的大陆稻作业已传播到了台湾。尤其是芝山岩、园山、卑南和凤鼻头诸文化遗址中,普遍发现彩绘陶片、小石铳、有段石铳、有肩石斧、石镰、半月石刀、蚌器、贝壳饰品及几何形印纹陶等等(图 5),都是浙、闽、粤新石器时代晚期及至青铜时代常见之物。如台湾所见的彩绘陶在浙南的瑞安山前山(图 6)、福建的寿宁、福安、周宁、闽侯昙石山、福清东张、厦门灌口等地都有出土。

黄士强教授曾列举了芝山岩出土的彩绘陶和陀螺形木器、黑皮陶、红衣陶、骨镖、角质鹤嘴锄和钩状器等等,同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中的同类器进行对比,因而认定“在台湾找不到芝山岩文化的祖型”,上述“要素不应是独立发生的,而是传播的结果”。“它的持有人来自中国东部或东南沿海,尤其浙闽地区的可能性很大。”^③笔者欲予补充的是,芝山岩遗址出土数量多而形制特殊的内底带半环形钮的器盖,在河姆渡遗址第三层就有其祖型出现(图 7)。园山文化和台东卑南文化遗址中发现的扁圆形带一缺口的玉玦、玉管、玉环和玉耳饰等,都可以追溯到大陆史前江南文化中的同类玉器,前三种屡见于崧泽和良渚文化,而玉耳饰最近在浙江余杭星桥乡的两座良渚文化墓葬中也有出土^④(图 8)。不过,我们并不能由此肯定芝山岩文化的主人是当时大陆族群直接迁居台湾的结果。尽管已有迹象

表明良渚文化先民确曾与山东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先民发生过战争,导致良渚晚期先民被迫他迁,而且大陆东南沿海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和航海技术都已有了长足的发展,具有向海外拓展的动力和条件。但如主张“在台湾找不到芝山岩文化祖型”,恐与史实不符。因上述所举芝山岩的大陆文化因素并不占主流,故芝山岩文化实应由大坨坑文化发展演变而来。藏振华先生在论述台湾细绳纹陶文化来源时指出,不能仅据不同文化间器物特征的比较,用“移民”或“地区演化”等单一的模型来作解释,而必须从自然环境、人地关系和族群互动等多重因素相互作用所形成的过程作考量,才能获得更具可信性的解释。^④此说颇有见地,值得重视。

除此之外,台东卑南文化墓地出现的拔牙、猎头和西海岸中部番仔园文化流行以陶器覆盖死者头部的习俗,台湾各地常出土的靴形石器及其后的干栏式房屋、纹身习俗等等,均应是大陆越文化传播的结果。

园山文化和卑南文化屡见的那种外缘带有四个小突块(或称花边)的玦形耳饰,不但在广西田东、锅盖岭、平县银山、广东曲江石峡和香港大湾遗址找到其渊源所在,而且在浙江衢州西山西周土墩中也有发现^⑤。台湾习见的玉玦在福建闽侯黄土仑和广东曲江石峡等遗址都有出土(图9)。园山文化出现的有肩石斧,更向人们昭示它同广东沿海和香港地区的亲缘关系。不过,我们应注意到台湾普遍发现的有段石铤大多属台阶型和凹槽型,有的横断面呈梯形,也有少数近似三角形,显属有段石铤晚期形式或变种,而且有的往往同有肩石斧、彩绘陶及至印纹陶共存,表明她同大陆文化交往的时间不可能太早。结合良渚文化之时已有了筏和大型独木舟分析,笔者主张台湾与浙南、福建、粤东沿海先民的海上文化交往,最早当不超过距今5000年

前。

五、越文化对东南亚太平洋岛屿文化圈的传播

台湾凌纯声教授在《论夷越民族》文中,曾指出从非洲东海岸起,到印度洋和太平洋间各岛屿及至南美洲西海岸的各地土著文化中,至今尚保留有中国古代夷越文化的因素^②。国外学者如柯灵顿(R. H. Codrington)、佛累则(J. G. Frazer)等众多研究者,早年也曾提出过太平洋群岛的民族在文化起源上,与西太平洋海岸民族有关。^③显然,对此问题的研究,理应引起我们的深思。

早在 1761 年法国汉学家德吉尼斯(J. De Duignes)就提出了中国人早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前 1000 年就已到达美洲(即“扶桑”)的主张。这一学术新论曾得到中国学者诸如章太炎、兴公、陈志良、朱谦之等先生的支持。直到 1947 年韩振华教授的《扶桑国新考证》和 1962 年罗荣渠教授的《论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的问题》大作发表后^④,上述观点才在国内受到了强有力的批驳。

1975 年冬,由于美国加利福尼亚海底发现了据说可能已沉睡 2500 年之久的所谓中国古代“石锚”后,因之这一早已否定的问题被重新提了出来。房仲甫先后多次发表了文章,率先对这曾有怀疑的石锚年代和国别进行肯定,进而主张它是 3000 年前中国殷人扬帆东渡美洲的物证^⑤。石氏认定距今 3000 年前地处中国东南沿海的越人船队,已可驶向东南亚和南太平洋群岛及至美洲大陆,北美发现的中国船锚,充分说明了这个事实^⑥。

而对此问题研究最为全面系统的要数卫聚贤先生长达百万字的《中国人发现美洲初考》皇皇巨著^⑦,不过我们细审其所附

的照片实证后则大生疑惑。如卫著所记在墨西哥出土的被认为是殷人东渡美洲后为表示不忘宗庙之意,在一陶片上刻下的 23 个“亚”字,其实应是陶器上的装饰花纹。1926 年秘鲁利玛发现所谓秦代徐福出海携去的银铸“半两”钱币也大成问题。至如所谓墨西哥发现的汉玉璧和秘鲁石壁上的“木武本”、“遂为纪”刻石纪名及所引《春秋》中的“六鷁退飞过宋都”之说,更有哗众取宠之嫌,盖不足信矣。近年张小华在《中国与大洋洲、美洲古代交往的探讨》文中^⑧,更忽视了某些因用途或功能相似而呈现出的文化趋同现象,有的“物证”则是断章取义,甚至是建立在学术界早已否定的基础上,便作出 6000—4000 年前中国的夷人或越人已航渡美洲和大洋洲的论断,着实令人惊诧。如被张文认定由美洲传入中国的主要物证花生和钩纹皮蠹虫问题,浙江钱山漾遗址出土的良渚文化“花生”,当时仅作外形鉴别,争议很大,目前也未作籽粒或切片科学鉴定。而与“花生”共存的“芝麻”和“蚕豆”,前者已重新确认为小泡瓜籽粒,而后者则应为皂荚之类^⑨,故其是否可确认为花生值得怀疑。尽管近年在陕西汉景帝阳陵陵园的第 17 号从葬坑中,又发现了十几颗花生^⑩,但我们认为应再请植物学家作科学鉴定确认,并揭示它与宋元以后引种的花生是否同一品种?有否前后承袭的遗传基因?倘我国在 6000—4000 年前已种植花生或者是从南美引种花生,其后应有连续种植过程,而为古文献所载录,何以直至宋元间才有花生与番瓜、红薯之类从海上诸国引入的记载?再如钩纹皮蠹虫原产美洲之说,也早被我国昆虫学界否定,不能以此作证据。^⑪

笔者在 1988 年即对上说提出商榷^⑫,现在被用作“实证”的石锚,美国史学家已证实是 19 世纪居住在加利福尼亚的中国渔民所遗,因之上述诸说便不攻自破。

1991 年,美国俄勒冈州大学人类学系主任杨江先生又主

张：“早在 6000 年前，马来一波利尼西亚人的祖先开始从中国的福建省出发，进行了长途的迁移运动。他们向南行进穿越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尔后分两个方向迁移。一路向西，到达马达加斯加；另一路向东，到达夏威夷和伊斯特岛。东徙的年代表如下：距今 6000 年前，到达中国东南部及台湾；距今 5500 年，到达婆罗洲、帝汶岛；距今 4500 年，到达印尼所罗门群岛新纳亚；距今 4000 年，到达西密克罗尼亚群岛；距今 3500 年，到达斐济；距今 3000 年，到达萨摩亚群岛；距今 1700 年，到达马贵斯群岛；距今 1600 年，到达伊斯特岛；距今 1400 年，到达夏威夷；距今 1100 年，到达新西兰。”^④遗憾的是，我们无法在杨先生提纲式的文中找到对此问题论证的详细根据，而按我们对各地考古实物和文化人类学资料的认识来看，杨先生提出的迁徙年代等问题，也尚待新的资料加以证实。不过，杨先生提出西方研究东南亚与太平洋岛屿的学者，应与东方研究百越文化的学者之间，建立起紧密联系，加强中西方学者合作的呼吁，我们却是十分赞同的！近年王大有等人又把美洲奥尔梅克玉器上的图案，考订为殷商文字，证明是殷末将领率众东渡美洲，将中华文明带到新大陆。^⑤然奥尔梅克文化拉文塔(La Venta)遗址发现的玉版实属图案装饰，并不是什么殷商文字，龚缨晏先生已有匡谬^⑥，此不赘述。其实，研究海外文化交流既不能脱离严谨科学的考古文物实证，同时还应结合民族学、语言学、民俗学、体质人类学和造船与航海史等多学科研究，辨明文化的共性与个性，并借助某些自然科学手段，也许才能揭示历史的原貌。

早年台湾杨希枚教授和助手曾对 40 年代以前在河南安阳殷墟祭祀坑中出土的 400 具人头骨研究，将大约 225 具较完整的标本划分的五类型。指出其中的第 I 型(约 80 具)为典型的蒙古人种类型；第 II 型(约 38 具)为太平洋尼格罗人种，与现

代巴布亚人和美拉尼西亚人头骨相似;第Ⅲ型(约2具)为欧洲人种,与现代英国人头骨相似;第Ⅳ型(约55具)为爱斯基摩人种;第Ⅴ型(约50具)则怀疑与波利尼西亚人头骨相近(但也可能是上述类型中的某一类女性头骨)。然据韩康信、郑晓瑛的研究结果,表明殷墟祭祀坑中的人骨最多的应为东亚成分,其次为北亚的,近南亚的实属少数^④。

自19世纪末叶以来,便有不少民族学家、语言学家和考古学家通过对分布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屿上的南岛语系诸语支的研究后,认定构成南岛语母体的前南岛语支发源于台湾,而其更早的渊源则可追溯到中国的大陆南部沿海。前南岛语由台湾传入菲律宾后,逐渐形成马来一波利尼西亚语支,并慢慢扩散到爪哇、苏门答腊、马来亚、越南等地。该语区向南移动形成中央马来一波利尼西亚语;向东移动形成东部马来一波利尼西亚语,尔后并广布到密克罗尼西亚南部、美拉尼西亚东部及整个波利尼西亚。考古学家贝伍德(Deter Bellwood)则进一步提出:“公元5000年后期由华南大陆(也许是浙江、福建)来的原始居民进入台湾,原始的南岛语进一步扩展之前至少在台湾岛使用了1000年、在公元3000年前后讲原始南岛语的民族进入吕宋岛,前南岛语(它是在台湾原始南岛语消亡时形成的)分裂为台湾与马来、波利尼西亚两个语支,前南岛语系的诸民族拥有驯化的猪、狗,能够耕种水稻、粟和甘蔗。考古学的证据有陶器、树皮衣、石器与骨器(收获用的刀、抛射用尖状器、石铤)等。”^⑤梁钊韬教授还就波利尼西亚语中的水神Tangaroa来源进行稽索,指出Tangaroa与广州方言“置家佬”读音相近,而“置家”应是古代闽越沿海“但”人之后,正是越人的一支,“置民迁移到太平洋群岛的年代,可能在西汉至南北朝期间”^⑥。我们从中国东南沿海古代先民与东南亚及太平洋岛屿文化圈的文化习俗、农耕方式和宗教

信仰,如干栏建筑,以水牛或象踏耕耨田,擅长舟楫、拔牙、文身、猎头、食人、崖葬、占卜、蛇图腾、鸟图腾和祖先崇拜等等,也都显示出较大的共性和亲缘关系。

当然研究海外文化交往的关键,是绝不能离开考古文物的实证,大洋洲的古文化并非单一来源,情况相当复杂。如分布在新几内亚的穆绍岛以东,波利尼西亚的汤加、萨摩亚以西,中间包括美拉尼西亚群岛大部分地区在内的拉皮塔(Lapita)文化(公元前1600—前500年)的内涵^⑨,虽有若干东南亚文化因素,但总体上与澳大利亚较为接近。密克罗尼西亚群岛则与菲律宾的古文化有着亲缘关系,且有自西向东及向南发展趋势。而对此问题的研究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应首推海洋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之一——有段石铳。

早在30年代,对东南亚考古学和民族学素有研究的德国学者海涅·格尔顿(Robert Heine Geldern)就曾提出了有段石铳是台湾传到菲律宾及苏拉威西、波利尼西亚等南群岛去的主张,并指出波利尼西亚有段石铳及大洋洲的有些古文化应起源于中国。日本学者鹿野忠雄也认定波利尼西亚有段石铳是由华南、华中的民族及文化移动而传入,华南古文化研究的重要性不但对东南亚、甚至对波利尼西亚都有关系。菲律宾的人类学和考古学家拜耶(H. O. Beger)也赞同太平洋的有段石铳是由菲律宾传去,至于菲律宾则是由大陆传去的。在海丰、香港以及福建南部和台湾等处的发现,都表明与菲律宾的确有关系的,菲律宾是这种石器传入太平洋的通路。1938年林惠祥教授在出席“远东史前学会第三届大会”的论文中,也曾指出中国大陆发现的有段石铳和台湾、菲律宾、甚至波利尼西亚的很相同。中国东南部的史前文化与华北有异,而和南方的马来西亚以及波利尼西亚有关。林氏曾把有段石铳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认为它首先发生

于中国大陆东南区的闽、浙、粤、赣和苏、皖一带,然后北向传于华北、东北、东南面则先传入台湾及至菲律宾与波利尼西亚诸岛。^③

根据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浙江的河姆渡文化是有段石铤的起源中心。^④菲律宾的有段石铤平面多呈梯形,器身两侧向内斜杀尤其,横剖面多为梯形,少数呈三角形,有台阶和凹槽形,也有背部中间突一横脊,再在中间琢一纵向凹槽的特殊器形,均属有段石铤的退化型式或变种。拜耶先生认为菲律宾的有段石铤,年代较早的属公元前 1250—公元前 800 年,较晚的约公元前 500 年—公元前 200 年左右。然据 1970 年罗·达夫(Roger Duff)的论著可知,吕宋岛东南阿尔贝(Albag)的福克斯(Fox)和埃文吉里斯塔(Evangelista)的瓮棺葬中,仍然还有衰退形的有段石铤出土,碳十四测定年代仅为公元 100 年^⑤,可知其结束时间很晚。

印度尼西亚的有段石铤见于东部的苏拉威西岛和爪哇岛,有退化变异的台阶形、凹槽形及斜脊形,数量不多,从其横剖面呈梯形和三角形看来,显由菲律宾传入,年代应更晚。

太平洋中的波利尼西亚诸岛的有段石铤均显示出它由菲律宾传入的亲缘关系。按海涅·格尔顿的研究,知其在夏威夷、马奎萨斯、社会岛、库克群岛、奥斯突拉尔岛、塔希地岛及至大洋洲的新西兰和查塔姆岛都有分布,甚至在太平洋东部智利复活节岛(Easter Is.),以及南美洲的厄瓜多尔也有发现。大凡波利尼西亚诸岛有段石铤的特征往往是器身长,中脊高,分段显明,横剖面有四角、三角、圆形等,在大赫岛还有一种在背面和正面都制成台阶状的有段石铤,新西兰也有一种柄部之中分别琢一较宽的横向弧形凹槽及一纵向窄槽,这也均属有段石铤的变种形式,年代应比菲律宾更晚。它曾在当地使用了相当漫长的一段

时期,甚至直到西欧早期航海家发现这些岛屿时,有段石铤仍然还是波利尼西亚诸岛土著的主要生产工具。饶有趣味的是,不但其地有段石铤还保留有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许多特征,甚至连安装捆绑有段石铤的木器柄也同河姆渡文化所发现的很相似,只是其柄部多刻花纹装饰,制作更精更高级罢了。

至于环中国南海文化交往问题,据 Terrien de Lacou Peris 考证,在公元前 425—375 年前后,印度航海者大都由马六甲海峡、经苏门答腊及爪哇之南,以抵中国海岸,输入印度洋和波斯湾的珍珠、玛瑙等物。Heine Geldern 还主张中国的商人及移民早在汉朝业已定居生活于印度尼西亚。^③又按《汉书·地理志》记载,番禺“处近海,多犀、象、瑇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1983 年 8 月在广州象岗山发掘的南越王墓中,曾出土有一批珍贵文物,其中的大象牙器犀角、银器、玻璃器、以及玛瑙、琥珀、水晶、玻璃等多种质料的珠饰,有些可能“是从中亚或南亚等地输入的”。^④笔者欲予指出的是,南越王墓中随葬的银盒(图 10)其上下腹部压印的花瓣式装饰,几乎与伊朗首都德黑兰博物馆所藏公元前四世纪银盘(图 11)完全相同。它和五枚经确认为非洲象齿的原支大象牙一样,可能原产自古波斯一带,尔后经中南半岛商贾转手,由海外贸易输入的。而山东临淄齐王墓出土的同类银盒,似由南越国传入,由此可印证《淮南子·人间训》所记秦时的南越有“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之利史实。足见秦时同中南半岛诸国的海上航线已开通是毋庸置疑的。近年在南海西沙群岛的甘泉岛上发现瓮棺遗址及有肩石斧(距今约 3000—2500 年)等史前遗物和战国、秦汉时期的文化遗物(图 12),正是这条航线的有力注脚。^⑤西汉武帝时的船队之所以能远航到南印度和斯里兰卡一带,应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但这也并非南海海上交通之始,据《韩诗外传》、《尚书大传》

等书记载,早在周成王时,居住在交趾之南滨海地区的越裳氏,就通过重重翻译(“九译”或“三译”)远贡“白雉于周公”。《左传·襄公十三年》有楚“奄征南海,以属诸夏”之说。古本《竹书纪年》有越王派公孙隅向魏进贡舟、箭和犀角、象齿的记载;而在浙江鄞县甲村石秃山出土战国之时的一件青铜钺(图 13),其上所镌印的两条两头相向、尾向内卷的龙图像^⑤,与越南东山一件铜斧上的图像(图 14)几乎相同^⑥,似是同越地文化交流的产物。当然,中南半岛诸国同中国华南地区的交往,至迟可上溯到新石器时代,根据傅宪国先生对华南有肩石器的研究表明,“有肩石器在广东珠江三角洲发源后,主要是循中国南部海岸西行,经广西而入云南及中南半岛诸国、马来西亚及南亚的印度和孟加拉”^⑦。又据宋文薰教授对台湾及环中南海史前时代玦形耳饰研究可知^⑧,玦形饰在中国华南、香港和台湾地区越南、泰国、老挝、沙劳越、菲律宾等地都有发现(图 15),早期为玉或石质,玦身为带一缺口的扁圆形,外缘有三或四个突块或花边,晚期为石、软玉、玻璃或贝壳等的质料制成,玦身呈扁钩状,外缘突块尖长如钉。一般认为它是起源于越南中部,但从广东曲江石峡遗址,广西田东锅盖岭遗址、香港大湾遗址和浙江衢州西周墓所出属早期类型的玉质玦形耳饰,似可以定中国的华南为其起源中心,尔后向浙江和环中国南海传播的。再如越南东北文化和马来亚等地普遍发现的印纹陶,尤其是韩槐准先生在马来亚柔佛州、哥打丁宜采集的一批印纹陶,韩氏认为“与近年中国东南沿海地带发现之印纹硬陶成器,或碎片,其花纹极相同”。同时又进一步提出:“可能殷商时代或稍后,我国烧制之印纹硬陶已在南洋交易。”^⑨安志敏先生主张是当地制作的,“年代大体与我国东汉相当”^⑩。彭适凡先生则正确地指出马来亚的印纹陶具有明显的两重性,其中大多数表现出浓厚的土著特色,少数“时代大体相当西周甚或更早”的印纹陶与中国南方相同或相似。^⑪然就我看来柔佛州所见的云雷纹、席纹、曲折纹和菱格填线纹等,

应属中国南方特点的印纹陶,年代为西周晚期至春秋(图 16)。结合笔者关于帆船出现于春秋战国之说剖析,传入马来亚的年代当不超过春秋之时,即距今 2800 年前后。

综上所述,本文小结如下:

1. 以前将河姆渡遗址第三、四文化层为代表的内涵,确立为“河姆渡文化”是完全正确的,而该址的第二和第一文化层内涵,宜分别称为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的宁绍类型。

2. 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有着悠久发达的造船业,至迟在良渚文化之时出现了筏和大型独木舟,而帆船的出现则始于春秋战国。

3. 传入日本的“稻米之路”应是:长江下游——山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九州。

4. 大陆与台湾岛的文化交往约始于距今 5000 年。

5. 所谓中国与大洋洲、美洲的古代交往始于 3000—6000 年前之说不足信。中国越文化传入台湾岛稳定一段时期后,在距今 3500 年左右开始传至菲律宾,可能在距今 2500 年前后又逐渐从菲律宾分别向东及向南传播,大致在距今 1000 多年前传至大洋洲的波利尼西亚。

6. 中国华南与马来亚的海上交往,约始于 2800 年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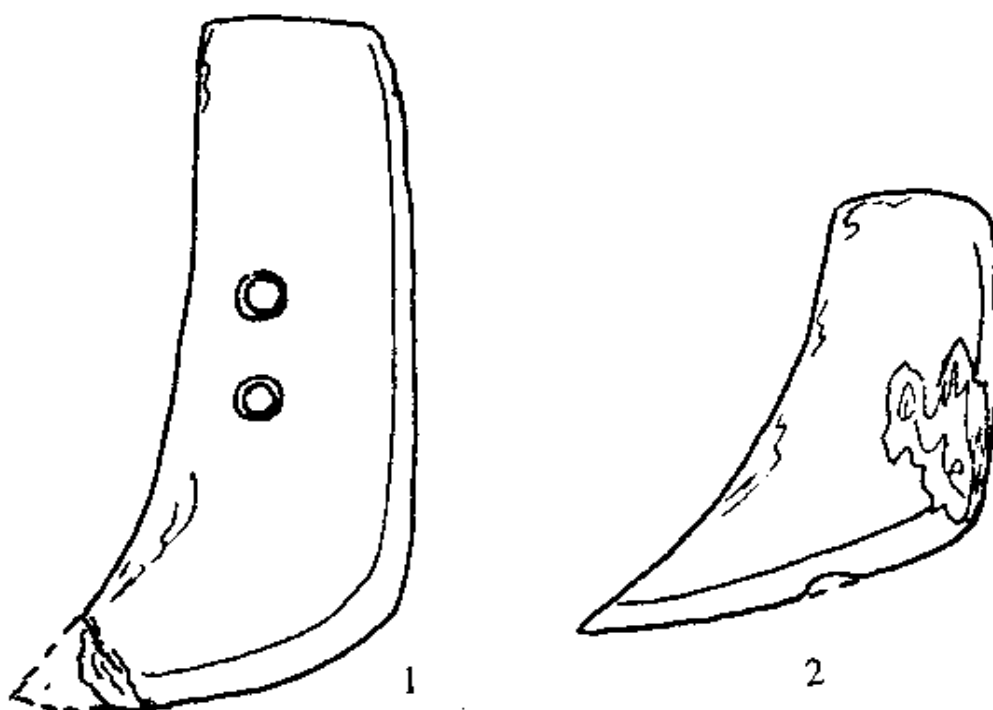


图 1、2 韩国庆州出土的靴形石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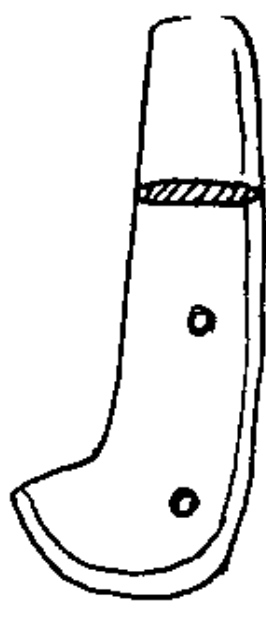


图 3 余杭长命长风山出土的靴形石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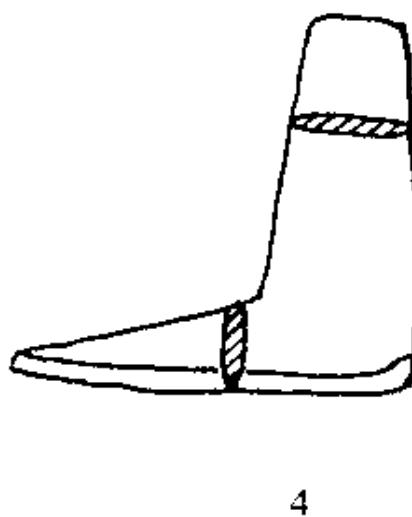


图 4 余杭石鸽乡出土的靴形石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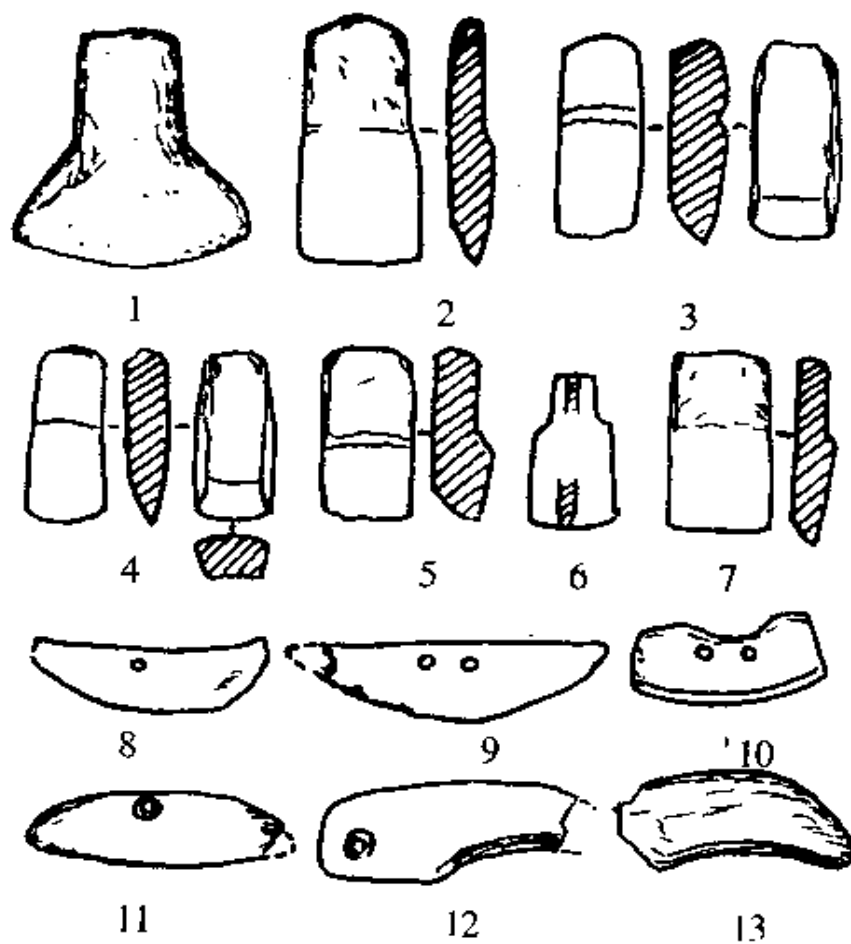


图5 台湾发现的有段石棒、有肩石斧、石镰和半月形石刀

1. 芝山岩遗址出土

8、9. 台中竹山采集

2、3、4. 台北采集

10. 台中大甲

5、7. 圆山护国神社采集

11. 高雄枕仔园采集

6. 圆山采集

12、13. 台东县都峦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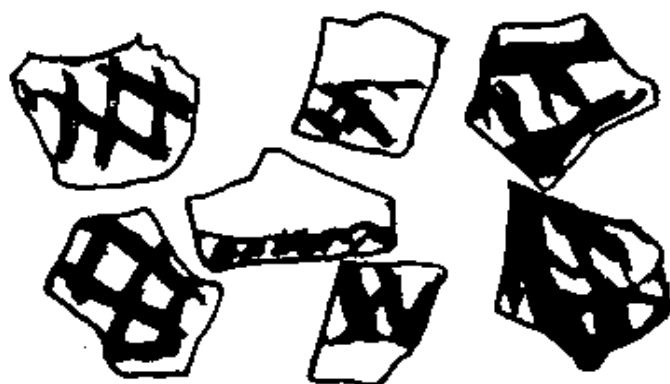


图6 浙江瑞安山前山发现的彩绘陶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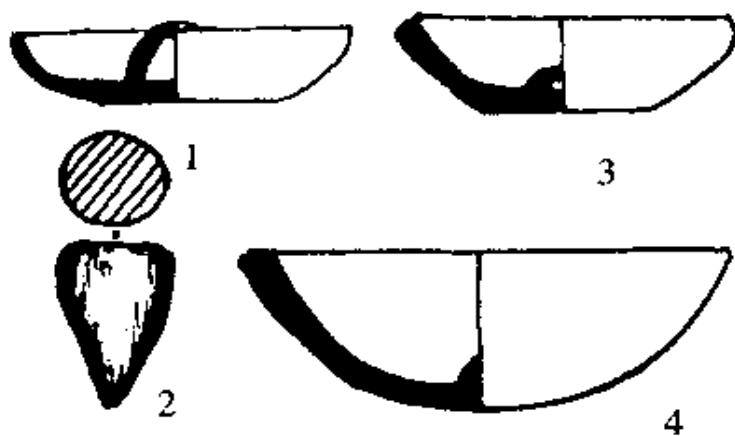


图7 河姆渡和芝山岩遗址出土文物

1. 河姆渡出土陶器盖 2. 河姆渡出土陀螺形木器
3、4. 芝山岩出土陶器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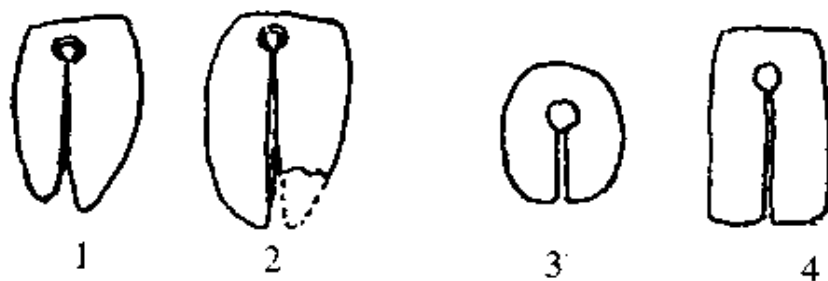


图8 良渚和卑南文化遗址出土玉耳饰

- 1、2. 浙江余杭星桥乡出土 3、4. 台湾卑南遗址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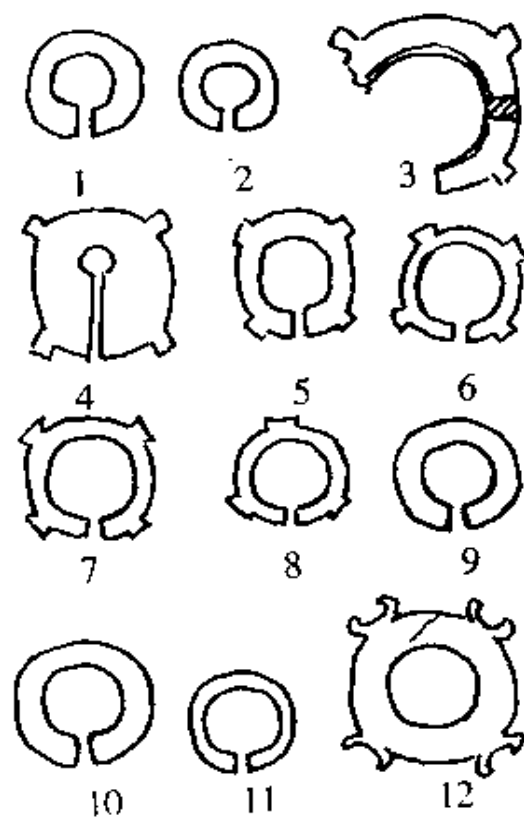


图9 台湾、福建、广东出土玉玦和玦形耳饰

1、2、3. 台湾蒙山岩遗址出土

4、5. 台湾卑南遗址出土

6. 台湾绿岛油子湖遗址出土

7. 台湾兰屿出土

8、9. 浙江衢州西山西周土墩墓出土

10. 福建闽侯黄土仑出土石块

11、12. 广东曲江石峡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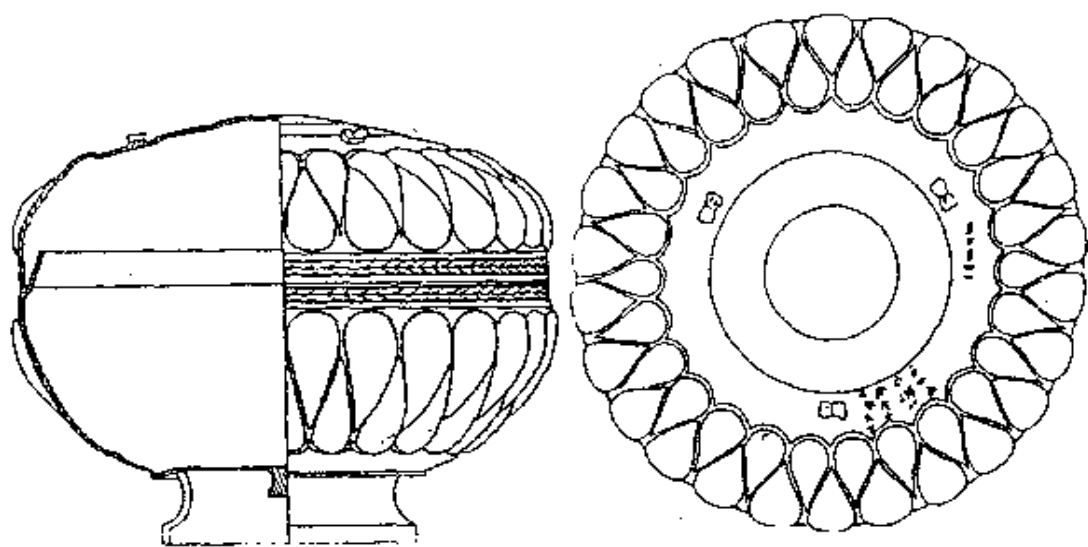


图 10 广州南越王墓出土银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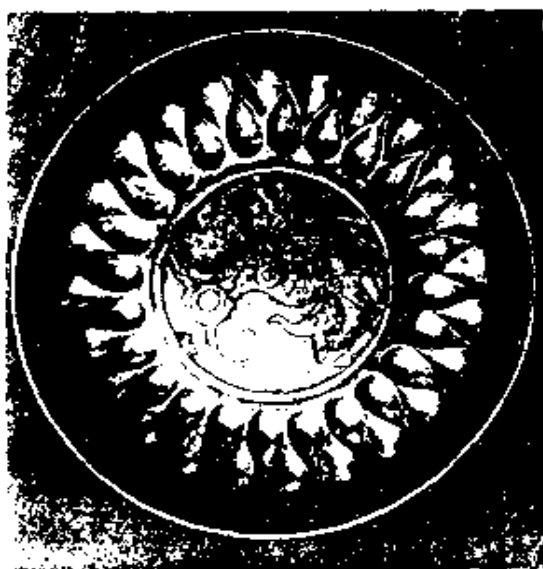


图 11 伊朗德黑兰博物馆珍藏
银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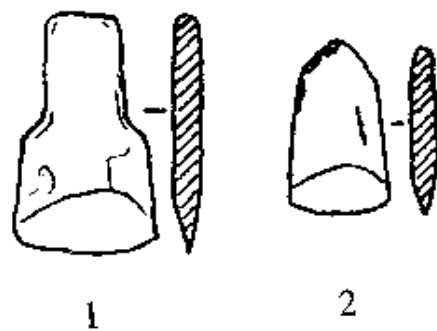


图 12 西沙群岛甘泉岛石器
1. 有肩石斧 2. 石斧



图 13 浙江鄞县出土战国铜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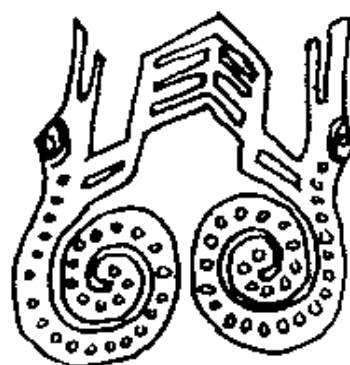


图 14 越南东山青铜斧上的图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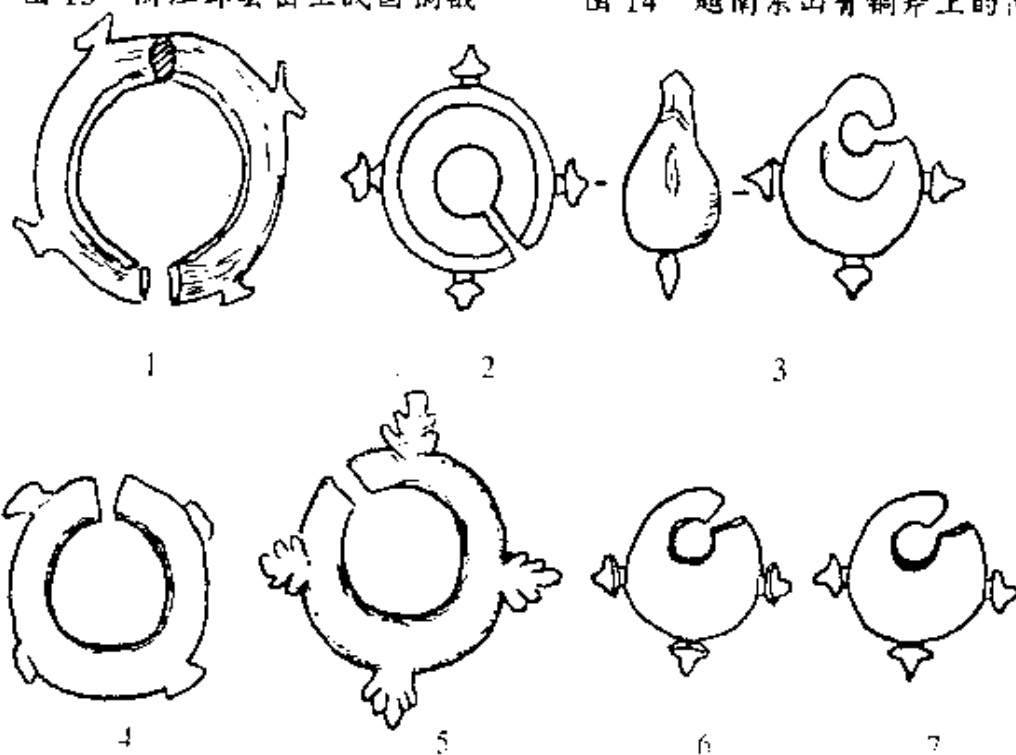


图 15 环中国南海发现的玦形耳饰

1. 台湾兰屿朗岛村发现 2、3. 越南中部 Sa-Haynh 文化发现 4、5、6. 菲律宾巴拉望岛出土 7. 沙劳越尼亚洞穴出土



图.16 马来亚柔佛州所见印纹陶

注释

- ①黄渭金：《鲞架山遗址发掘重要成果》，1994年12月4日《中国文物报》。
- ②夏鼐：《三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考古》1979年第5期，安志敏：《论河姆渡文化》，《河姆渡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提要》，1994年4月23日；严文明：《论青莲岗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关系》，《文物集刊》第1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汪济英：《良渚文化的回顾与探讨》，余杭县政协编：《良渚文化》，1987年，苏秉琦先生观点并见此文。
- ③牟永抗：《试论河姆渡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 ④吴玉贤：《河姆渡的原始艺术》，《文物》1982年第7期。
- ⑤转引自汪济英：《良渚文化的回顾与探讨》，余杭县政协编《良渚文化》，1987年。
- ⑥参见林华东《河姆渡文化初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浙江省文管会等：《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河姆渡遗址考古队：《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

1980年第5期。

⑦⑤林华东著:《河姆渡文化初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4月版。

⑧林华东:《中国风帆探源》,载《海交史研究》1986年第2期。

⑨林华东:《试论我国先秦时期的造船业》,载《中国水运史研究》1989年第2期。

⑩安志敏:《长江下游史前文化对海东的影响》,载《考古》1984年第5期;安志敏:《江南文化和古代的日本》,载《考古》1990年第4期;安志敏:《日本吉野ヶ里和中国江南文化》,载《东南文化》1990年第5期;周南泉:《试论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玉器》,载《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5期;王心喜:《江南地区远古居民航渡日本试论》,载《海交史研究》1987年第2期。

⑪⑩林华东:《话说木屐》,载台湾《故宫文物月刊》1991年9月号,总102期。

⑫见1992年12月15日《西日本新闻》(夕刊),又1993年1月8日《读卖新闻》(夕刊)。

⑬沈奉谨:《韩国にれけ为稻作农耕》,出席日本第30回埋藏文化财研究会论文1991年。

⑭《稻作起源于4500年前?》,见日本1994年3月21日《山阳新闻》;又1994年3月21日《每日新闻》;高桥护:《绳文农耕与稻作》,载日本《东亚古代文化》81号,1994年秋;高桥护:《再论绳文农耕的可能性》,载日本《东亚古代文化》84号,1995年夏。

⑮严文明:《再论中国稻作农业起源》,载《农业考古》1989年第2期。

⑯吴青云:《大连农业考古获重大发现》,载1991年10月13日《中国文物报》。

⑰李锦山:《东夷原始宗教概述》,载《东夷古国史研究》第1辑,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

⑱沈德祥:《良渚文化时期的主要耕作农具和部分石器的探讨》,载余杭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编《良渚文化》,1987年12月。

⑲林华东:《吉野ヶ里遗迹にみられる首狩りのアツアの文化》,载《东アジアの古代文化》67号,1993年7月版。

- ②林华东:《中国稻作农业の起源と日本への传播》,载日本第30埋藏文化财研究会出版的《各地域における米づくりの开始》1993年第3期,1991年8月24日日本福岡。
- 林华东:《中国·朝鲜·日本をつなぐ稻作の道》,载《东アジアの古代文化》74号,1993年1月出版。
- ③金关丈夫:《台湾先史時代に于ける北方文化的影响》;国分直一:《有肩石斧、有段铈及び黑陶文化》,均见《台湾文化论丛》1943年第1辑。鹿野忠雄著,宋文薰译:《台湾考古学民族学概观》,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出版,1955年。
- ④参见刘益昌:《史前时代台湾与华南关系初探》,载台湾《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三),1988年。
- ⑤臧振华:《试论台湾史前史上的三个重要问题》,载《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1989年第45期。
- ⑥张光直:《中国东南海岸的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载《上海博物馆集刊》1987年第4辑。
- ⑦转引自注⑦。
- ⑧钟礼强:《昙石山文化的生产方式与邻省区同期原始文化的异同》,载《南方文物》1993年第1期。
- ⑨黄土强著:《台北芝山岩遗址发掘报告》,台北市文献委员会印行,1984年。
- ⑩王云路:《余杭再次发现良渚文化大墓》,1993年6月6日《中国文物报》,东按:其墓年代属良渚文化中期偏早。
- ⑪臧振华:《略论台湾的细绳纹陶文化》,载《浙江学刊》1990年第6期。
- ⑫⑬宋文薰:《论台湾及环中国南海史前时代的玦形耳饰》,载台湾《中央研究院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1989年。
- ⑭凌纯声:《论夷越民族》,载《中国远古与太平洋、印度两洋的帆筏、戈船、方舟和楼船的研究》,(台)中研院民族所专刊之16,1970年。
- ⑮R. H. Codrington: The Melanesians, Studies in Their Anthropology and Folklore.
- ⑯韩振华:《扶桑国新考证》,载《福建文化》,1947年。

罗荣渠：《论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的问题》，载《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

⑤房仲甫：《扬帆美洲三千年》，见1981年12月5日《人民日报》。

房仲甫：《殷人航渡美洲再探》，载《世界历史》1983年第3期。

⑥石钟健：《古代中国船只到达美洲的文物证据——石锚和有段石铤》，载《思想战线》1983年第1期；杨喆：《中华民族的海洋文化》，载《海交史研究》1986年第2期；陈丽琼：《铜鼓船纹补释——兼论越人航渡美洲》，载《中国铜鼓研究第三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

⑦卫聚贤著：《中国古代与美洲交通考》，台湾新竹市说文书店1982年版。

⑧张小华：《中国与大洋洲、美洲古代交往探讨》，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

⑨游修龄：《蚕豆的起源和传播问题》，载《自然科学史研究》1993年第12卷第2期。

⑩王学理：《汉景帝阳陵陵园考古获新成果》，1993年1月3日《中国文物报》。

⑪朱弘复等：《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出土的昆虫尸体》，载《考古》1973年第1期。

⑫林华东：《吴越舟楫与航海》，载《广西民族研究》1988年第2期。

⑬杨江：《马来—波利尼西亚与中国南方文化传统的关系》，载《浙江学刊》1991年第1期。

⑭王大有、宋宝忠、王双有：《古代美洲奥尔梅克玉圭商殷文研究——中华文明东迁美洲的文字学证据》，载1992年2月28日《华声报》。

⑮龚缨晏：《古代美洲奥尔梅克玉器匡谬——兼论古代中国与美洲交往问题》，载《世界历史》1992年第6期。

⑯《殷墟祭祀坑人骨有异种成分》，载1992年11月9日《文摘报》。

⑰Peter Bellwood, "Prehistory of the Indo-malaysian Archipelago" Academic Press, New York, 1985.

⑱梁钊韬：《西欧族源初探》，载《学术研究》1978年第1期。

⑲乔晓勤：《大洋洲史前考古新发现及其意义》，载《人类学论文选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 ⑮林惠祥：《中国东南区新石器文化特征之一：有段石铤》，载《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
- ⑯Roger Duff, *Stone adze of Southeast Asia* Order of the Board Ohristchurch New Zealand, 1970.
- ⑰参见刘继寅、东世征：《中华民族拓殖南洋史》，国立编译馆；Victor Purcell. 1965,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Part 1*；游修龄：《百越稻作与南洋的关系》，载《农业考古》第3期。
- ⑱广州象岗汉墓发掘队：《西汉南越王墓发掘报告》，载《考古》1984年第3期。
- ⑲王恒杰：《西沙群岛的考古调查》，载《考古》1992年第9期。
- ⑳曹锦炎等：《浙江鄞县出土春秋时代铜器》，载《考古》1984年第8期。东案：铜钺年代实为战国之时。
- ㉑（法）V·戈鹭波：《东南和安南部的青铜时代》，原载《法国远东学院学报》1929年第29卷。转引自刘雪红等人译《民族考古译文集》第1集，1985年。
- ㉒傅宪国：《论有段石铤和有肩石器》，载《考古学报》1988年第1期。
- ㉓韩槐准：《南洋遗留的中国古瓷外销陶器》，新加坡青年书局，1960年。
- ㉔安志敏：《马来亚柔佛洲出土的古代陶片》，载《考古》1965年第6期。
- ㉕彭适凡著：《中国南方古代印纹陶》，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河姆渡遗址文化与越族先民

杨成鎰

河姆渡遗址是世界著名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遗址,它代表着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的东南江海文化的先驱;与其对应的是以西安附近半坡村遗址为代表的黄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的中原内陆文化;从而构成了中国文化源流的两大历史系统。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人文条件,使河姆渡文化成为开放型的中国江海文化的先驱,它孕育了越族先民开放型的文化:熟悉水上生活的居民,比较发达的江海水上交通,使他们能够向东南沿海和东南亚、日本南部地区迁移和发展,甚至远渡到密克罗内西亚群岛。

河姆人属于哪一氏族?是有巢氏先民吗?可是有巢氏是结绳记事的,而没有文字直接可查。我们只能从有关史料和遗址发掘中,寻找蛛丝马迹。

一、中国东南江海文化的开放性特色

位置是一个重要的地理要素,它是指地球表面各种地物所占有的特定空间。我国的疆域辽阔,地形复杂。从西北向东南,可分为:亚洲大陆的内陆地区和东部、东南部沿海地区(包括沿海岛屿在内)。不同的地理环境与交通状况,使古代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习俗和知识、视野也各不相同。余姚市河姆渡位于东

经 121 度 20 分,北纬 29 度 58 分。这个所处的地理位置,不禁使人想起西方古代文明的发源地埃及,其古都孟斐斯正处于北纬 30 度线左右;西亚的文明发源地两河流域,其人口繁多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口的乌尔、拉尔萨等城邦国家也正在北纬 30 度线稍北,而巴比伦城在北纬 32 度 20 分左右;波斯最古老的首都波斯波利斯,也处在 30 线上;古印度文明的代表——哈拉帕文化区域,也处于北纬 30 度线左右;因此,是否可以认为 5000—7000 年前的北纬 30 度线地区是最适宜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地区,是人类古代的文明地带所在?

河姆渡当时的平均气温比今天约高 3—5 摄氏度,属于亚热带海洋性气候,雨量充沛,气候温和宜人。而当时的海岸线还没有像今天那样突出,河姆渡古代处于沿海地区,它东望东海,北临杭州湾,西临今宁绍平原,南靠四明山;这里水网密布,土壤肥沃;又有四明山中的野兽可供捕猎,这为人类提供了较充分的生活资源,在河姆渡人的时代,那里已是东方稀有的鱼米之乡,而海洋正是开放的门户。

由此可见,河姆渡文化的主要特色之一,是它的南方江海文化特色。

二、河姆渡遗址的水稻文化

河姆渡遗址在 1973 年和 1978 年两次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碳化稻谷。在稻谷堆积中,有的稻谷和稻壳、稻秆、稻叶交互混杂迭压,平均厚度在 40—50 厘米之间,也有厚达 1 米以上的。从稻谷堆积的厚度及面积推算,埋藏的稻谷总量当在百吨左右。稻谷的样品根据碳十四的测定,其年代可追溯到 6950BP \pm 130 年前。对这些举世罕见的碳化稻,浙江农业大学游修龄教授等

人,已作了外观、粒型和硅酸体的研究,判断为原始籼粳的混和群体。

1994年4月,日本国立遗传学研究所佐藤洋一郎教授、中国水稻研究所汤圣祥、浙江省博物馆俞为洁等,发表了《河姆渡碳化稻中普通野生稻谷粒的发现》报告。

亚洲栽培稻起源于普通野生稻,中国是亚洲栽培稻起源地之一,这一观点,已被国际学术界所公认。并于我国栽培稻的具体起源地,目前主要有:华南说,云贵高原说,长江(中)下游说等,迄今尚未定论。长江(中)下游说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是明确远古的新石器时代(7000年前),长江(中)下游地区是否曾经生长、繁衍过普通野生稻?

由浙江博物馆提供完整的河姆渡碳化稻谷105粒,进行了亚微结构的研究,逐粒测量谷粒的长度和宽度,计算长宽比,将抽样的81粒碳化稻谷,依据有芒、断芒和无芒初分后,对粒型瘦长、有芒的碳化谷粒进行喷金处理后,对其芒及小穗轴断面在电子扫描电镜下观察并拍照。结果表明:河姆渡碳化稻为类籼、类粳和中间型的原始混合群体。发现四粒有芒碳化稻与其他碳化稻不同,判断为普通野生稻谷粒,其特点为:

(1)芒上小刚毛长而密集,其数据均与普通野生稻芒上刚毛特征的分布范围相合。

(2)小颖轴脱落斑小而光滑,具有自行脱落的痕迹。

(3)谷粒较瘦长。

据此研究分析,发现的大量河姆渡碳化稻中,存在极少数普通野生稻谷粒,证实在7000年前的河姆渡地区生长有普通野生稻。表明在长江下游确实存在普通野生稻。当时的普通野生稻与原始栽培稻混生或近生。^①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大量遗存表明:河姆渡人还处于以原始耕作为主,采集为辅的时期,即以原始稻

作和渔猎为主,兼及野生稻及其他可食植物的采集。

河姆渡遗址附近发现极粗放的象田、鸟田和牛踩田^②(根据俞为洁女士在 1993 年的论文),用于土壤浅耕作及开沟的骨耜,以及加工谷物的石磨盘均表明这一时期已开始进入稻作粗耕阶段。沼泽型农业是农业起源的一大类型,从稻作起源的动力和机制来看,有理由相信我国的原始栽培稻起源于东南季风区北缘的长江(中)下游沼泽地区。

日本佐贺大学农学部佐野喜久生教授在《关于东亚栽培稻起源的遗传学与考古学研究》^③一文中说:“一些研究者坚持认为云南省最早出现栽培稻,并顺河而下,传播到长江下游及其它大河流域。云南大约有八处稻作文化遗存已经发掘,但史前稻作遗存的年代要比长江下游晚得多。经碳十四测定:年代最早(公元前 1000 年到 2000 年)的两处分别是:四川县白羊村(公元前 1820 ± 85 年),元谋县的大墩子(公元前 1475 ± 55 年)。

“一种理论假想认为,稻作农耕首先出现在从印度阿萨密到中国云南的山区,然后顺流而下传播到几条大河流域;而考古发现表明:史前最早的稻作遗存出现在长江下游地区。”

佐野先生还在发言中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南迁的方向,表明了水稻的传播是从长江下游出发,自北而南行,云南是最后到达的地方。”^④

游修龄先生说:“我们从民族学和铜鼓传播的历史角度来看,稻作是随着民族迁徙和铜鼓的传播从云南向泰国、缅甸、老挝和马来亚半岛直至印度尼西亚传播的。”^⑤

而笔者认为,河姆渡人是越族先民(这将在下文中论证),他们是百越民族的远祖,是越南族和现今已融合在汉族中的闽粤台土著,以及壮族、京族等的鼻祖。河姆渡人种植水稻的历史还远早于 7000 年前(有可能为距今 8000 年至 1 万年)。他们是世

界上最早发现和栽培水稻的民族。在民族大迁移中,越族先民分别从江流和海流向西南和东南沿海往东南亚迁徙。前者 and 西南的土著结合,总称为百越;后者和东南沿海及红河流域的土著居民结合,称为越南族、僮族、京族及汉族南系。他们传播了水稻,还在略较后的时期带去了几何形印纹陶器,作为稻米饭炊具及容器之用。

既然,在古代偶然遗留下的几个储藏仓库中能保存上百吨的稻谷;那么,河姆渡人所栽培种植的稻谷的年总产量将在 500 吨至 1000 吨之间。在当时粗种粗收的条件下,每亩水田一沼泽地的年产量不可能超过 50 公斤;由此推算,其种植面积将达 1.5 万亩(1000 公顷)以上。而这么多的田是如何耕耘的呢?

俞为洁女士在《河姆渡时期稻田的获取和整治》^⑥一文中谈到:河姆渡遗址附近的极粗放的象田、鸟田和牛踩田。关于鸟田的记录,《越绝书卷第八》说:“畦粪桑麻,播种五谷,必以手足。大越海滨之民,独以鸟田:小大有差,进退有行。其故何也?”

《吴越春秋》也提到越国的鸟田情况。一直到东汉时,越地仍然有鸟田,王充在《论衡·偶会篇》中说:“雁鹤集于会稽,去避碣石之寒,来遭民田之毕。蹈履民田,啄食草根。粮尽食索,春雨造作,避热北去,复之碣石”。王充是上虞人,当时与句章的黄墓渡(即河姆渡)同属于会稽郡。其记述当为可靠。

在人类的童年时期,人自身的力量薄弱,较多地依赖于大自然的恩赐。人们根据当地的有利条件,巧妙地加以运用,以发展生产。鸟田也由此而来,是为越族所发明和利用。因此,鸟田与古越族及越族先民的农业具有一定的联系。这从地理环境与生产的角度,说明河姆渡人是越族先民。

三、海上捕捞和近海航行

在河姆渡的出土遗物中,有大量的鱼类骨骼、蚌壳等水生动物标本。其中有咸淡水交汇水域中的鲚鱼、裸顶鲷等,也有生活在深海中的鲨鱼和鲸鱼。这些说明:河姆渡人不仅在江海交汇处捕捞,而且还乘舟趁潮到深海捕鱼。为此,我们可以推知他们已发明创造了水上交通工具和推进工具,能够在江湖河海进行生产活动,并且具有一定的航海能力。

行船驭舟是长江流域文化(即江海文化)的重要特色之一,而河姆渡人是舟楫发明和征服海洋的先导。在河姆渡出土的珍贵文物中,与水上有关的遗物有在第三、四文化层中出土的六支木桨和采集的两件夹炭黑陶质的小陶舟模型器。木桨均系采用单一木料加工制成,但桨柄、桨叶已明显地分开。其中保存较好的一件总长 92 厘米,另一件是保存完好的桨叶,叶长 20 厘米、宽 12.3 厘米、厚 2.1 厘米。木桨的柄部切面是方形,适宜于手握。柄上刻满横线、斜线组成的几何形装饰花纹。一般规律是:先有船,后有桨;有桨必定有船。但完整的船体保存 6850 年之久,是不可能的。在河姆渡遗址的第三文化层内,发现一件直径约 60 厘米,中间挖空、残长 2 米的木构件。构件的一端已残,另一端呈尖头状。据分析,有可能是废弃的独木舟残骸。

采集的两只陶舟:一只是方槽形,长 8.7 厘米、宽 1.6 到 3 厘米、高 2.5 到 3 厘米;另一只长 7.7 厘米、高 3 厘米、宽 2.8 厘米。两端尖,尾部微翘。船首有一只胸式穿孔小桩,两侧等高,底部略圆,俯视则船体平面若梭形。^⑦船是河姆渡人向外开拓的重要交通工具。这些越族先民的航海交通工具和航海技术,后在他们的后裔越族人民中得到继承和进一步发展:

勾践曾喟然曰：“夫越性脆而愚，水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锐兵任死，越之常性也。”^⑧

《越绝书·越地传》载：“勾践伐吴，霸关东，从琅琊，起观台。台周七里，以望东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

《越绝书·吴地传》：“丽溪城者，阖庐所置船宫地也。阖庐所造。”

《越绝书·越地传》：“木客大冢者，勾践父允常冢也。初徙琅琊，使楼船卒二千八百人，伐松柏以为桴，故曰木客。”

《越绝书》还提到：“大翼一艘，广一丈五尺二寸，长十丈^⑨……中翼一艘，广一丈三尺五寸，长九丈六尺。小翼一艘，广一丈二尺，长九丈。”^⑩

《国语》：“吴王夫差既杀申胥不稔之岁，乃起师北征。闾为深沟于商鲁之间：北属之沂，西属之济，以会晋公午于黄池。于是勾践乃命范蠡、舌庸率师沿海沂淮以绝吴路”。^⑪

越人履水面如平地，其航行水平是如此高超。这些船只已经可以在海洋航行。吴国具有单独的造船城—丽溪城，可见吴国造船规模之大。吴军 5 万人，能一次乘船沿邗江、通济渠以连中原的黄池。越军数万人，能从会稽浮海北上直抵淮河河口。越国一次可以派出楼船卒——水兵 2800 人：在战国初期，吴国和越国已具有这样的航海能力，这与他们所继承的越族先民（河姆渡人）的航海习惯是分不开的。

越族先民是继承河姆渡文化的开放性，带着水稻和容器、炊具几何形印纹陶，以舟代步，足迹遍及东南亚各地和日本南部。

四、在史书上失踪了的有巢氏民族

河姆渡人属于甚么氏族或民族呢？笔者认为他们与传说中

的有巢氏部落有关。

《韩非子》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不胜禽兽虫蛇，圣人有作构木为巢，以之群居，天下号曰有巢氏。”

《路史·前纪》^②第五卷《有巢氏》条：

“太古之民，穴居而野处，搏生而咀华，与物相友。人无忌物之心，而物亦无伤人之意。逮于后世，人泯机智而物婚为敌，爪牙角毒，概不足以胜禽兽。有圣者作栖木而巢，教之巢居以避之，号大巢氏。其为民也，登巢琢蠹，脍食鸟兽之肉。若不能庖者，饮其血，嚼其肉。茹其皮毛，未有火化，捫橡栗以为食，草栖木末，令之曰：有巢氏之民。

……于是刻木结绳以为政。木皮未委，于复塞其羽革，铁衣率领，着兜帽以赍体。民之葬者，犹未详焉。过者颡此，于厚衣之薪而焚而瘞之，不封不植也，掩覆而已，丧期无数也，哀除而已。其政好生而恶杀，节上而羨下，故天下之人不归其服而归其义。治三百余载，妻于石娄之颜。”

《路史》还引用《遁甲开山记》作注解：“石娄山在琅邪，昔有巢氏治此山南。”

《吕氏春秋》、《仪礼》和《史记正义》等书中，都提到了有巢氏。

综观上述，可见有巢氏（大巢氏）也和伏羲氏、神农氏一样，是上古时代一个很有名的部落（氏族国家）。可是在后世的历史地理书上，却再也找不到有巢氏国的踪迹！

1973年在河姆渡遗址的第一期发掘中，木构建筑露头于第四层中部，出土的木构件总数达一千件以上。主要构件是13排木桩，基本上形成西北—东南走向，部分近正南北。这里至少建筑着三栋以上的房屋。这些房屋呈长条状，系多间互相品连而成，其中有一栋连品的房屋在9间以上。在7000年前，有这样

大规模的建筑群,正与《韩非子》所说的“有作构木为巢,以之群居”相吻合。

由于河姆渡遗址地处江滨,近沼泽与水,地势低湿。为此,筑房屋时先打下四排木桩,造成离地面相当高的底架,在底架上架地梁,在上面建设地板,再在上面立柱、架梁、敷椽、覆盖茅茨。在底架下面圈养家畜,上面住人。“这种以木桩为基础,在其上架设大、小梁承托地板,构成架空的建筑基座,再于其上立柱架梁干栏式木构房屋,是原始巢居的直接继承和发展。”^⑩

其梁柱的交结点用榫卯结构,它是在我国现已发现木结构建筑中最早采用的技术。这就是《路史·前记》所谓“登巢琢蠡”和“构木为巢”的真正含义所在。

所以,笔者认为河姆渡人就是“有巢氏之民”。今天的河姆渡地区是当时有巢氏国的中心区域。

然而古书及其注解,将有巢氏其国的地址大多定在巢湖附近。但据有关资料考证:太古时代的有巢氏国,与夏末商初的南巢及春秋时的巢国,各为一地,互不相干,只名近而已。

那么,这个古巢国有史可查吗?有。

《越绝书·吴地传》说:“吴古故水道,出平门,上郭池,入渚;出巢湖,上历地,过梅亭,入杨湖;出渔浦,入大江,奏广陵。”

平门为今苏州城的北门,巢湖应为今蠡湖,在吴国未被越国灭亡以前,称为巢湖。因而,有巢氏之国境应在这个巢湖以南,包括河姆渡在内。

可是《越绝书·吴地传》又说:“毗陵县南城,故古淹君地也。东南大冢,淹君子女冢也。去县十八里。”

毗陵县在今江苏武进。今考古发掘后,奄城遗址已被发现,这一方面证明《越绝书》所载属实;另一方面说明:由于古代民族的迁徙,他们的前后居住地,在南方和北方各留下了一个。如商

朝的同族奄和蒲姑两国,在周初尚存在于今山东省的曲阜和临淄。由于他们帮助纣子武庚复辟,从而为周公所灭,作为鲁和齐的封地,但他们的南留部分依然存在,《越绝书·吴地传》还有关于吴都附近蒲姑大冢的记载。

有关有巢氏国的另一佐证是:

1994年4月至7月中旬,在河姆渡鹫架山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河姆渡先民的瓮罐葬和红烧土祭祀碑,其中一处遗址直径达340厘米,最厚处达75厘米。从出土文物迹象分析:先民死后尸体用火烧烤后,将遗骨放入罐内,再入土安葬,带有“古代火葬”的形式。这是迄今国内发掘的古遗址中所罕见。然而却与《路史》“有巢氏”条:“民之葬者……于厚衣之薪,[焚]而瘞之,不封不植也。掩覆而已”的记载相一致。至今嘉兴、湖州、桐乡一带的丧葬习俗,还依然如此。

毛昭晰先生认为河姆人与传说中的羽民国有关^⑩,这种见解有一定的理由。《淮南子·坠形训》中有羽民国的记载。《山海经·大荒南经》说:“羽民之国,其民皆生毛羽。”

羽饰的习俗,笔者认为与河姆渡地区——越地为候鸟集中地有关。大雁等候鸟在这里换毛后,留下了大量的羽毛。越族先民将长大美丽的羽毛作为头饰,在河姆渡遗址第三文化层中发现一些陶塑人头,其中几个头部有横向一列的五个小孔,是用来插羽毛的。但笔者认为更多的候鸟羽毛,用来塞在粗疏的植物纤维纺织品的夹层内,作冬天御寒之用。正如“有巢氏”条所载:“木皮未委,于复塞其羽革,挟衣率领,着兜冒(帽)以赅体。”

这些“木皮”就是指藤本植物的纤维,河姆渡人的纺轮,将它纺成纱,又织成极其粗疏的布,做成衣服。但它的御寒性能极差,须要在夹层中铺塞羽毛或皮革。由于布粗空隙大,大量细羽毛从布中穿出,使外地人看到后,有全身“皆生毛羽”的感觉,故

被称之为“羽民”；其地被称为“羽民之国”。

由此推断：河姆渡人因居被称有巢氏之民，冬天外出则被称为羽民，而羽饰则是越族先民的一种习俗。

史树青先生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出：河姆渡就是古代史书中所说的“姚墟”。我赞同他的观点，并作了补充。他读后很高兴。

前面“有巢氏”条提到，有巢氏之国是“刻木结绳以为政”的，没有文字的民族往往有急读或缓读两种名称。如日本的古国大和，是缓读名称，急读则成为“倭”，所以倭国也就是大和国。这源于译音的急读和缓读，并无褒贬意义在内。突厥族在隋唐时期活动于我国境内，“突厥”是译音的急读；后来部分西迁到小亚细亚，称为“土耳其”，这是译音的缓读。有巢氏也是一样：急读为“姚氏”；缓读为“有巢氏”。但这个曾经立国 300 多年的地方，待到舜出生的时候已是“墟”了。可见这个姚氏之国很早已不存在，只是遗址而已，所以这个没有文字的有巢氏之国也无可稽查了。论其存在的年代，当在河姆渡人的时期。

当有巢氏失国多年之后，羽人国的别称依然存在，不过羽人已缓读为“于越”人了。

《会稽志》载：“舜，上虞人，去虞三十里有姚丘，即舜所生地也。”

《括地志》载：“越州余姚县有历山、舜井，濮州雷泽县有历山、舜井，二所又有姚墟，云生舜处也。”

《风土记》、《风俗通·山泽》篇等都有“舜生姚墟”的记载，面临姚江的河姆渡应为姚墟，由于舜生于此，姚江又名舜江。

象是舜不可分割的环境：舜弟名象。舜耕于历山时，相传有象为之代耕。舜南巡狩，为象所阻，崩于苍梧之野。“舜葬九疑，象来至此，后人立祠，名为鼻亭神祠。”^⑮

4000 多年前的今山东和山西,根本不可能有象群出现。而河姆渡遗址当时气候炎热,据发掘出的动物遗骸有:亚洲象、苏门答腊犀、爪哇犀。证明野象的存在。河姆渡有象耕田^⑩。其东北数十里是历山镇,有象田遗址。有可能舜是驯象者出身。

由此看来,河姆渡应是姚丘。

五、河姆渡人与越族先民

新近发现的象山县塔山遗址^⑪的早期文化层——即第八、第九文化层及墓地,出土的器物具有河姆渡文化特征。“年代上相当于河姆渡遗址三期”,距今约 6000 年,比河姆渡第三期碳十四平均值 5713 年还早些。它们同属于河姆渡文化,在共同的基础之上,又有各自的特色。这里发掘出 51 具骨骸,笔者所见到的两具保存较为完好的塔山人骨骸:头形短而宽,鼻根较低凹,眼裂开度较大。身材较矮:为 1.63 米至 1.64 米之间。河姆渡人和象山塔山人的直系后裔都是越族先民。由于他们的开放性,不少人乘船移居海外。就其头颅与骨骼来看,他们与越族、壮族、京族、台湾土著居民、日本南部居民之间,具有一定的血缘关系。

总之,河姆渡遗址的发现,是东方文化史上的奇迹。河姆渡文化的主要内涵是水稻文化。关于水稻起源于长江下游,仍有人持异议。在 1994 年 4 月至 7 月,距河姆渡东北 1000 米的黄架山,在发掘现场发现了大量的新的陶系及夹炭红衣陶。它属于河姆渡遗址内第三、第四文化层的夹炭黑陶,向第一、第二文化层的夹砂红陶过渡陶系。填补了河姆渡遗址陶系演变的缺环。^⑫河姆渡人,即越族先民,他们是最早的航海家,是他们将水稻传播到东南沿海及东南亚。

注释

- ①汤圣祥、佐藤洋一郎、俞为洁：《河姆渡碳化稻中普通野生稻颗粒之发现》。
- ②⑥⑩俞为洁：《河姆渡时期稻田的获取和整治》，见《古今农业》1993 年第四期第 36—43 页。
- ③此为河姆渡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
- ④1990 年 5 月 15 日游修龄在参加佐贺市中日文化交流研究会期间和佐野先生谈话。
- ⑤游修龄、郑云飞：《河姆渡稻谷研究进展及展望》。
- ⑦曾骥：《河姆渡人在中华文化缔造中的贡献》。
- ⑧《越绝书》卷第八《越地传》。
- ⑨《昭明文选》“侍游曲阿后湖诗注”引用《越绝书》“伍子胥水伐兵法内经曰：……”
- ⑩原文作“门九丈”，今改正。
- ⑪《国语·吴语》。
- ⑫《路史》为宋代庐陵罗泌集所藏秘本而写成书。
- ⑬《关于河姆渡遗址第 1 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 年第一期。
- ⑭毛昭晰：《羽人源流考》。
- ⑮《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 ⑯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象山县塔山遗址首期发掘成果报告》，1991 年 10 月 2 月 9 日。
- ⑰《河姆渡遗址新出土两千余件文物和标本》，1994 年 8 月 4 日《宁波日报》第 7 版。

河姆渡文化原始雕塑

刘 军

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 and 优良传统,是中国文化艺术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商周时期的古色斑斕的、形态各异的兽形青铜器到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观”的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的数以千计的大型陶塑;从西汉霍去病坟前的大型生动石雕和出土的一批汉代人物陶、木俑以及精美的青铜奔马、到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时期闻名中外的云冈、龙门、麦积山、敦煌等佛教石窟艺术。这些历数千年而不衰的雕塑艺术,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辉煌成就。直至今日,雕塑艺术奇葩给人以美的享受,无限的遐想,激励着中华儿女奋斗不息。

考古发掘材料告诉人们,我国最古老的雕塑艺术早在原始社会遗址中就屡有发现,出现了各种动物和人的塑像以及精美的玉石雕刻。特别是距今 7000 年的著名的河姆渡遗址中发现了丰富多彩的雕塑艺术品,河姆渡雕塑匠师善于抓住雕塑对象特征,加以适当夸张,表现了河姆渡人爱美的天性和细腻的感情,这在同时期的遗址中是很少见到的。河姆渡雕塑艺术品不仅数量多,更主要的是每件艺术品充分体现了匠师技艺之娴熟,水平之高超,令人无不惊叹,在我国雕塑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河姆渡的雕塑艺术,可分为雕刻和捏塑两大部分。雕刻艺术主要有石雕、骨雕、木雕和牙雕;捏塑主要有堆塑、陶塑和泥

塑。它们是通过考古发掘得到的,是古代文物的一部分重要内容,它以可塑的粘土和可雕刻的石、骨、木、牙等物质材料为媒介,创造出各种具有实在体积的造型艺术,这种艺术常被人们称之为:“立体的诗,动态的画,有形的音乐”。

河姆渡雕刻作品主要是以较硬的物质材料为媒介,经过选材、琢磨、刻、钻等“鬼斧神工”的艺术处理。推测每件雕刻作品在正式雕刻之前,必须经过三道工序:第一道开荒取材,即去发现可供制作雕刻艺术品的原材料;第二道具体打琢,从局部到整体,制作出所需要的形体;第三道修整、研磨,使其完整光滑。经过三道工序后再进行精雕细作。

对照中国古代雕塑艺术技法——圆雕、浮雕(高、低浮雕)、凹凸平面雕和线雕四种,河姆渡文化雕塑艺术的造型特点和制作方法,有线雕和圆雕两种,而线雕是主要的,其次才是圆雕。

捏塑工艺在河姆渡文化中也有十分突出的表现,引人注目。它是利用可塑性最强的粘土为原料制作的,可以随心所欲地塑造各种自己喜欢的形体,使粗糙的坯胎升华为线条柔和、形体优美、造型奇特的艺术品。真是“抟泥幻化”的艺术。捏塑工艺中有泥塑、陶塑和堆塑三种,河姆渡人已经熟练地运用塑、堆、捏、贴、刻等现代雕塑匠师常用的方法。

线(阴线)雕在河姆渡雕塑艺术品中占有很大的比例,线雕是我国民族雕塑艺术的独特风格,也是以我国为代表的东方艺术的特点,和西方造型艺术相比,中国传统的造型艺术可以说是线的艺术,河姆渡文化的图像就象音乐语言似的,以其特有的点、线节奏韵律来表达艺术家对生活的亲切感,其在线条表现形式上所能达到的完美程度,只要我们浏览一下河姆渡文化的骨、牙线雕动物图像就会为那流畅的线条组合发出惊叹。河姆渡出土的双凤朝阳牙雕,作双凤朝阳状,阴刻两凤昂首相视,省略其

身,似凤鸟展翅图像,栩栩如生。留下一片空白为背景,似广阔天地,中下部以光芒四射的太阳形点化主题,犹如一轮红日从东方地平线上冉冉升起,构成了一幅壮美的日出景致。刀法起伏顿挫婉转自如,堪称史前雕塑艺术佼佼者,难得的艺术瑰宝,这往往使我们叹为观止。该作品的特点是线条组合严密,显得游刃有余,体现了高超的线条驾驭能力和构图意匠,其手艺的精巧程度与现代最高超的匠人相比也毫无逊色。充分表达了河姆渡人祈求光明吉祥,充满了内心的激情。连体双头鹰纹骨匕,河姆渡匠师抓住猛禽类头部和嘴的特征,突出了大头勾喙、双目瞪视、精神毕现、神态凶悍形象,河姆渡艺术家通过锥刺手法,从无数个小点组成线条美,把鹰的凶悍表现得淋漓尽致。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自然神崇拜而产生的神秘和肃穆气氛。牙雕鸟形匕,这是件圆雕珍品,一端是精雕细琢的似鸟形首与线条刻划;另一端是朴实无华的光洁器身,既从属了器物的实用性,又起到了装饰作用。整件器物造型,从侧面看犹如凤鸟拖着长长的尾巴,站立枝头伺机觅食。

象牙雕刻并非易事,象牙圆雕艺术是雕塑艺术中难度更大的一种表现技法,不但需要把各部位雕塑得形神俱备,而且随着光线的移动都能引起不同的艺术效果。在几千年后的今天看来,这些象牙雕刻仍具有不朽的艺术魅力,何况在那个没有金属工具的年代制作一件雕刻品需要花费多少劳动力是可想而知的,人们要花费那么多的精力去制作它,显然有它们的特殊功用,不由使我们联想到后来良渚文化时期大量出现的以玉琮为代表的精雕细刻的玉礼器的功能。

河姆渡时期除骨(牙)雕外,木质雕刻艺术也出现了别开生面的作品,鱼形木雕(图1),可以说是件代表作,圆雕木鱼体态浑圆肥胖,大小不等的圆涡纹象征着层层鳞片,简练的弧线以示

鱼鳃, 鱼的特征在这里表现得惟妙惟肖, 反映了原始艺术质朴古拙。

陶器是研究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民族生活的特征之一, 也是了解原始塑造艺术发生、发展的唯一资料, 应该说“塑”的技能, 胚胎于新石器时代陶器的造作, 萌芽于陶器表面的装饰, 器表装饰源于平面的线纹, 进而到器物的局部立体捏塑, 使它起到器物的耳、把手、盖纽等作用, 题材多为常见的鸟、兽等。从中可以看到河姆渡人已掌握塑造形象的技法, 观察事物能力较强, 如河姆渡出土的一件器盖(图 2), 其顶部塑造了一只动物作盖纽。河姆渡还发现少量的陶器表面施加彩绘, 这是否与后来逐步发展成为我国独具一格的彩塑艺术有关。随着造型能力增强, 河姆渡人还创造出整体作动物形象的陶器, 如垂囊壶, 器体稳健, 形态生动, 这种以鸟腹部作容器, 以鸟首作注入口, 以尾作鑊的巧妙造型设计, 为原始工艺品开辟了新天地。异形鬻, 通体作裸体女像, 头部作注入口, 腹部特地塑造两个丰满乳房, 腿部肥硕圆润。动物形及人形陶器的设计, 表明河姆渡人的塑造才能已达到较为成熟的阶段, 因而摆脱了陶器工艺的范畴, 成为独立形式的圆塑也已经开始出现。猪形陶塑, 突出了家猪的丰满形态的外部轮廓, 并能抓住家猪的前后肢同等粗壮, 腹部下垂等体形特征加以表现, 以区别于野猪形态, 作奔走状, 笨拙之态可掬, 令人爱不释手。这圆塑家猪形态, 反映了河姆渡时期已经饲养家畜, 并具有相当久远的历史。羊形陶塑(图 3), 体态浑圆肥胖, 昂首匍匐, 形象生动。陶塑鱼(图 4), 睁眼张嘴, 腹下两鳍塑成翅膀状, 意在表现游鱼腾越之态。人面塑(图 5), 高颧骨、凸前额, 塌鼻梁, 阔嘴巴, 长方脸, 河姆渡人的脸部特征通过简单的捏塑的刻划, 体现了藏巧于拙, 寓美于朴的艺术魅力, 在这里艺术语言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 简练的刀法下是一个聪颖而童稚、朦胧

而神奇的河姆渡人的面孔出现在我们面前。兽形塑(图 6), 身躯高大肥胖, 健壮的四肢稳重自然, 作静立之态。气魄深沉雄大, 粗犷豪迈, 浑朴古拙。奔兽(图 7), 堆塑品, 体态浑厚壮实, 张嘴嘶鸣, 四足腾空, 作疾奔状。整个造型生动精美, 给人以神彩飞扬, 矫健骏逸之印象。双飞燕(图 8), 堆塑品, 简练泥条塑造了一对展翅翱翔的飞燕形态, 河姆渡的雕塑艺术呈现着多样化的特点, 除了以动植物和人作为雕塑对象外, 作为生殖崇拜的对象是妇女, 与之相对的是出现了对于男性生殖器官的崇拜, 河姆渡发现的陶祖, 捏塑而成, 硕大有力的形状, 象征着强壮与男性生殖力, 形象逼真。

纵观河姆渡雕塑艺术, 无论从广度和深度的艺境来说, 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艺术工匠们能塑如此众多的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雕塑艺术品, 观者无不为此举指称绝, 记得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期间, 有位从北京来的专家到发掘工地看到连体双头鹰纹骨匕时赞不绝口, 说这件东西不是在现场看到, 打死我也不相信会是 7000 年的东西, 多次发出真绝了、真绝了的赞许。的确, 河姆渡文化的雕塑艺术精品, 无论用什么形容词来称赞它也并不过分。它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也是人类智慧的艺术奇迹。

河姆渡文化之所以能出现大量的杰出雕塑艺术品, 是有它的坚实的基础: 河姆渡遗址 6000 多件出土文物中, 包含了石、骨(牙)、木器和陶器、制造这些琳琅满目的器物本身, 虽然只能说是属于工艺性质, 但是, 制作它们的过程中, 实际上也包含着“雕”和“塑”的因素, 孕育着河姆渡人雕塑艺术才能; 另一方面, 要想发展手工艺术, 首要的条件就是要有闲暇时间, 不管人们有多么强烈的艺术冲动, 如果河姆渡人的时间被完全用于取得最起码的生活资料, 即使河姆渡人有再强烈的艺术冲动也是无法实现的。河姆渡时期之所以能造作如此之多的佳作是因为河

姆渡人在取得了足够的食物之后,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去雕塑自己追逐过的动物,并从中得到乐趣。要知道艺术品数量的多少完全取决于空闲时间的多少,河姆渡人在耜耕农业的劳作之余,可以估计到他们有不少的空暇时间,才能创造出如此丰富的雕塑艺术品。河姆渡的雕塑艺术品有个显著的特点始终没有跳出象征手法的框架,不求细微末节的忠实,而是抓住关键部位,运用艺术夸张和提炼概括的技法,塑造出活灵活现的形神兼备的动物形象,鸟、鱼、猪、羊是当时雕塑艺术品中常见的主题。这固然是河姆渡人日常的渔猎、饲养家畜,征服自然过程中生产、生活的写照,但更应该看到河姆渡的这些精湛雕塑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品,它富有更深层次含意。大家都知道,原始人往往把自己的前身归之于某种灵物(图腾),对之进行崇拜和供奉,制定了礼仪祭祀,并创造了相应的原始宗教艺术。河姆渡的鸟、鱼、猪、羊等动物形象的雕塑,应是当时河姆渡人崇拜和供奉的灵物,是一种图腾活动的表现用来鼓励和促进牲畜和农作物的丰产,具有巫术作用或祭祀祈祷之功能。河姆渡有件木雕鱼形器柄(图9),制作得颇具匠心,构图严谨而富于装饰性,它或许可能是一件体现原始宗教观的权杖的柄部,推测鱼形是图腾标志,权杖则为氏族酋长所有。

在河姆渡雕塑作品中,常见圆圈形状来装饰动物身躯,我们都知道,古文字中太阳的象形文字多写成一个圆圈或圆圈外加光芒。因此,发现在河姆渡动物雕塑身上的圆圈纹应是河姆渡人对太阳神崇拜的物证,其实双凤朝阳牙雕和连体双头鹰纹骨匕也是河姆渡人对太阳神崇拜的最好的实物见证。在我国从远古时候起,就称太阳为金乌,世界上也有不少民族把乌作为太阳的象征。太阳不仅给河姆渡人带来了温暖,而且给他们带来了生产的丰收,使他们摆脱了过去那种朝不保夕的渔猎和采集的

生产活动。因此,太阳成了河姆渡人的“救世主”,但是,太阳有时也给河姆渡人作对,需要它时不出来,不需要它时却偏偏烈日当空,劳动成果多少受到太阳的严重制约。距今 7000 年的河姆渡气候比现在温暖、潮湿多雨,春夏两季有时甚至可能是一两个月阴雨连绵,倘若禾苗抽穗时,或稻谷成熟期,长时间不见太阳,光照不足,肯定造成农业欠收或颗粒无收。在这样的情况下,河姆渡人自然会想尽办法祈求日出,制作太阳形象,并以巫术仪式或祭祀仪式祈求日出,保佑他们农业和饲养业的丰收。



图 1 鱼形木雕



图 2 动物盖纽



图 3 羊形陶塑



图 4 陶塑鱼



图 5 人面塑



图 6 兽形塑



图 7 奔兽堆塑



图8 双飞燕堆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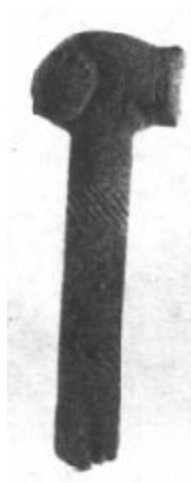


图9 木雕鱼形器柄

河姆渡文化猪形塑及猪形 图案装饰器新探

俞为洁

河姆渡文化是主要分布于浙江宁绍平原上的一支新石器时代文化。其早期地层(距今六七千年)中出土许多猪形塑及猪形图案装饰器(详见图1-图5),一直被作为农畜业的证据而广为引用。但对这些材料的如此利用应该说还是很初步的。近年,一些有识之士又提出了“它们不是日用器而是一种与某种巫术礼仪有关的用器”^①的观点,正渐为学人所共识,但它们参与的是何种巫术礼仪呢?我们初步推测在当时可能是用于稻作祈雨巫术的。

1. 水畜:猪主要生活在沼泽水地或山居近水之处。《史记·货殖列传》记:“泽中千足彘,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齐民要术》及《四时纂要》则均记:“猪性便水生之草,收浮萍、水藻饲之则易肥。”因此,猪一直被视为水畜。如《易经·说卦》指出:“坎为豕”,“坎为水,为沟渎”。《周易正义》唐代孔颖达疏:“坎为豕,坎适水渎。豕处污湿,故为豕也。”宋代陆佃《埤雅》则释:“坎性趋下,豕能俯其首,又喜卑秽,亦水畜。”《史记·天官书》曰:“奎曰封豕,为沟渎。”这些后世的解说虽多牵强附会,但多少说明了猪喜水之基本特性。人们对猪的这种基本认识在采猎时期应即已确定。因为最初的人类活动地多为依山傍水的丘泽地带,而豕、鹿又是这类地带的主兽群,《孟子·尽心(上)》记载:“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因此,豕

与鹿一样是当时人们的狩猎大宗,如殷墟遗址出土的卜辞中,关于狩猎野猪的记录就有三回,最高狩猎数达 113 头之多。要获豕,必对其生活习性作最大可能的观察和认识。此外,前之所引文献虽多指畜牧之猪,但家猪的这些习“水”性并不是驯养的结果,而是“天性”的继承,如家猪好卧于污泥浊水,今人多以猪肥胖需卧水散热来解释这种现象,非,实亦其野生祖先(并不肥胖)遗传下来的天性。

2. 灵畜:在我们讨论猪在史前早期社会的多种功用之前,首先需要破除一下我们心目中根深蒂固的“蠢猪”观念。猪并非又懒又笨,贪吃贪睡,长一身肥膘,终为人所食的蠢物,是人类最终使其然,并非其本性如此。现代科学家也已证实,猪与狗具有同等的智力。人类在初期也并非如此看它,猪在史前社会曾被视为很神圣的灵物。例如河姆渡遗址出土的一些身上加饰圆圈纹和植物纹的猪形图案和双首共身陶猪(照片 3)明显具有特殊含义。又如陕西扶风案板遗址一处属仰韶晚期的地层里,出土了许多被纤维状编织物包裹着的猪头骨,有些猪头骨还被涂了红色颜料。^②而这两项措施,众所周知,也是有其特殊巫术宗教意义的。又如新石器时代出土的卜骨,也是以牛、羊、猪之肩胛骨为多^③,后世才盛行龟甲卜、鸡骨卜等。《论语》中子路与孔子的一段对话正阐述了这种历史发展因缘,子路问:“猪肩羊膊可以得兆,鬃苇蕞髻可以得数,何必以蓍龟?”孔子答:“不然,盖取其名也,夫蓍之为言,耆也,龟之为言,旧也。明狐疑之事,当问耆旧也。”

3. 知雨畜:许多动物对与其生存关系重大的自然现象之变化均有一定的预知能力,如蚁类能感知暴风雨之将临,候鸟能预知气候之冷暖、四季之变迁,鼠、狗等能预知地震之将发,诸如此类。作为水畜的猪(尤其是豕,因为家养后,许多动物的原始生

存技能会退化,甚至消失),对雨之将至也有一定的预知能力。如夏天,尤其在南方,下暴雨或雷阵雨前,人们往往会发现猪喜欢到泥水处卧滚,过后就会有大雨。猪的这种特性为采猎民所认识、所利用,同时也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人们所神化,猪成了知雨畜。考古的材料很缺乏,但我们从一些文献中可以一窥这种观念在后世之孑遗。如《诗经》小雅《渐渐之石》篇描写出征将士怨叹道途艰险,跋涉劳顿,其间有句曰:“有豕白臄,蒸涉波矣,月离于毕^④,俾滂沱矣”。毛传云:“将久雨,则豕进涉水波。”当然,现在人们已能科学地解释这种现象,这是因为这种雨前天气气压低,天气闷热,而猪厚脂(猪为蛇之天敌,就是因为猪有厚厚的脂肪,能中和蛇毒而防止蛇毒进入血液),散热不易,处泥水以降体温,维持正常的生理过程。然当时的人是不可能知道这些的,随着“猪为知雨畜”观念的进一步神化,这种自然界的物象观察经验进一步被引象为雨兆天象。南朝·梁·任昉《述异记》曰:“夜半天汉中有黑气相连俗谓之黑猪渡河,雨候也。”唐·黄子发《相雨书》亦记:“四方斗中无云,唯河中有云三枚相连,状如浴猪,三日大雨。”(《古今图书集成》卷八十)

4. 祈雨畜:猪为水畜、灵畜、知雨畜在采猎时期就为人们认识和利用了。进入农业社会后河姆渡人已以稻作为生,而水稻又是尤其忌旱的作物,求雨成了人们求生存的大事要事。猪为水畜,使人确信其与人利益一致,其为灵畜、知雨畜又使人相信其与“上天”有通。由此,猪自然而然、理所当然地被选为人类利益的代言人上天求雨。河姆渡时期的猪形图案装饰器和猪形塑可能就是用于此类求雨祭祀的。过去,有观点认为这些猪形塑及猪形图案装饰器是祈畜牧业之发达,但我们注意到这些刻划、掐塑多为野猪(即豕)形象(也有用近似家猪的,如一件小陶猪,照片4),用于为畜牧业的祈祷巫术是很不恰当的,而用于祈雨

巫术,正中要的,因为我们在前面已经说明过,野猪在“知雨”这一点上会比家猪更灵敏。野猪(因残,很难确认是家猪还是野猪,但似乎与野猪更像些)与稻绘在一起(照片5)也正说明这种巫术的最终目的是祈雨,使水稻丰收。如果不是用于祈雨,稻豕绘在一起就很难解释了,因为豕,尤其是在原始农业中是一大灾害,古之腊祭就反映了这种状况:“腊之祭也,主先墙而祭先墙也。……古之君子使之必报之,迎猫为其食田鼠也,迎虎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礼记·郊特牲》),就算是家猪,与稻组绘在一起,如果不是用于祈雨巫术,也是难于解释的。有人提出这幅图画正反映了农畜两旺的丰收景象,然我们知道当时的农业还未知施用人畜粪肥,稻与猪绘在一起在河姆渡时期还是无法在这个意义上组合寓义的,“猪满圈,粮满仓”只能是在农作知用人畜粪肥之后的寓义写照。同时我们也试着对猪图中猪身上的图案刻划提出自己的观点,以方钵上的豕图为例(图1),其圆圈纹,近有同志认为是表示箭矢射中豕之心脏,是一种狩猎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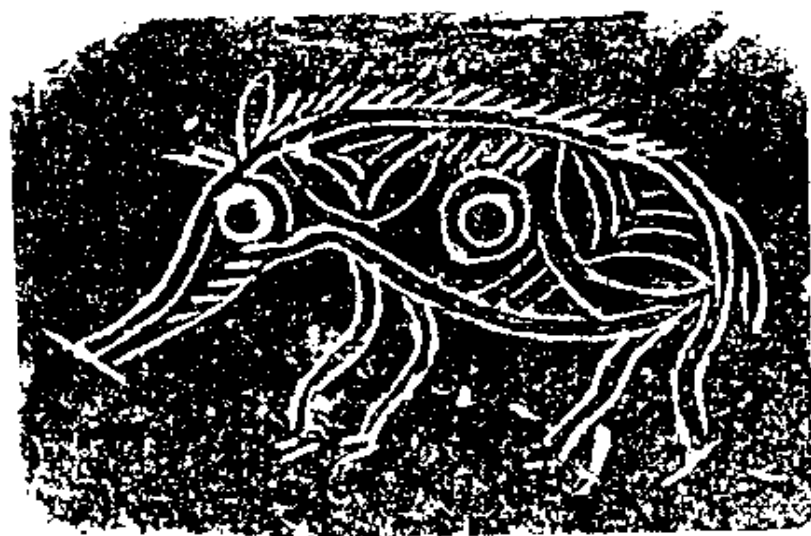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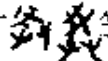
图1 豕纹方钵上之豕纹

术^⑤。我们认为中国以及世界各地发现的众多岩画,其中许多应该就是采集狩猎民为狩猎举行巫术活动后的遗存,其施巫手段是在野兽图像上绘上射在它身上的箭矢、尖木棍等,或绘出它流血的创伤口,而此件钵上之豕图,身上填绘圆圈纹和植物纹,当与狩猎无关而与农业有关。过去则多把此圆圈纹释为日纹,统归为日崇拜之证例。我们认为圆圈纹在河姆渡文化中并未定义化、规范化,仍为一种点、线之类的构图要素,视其绘于不同部位不同布局中分别表示日、日、水滴之类。此幅画中正以释雨滴为妥,因其上方有一组由斜短线组构成的“雨丝”(现代儿童画仍用这种方法画雨丝),其旁为一植株形,下似根,中间横线似土面,上为叶草形,此圆圈基本处于土线处,且偏下,代表着雨滴落在土上且渐渗入土中,为植物之根所吸收,如为日,绘在这个部位就很难解释。因此,我们认为此组图案实际上表达了豕祈雨巫术之目的,它与豕形图案及它们的附着实体钵等(即祭器),或许还有祭器内盛的祭品(据研究被宰家猪多为幼年,在食用之外,可能还和巫术祭祀有关^⑥)一起构组了一个完整的巫术祭祀过程:巫领人们献祭祈愿——送豕上天求雨(为使豕不忘此行目的,为了天神一看就知道人们的祈愿,人们把豕刻在祭器上,把雨降禾苗的图案刻划在豕身上)——希望它求雨成功、雨降——植物得到滋润,生长茂盛——人们如愿。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采猎时期,猪为水畜、灵畜、知雨畜的观念已经形成,并已为人们所认识利用。发展到原始农业早中期,这种认识更被广泛利用于直接关系稻作丰荒的祈雨祭祀中。

但再向后发展,由于猪之饲养越来越普遍,成了人们的主要肉食来源。如属齐家文化早期的大何庄遗址出土猪下腭骨 194 块、羊 56 块、牛 6 块,到晚期的秦魏家遗址则剧增到猪 430 块、羊 50 块、牛 38 块,其它种类之兽骨则发现很少^⑦,可见当时猪

之饲养量已很大,是大宗中之大宗,且发展速度很快。正是在人们大养其猪、大食其肉的过程中,猪之灵气神性渐渐地被淡忘了(此命运与鸡极相似。前文引述的河姆渡遗址“神猪”材料也均出于最早的第四层,不见于晚期地层中,从某种角度看,似也正反映了这种过程),而作为肉食及财富象征的意义则在日渐加强,原始社会晚期的墓葬已普遍出现以殉葬猪之有无或丰寡以别贫富贵贱的情况,如前述永靖大何庄、秦魏家遗址的墓葬中,都发现有少数墓用猪下腓骨随葬,其中秦魏家随葬最多的一座墓竟达 68 块^⑧,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尤其是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址墓葬情况也很典型地反映了这种过程。^⑨再后来,由于冶金及采矿业之兴起,人们有了更珍贵的青铜器、金银铁器、玉石器等来标志财富和权力,猪渐失其财富地位之象征意义而渐演为大众化之祭祀牺牲。这期间有条分支观念也在平行发展,这就是视猪为贪虐之象征。它最初的认识可能是出于对猪性的真实观察——贪吃、凶狠,后被借用于对人、事的比拟,如《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记伯封事曰:“昔有仍氏生女,繄黑而甚美,光可以鉴,名曰玄妻。乐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实有豕心,贪戾无厌,忿戾无期,谓之封豕。”后世盛行的饕餮很可能也就是这一分支观念的发展结果。因为最早记载饕餮的《神异经·西南荒经》只记:“西南方有人焉,身多毛,头戴豕,贪如狼恶,积财而不用,善夺人谷物(上二句原作“好自积财,而不食人谷。据《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改)。强者夺老弱者,畏群而击单,名曰饕餮。”^⑩在《左传》及其以后的文献记载中饕餮才被和缙云氏之不才子及蚩尤等联系起来,含义或也因此有所改变,但贪虐之基本含义仍存。当然这只是一个支流的发展情况,此时猪观念之主流前已提及由于猪之饲养普遍取用简易而终成最普遍意义上的祭祀牺牲。如殷商时期,人们已普遍以豕为家祭牺牲了。卜辞中“豕”字出现频

繁,吴大澂曰:“古家字从宀从豕。凡祭,士以羊、豕。古者庶土庶民无庙干寝,陈豕于屋而祭也。”甲骨文中还有等字都作双手捧豕形,当为以猪祭献情形的描绘。这说明猪在当时已普及到各家必养,是最普遍意义上的百姓人家的家祭牺牲,而且其它的一些卜辞也反映出当时猪也广泛用于其它各类祭礼。^⑩这种情况一直被延续和发展下来,《淮南子》记:“飨大高者,而彘为上牲”(汜论训),高诱注:“大,高祖也,一曰上帝”。又记:“立夏之日……,天子以彘尝麦,先荐寝庙”(时则训),高诱注:“是日麦始升,故以豕尝麦,豕水畜,宜先荐寝庙,孝之至也”。明·邝嶷《便民图纂》记:“五月……,戊辰日以猪头祀灶,令人所求如意。”《梅里志》记:“凡遇疾病,均已驱祟为急,务供神马,煮猪首以祀,名曰‘献猪头。’”浙江嘉兴一带过年逢节要“祝福”,祭天地、敬祖先,请“利市”,供品也必有猪头,尤喜用一种头肥耳大,状似“元宝”,头部皱纹象古时“寿”字,所谓呈“吉利”之相的“寿字头”猪。^⑪之所以会有这种越用越滥,猪头祈福消灾“万能”的发展趋势,早在《淮南子》一书中就已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其中缘由:“世俗言曰……飨大畜而彘为上牲,非彘能贤于野兽麋鹿也,而神明独飨之,何也?以为彘者,家人所常畜而易得之物也,故因其便以为之。”

以上我们论述了猪在巫术、宗教意义上的五个发展过程:水畜、灵畜,知雨畜→祈雨巫术→财富、地位之象征(…贪虐之象征…)->大众化之祭祀牺牲。但这并不说明它们之间是截然断裂的,而是有很大继承性的。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很难想象猪会和祈雨有关,但只要 we 仔细检索历史就会发现,这种原始观念一直以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被继承着。如原始社会晚期,猪之祈雨功用虽然可能已消退,但许多实用水器却被塑为猪形,如崧泽出土的猪首形匜(M52),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猪形鬲,江

苏高邮龙虬庄遗址出土的猪形罐^⑩等。崧泽、良渚文化中出土许多豕面纹器,尤其是良渚之玉琮,多刻有豕面类纹饰,如江苏草鞋山 T303M1 出土的玉琮上就有八组此类纹饰,另反山、瑶山、福泉山、张陵山等遗址均有此类玉琮出土。近见藏振考证,琮本身就是整猪或猪头之代意。^⑪我们初步推测这些可能与河姆渡时期以豕祈雨之巫术观念有一定的继承关系,当然其具体功用可能已有所改变。正因为猪在史前充当过诸如此类的角色,以致在后世的一些神话传说中,能招雨消旱的神怪们往往也因此被赋予了猪之体征,如《山海经·东次四经》记载:“(剡山)有兽焉,其状如彘而人面,黄身而赤尾,其名曰合窳,其音如婴儿。是兽也,食人,亦食虫蛇,见则天下大水。”(重点号为引者所加)虽已被神怪化,然仍保留了一些猪之基本体征和食性,且被神化的基点就是与水之关系:见则天下大水。又如《太平御览》卷八八三引《神异经》曰:“南方有人,长二三尺,裸形而目在顶上,走行如风,名曰魃。所见之国大旱,赤地千里,一曰旱母,一曰傜,遇者得之,投溷中乃死,旱灾销也。”(重点号为引者所加)“溷”通“盂”,原始意义为猪圈。以猪圈为旱神之克星,曲折反映了猪祈雨的原始巫术观念。又据日本学者研究,日本的弥生文化主要是由“渡来人”(指中国徙日的稻作民)创造的,他们成族成族地迁徙而去,带去的不仅仅是稻作技术,而且包括他们的等级制度、家族制度及全部的生活方式。据研究:弥生时代的猪不同于绳文时代的猪,不仅仅是形体特征,而且解体、食用等方面的处理方法也不一样,因此也被视为渡来人的随带之物。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猪不仅食用,也用于礼仪,因为这些猪的下颌骨多见穿孔,这种孔与食用无关,是穿在棍子上挂起来的,如菜畑遗址,其周围还有涂朱色的陶器,下颌骨没有孔的,是将其联合部挂在棍子上,如唐古遗址,发现把 13 块下颌骨挂在一根木棍上。日本

学者西本丰弘认为：“这种作法可能与礼仪有关，其礼仪就是农耕礼仪，在农耕开始时企求风调雨顺，从这一点考虑，不应该认为当时单单是水稻技术传到日本，而应该认识到当时是包含农耕礼仪在内的整个农耕文化都传到日本，即猪不单是作为食用的，还是作为农耕礼仪的必要物被带到日本来的。”^⑩（重点号为引者所加）日本的弥生时代为公元前 300 至公元 300 年，此时日本人开始以稻作农耕经济为主要生活来源。众多的考古和文献材料已足以证明江浙稻作民与日本自古以来特殊的密切关系，这些渡来人中会有大批的江浙稻作民，弥生猪骨遗骸的“礼仪性”特征，或许正是江浙稻作民豕祈雨远古农耕礼仪文化的迁播和继承。豕用于祈雨，在中国殷商时期仍有孑遗，如《合集》编号 28180 卜辞记：“王其侑于滴，在右岸燎，有雨/即川燎，有雨/王其呼戊舞孟，有雨。吉/惟万舞孟田，有雨，吉/登、燎、惟豚/惟羊/惟小牢。”又如我们知道西汉求雨已普遍用土龙和蛙，《春秋繁露》对此有详尽记载^⑪，但其中春旱求雨和夏求雨二节中，祭雨牺牲均用到猪。唐天复四年（904 年），蜀城大旱，守宰也是到常见“牝豕出入”的“母猪龙湫”去求雨的（五代末·孙光宪《北梦琐言》）。阴阳五行学说形成时，猪被定为水畜。与下雨有关的雷公有时也被描绘成猪形，唐·房千里《投荒杂录》记：“雷公豕首麟身”，唐·李肇《唐国史补》亦记雷公“状类彘”。被大家较一致认为是龙原形之一的鳄又俗名猪婆龙，微山湖祭水神要用无杂毛之黑猪为牺牲^⑫，水族祈雨则用多乳头多产仔的母猪^⑬。诸如此类，均说明猪与祈雨有关的观念表面看似已被人们彻底忘却，为后世的各種新观念所替代，其实却以顽强的生命力孑遗在人们的意识思维深处，这也正可逆证：这种观念在远古时期一定有一个繁盛期，造就了一个深厚的意识积存，否则它不会经得起时间的如此消蚀而依旧不灭，河姆渡早期文化应该说就是这种猪祈

雨巫术繁盛地、繁盛期的一个典型。而此时此地之所以会有猪祈雨巫术之繁盛,又是由河姆渡社会的经济基础——稻作所决定的,以豕祈雨和以鸟祈日(注:原提“鸟图腾崇拜”,笔者认为以鸟为媒介的日崇拜巫术,其最终功利目的是为稻作祈阳光)应是河姆渡这支以稻作为基础的新石器文化最显明的两个特征。

注释

- ①吴汝祚等:《农业与文明》,《农业考古》1992年第3期。
- ②王建新:《陕西扶风案板出土的陶塑人像》,《文物天地》1992年第5期。
- ③李汉鹏:《论先秦时期的真人集团》,《东南文化》1993年第4期。
- ④毕为雨星,月儿落入毕星座,为雨兆。
- ⑤袁靖:《史前人类和自然生态的关系——关于动物考古学的几个问题》,《史前研究》1990—1991年辑刊。
- ⑥刘军等:《中国河姆渡文化》,第41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 ⑦⑧郑乃武:《小谈齐家文化的农业遗存》,《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
- ⑨何德亮:《论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养猪业》,《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 ⑩《神异经》虽为六朝文士托古之作,然所录神异故事多有所本,如所记东王公、西王母相会之故事也见于汉画像石,因此,其所本源之饕餮传说很可能早于《左传》等所记。袁柯先生在《中国神话传说词典》“饕餮”条下的文献材料排列秩序似也说明了这种认识倾向。
- ⑪卫斯:《从甲骨文看商代养猪技术》,《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
- ⑫龚宏勋:《嘉光猪的形成及其演变》,《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 ⑬张敏等:《龙虬庄遗址发掘再获重大成果》,1994年2月27日《中国文物报》。
- ⑭藏振:《玉琮功能刍议》,《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4期。
- ⑮[日]西本丰弘著、袁靖译:《论弥生时代的豕猪》,《农业考古》1993年第3期。
- ⑯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十六,求雨第七十四。

⑫ 刘君：《微山湖敬大王》，《民俗研究》1993 年第 1 期。

⑬ 潘朝霖：《水家祈雨活动“敬霞”试探》，《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89 年第 4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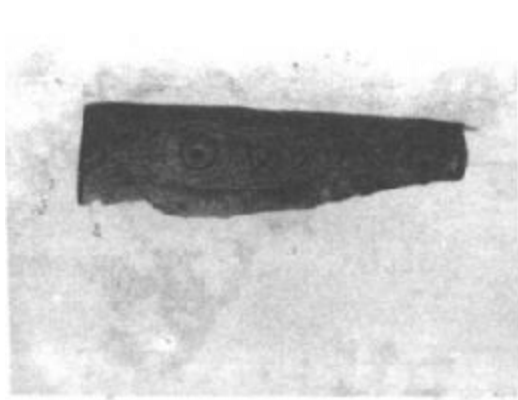


图 2 猪纹骨雕片(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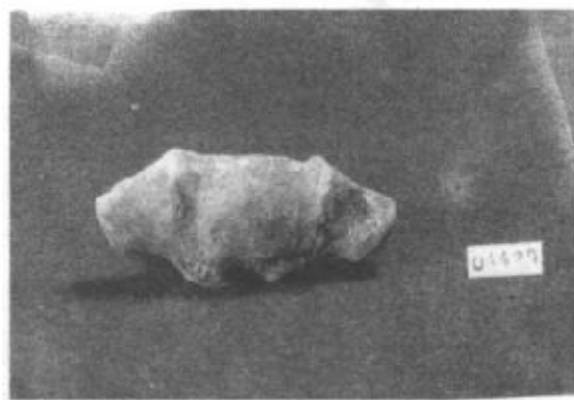


图 3 双头共身陶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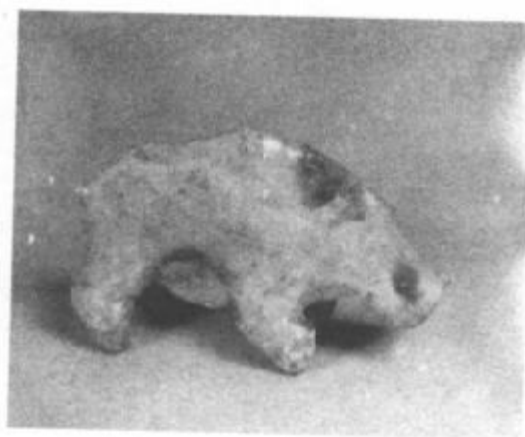


图 4 小陶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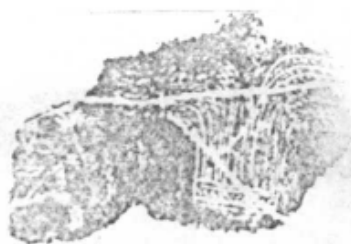


图 5 稻豕纹陶盆

河姆渡先民的原始历法

叶树望

中国号称农业古国,与史前农业密切相关的远古天文历法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发展,正在逐渐明朗。在河姆渡遗址,出土了大量骨耜等农具、炭化稻谷和稻草,充分显示出河姆渡的农耕稻作文化已达到了相当的经营规模和生产水平。在此之前,河姆渡先民必然还有很长一段栽培水稻的历史。与此相适应,河姆渡先民必须掌握原始的天文历法知识,否则,如此规模的农耕生产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河姆渡先民已经形成对太阳和风鸟的崇拜,并且确实已经掌握了原始历法知识。

一

在河姆渡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鹿角。在 1400 余件鹿科动物的角标本中,仅四不象鹿角就几乎占了三分之一强,有 550 余件。以保存角环的标本统计,属自然脱落的 22 件,非自然脱落的 92 件。^①鹿类是东南沿海新石器时代遗址屡见出土的动物,浙江桐乡罗家角遗址也有大量鹿角堆积。固然,鹿类是一种非常温驯的动物,便于原始人类围捕,以充实生活资料。但仅在河姆渡 2800 平方米的发掘范围内,就出土了如此众多的四不象鹿角,并且有很大一部分是属自然脱落的,其中幼年鹿角也不乏其数,这绝不是一种偶然或孤立的现象。宋代王应麟《玉海》卷十:

“尧之作历，仰观象于天，俯观事于民，远观宜于鸟兽。”其中“远观宜于鸟兽”是我国远古时代先民观察草木鸟兽来确定季节的方法。这在我国古老的历法《夏小正》中说得明白：（十有一月）“陨麋角。陨，坠也，曰冬至。阳气至始动，诸向生，皆蒙蒙矣，故麋角陨记时焉尔。”这就是说，当麋鹿脱角时，冬至就到了，大地开始暖气微微，万物也将蒙蒙苏醒，新的一年又将开始了。《礼记·月令》也说：“仲夏日，鹿角解，仲冬日，麋角解。鹿以夏至陨角而应阴，麋以冬至陨角而应阳。故知二者阴阳之性不同也。”这就是利用物候确定冬至和夏至的观察标准。足见观察鹿类脱角在原始历法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在河姆渡遗址出土众多鹿角的现象，不得不使人们与古代的物候观察现象联系起来考察。河姆渡先民很有可能观察一年一度鹿类脱角来确定冬至和夏至这两个节气的。麋鹿俗称“四不像”，是我国特产的动物，鹿类一直被历代帝王视为珍兽，并放养在囿苑中，民间也历来把它奉为吉祥物，其原因正在这里吧。对此，西安植物园的韩涛先生已有非常全面的论述。^②

在河姆渡遗址出土文物中，有许多刻划、雕刻或堆塑鸟和太阳形象的珍贵文物，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文化现象。其质料有象牙、骨、木和陶等。其中有 T244（四）鸟形象象牙圆雕，形如牙匕，正面微凸，雕刻弦纹和斜线纹相间的图案，一端作鸟头，喙弯曲，一端作长尾，中间饰翅膀，长 15.8 厘米、宽 3.4 厘米、厚 0.8 厘米；T226（三）双鸟朝阳纹象牙雕刻件，正面中心刻划一组五重同心圆，外绕火焰，形似太阳，两侧刻有昂首相望的连体鸟，形态逼真，上下还钻有小圆孔六个，长 16.6 厘米、残宽 5.9 厘米、厚 1.2 厘米；^③T21（四）连体双鸟纹骨匕柄，上刻两组双头连体鸟，朝着相反的方向伸颈，中间有一个形似太阳的圆圈，长 14.5 厘米、宽 3.4 厘米。^④还有陶塑飞鸟和形如鸟首的陶器盖纽。此

外,所谓的“蝶形器”,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其实这类东西不是蝶形器,应该称之为鸟形器。^⑨在有些鸟形器正面还刻划有形似太阳的多重同心圆。以上这些众多鸟纹及太阳形象的出现,无非是表明太阳是与河姆渡先民休戚相关的,特别是进入农业时代以后,太阳在更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的命运。太阳可以降福,也可以降灾祸于人,太阳当然成为最伟大、最受崇拜的对象。由此看来,尊太阳为神灵的宇宙崇拜意识一直可以追溯到河姆渡时期,甚至更早。

鸟形象不仅在河姆渡文化中大量出现,而且在以后的良渚文化中,作为祭祀天地礼器的玉琮、玉璧、玉钺等重要玉器上也均雕刻有鸟的图案,屡见不鲜。可见,鸟在原始文化部族的心目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这种鸟与太阳的共存现象,无疑显示出鸟是空中神秘的动物,是介乎人天(太阳)之间的神使,而双鸟连体又意味着交感繁殖,象征着生命的诞生。

事实上,鸟确实为人类的原始农业生产活动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帮助。在《越绝书》上就载了古代浙东一带“象耕鸟耘”的现象:“舜葬苍梧,象为之耕;禹葬会稽,鸟为之耘。”《水经注》且解析为:“鸟为之耘,春拔草根,秋啄其秽也。”东汉时期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对此解释得更为明白:“鸟田象耘,报佑舜禹,非其实也。实者,苍梧多象之地,会稽众鸟所居……象自蹈土,鸟自食苹,土蹶草尽,若耕田状。”^⑩这就是说,把鸟田象耕现象解释成报答舜禹,天人感应所致的说法是不足取的。象耕乃是沼泽地经过野象的踩踏后,就成了耙耕过的水田。浙东沿海的低湿地上,长满了苹草之类,经过众鸟的啄食,起到去除草根、消灭虫害、净化土壤的作用,也适宜于播种稻谷。“鸟自食苹”的“苹”,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为鸿雁所喜食。因而,古代浙东一带就有把农田称作“鸟田”的。如《越绝书》说:“大越海滨之民,独以

鸟田,大小有差,进退有度。”《吴越春秋》也说:“少康恐禹之绝祀,乃封其少子于越,号曰无余。余虽受封,人民山居,虽有鸟田之利,租贡才给宗庙祭祀之费。”鸟田的称呼应以鸿雁等游禽缘水而居啄食苹草之类而产生的。

此外,候鸟在远古时代观象授时,确定农业生产活动的节气方面,确实也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左传》昭公十七年:“玄鸟氏司分者也,注:玄鸟燕也。疏:此鸟以春分来,秋分去。”按照先儒的解释,确定每年的春分和秋分,就是以“玄鸟”的来去为依据。在古代,人们确实是用这种物候方法来确定节气的。如《礼记·月令》:“仲春之月,玄鸟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谋,天子亲往。”仲春之月,燕子回来的一天,天子还要亲自去庙里进香呢。我们知道,一切事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在三代时用“玄鸟司分”。那么,早在六七千年前的河姆渡先民完全有可能用其他候鸟来作为物候标准。《尚书》扬州赞:“阳鸟攸居。传谓:随阳之鸟,鸿雁之属也。”^⑦《礼记·月令》也载:(季秋之月)“鸿雁来宾”。鸿雁,栖息于河湖、沼泽地带和海滩,每年春分时节飞往北方,秋分时节飞回长江下游及稍南地区越冬,多于晨昏觅食野草根茎。再据地质资料分析,六七千年前,河姆渡一带就有大片的沼泽地和湖泊,并靠近海涂。河姆渡人曾在这里捕捞大量的水生动物。在这一带至今仍有大量的泥碳层,这就是当年沼泽地和湖泊湮没后造成的地质状况。这里确实是鸿雁越冬的好去处。鸿雁的食性也与《水经注》上所说的“春拔草根,秋啄其秽”的现象吻合。由此可见,鸿雁与河姆渡先民的关系非同一般。每年鸿雁往北飞时,就是春分到了;鸿雁飞回来时,那就是秋分到了。这就是河姆渡先民利用鸿雁确定一年的秋分和春分的物候标准。河姆渡先民,用他们认为最有灵气的象牙和骨片雕刻成鸟形器或“随阳之鸟”图案,显得如此神圣而庄严的道理就在

这里。鸿雁就是三代时期利用玄鸟作为物候定二分的早期标准。这样,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河姆渡先民太阳崇拜的象征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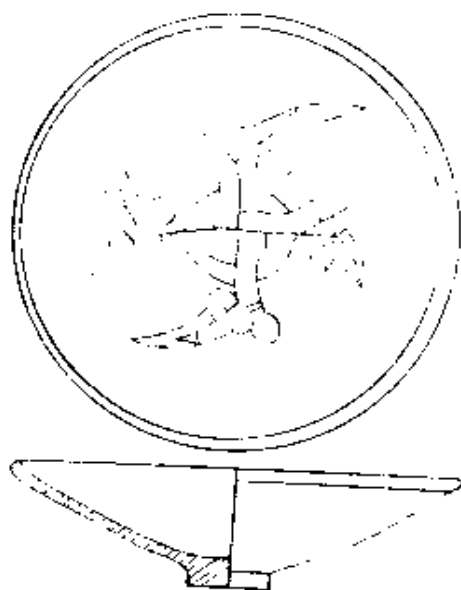
然而,揭示双鸟朝阳纹象牙雕刻件及其鸟形器的用途。学术界存在着较大的分歧。这些鸟形器,或者双鸟朝阳象牙雕刻件等,在周边大多钻有数个小圆孔,在圆孔边缘还有明显的系绳悬挂后留下的磨损痕迹。我们既然认为鸟与原始人类的农业生产确定节气的历数密切相关,人与鸟、鸟与至高无上的天之间有着特殊的联系,这就难怪河姆渡先民会对鸟有着特别的感情和敬畏,并且逐渐使之超然于现实之上。这种粗看起来像原始人类装饰件的出土物,其实寄托着河姆渡先民的一种非常深刻的信仰和崇拜。鸟是空中神秘的动物,是神灵之精,理当顶礼膜拜,祈祷着它能保佑风调雨顺、谷物丰盛。这无疑表明,河姆渡先民已把这些鸟形器作为掌握天文历算的历正的徽志。每年麋鹿脱角,鸿雁来去的四季到临时,人们就把它系绳悬于胸前作徽章,以为授时。这可以后世的《左传》作为佐证。昭公十七年秋:“……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据先儒解释,“正”是掌管天文历象的;“分”是指春分秋分;“至”即是冬至夏至;“启”就是立春立夏;“闭”立秋立冬。这就是上古流传的风鸟知天时。这里有一点要说明,河姆渡出土的鸟形器不但质料不同,而且有些鸟形器制作考究、雕刻精细;还有一些却是用石、木质制作的素面鸟形器,显得比较粗放,其体形大小也相差悬殊。这种鸟形器背面中部有两道平行的纵向突脊,两脊之间形成一道上端不通的凹槽,脊上部往往有钻孔,两翼上端亦常有横脊或钻孔。笔者认为,这种鸟形器,其实也是一种历正的徽志,把它安上柄,立于房屋旁边,或立于氏族部落的公众场所上以为授时。^④故鸟形器的作用虽相同,但用法有异,当不可一概而论。

河姆渡先民在六七千年前,经过长期的生产实践,积累了丰

富的经验,已知道利用物候方法掌握春华秋实、寒来暑往的节气转换规律,确定二至二分节气,适时地安排农业生产活动。但是,如果说,河姆渡先民在距今六七千年的时候毕竟没能为我们留下最有说服力的直接物证的话,那末,笔者在距今 5000 余年的河姆渡第一文化层的出土物中,却发现了一种颇具特殊意义的原始历法图象。

二

在河姆渡遗址 T233(一)出土了一件编号为 M4:1 的泥质灰陶刻花豆^⑨。豆柄全残,仅剩豆盘,直径为 25.8 厘米,在内壁刻划有一组阳鸟组合图案(见图 1)。内壁中心刻划着用长短不等的实线条和虚线条连接的圆圈,在其圆心部位,分别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刻划出四个长颈鸟头,也是用实线和虚线的组合线条勾勒。长喙、大头,其喙都伸向顺时针方向,无一例外。根据此鸟形态特征,与鸿雁无异。我们仿佛看到河姆渡先民从距今 7000 年前到 5000



M4 豆盘

年前对此种候鸟崇拜连续性的迹象。笔者认为:如果我们动态、旋转地来看这组图案,无疑,其中包含着原始天文历法的特殊含意,豆盘内壁正中的圆圈与凤鸟的组合,按照传统的习惯解释,应是太阳的象征,但它用实线和虚线的组合线条刻划的现象,却又象征着太阳的阴阳变化,说明与历法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再说古人认为凤鸟是知天时的。为此,我们就有理由把分别伸向四个方向的雁头所指方位看成与季节有关的图形。我们都知

道,古代的《周易》不能简单地把它说成是一本占卜书,它还是我国早期的一部历法著作。《周易·系辞上》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豆盘上所刻划的长颈雁头所指引的方位,正与以上四象的概念相合。两仪从历法概念来说,是指阴阳。两仪再分裂,就成四象。四象在历法上又称少阳、太阳、少阴、太阴,相当于农历上的春夏秋冬。因此,古人不但将一岁按阴阳分为上下两个半年,而且还进一步将阴阳再各分为两半。《管子·乘马篇》也说:“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为此,笔者认为,豆盘上所刻划的长颈雁头所指的方位,表示的就是这个意思。

《周易》中的八卦有卦画、卦名和卦象。先天八卦的卦名自东北沿顺时针方向旋转。排列为震、离、兑、乾、巽、坎、艮、坤。如果我们在豆盘的组合图案上通过圆心,加两条辅助线,平均分割四象限,就发现这两条辅助线是互相垂直的,并有一条连接向对雁喙的尖端。这就成了《周易》上的四象再分裂,便成为八卦了。也就能与先天八卦自东北沿顺时针方向排列的卦名一一对应。《周易》中的太极一分为二,就是将一岁分为阳阴两个半年,可用——(阳)和--(阴)两个卦画来表示。阴阳两仪再分裂为四象,那就成了 ☳ (少阳)、☰ (太阳)、☷ (太阴)和 ☵ (少阴)。四象再分裂,只要分别在每个卦画上依次类推地加上阴阳两个卦画,便成为八卦。从八卦的卦画中就能看出季节的变化。因为,八卦与季节和方位都是一一对应的。震在东北为初春;离在正东为仲春;兑在东南为初夏;乾在正南为盛夏;巽在西南为初秋;坎在正西为仲秋;艮在西北为初冬;坤在正北为寒冬。《周易》中卦画的表示法,在豆盘内壁的阳鸟组合图案中也可看出卦画的肇始。如那个均用虚线勾勒的雁头所指的北方位,卦名应为坤,是为最冷的寒冬季节,其卦画是 ☷。反之,与它相对的那个用实线条刻划的雁头,指向正南,卦名应为乾,是为盛夏,其卦画是 ☰。豆盘上的这组刻划图案的虚实线条的区分,并不

是河姆渡先民无意识的创作,而是有一定意义的,似乎与卦画的阴(一一)、阳(—)符号虚实区分不谋而合。就卦画本身在天文历法上的概念而言,无非就是阴阳(虚实)对照,以表示节气的周而复始。因此,毋庸置疑,早在 5000 年前的河姆渡先民刻划在豆盘内壁上的阳鸟组合图案,应该就是原始八卦的先声,是河姆渡先民原始历法的写实。

综上所述。造就河姆渡发达的原始农业,是离不开天文历法知识的,它们是相辅相成的。河姆渡先民早在六七千年前已能用物候来推算节气,到了距今 5000 年时,他们已能用图案表示出这种原始历法。这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才从最初的历法概念,形成反映天文历法的实物图像的。河姆渡先民在历法上获得如此之成就。时间又是如此之早,确实体现了中华民族对文明的首创精神。

注释

- ①《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动物群》,海洋出版社出版。
- ②《正本朔源话二至》,《农业考古》1991 年第 3 期。
- ③④《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0 年第 5 期。
- ④《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 年第 1 期。
- ⑤参阅《越国鸟图腾和鸟崇拜的若干问题》,《浙江学刊》1990 年第 6 期。
- ⑥《论衡·书虚》。
- ⑦参阅《百越族的鸟田文化》,国际百越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
- ⑧参阅《河姆渡文化与凤鸟的关系》,国际百越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

试论河姆渡无头葬及肢骨不全墓

黄渭金

河姆渡遗址第二期考古发掘,均未能发现氏族公共墓地,而仅发现一些零星墓葬。其中第一期发掘时,在第二和第三文化层分别发现过2具人骨架,但具体资料不详。^①第二期发掘发现的27座墓葬中,第三文化层13座墓葬,骨架“多半不全,不是无下肢就是不见头颅”。如M16头颅与身躯分离;M19不见头颅;M20仅见上半身骨架,不见下肢骨等。第二文化层3座墓葬,骨架也都不完整,2具缺下肢骨,另1具头盖骨和上颌骨分离较远。^②

本文利用考古学、民族学资料及文献史料,对上述无头葬和肢骨不全墓所反映的宗教习俗及产生的原因、墓葬性质等问题略呈管窥。

一、无头葬是猎首习俗的遗存

考古发掘时经常发现一些灰坑及墓葬中埋有单独人头骨及无头躯干现象。如江苏常州圩墩遗址马家浜文化时期的M9与M10及M10与M11之间,均发现多出了一个人头骨,编号分别为M22、M23。^③苏州吴县张陵山良渚文化M4的南部发现一些零星的人肢骨,中部和北部发现3个人头骨,其中西北角上的一个保存较好,顶骨向上,直立于墓内。^④湖北房县七里河石家河文化时期墓葬中,发现M21虽有丰厚的随葬品,骨架也基本保

存完好,却不见头颅。在一座半地穴式椭圆形房址中,也曾发现一个完整的人头骨及一些骨器、石器和陶器,且未见人体其它部位的骨架。^⑤松滋桂花树大溪文化 M2 中三个头骨排成“品”字形,另一头骨则与随葬品共置一处。^⑥山西侯马东呈王遗址一个灰坑底部埋有一具缺失下肢的俯身人骨架和两个人头骨,填土中夹杂红烧土、炭化谷物和三个陶罐。^⑦河北邯郸涧沟两个灰坑中分别放置三个头盖骨,头骨上有清晰砍过伤痕。^⑧河南濮阳西水坡有两个灰坑各埋一具无头人骨架。^⑨云南宾川白羊村遗址的 10 座一次墓葬中,共发现 23 具以上的无头骨人骨骼;6 座 2 次墓葬也均无头骨。^⑩另外在台湾高雄市桃仔园风鼻头二期文化的贝丘遗址中,也发现被损坏颞骨的人头骨。^⑪台湾卑南遗址也有缺人头骨的墓葬发现^⑫。据研究上述灰坑或墓葬中的无头葬或单独的人头骨,是史前时期猎首习俗流行的结果,否则就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

进入历史时期的猎首习俗主要流行于我国南方的百越民族及其后裔中。《九歌·招魂》:“魂兮归来,南方不可止些,,雕题黑齿,得人肉而祀,以其骨为醢些。”《太平寰宇记》儋州风俗条说生黎“杀行人取齿贯之于项,以炫骁勇”。《太平御览》载钦州僚人“得一人头,即得多妇”。《南州异物志》载交广乌浒人“恒出道间,伺候二州行旅,有单同辈者,辄出击之”。台湾由于四面环海的特殊地理位置,阻碍了他们与其他民族的同化进程,从而使土著民的猎首习俗一直保留到近现代。如《隋书·琉球传》载台湾土著民“斗战杀人,便将所杀人祭其神,或依茂树起小屋,或悬骷髅于树上,以箭射之,或累石系幡,以为神主”。《太平御览》引《临海水土异物志》曰:“夷州在临海东南,……战得人,著首还,于中庭建一大材,高十余丈,以所得头差次挂之,历年不下,彰示其功。”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他国人,倘有所犯,……取其头

悬木竿。”清康熙周元文修《台湾府志》也说土著民“性好杀人,取其头,剔骨饰金,悬于家以示英雄”。陈第的游记《东番记》亦载台湾土著“性好勇,喜斗,……所斩首,剔肉存骨,悬之门,其门悬骷髅多者,称壮士”。

从上述考古资料和文字资料的相互印证中可以看出,我国至迟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后,在长江和黄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已开始流行猎首之风。之后在长江上游的云南及岭南、台湾等地,猎首之风也先后出现,并且在我国南方部分地区一直延续到近现代。河姆渡无头葬无论是遗存迹象,还是出现的时间均同我国史前猎首习俗的特征基本吻合,因此可以肯定河姆渡无头葬现象应是当时流行猎首习俗的遗存。

二、血祭地神是猎首习俗产生的原因

史前猎首习俗大多流行于原始农业部落,系渊源于原始氏族、部落的农神崇拜。特别是其中的地神崇拜。我国古代地神崇拜可分为自然神崇拜、拟人化崇拜和土地公崇拜三个阶段。在史前母系社会由于当时人们认为土地的生产力与人的生产力似乎相似,因此将土地和妇女相联系把土地女性化和神格化,并且尊之为“生产之神”、“大母神”和“地母”,实行地母神崇拜。这类遗址在考古中已有发现。如辽宁喀左东山嘴发现的大型宗教祭祀建筑,中间是方形台基,四周为围墙,两侧分布石墙或石堆,前后是圆形或方形石圈,石圈附近发现裸体、躯干丰满,乳房、腹部、臀部肥胖而突出的女像残块,可见此处宗教建筑供奉的是女神群体。从遗址出土的人骨架和大量猪骨,烧灰等遗存中,不难猜想当时此地还举行过多次宗教祭仪。^⑩此外,在距东山嘴不远的牛河梁也发现了“女神庙”,遗址由大致呈南北分布的多室及

单室建筑构成,庙南2个祭坑内出土陶、石器、兽骨以及小型裸体女人头像、人身像。发掘者认为:女神象征生育、大地和收获,反映了“当时对农事关心,祈求丰收的愿望,对大地母神的崇敬”^⑩。

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父系氏族,随着男性在社会生产、生活等方面地位的提高,地神也由女性逐渐演变成对男性土地神的崇拜——社神崇拜。《孝经纬》:“社者,土地之神也。土地阔不可尽祭,故封土地为社,以报也。”《白虎通义》:“地载万物者,释地所以得神之由也。”考史前社神形象,主要有石社、土社和树社三种形式,对此我国古代文献史料不乏记载。如《礼记》:“天子建国。左庙右社,以石为之。”《吕氏春秋》:“殷人社用石。”关于土社,我国自古便有“社日祭土”习俗。《礼记·郊特性》:“社祭土,而主阴气。”《淮南子·齐俗训》:“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至于树社,《论语·八佾》云:“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周礼·大司徒》亦云:“设其社稷之壝,而树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与其野。”

人们为了祈求地神的保佑,每当春播秋获之时,都要举行隆重的一祈一报的祭祀仪式。祭仪形式有血祭和瘞埋等,其中的血祭即是将人畜或动物杀死,以其血浇灌土地或社坛。如北美印第安帕尼部落,以少女祭地神,将肢体脔割后瘞埋于田中,血浆则洒于禾苗上。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使谷物丰稔。^⑪我国景颇族剽牛血祭地神,剽牛之前,先杀鸡和猪,将血淋到祭台上,还要把猪头插到祭台右下角。^⑫佤族解放前,每逢播种季节便举行猎头、接头、祭头仪式,将猎来人头撒上火灰,与头血溶化后落到地上,每家分一些,在播种时一同撒到田里。^⑬基诺族垦荒烧地时,要用鸡狗血祭地神。^⑭血祭地神先秦文献中也不乏记载。《礼记·郊特性》:“有虞氏之祭,尚用气、血、腥。”《周礼·大宗伯》:

“以血祭祭社稷。”《管子·揆度》：“不能治田土者，杀以衅其社。”甲骨文“示”写作“𠄎”、“𠄎”，“土”字写作“𡵓”、“𡵓”者，均像以血灌祭社坛。至于考古资料，如前面提及的湖北房县七里河、松滋桂花树、山西侯马东呈王、河北邯郸涧沟等遗址灰坑或少数墓葬中埋有人头、畜头或无头躯体^⑨，即是史前血祭地神的遗存。

综上所述，原始居民认为，用人畜血浇灌土地，血液下渗入土中，易于地神接受，可以使土地恢复活力。人畜血借助土地把自己神秘的特性传给谷粒，即使多次收获之后，土地的活力和农作物灵导特性仍会保存。由于人是神灵最喜欢和原始的祭品，所以最隆重的祭祀自然当推杀人牲祭祀地神。似乎只有这样才能风调雨顺，保佑原始农业获得丰收，这或许是古代猎首习俗能够长期盛行的根本原因。

众所周知，河姆渡遗址二期考古发掘中出土稻谷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不仅堪称全国第一，就是在世界史前遗址中也是十分罕见的，足见先民的稻作农业已相当发达，并且已形成了一定的规模，稻谷也成先民的主要食物。与此相应，先民亦从生产工具中分化出部分农具专门用于耕作。伴随稻谷出土的 170 余件“骨耜”即是当时翻土耕作的农具，表明先民的原始稻作农业已进入到极为发达的“耜耕农业”阶段。但从遗址中出土的大量动植物遗存分析，当时的采集和渔猎经济依然极为发达。先民的采集范围遍及周围丘陵山地和湖沼平原；而遗址的动物遗骸更是遍布各个探方，经初步鉴定有 61 个种属。采集和渔猎的盛行是当时农业生产无法保障生活的表现，同时也是农业生产处于较原始状态的旁证。从而也表明了当时河姆渡先民的原始稻作农业受各种自然条件的制约还相当严重，加上当时人们认识水平的限制和万物有灵意念的普遍流行，由此产生对生长植物的土地崇拜也是顺理成章的。河姆渡遗址曾出土不少制作精细、

刻划生动动植物图像的陶器,如猪穗纹盆、五叶纹和三叶纹陶块等,在这些陶器的植物纹下方均有长方形框。有学者视其为“花盆”^②,显然是将河姆渡文化过于理想化了。其实这些长方形框有的底部还刻划若干象征根系斜线,看来代表生长植物的土地的可能性更大,也更切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联系到之后良渚文化习见的人工堆筑祭坛遗迹,我们认为河姆渡植物纹与长方形框组合可能似《孝经纬》“封土为社”和《周礼·大司徒》“设其社稷之帑,而树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与其野”等相类似,表示的是河姆渡先民所要崇祀的地神形象。因此河姆渡猎首习俗的原因可能同《九歌·招魂》“得人肉而祀”、《隋书·琉球传》“将所杀人祭其神”等的记载相似,是河姆渡先民生活时期用人血血祭地神的结果。

民族学资料表明,史前猎首对象主要是外氏族成员或战争中的俘虏。由于河姆渡先民生活时期猎首祭祀地神习俗的盛行,经常与外氏族发生战争,自然本氏族成员有时也会被对方猎去头颅或杀伤,所以留下了不少无头葬或肢骨不全墓。

三、零星墓葬属非正常死亡的特葬墓

综观我国新石器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文化和不同时代的墓葬资料,一般在每个居住区周围都辟有埋葬死者的氏族公共墓地。河姆渡遗址的二期发掘可能因选址原因,至今未曾发现氏族公共墓地,但据象山塔山遗址和余姚蜆架山遗址均发现了河姆渡文化晚期氏族公共墓地推测,河姆渡遗址周围也应设有一定规模的氏族公共墓地,这肯定会被今后的进一步发掘资料所证实。

至于目前所见的零星墓葬,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体质

人类学组对可供鉴定的 11 具人骨架分析结果看,成年男女只有 2 个,其余都是未成年的男女青少年和儿童,有的甚至是婴儿^③,另外,这些骨架大多不全,表明这些墓葬所埋的大多是非正常死亡者。

埋葬制度是灵魂不死观念的产物,在死去的人当中,人们往往特别注意区别正常死亡和非正常死亡。正常死亡的享受正规埋葬的待遇,而非正常死亡的则不然,他们有的连进入正常死亡者墓地的机会都没有,此类墓葬学术界称为特葬墓。如武威皇娘娘台第四次发掘的 62 座墓,单人葬 40 座中 26 座为仰身直肢,8 座侧身屈肢葬处于墓地边缘,另有 5 座身首分离、肢体不全的极少随葬品的乱葬墓,都处在墓地东、西边缘。^④夏县东下冯 21 座龙山墓中,几座俯身和侧身葬都分布于墓地南北边缘,其中有 1 座女性死者的圆坑跪葬,脚被砍去。^⑤海安青墩中层发现 1 座 4 人乱葬的葬在墓地东部,死者俯身背手屈肢。^⑥邳县刘林 M152 为一女性折头葬,骨盆中有一婴儿骨骼,应是难产死者,埋在墓区边缘。^⑦上述是分布于氏族公共墓地边缘的特葬墓,考古发掘中还发现一类专用的特葬墓地。如云南元谋大墩子墓地,所见 19 座成人墓“死者多数是青年,其中断肢、大石压身和身中有石镞的占相当大的比例,看来是非正常死亡的遗骨”。他们没有统一的墓向和葬式,也没有专用的随葬品,这大概是一处刑死者特葬墓地。^⑧南京西善桥良渚文化墓地中,发掘到 10 座方向不一、骨架不全的墓,有 3 座死者有头无身,2 座有身无头,1 座身首分离。也属于刑死者墓地。^⑨民族学中这方面资料也较多。如苗族对自缢、难产、落水,跌岩等非正常死亡的人,就不与正常亡故的人葬在一起,如果是青年夭折,他的用具要全部烧毁,留下来怕鬼魂回来侵扰。^⑩藏族本通行天葬,或称鸟葬,但对于乞丐、疯人及恶疾死者,则投尸于河流中,使他永不

复返；对于刑死、凶杀和暴卒的尸体，则拖出掘坑掩埋，使之永堕地下不得转生。^⑧东北鄂伦春人实行风葬，但对于急症死去的青年和孕妇则实行火葬。^⑨墨西哥的阿慈特克人认为正常与非正常死亡的人灵魂去向不相同，正常死亡者去米克特兰，而溺水、电击、水肿、麻疯病死者则去塔鲁坎。^⑩

由上述考古资料及民族学材料可见，古代人们对正常和非正常死亡所采取的葬俗是极不相同的，具体通过埋葬方法、墓葬方位、葬式和随葬品上表现出来。河姆渡第三、二文化层所见的墓葬如前所揭，埋葬的是非正常死亡者。出于当时宗教信仰原因，这些死者不能享受正常死亡者的正规待遇，而是采用侧身屈肢、不挖墓坑就地掩埋、不随葬及不埋入公共墓地等特殊葬俗以与正常死亡者相区别。因此我们认为这些零星墓葬是先民对非正常死亡者所采用的特殊葬俗，并不能真实地反映河姆渡文化正常死亡者的常规葬俗。目前所见能够真实体现河姆渡人丧葬习俗的，仅是象山塔山遗址第九层下的 35 座墓葬资料而已。塔山墓葬大部分骨架保存良好，经鉴定的全部骨架均属成年，个别为青年或老年。看来是一处成年人的氏族公共墓地。墓葬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皆为单人仰身直肢一次葬和二次葬，不见葬具，墓向基本向东。每墓均有 1~5 件随葬品，除少量玉器置于头部外，其余随葬品均放在足部。从这些墓葬及其上叠压的第九文化层的出土遗物考察，文化面貌及时代当与河姆渡第二文化层相同，属河姆渡文化第三期。^⑪但塔山遗址的仰身直肢土坑墓与河姆渡遗址第二文化层侧身或侧身屈肢、不见墓坑和随葬品的葬俗区别明显，这无疑为河姆渡遗址发现的零星墓葬是埋葬非正常死亡者的特葬墓提供了无可辩驳的实物证据。否则对两处同一文化类型墓葬的不同葬俗无法得到合理解释。

注释

- ①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博物馆:《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 ②河姆渡遗址考古队:《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0年第5期。
- ③常州市博物馆:《江苏常州圩墩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和试掘》,《考古》1974年第2期。
- ④南京博物馆:《江苏吴县张陵山遗址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6辑,1982年。
- ⑤王劲、林邦存:《房县七里河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江汉考古》1984年第3期。
- ⑥河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湖北松滋县桂花树新石器时代器遗址》,《考古》1976年第3期。
- ⑦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侯马东呈王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91年第2期。
- ⑧严文明:《洹沟的头盖杯和剥头皮风俗》,《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2期。
- ⑨濮阳市文管会:《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3期。
- ⑩《云南宾川白羊村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 ⑪《高山族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 ⑫林华东:《河姆渡文化初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4月版。
- ⑬郭大顺、张克举:《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1期。
- ⑭孙守道、郭大顺:《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头像的发现与研究》,《文物》1986年第8期。
- ⑮谢·亚·托卡列夫:《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 ⑯罗钰:《景颇族的剽牛祭祀》,《博物》1984年第5期。
- ⑰蔡葵:《解放前云南西盟佤族的概况》,《史前研究》1984年第3期。
- ⑱宋恩常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宗教初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 ⑭李锦山：《史前农神及事崇拜》（续），《农业考古》1994年第3期。
- ⑮龚若栋：《河姆渡原始艺术的地位与价值》，《民间文艺季刊》1988年第1期。
- ⑯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皇娘娘台遗址第四次发掘》，《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
- ⑰东下冯考古队：《山西夏县东下冯龙山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83年第1期。
- ⑱南京博物院：《江苏海安青墩遗址》，《考古学报》1983年第2期。
- ⑲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刘林新石器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65年第2期。
- ⑳云南省博物馆：《元谋大墩子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
- ㉑江苏省文物工作队太岗寺工作组：《南京西善桥太岗寺遗址的发掘》，《考古》1962年第3期。
- ㉒石桥大簸箕寨民俗调查组：《丹寨县石桥大簸箕寨民俗调查报告》，《贵州省文物工作资料汇编》（5），1984年。
- ㉓①④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编写组：《中国少数民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 ㉔乔治·彼得·穆达克著、童恩正译：《我们当代的原始民族》，成都1980年。
- ㉕浙江省考古文物研究所资料。

涡纹·湖沼崇拜·鸟形器

蒋卫东

河姆渡文化是分布在浙江宁绍平原上的一支新石器时代文化,它以余姚市河姆渡遗址为代表。该遗址在本世纪 70 年代的两次发掘,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大震动。近 20 年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大量的研究论文几乎涉及到了河姆渡文化的各个方面,为我们全面了解河姆渡时代的生态环境、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提供了相当丰富的素材。笔者不揣浅陋,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河姆渡文化早期器物上的一种特殊的装饰纹样——涡纹,及与其相关的一些问题,作出初步的分析和研究,以求师友同仁斧正。

涡纹,是河姆渡遗址第四、三层器物上一种比较常见的装饰纹样,见于陶器、木器、骨器和象牙雕刻器上,以阴线刻划为主,多数与刻划的动植物纹饰配置使用,有时仅作为动物身躯上的装饰纹样出现,而作为单独纹样的几乎不见。由于在这些刻划动植物形象的器物上,涡纹的位置十分显眼和突出,显然除了纯粹的装饰效果外,它还应当具有某些深层次的意义。早在河姆渡遗址第二次发掘中,标本 T₂₂₆③:79 象牙雕刻鸟形器上带同心圆圈形涡纹的连体双鸟图案,就被定名为“双鸟朝阳”^①,这一定名以后一直为研究者们沿用,1992 年出版的《河姆渡文化初探》中,不仅对该标本沿用了“双鸟朝阳”的称呼,而且将另一件象牙雕刻鸟形器(T₂₂₄③C:82)命名为“太阳纹蝶形器”。^②1993 年,由刘军、姚仲源两位先生合著的系统介绍河姆渡文化的专著

《中国河姆渡文化》面世,该书公布了许多原先未曾发表过的资料,并且将河姆渡遗址第一、二次发掘中称为“蝶形器”的器物,更名为“鸟形器”。但对于 T226③:79 象牙雕刻鸟形器上的刻划纹饰仍沿用了“双鸟朝阳”的定名,并在该书第七章“讨论”部分,以该标本为基础,结合其他的一些材料,专门论述了河姆渡文化的太阳崇拜问题^③。牟永抗先生在其专论太阳崇拜的文章中,列举了河姆渡遗址 10 余件带有涡纹的标本,认为这些涡纹都是太阳崇拜中对太阳形体的形象模写^④。但是,河姆渡遗址出土器物上的涡纹真的是对太阳的形象模写吗?我们认为有必要首先对刻划涡纹的标本进行系统认真地观察和分析,然后再作出结论,才有可能更符合实际的情况。

河姆渡文化早期器物上的涡纹,据其形态,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形态。第一种,是单圆形涡纹,标本有 T231④:309 圆雕木鱼、T17④:37 木质鸟形器和 T242③:68 陶塑鱼。这三件标本上的涡纹都以单圆形为主,有的仅是圆形的浅凹窝。圆雕木鱼身上布满了圆涡,而出土于第三层的陶塑鱼身上的涡纹虽然是戳印的,但应当和圆雕木鱼身上的涡纹表达了同样的意思。T17④:37 木质鸟形器正面平滑光洁,上端两测各有一圆形浅凹窝,凹窝外缘髹漆一圈,现呈深黑色^⑤(图 1,3^⑥)。这件标本曾被牟永抗先生用于他的论文中,认为圆形浅凹窝和凹窝外的那圈髹漆组合为一体,共同表现为太阳的形象。^⑦但我们认为这种凹窝与圆雕木鱼身上的凹窝涡纹间没有明显的区别,应当表现了同一装饰题材和装饰意义。早期的陶釜上,也常常可以见到戳印的圆点纹,它们与陶塑鱼身上的戳印圆圈一样,也是河姆渡文化第一种形态涡纹的一种变体形态。

第二种类型是同心圆圈形涡纹,刻划这种类型涡纹的标本最多见,出土有 10 多件,除了著名的“双鸟朝阳”象牙雕刻器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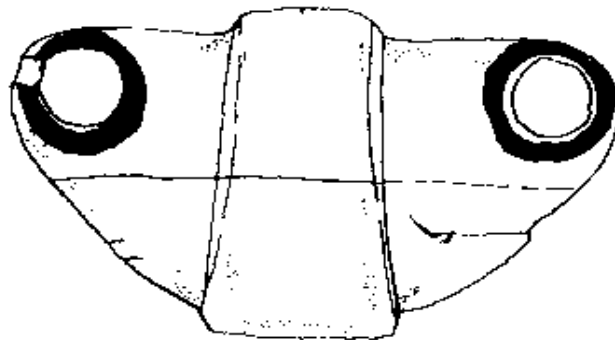


图1 河姆渡遗址第一种类型的满纹标本

1. 圆雕木鱼(77T231④:309)
2. 陶塑鱼(T242③:68)
3. 木鸟形器(T17④:37 正面)

的“太阳”纹外, T224③C:82、T221③C:91、T224④B:167、T18④:43、T31④:33 等象牙雕刻鸟形器以及 T212④:53 的雕兽纹骨片、T21④:18 双鸟纹骨匕、T243④:71 刻猪纹陶钵。T223④

出土的形似独角犀的陶塑兽身上, T29④:46 鱼藻纹陶盆等象牙器、骨器和陶器上, 都可见到这种类型的刻划涡纹(图 2、3)。它的表现手法首先是在中心钻琢一小凹圆窝, 然后以此为圆心, 外刻一至五圈阴线, 组成涡纹。其中象牙雕刻鸟形器上的同心圆图形涡纹形象比较接近, 同心圆圈数较多, 大多在 4—5 圈间。而骨器和陶器上的涡纹则圈数略少, T243④:71 陶钵一侧豕身上的涡纹和 T29④:46 陶盆上鱼藻纹间的涡纹, 都只有两重圈。T234④陶兽上的涡纹则由 4 圈阴线组成, 而 T33④:98 刻纹陶片和 T212④:53 刻兽纹骨片上的涡纹却都较接近象牙雕刻鸟形器上的涡纹。较为特别的是 T21④:18 骨匕上的涡纹, 在中心钻琢一圆凹坑, 外仅围一道阴线刻, 其中一个涡纹的外圈阴刻线内缘还较细密地刻划着纵向平行的细短阴线。

第三种形态的涡纹标本最少见, 早期标本仅 T211④:152 刻纹纺轮, 该纺轮一面阴刻叶纹, 一面阴刻涡纹(图 4, 1)涡纹虽也由数道阴刻线组成, 但表现为螺旋形。在河姆渡遗址第二层中出土的一件陶支座(T18②:85)上, 堆塑的涡纹也表现为螺旋形(图 4, 2), 后者可能就是承袭前者的风格演变而来的。

新石器时代, 先民的艺术灵感主要来源于生活实践中对自然的感性认识和抽象概括。河姆渡文化早期器物上的刻划涡纹也应当是描摹自然的结果。在自然界中, 先民可以见到的涡纹大致有以下几类: 太阳和月亮的光环, 树木的年轮、人类手指上的涡纹, 动物(包括人)眼球内的圈纹, 水涡纹等, 这些自然物中的一种或几种, 可能就是河姆渡遗址早期器物上涡纹的模写原型。但是, 由于河姆渡遗址中刻划涡纹的大部分器物无论从质料、造型, 还是从纹饰内容看, 都不应是简单的日常生活用器, 而是一些带着特殊宗教意义具有宗教礼仪用途的器物, 如有的研究者就认为河姆渡遗址中出土的刻划鸟纹的象牙雕刻鸟形器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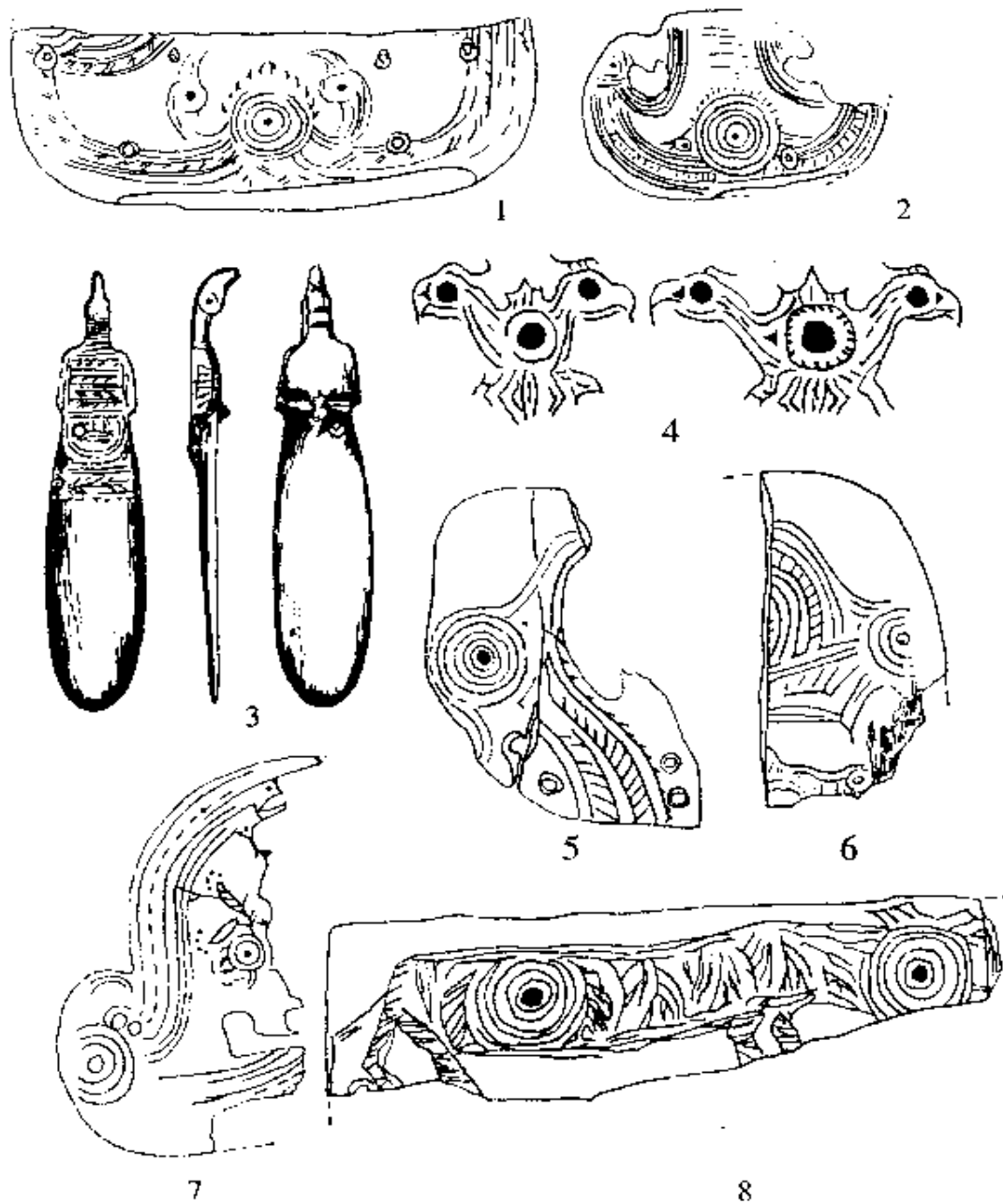


图2 河姆渡文化象牙雕刻和骨雕上的第二种类型涡纹

- 1、2、5、6、7. 象牙鸟形器(T226③:79、T224③C:82、T224④B:167、T31④:33、T221③C:91)
 3. 象牙鸟形匕(T244④:124)、4. T21④:18 骨匕上的连体鸟纹
 8. 刻兽纹骨片(T212④: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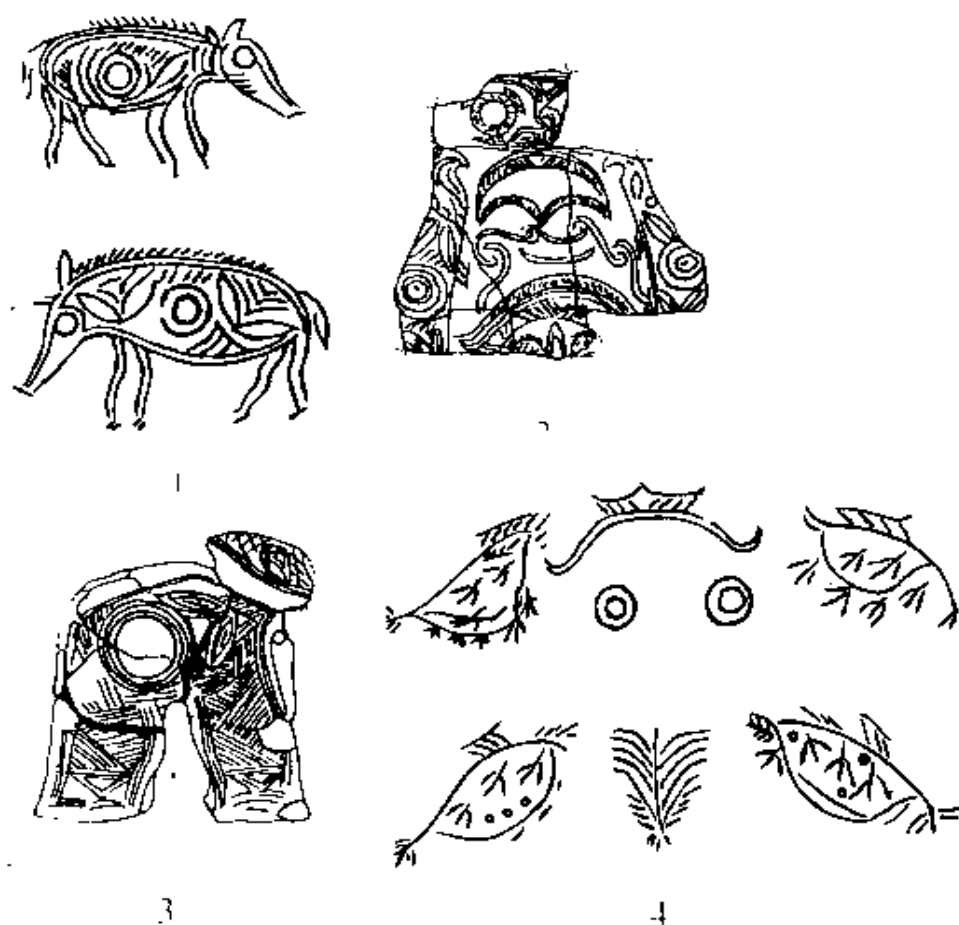


图3 河姆渡文化陶器上刻划的第二种类型涡纹

1. 陶钵上的豕纹(T243④:71)
2. 刻纹陶片(T33④:98)
3. 陶兽(T234④)
4. 陶盆上的鱼藻纹(T29④: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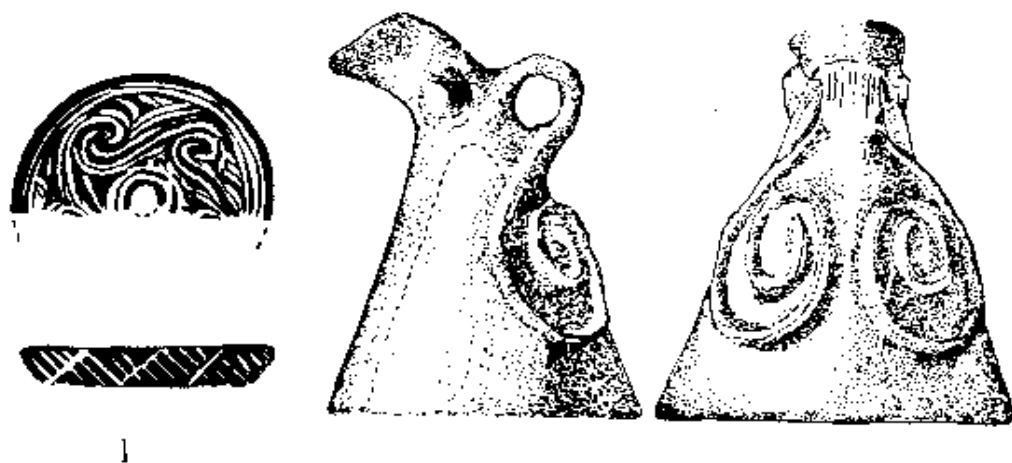


图4 河姆渡文化陶器上刻划或堆塑的第三种类型的涡纹

1. 纺轮(T211④:152) 2. 支座(T18②:85)

用于祈求光照的,而刻划猪纹的陶钵则是祈雨的用具。^⑧所以指纹、眼球、树木年轮等涡纹跟河姆渡遗址早期器物上的涡纹所透露出来的原始宗教的信息,是风牛马互不相及的,所以,可以不予考虑。河姆渡文化早期器物上的涡纹除了对自然物体的模写外,还具有深层次的宗教意义,而那深层次的意义,才是决定这些涡纹描摹对象的关键。

在河姆渡文化涡纹的三种形态中,第三种明显地表现为旋转的水涡,波涛汹涌,而与太阳或月亮的光环无涉。第一种涡纹,形态简单,有的学者认为 T231④:309 圆雕木鱼身上的涡纹,是“鳞片或水珠”的象征^⑨,但无论如何,这种大小不等的圆涡纹也与太阳或月亮的光环不相干,而更多地跟水涡相关。那么,第二种形态的涡纹,即同心圆圈形的涡纹,它描摹的又是什么呢?我们发现,河姆渡的发掘者和一些研究者在判定 T226③:79 象牙雕刻鸟形器上的刻划纹饰为“双鸟朝阳”时,都认准涡纹外圆边的短阴线雕刻为“烈焰光芒”^⑩、“火焰状的光芒”^⑪,标本 T224③C:82 象牙雕的圆涡纹上方也有类似的阴刻短线,所以有的研究者就直呼其为“太阳”纹。^⑫但通过仔细观察和比

较研究,我们认为这种涡纹外圆边上方的短阴线刻划,表现的并不是太阳的光芒,而是连体双鸟的尾羽。在河姆渡文化中,鸟是器物上常见的装饰题材,不仅有刻划的鸟纹,还有透雕和堆塑的鸟纹,其中刻划鸟纹上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即对鸟的羽翎详加刻划,如标本 T244④:124 象牙雕刻鸟形匕的正面,用弦线和短斜线组合,相当细致地刻划出鸟背部的羽翎(图 2,3)。在 T226③:79 和 T2243C:82 象牙雕刻鸟形器上,鸟羽的刻划也相当细致,展开的翅翼上用短阴线刻划出羽毛,其刻划方法与所谓的“太阳光焰纹”的刻划方法没有区别。换一种角度,假设涡纹上方的这种短阴线刻划,真的代表“太阳光焰纹”,那么一方面它似乎应当是环绕涡纹的一个整圈,而不应当仅仅局限于上方,另一方面,在其它一些施刻同样风格和涡纹上方,也应当有这种“太阳光焰纹”,但实际上在另外 10 余件刻同样风格涡纹的器物上,基本没有见到这种“太阳光焰纹”。所以,我们认为这种短线阴刻纹和第二种类型涡纹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不能作为确定涡纹性质的纹饰,但这种短线纹跟鸟的尾羽间的相契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河姆渡人在构图上的巧思,将尾羽连在一起,而鸟的连体部分则以五重圆圈的涡纹表示,神秘而意趣无限。

如果河姆渡遗址象牙雕刻上的“太阳”纹去掉了所谓的芒刺后,它就变成了跟陶器、骨器上的涡纹形象结构完全一致的涡纹。这种涡纹,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其它一些文化类型的出土器物上也能够见到。其中,甘肃马家窑文化彩陶上的彩绘涡纹就很接近于河姆渡文化(图 5),都呈同心圆圈形的状态。不过,马家窑文化的涡纹更多地表现为河姆渡文化第二种形态和第三种形态两种涡纹的合体,动感很强。这种涡纹,“是当时陶工们对黄河奔腾流水的一种艺术表现”^⑩。当然,马家窑文化和河姆渡文化不仅在地域上相距数千公里,而且在时间跨度上也相隔近千年,但它们都曾以同心圆圈形的涡旋纹来表现自然界中水的状态。由于马家窑文化的涡旋纹模写的是奔腾汹涌的黄

河之水,所以极具动感,水花四溅,气势磅礴。而河姆渡文化涡纹模写的是遗址周围的沼泽湖泊,所以相对静态,只是“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不过,也有个别器物(T211④:152 纺轮)上的涡纹呈现出惊涛卷浪的状况,具有一种动态的艺术感染力。因此,我们认为河姆渡遗址早期器物上的三种形态的涡纹,都是先民在生活实践中对周围沼泽环境的描摹,而与太阳崇拜没有多少关系。

河姆渡遗址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成果充分说明了沼泽环境在河姆渡人生活中举足轻重的作用。考古发掘出土了数量众多的动植物标本,研究者通过对动植物标本的研究,结合孢粉分析、地质勘查等研究成果,对河姆渡遗址的生态环境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在距今 7000-6000 年前,河姆渡气候温暖湿润,年平均气温比目前高出了 3℃ 左右。“地理地貌应属丘陵山地与沼泽平原的交接地带。遗址附近不但有着大片淡水的湖塘,沼泽平原,而且距离河口海岸也并不太远。”^⑭河姆渡先民就定居在“余姚丈亭一二六市—河姆渡三角地带的一个大湖泊的南缘”^⑮。遗址北面是芦苇密集,杂草丛生的湖沼地带,这里有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沼泽湖泊中不仅滋生着丰富的鱼类、爬行类和软体类动物,而且也是鸕鹚、鸬鹚、雁、鹭、鹤、野鸭、鹰、鸦等鸟类栖息和捕食的好场所。濒水的山地林间,是鹿、虎、犀、熊、象、獐、羊、牛、野猪等几十种哺乳动物生活的乐园,湖沼也是它们饮水和捕食时频繁光顾的地方。湖沼环境为河姆渡先民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资源,也提供了精神上的依托。河姆渡文化早期,水稻的栽培和利用虽然已经开始,但由于上天赐予的优越的自然环境,河姆渡人的食物来源并不匮乏,甚至出现了储存麻栎果等采集食物的窖藏^⑯,还有的炊食陶器釜的内底或陶片上可见粘着烧焦的米粒残渣或“锅巴”^⑰。可见食物是充裕的。除采集外,狩猎是获取蛋白质和脂肪食物的重要手段,在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动物遗骨中,有虎、熊、犀、象等猛兽,在遭遇这些躯体庞大、性情暴躁

的猛兽时,狩猎不仅需要依靠群体的力量,而且还需要设置必要的陷阱,才有可能成功地完成捕杀。沼泽地带就是自然界提供的最好的陷阱,当象、虎、犀、熊等猛兽被人和猎狗共同组成的狩猎队伍驱赶进湖沼后,身陷于泥潭中被杂草绊住的猛兽已失去往日的蛮横,只得坐以待毙了。我们在河姆渡文化陶器或骨片刻划的兽身上都发现了涡纹,这种涡纹边上常有水草纹。涡纹激涟漪荡开,水草随波摇摆,正是沼泽环境的形象写照。而刻划涡纹的形似独角犀的陶兽,刻“虎”纹骨器等,可能就是一种狩猎或献牲仪式上的供奉。观察标本时,我们看到,在精美的象牙雕刻鸟形器上,涡纹主要与鸟纹搭配,与其它纹饰的搭配较为少见;而在陶器和骨器上,涡纹常出现在动物的身躯上或鱼藻之间,这时,它常与植物叶纹搭配使用,而不见与鸟纹的搭配。可见,涡纹跟鸟纹或禾叶纹的配置是具有一定规定和区分的。这表明,刻划涡纹的器物在实际的使用功能上存在着差别。由于这些器物在质料、制作和纹饰上都有别于日常生活器皿,而明显地带有某种宗教功能,所以我们认为这些器物在宗教功能上也是有所差别的。

为了进一步说明涡纹就是沼泽环境中水涡的模写,我们有必要对以 T226③:79“双鸟朝阳”象牙雕刻鸟形器为代表的“双鸟朝阳”图案作进一步的考察和分析。在该鸟形器上,涡纹的两侧各刻划一只鸟的形象,鸟尖喙长嘴,引颈振翅。两鸟身躯相连,头相对,尾羽装饰在涡纹上方。鸟在中国东南古代原始部落中,是常常被赋予神性加以膜拜的动物。在中国东北通古斯语族的萨满教中,鸟是“腾格里”(天)的使者。^⑩鸟与太阳的联系见诸文献,不晚于战国,如《楚辞·天问》中有“羿焉羿日?鸟焉解羽?”王逸注曰:“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鸟皆死,堕其羽翼。”至西汉早期,不仅《淮南子·精神篇》中有“日中有骏乌”的记载,而且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上已明显地表现为日中有骏乌,月中有蟾蜍。但远在此四五千年前的河姆渡人是否也已

经产生了鸟与日联系起来的观念？我们不得而知。有的学者认为这种“连体鸟：或者与鸟生的传说有关；连体意味着双鸟交感繁殖”^⑩。可谓是具有卓识的见解。牟永抗先生在分析 T21④：18 双头鸟纹骨雕时也指出：“右鸟头顶饰冠状羽毛，个体较左鸟硕大，似为雄性；左鸟头顶仅有一条后翘的羽毛，可能是雌者。”两者合二为一，表现了生命或生育的主题含意。^⑪双头连体是河姆渡文化具有特色的装饰手法，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鸟形器许多都明确地表现为双鸟连体的形象，在遗址第二层出土的一件器钮上也塑造了双兽连体的形象（图 7）。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鸟类遗骨，经鉴定大多是雁、鸕鹚、鹤、鸬鹚、鹭、野鸭等水鸟。由于优越的湿热温暖的沼泽环境，河姆渡遗址周围曾是水鸟的天堂，每年秋天，候鸟南飞，来到了河姆渡，栖息在沼泽地带的芦苇和草丛中，生养休息，繁衍后代。鸟类在沼泽中交尾繁殖的景象对河姆渡人产生了重大影响，所以他们在精制的象牙器、骨器上刻琢上鸟类交尾繁殖的情景，来表现对于生命或生育的崇拜的主题。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卵生或多产的动物种类常常被作为生殖崇拜的对象，如鱼、龟、鸟等。

确认鸟形器的用途，对于我们理解鸟在河姆渡先民宗教观念中的角色十分重要。鸟形器，是河姆渡遗址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特殊器物。在《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和《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中，发掘者称这种器物为“蝶形器”，后在《中国河姆渡文化》中更名为“鸟形器”。鸟形器在河姆渡遗址中出土的数量有不少，其中第四层有 11 件，有木质、石质，也有象牙的；第三层有 8 件，全为象牙；第二层 1 件，石质。早期的出土数量显然是最多的。不管取材于哪一种质料，鸟形器都经过精雕细作。从它的外形看，可分为飞鸟式和立鸟式。立鸟式都用木料制成，是第四层的特色，不见于第三层和其它层次。形如站立的侧身鸟体，前端作鸟头，正面较平滑，挖琢一浅圆凹窝，背面中央起脊，上下延伸超出鸟体，近尾处上方有一橢

圆形钻孔。飞鸟式则如展翼飞翔之鸟,正面微弧,上下端各有一钻孔,背面弧凹,中央凸起两道脊,脊上端各有2个横穿孔,孔壁上有绳索勒磨痕迹,两脊间为凹槽,上下不贯通(图6)。木质、骨质、石质的鸟形器上多无刻划纹饰或只有简单的刻划纹饰,而象牙质的鸟形器上都有单纯阴线刻划或采用透雕和阴线刻划组合的纹饰,其中以双头连体鸟纹为最常见。关于鸟形器的用途,学术界存在着较大的分歧。王仁湘、袁靖两先生以苏联白令海峡附近所发现的古代爱斯基摩人制作的有翼形骨器为旁证,认为河姆渡的鸟形器是安装在投枪尾部,起平衡定向作用的器具。^②但由于第四层出土的木质鸟形器,有的是立鸟式,两翼不对称,因而无法起到平衡作用。而且,制作精美的象牙雕刻器似乎也不可能是某种生产工具的附件,所以王、袁两先生的见解已基本为学术界否认。牟永抗先生主张鸟形器的功能“和良渚文化的玉质冠状饰相似。前者可能是后者的早期形态,它们都是某种崇拜偶像的冠冕”^③。日本学者林已奈夫也认为河姆渡鸟形器是良渚文化玉冠状饰的滥觞^④。林华东先生认为制作精细的象牙雕刻鸟形器应与宗教活动有关,而石质的或木质的素面鸟形器,多有使用痕迹(有些已残断),则又似生产工具之属。^⑤宋兆麟先生则以台湾高山族房脊上所装的鸟形器为例,认为河姆渡鸟形器“与某些民族住宅的鸟形图腾柱一样,也是当时干栏式建筑顶部的一种建筑装饰,其所以雕成鸟形,与他们信仰鸟图腾是分不开的”^⑥。刘军、姚仲源两先生也认为鸟形器“可能是建筑物上的装饰物”^⑦。笔者认为鸟形器是悬挂于建筑物上具有特殊宗教意义的装饰物。鸟形器,背面常有凹槽,器上也有穿孔,孔中有绳索勒磨的痕迹。其中木质和石质的鸟形器,大约是安装在房屋顶部的,而雕刻精细的象牙质鸟形器,或许是缚系在门廊柱上(也可能缚系于房前或房内的崇拜偶像身上)。大凡鸟形器,除了少数立鸟式外,飞鸟式鸟形器都表现为双鸟合体的形象,象牙质的鸟形器都为双鸟合体的飞鸟式,许多还以较为

详尽的手法刻划出双鸟连体的形象或沼泽环境。双体连身的鸟纹所体现出来的生命或生育的主题含意,以及鸟自身所秉有的卵生多产的神性,都包含着河姆渡先民祈祷氏族人口兴旺、平安康宁的殷切愿望。作为建筑物上的带有宗教意义的悬挂物,它们悬挂在那儿,风吹日晒,器表留下了许多类似使用的痕迹,甚至皴裂折断。当突然性的灾祸,如失火、山洪暴发之时,人们忙于奔命,无暇顾及房屋建筑和悬挂在那儿的崇拜偶像,所以房屋倒塌了,留下了大量的木构件和鸟形器。据参加过河姆渡发掘的工作人员介绍,河姆渡遗址中出土的大体完整的编了器物号的鸟形器有 20 来件,而尚可辨器形未加编号的细小鸟形器碎片很多,总的说来,河姆渡遗址早期地层中出土的鸟形器远远不止二十件,若果是,那么鸟形器作为建筑物上的悬挂物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综上所述,河姆渡遗址早期出土器物上的涡纹,是沼泽环境中水涡的形象描摹,它以三种不同的形态出现,但都形象地表现了遗址周围的沼泽环境。它们并不是对太阳的摹写,甚至连河姆渡的鸟纹恐怕也与太阳崇拜无关,它是河姆渡人通过观察鸟类,而对双体交感繁殖的感悟。是河姆渡人对生命和生育的原始崇拜。沼泽环境不仅为河姆渡先民提供了充足的食物,而且也是他们认识世界的最重要窗口,因此,在河姆渡文化早期,对沼泽的膜拜是非常虔诚的,这也就是涡纹不仅成为重要的装饰纹样,而且在整体图案中常居中心位置的原因,当然。我们不可否认在河姆渡时期有着某些太阳崇拜的因素,如 T235④:102 刻纹纺轮上的十字纹(图 8),可能就是对太阳的抽象描绘。河姆渡遗址从早期到晚期,气候有逐渐变冷,沼泽湖泊有逐渐缩小的趋向^②,随着环境和气候的变更,人口的膨胀,采集和狩猎不再能充裕地供给生活必需的食物,水稻种植的意义日显重要,河姆渡人不得不改变原先对湖沼的依赖,而变成对太阳光照的依赖。

这表明,人类原始宗教信仰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然环境的变化和人类食物来源途径的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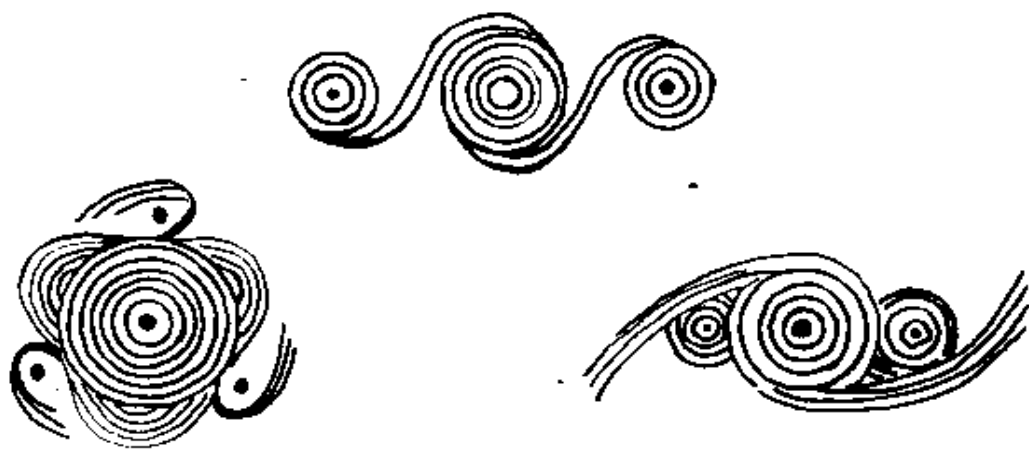


图5 马家窑文化彩陶上的涡纹
(据吴山《中国新石器时代陶器装饰艺术》图五一描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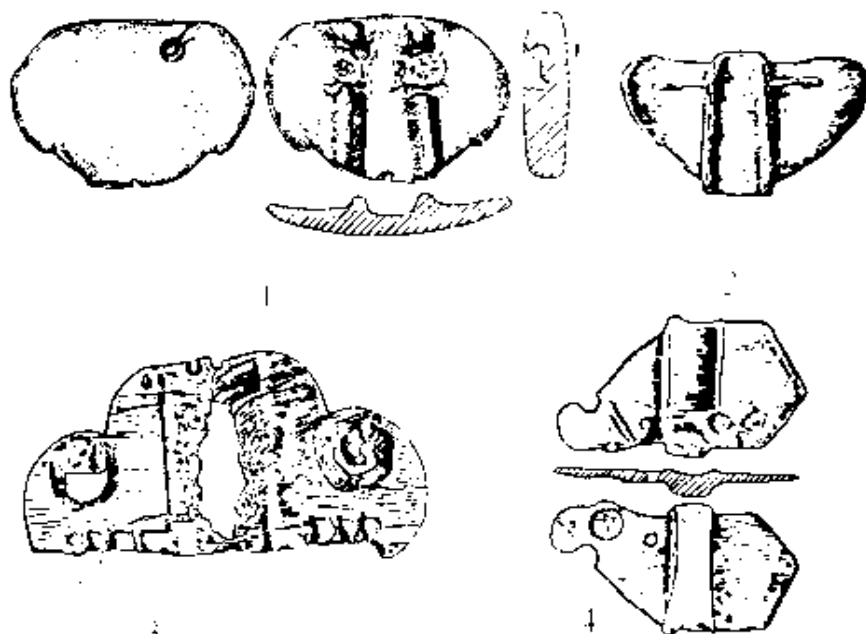


图6 河姆渡文化的鸟形器
1.石质鸟形器(T28④:41) 2、4.木质鸟形器(T17④:37.91)
3.骨质鸟形器(T18③: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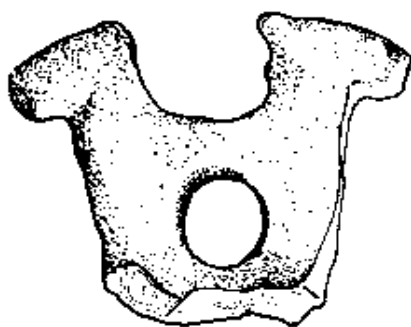


图7 双兽形器钮(T34②:10)



图8 刺十字纹纺轮(T235④:102)

注释

①⑩《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次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0年第5期。

②⑨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参见林华东：《河姆渡文化初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㉑㉒㉓刘军、姚仲源：《中国河姆渡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 ④⑤⑦②②牟永抗:《东方史前时期太阳崇拜的考古学观察》,台湾《故宫学术季刊》第十二卷第四期。
- ⑥本文采用河姆渡文化的器物线图的来源,除两次发掘简报外,主要根据牟永抗先生《东方史前时期太阳崇拜的考古学观察》一文的附图描绘。
- ⑧俞为洁:《河姆渡文化猪形塑及猪形图案装饰器新探》,《农业考古》1994年第3期。
- ⑨吴山:《中国新石器时代陶器装饰艺术》第40页,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 ⑩秋浦:《萨满教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 ⑪王士伦:《越国鸟图腾和鸟崇拜的若干问题》,《浙江学刊》1990年第6期。
- ⑫王仁汀、袁靖:《河姆渡文化“蝶形器”的用途和名称》,《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5期。
- ⑬牟永抗:《钱塘江以南的古文化及相关问题》,《福建文博》1990年增刊。
- ⑭[日]林已奈夫:《关于良渚文化玉器上的若干问题》,引自林华东《河姆渡文化初探》第232页。
- ⑮宋兆麟:《河姆渡遗址出土蝶形器的研究》,《中国原始文化论文集——纪念尹达八十诞辰》,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原始艺术科技的结晶

——河姆渡出土骨哨

陆 洲 华 光

河姆渡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扩大了我们对于原始社会物质文化的视野,对中国的远古文明有了新的认识。河姆渡遗址发掘中获得的大批遗物,为新石器时代的考古,为中华民族的远古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新资料。河姆渡遗址的发现、发掘到今天,对河姆渡遗址的文化层的考古、研究工作是取得了很大成果的,但作为一个文化整体,有其极其丰富的内涵,怎么分门别类、逐一作深入的探讨,这不仅是考古工作者、历史学家的事,还需要具备各类专门知识的专家、学者的共同投入,才能奏效。

我们不揣浅陋想通过对河姆渡出土的骨哨的研究、仿制中得出的点滴认识,来探寻一下原始社会、处于萌芽状况下的艺术与科技(生产技术)是怎么结合的这一课题,抛砖引玉,就正于国内外同行、专家。

河姆渡遗址位于杭州湾南岸,四明山北麓、余姚南部山地之间的一条狭长的河谷平原上。河姆渡遗址有四个相继叠压的文化堆积层,在文化面貌上,有别于我省以前发现的任何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是一个完全新颖的文化类型,因此被命名为“河姆渡文化”。河姆渡遗址的出土标本经碳十四测定,第四层有三个数据在距今 6900 年以前,四个数据在 6700 年以前,最晚的是 6570 年。综合上面地层叠压关系、生产力水平,确定了河姆渡

文化的上限为距今 7000 年左右。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骨哨,在有限的发掘面积里数量可观(共有 160 多支)均用飞禽的肢骨制成的,大多数为手指一般粗,长 10 公分左右,上面镂孔数不一,有二孔、三孔也有四孔的,其中还有 1 支七孔的(1 个吹孔、6 个音孔)跟今天的竹笛形状基本相似。出土的骨哨还有一支开孔的位置已经磨锉出,但未最后镂成的半成品。

乐器的产生与制造是有其特定的生产技术背景的。电子乐器只能出现于现代;钢琴则产生于大生产;原始艺术中可以名副其实地称为器乐的乐器的产生,也必然有其一定的生产技术背景。同时,“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也为对象生产主体”,原始器乐的出现也凝集了先民们对声乐的审美感受和经验。当然先民们的生产水平,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是十分低下、粗浅的,审美能力也是极其有限的。但这是人类改造主客观世界中,以情感、创造力代替先天本能迈出的伟大步伐。先民们在原始的歌舞、乐器的演奏中感受到喜悦兴奋,包含了对自身创造力的肯定。

原始乐器往往是从生产工具发展分化而来的,而先民们对器乐的审美感也往往是从工具的制造、使用中,对声音的感受,逐步发展过来,逐步形成对乐器演奏的审美意识。音乐的产生与生产实践,有着密切不可分离的联系。乐器的产生、制作也融注了先民们的生产知识和对自然规律(萌芽状态的科技知识)的掌握。

河姆渡原始社会的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狩猎、捕鱼和采集还是相当重要的经济部门。第四层有密集の木构建筑遗址。是一种长条形、干栏式带榫卯木居住建筑。从榫卯的制作,可以看出当时木结构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和积累了相当丰富的

经验。河姆渡遗址第四层出土的骨(角)器有 1500 余件,从品种上看已明显分化为农业、渔猎、纺织等各种专业工具。骨器生产工具的制造方法,普遍采用磨制加工,骨料的裁割,大部分采用锉磨法;骨(角)质生产工具的穿孔,则多采用挖凿法。同一层出土物还有磨制极精的象牙器和玉器。象牙器和玉都是高硬度的材料,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制作器具的工艺水平。

如果我们对骨哨的研究,放在上述的整体文化背景上,就不难看出骨哨不仅仅是一件原始的乐器。骨哨反映了当时河姆渡先民的生活状况和生产技术水平,反映了河姆渡先民对自然规律的某种程度的认识与把握。

1986 年 5 月份,本人曾在赵松庭先生的指导下,用鸡腿骨为材料,选河姆渡出土的四孔型骨哨作母本进行了仿制。仿制成的骨哨其基本尺寸、吹孔、指孔的位置与出土骨哨相同。经吹奏骨哨的音色高昂、脆亮。通过指法变换能吹出一组完整的五声音阶,一个低音;右手大拇指运用按半孔技法,还能吹奏七声音阶、部分升降音;骨哨还能逼真地摹拟自然界的鸟喧、虫鸣的音响。

当然,我们也认为仿制品与原出土的骨哨不能完全等同,并且河姆渡先民的演奏技巧、方法也不可能与今天从事音乐工作的专职人员相比,但通过对出土实物的研究同时进行了仿制和演奏,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分析与推断:

1. 7000 多年前的河姆渡先民,在制作骨哨的过程中,已掌握了孔位与音高之间的关系规律。

河姆渡出土的骨哨有 160 多支,数量之多排除了偶然性,说明当时制作骨哨已是一件相当普通的事。河姆渡先民诱捕猎物、祭祀的歌舞中已普遍使用这种可能是诱捕工具演变过来的乐器。同时骨哨的音孔数不同,多的达 7 孔,说明作为管乐的笛

的孔数、间距与发音高低,河姆渡先民已有过无数次的反复制作、吹奏的实践,逐渐形成一种规律性的认识。“音乐生于度量”,虽然对律、度、量、衡之间的理性认识及有关知识的专门化是在殷周以后更晚一些时间,但这有一个发展过程,正如没有涓涓的泉流何来奔腾不息的江河一样,找到源头才能更深入地了解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和丰富多彩。

2. 河姆渡先民已具有对某种音阶的认识。

吕骥同志在《从原始氏族社会到殷代的几种陶埙探索我国五音阶的形式年代》一文中曾说到:“不能想象人们对某种音阶还没有认识,就会预先制造能吹奏某种音阶或其中某几个音的乐器。这就是说,任何一种吹奏乐器的制造,即使是比较原始不完善的吹奏乐器,必然受到人们对音阶的认识的制约,决不可能脱离人们对音阶的认识而独立存在。盲目制造出来的吹奏乐器,决不能符合人们对音阶的认识。”仿制的四孔骨哨能吹出一组七声音阶一个最低音和一些升降音,至少有 9 个音。尽管河姆渡先民不可能具备现代人吹奏骨哨的某些技巧,但可以推断吹奏 5-6 个音肯定是不成问题的,而这五六个音正好是一组五声音阶,况且这只是四孔骨哨的发音情况,七孔骨笛发音将会更多。

因此,可以分析推断,7000 年前的河姆渡先民已具有今天概念的五声音阶的某种认识。虽然对每支骨哨来说由于受到材料、工具、制作工艺水平的差异和不同,尚存在不稳定性。但如作进一步科学测定就可以把目前尚有争议的五音阶形成的上限时间推前一二千年。

河姆渡出土骨哨是“世界管乐之祖”。河姆渡出土骨哨标志了 7000 年前的河姆渡先民的艺术生活已达到了相当的程度,对研究管乐器的产生和演变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但目前对河姆

渡骨哨的研究,见之于文字的还很少,这就需要考古界、艺术界、科技界的专家、学者共同合作,深入探讨,让这古老的艺术放出绚丽的光彩。

未来气候变暖的经验模式*

——浙江河姆渡古气候

刘为纶 周子康 吴维棠

一、引言

全球气候变暖及其对地球生态环境的影响,已引起各国政府和科学家的高度重视。1990年底国际科联(UNEP)和世界气象组织(WMO)召开的第二届世界气候大会上,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气候变化科学评估”^①指出,大气中CO₂浓度已从有实测资料的1958年的314ppm增加到1990年的353ppm。而19世纪后期仅为 270 ± 10 ppm。1880年以来,全球地面气温平均上升了0.3℃~0.6℃,“温室效应”对全球变暖将起促进作用。IPCC预测,在维持现行能源结构(即“正常排放”)情况下,到公元2030年大气中CO₂浓度约增加1倍,全球平均气温上升1.5℃~4.5℃,平均海平面上升8—29cm。到下世纪后期,气温将较今高3℃左右,海平面上升21—71cm。这些预测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不仅是由于温室气体浓度预测的困难,更重要的是现有理论气候模式本身还不够完善。

根据22种全球大气环流海气耦合模式计算结果,当CO₂

* 国家科技攀登计划第廿七项目成果之一,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浓度增加 1 倍时,全球年平均气温升高 $1.9^{\circ}\sim 5.2^{\circ}\text{C}$,降水量增加 $3.5\%\sim 15\%$ ^②。各模式计算结果在数值上差别较大。气候理论模式对区域性气候预测的不确定性远超过全球性预测效果。赵宗慈等^③利用 5 个全球大气海洋海冰模式,模拟大气中 CO_2 浓度加倍时对我国冬、夏季地面气温、降水的影响。冬季变暖 $3.1\sim 5.7^{\circ}\text{C}$,夏季为 $1.8\sim 5.1^{\circ}\text{C}$ 。从表 1 可见,各模式模拟结果差别很大。若对照我国各地区分布,差异就更大了。对降水的预测效果则更差。

表 1 我国地面气温变化的模拟($^{\circ}\text{C}$)
($2\times\text{CO}_2\sim 1\times\text{CO}_2$)^③

模式*	12—2 月	6—8 月
GFDL	3.5—6.0	1.5—6.0
GISS	3.5—5.5	2.0—6.0
NCAR	2.0—6.0	0.0—4.0
OSU	2.5—3.5	2.0—3.5
UKMO	4.0—7.5	3.5—6.0
平均	3.1—5.7	1.8—5.1

* GFDL: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地球物理流体动力学实验室模式;GISS:美国宇航局空间研究所模式;NCAR: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模式;OSU:美国俄勒冈州州立大学气候研究所模式;UKMO:英国气象局模式。

因此,利用理论气候模式模拟气候变化,不是唯一的方法。

二、全新世高温期地球气候

利用地球古气候变化经历的相似阶段,其主要气候特征,可作为研究未来气候环境变化的重要参照学。前苏联布德科运用

与地质时期三个温暖期古气候相似的方法,估测未来气候变化及特征^{④⑤}。这种有别于理论气候模式的经验方法,被 IPCC 的报告所采纳。布德科认为,今后气候变暖的最佳古气候相似有三个时期:上新世气候温暖期(300—400 百万年前),末次间冰期温暖期(12.5 万年前)和全新世温暖期(5000—6000 年前)。作者重建了这三个暖期全球冬、夏温度和降水量分布。由图 1 可见,三个暖期中温变的纬度分布规律十分相似。比不同理论气候模式的结果之间的相关系数要高。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在引起地球变暖的因子不完全相同情况下,气候系统反应可能是相似的。一些研究者认为,冰后期气候变化的原因之一,很可能是大气 CO₂ 含量增加造成的^⑥。据格林兰和南极四个钻孔的气泡所确定的大气成份表明,CO₂ 从距今 1.8 万年前的 180—200ppm 到温暖期盛期增加到 350—400ppm。ИИЪорЗеНКоВа 等认为地球全新世气候温暖期的盛期在距今 6200—5500 年,求得该时期与现代之间的平均纬度温差(表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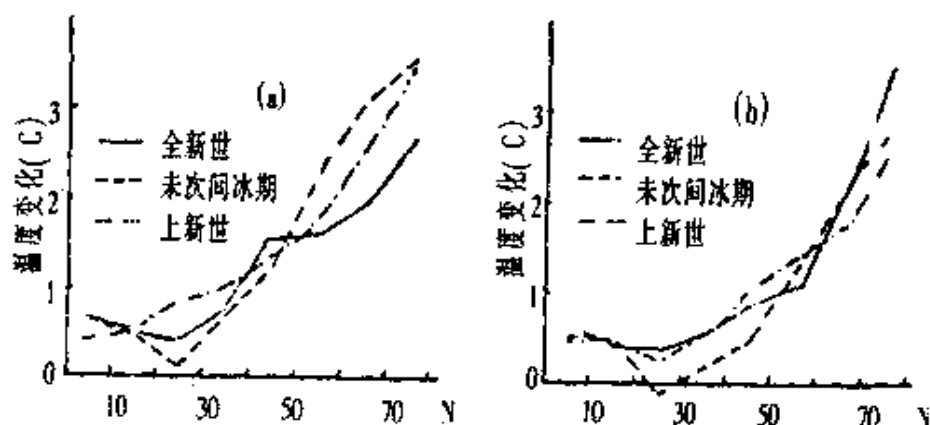


图 1 古气候三个温暖期北半球不同纬度地面冬季(a)和夏季(b)温度的相对变化

温暖期温度较现今高,且由低纬向高纬增加,与理论气候模式的模拟结果相似。

表 2 气候温暖期盛期(距今 6200—5500 年)与
现代两个时期之间的平均纬度温差

温差	纬 度					
	80~70	70~60	60~50	50~40	40~30	30~20
$\Delta t/^{\circ}\text{C}$	4.2	3.4	2.4	1.2	0.9	0.3

全新世暖期盛期是距今最近的一个暖期,相比前两个暖期,掌握的信息更丰富,可作为下世纪气候变化的最佳相似模式。

三、河姆渡地区古气候及生态环境可作 为下世纪气候变化的经验模式

有关我国全新世温暖期的提法及划分,意见不完全一致。施雅风等^⑦认为,中国全新世温暖期* 出现在距今 8500—3000 年之间,其中稳定的鼎盛阶段在距今 7200—6000 年。当时长江流域温度较今高 2℃。

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出丰富植物孢粉及动植物遗存。断年数据资料也较充分。本文作者等^{⑧⑨}对该时期气候特征及生态环境作了深入探讨。研究表明,河姆渡第四、第三文化层约距今 7000—6000 年,处于全新世气候最暖湿时期。与施雅风划定的大暖期的鼎盛期相一致。这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如此暖湿的气候环境。

* 中取名为“大暖期”。

作者对河姆渡在上述年代负载地层的孢粉和动植物遗存分析表明,植物群落建群种可定为蕈树、钩栲和苦槠,图2粗实线区为三者现今共存区。处于浙南、闽北和闽中区,约在北纬 $25.5^{\circ}\sim 27.5^{\circ}$ 间。按中国气候区划,属现代的中亚热带中部和南部地区^⑩(即⑤A₂~瓯江、闽江区)。该区主要气候要素分布:年平均气温 $18\sim 20^{\circ}\text{C}$,1月气温 $7\sim 11^{\circ}\text{C}$,年降水量1500—1800mm。

为进一步确认古河姆渡植被的类型,选取受人为影响较小的浙南乌岩岭自然保护区(现中亚热带)和广东鼎湖山(现南亚热带)自然保护区植被类型。通过类比分析表明,古河姆渡植被分布,其气候环境介于现今这两自然保护区之间。

从河姆渡第四、第三文化层某些生物的生种(属)的现代分布地域及所属相应气候带来看,众多生物种(属)现代仅见之于浙南甚至南亚热带和热带。

“河姆渡先人”的居室建筑为栽桩架板的干栏式建筑。它是与多雨温暖的气候环境和地面条件相适应的。类似建筑形式,现今存在于我国的南亚热带和热带地区。此外,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出现大量人工栽培稻谷遗存,在太湖流域的罗家角、慈溪的童家岙,亦发现有年代稍晚的稻谷遗存。而现今我国野生稻大都分布在北纬 25° 以南的南亚热带气候区。该时期长江下游众多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出现了光辉灿烂的史前文化,无疑与良好的暖湿气候环境有密切关系。^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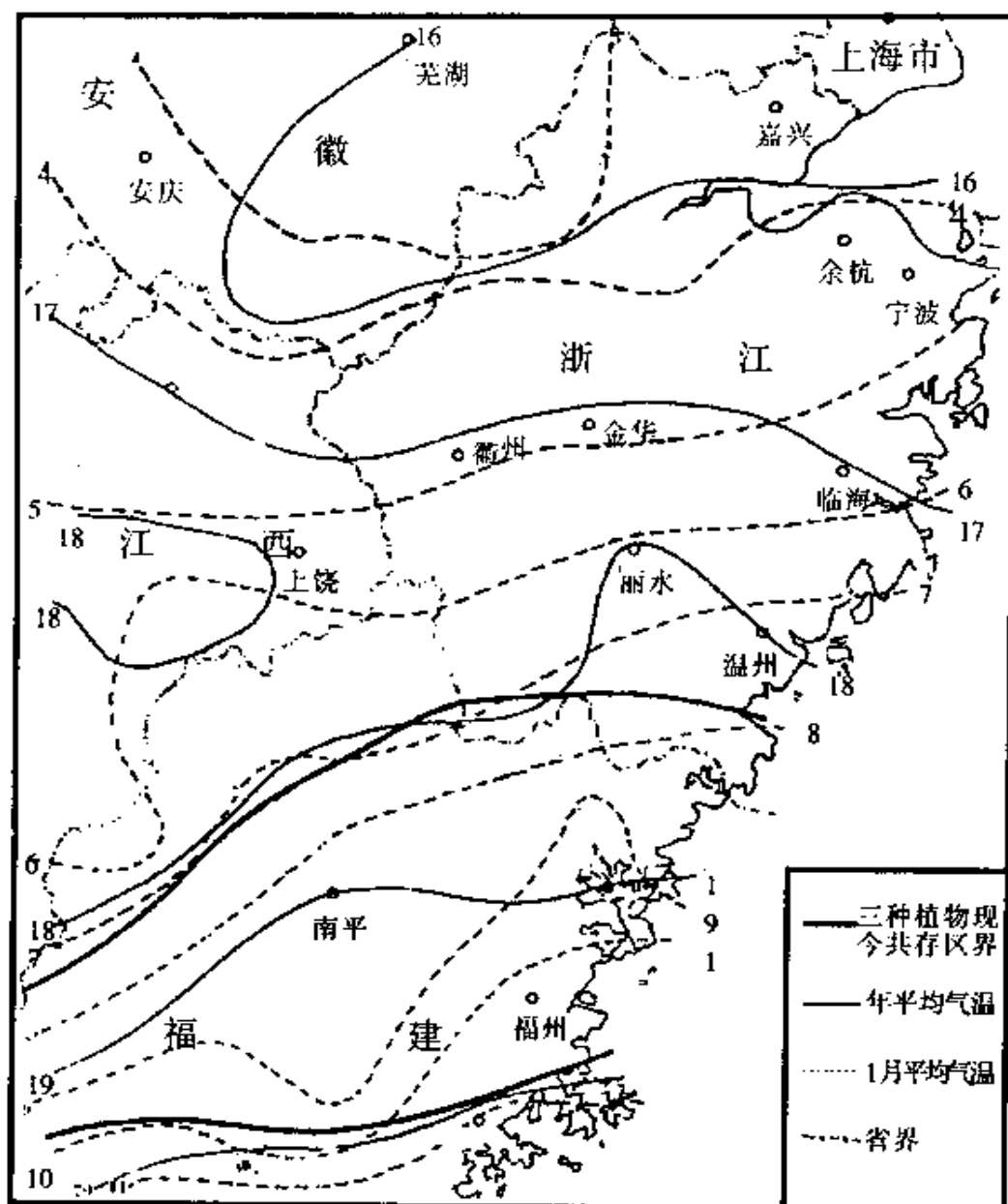


图 2

由上分析,可推断河姆渡当时气候要素约为:年平均气温 19—20℃(较今高 3—4℃),1 月平均气温 10—11℃(较今高 6—

7℃), $\geq 10^{\circ}\text{C}$ 活动积温约 6500℃ (较今高 1400℃ 左右), 年降水量约 1500—1800mm (较今多 200—400mm)。

根据近 30 年(1951—1980)我国东部(110°E 以东)114 个站年平均气温及 1 月、7 月平均气温、 $\geq 10^{\circ}\text{C}$ 的活动积温分布特征表明, 其等值线大体与纬圈平行, 但在不同纬度上梯度值(℃/纬距)差别甚大, 可分三区: ①东北、华北及山东区, ②长江中下游至闽中区, ③华南区, 分区建立东部地区纬度与温度的四组回归方程, 以下仅列出年平均温度与纬度的回归方程:

年平均气温回归方程	方 差	相关系数 r
$y_{\text{①}} = 50.889 - 1.0475x_1$	20.185	-0.951
$y_{\text{②}} = 31.250 - 0.4970x_2$	1.435	-0.919
$y_{\text{③}} = 40.582 - 0.8244x_3$	3.349	-0.958
$y_{\text{全}} = 40.320 - 0.7930\bar{x}$	39.980	-0.976

式中, x 为各区所在站的纬度, y 为 x 纬度上的年平均温度, 由 $y_{\text{②}}$ 方程求得乌岩岭(27.5°N)、余姚(30°N)的年均温度分别为 17.58℃ 和 16.34℃ (实况为 17.5℃ ~ 18.0℃ 和 16.2℃, 此系独立检验样本), 可见此方程有相当精度。

还可求得 1 月、7 月及 $\geq 10^{\circ}\text{C}$ 活动积温的各区三组回归方程(略)。分析表明, 冬季的方差及相关系数明显大于夏季, 表明年均温度随纬度变化受冬温变化影响大于夏季。从上式可见, ②区的温度梯度最小(0.947℃/1 纬距), 仅为华北、东北区的一半。反之在②区发生温度变化时, 温度带的迁移则最大, 如表 3 所示, 若各地年均温都升高 1 度, ②区的气候带北移 2 纬距多, ①区最小, 不到 1 纬距。1 月、7 月的情况类似。表明长江中下

游地区气候带的移动对温度变化的响应最为敏感*。在评估温度变暖造成气候带北移时,应充分考虑这种地区差异。照此,若年均温升高 $2.5^{\circ}\text{C} \sim 3.0^{\circ}\text{C}$,造成气候带北移5—6个纬距;1月升温 6°C ,亦北移6个纬距。实际值不会这么大,因①和③区纬距/ $^{\circ}\text{C}$ 值要小得多,故气候带北移小于4—5个纬距。

表3 温度变化 1°C 时,气候带的变化(纬距/ $^{\circ}\text{C}$)

月 份	①区	②区	③区	整个东部地区
1 月	0.579	1.099	0.708	0.742
7 月	2.070	3.932	/ ⁽¹⁾	3.289
年平均	0.955	2.012	1.213	1.261

注:③区7月出现负温度梯变,且回归方程未通过回归系数检验。

四、结 论

1. 全球性气候增暖现象及可能引起的生态环境变化,受到人们的高度关注。

目前,评估气候变暖的主要方法,是利用各种理论气候模式的模拟、预测。其结果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2. 利用地球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相似气候特征时期的气候及生态环境,作为评估今后气候变暖的一种方法,对于检验、补充、改善理论模式模拟结果有积极意义。全新世高温期是距今最近的一个暖期,有可能作为今后气候变暖最为相似的时期。

3. 距今6000—7000年前浙江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处于全新世温暖期的盛期。对遗址的孢粉和动植物遗存分析表明,

* 刘为纶等:《我国东部地区气温空间分布的敏感性》。

当时河姆渡处于中亚热带南部(现为北亚热带南部),年平均气温 $19^{\circ}\text{C} \sim 20^{\circ}\text{C}$ (较今高 $3^{\circ}\text{C} \sim 4^{\circ}\text{C}$), 1 月平均气温 $10^{\circ}\text{C} \sim 11^{\circ}\text{C}$ (较今高 $6^{\circ}\text{C} \sim 7^{\circ}\text{C}$), 年降水量约 1500—1800mm, 相当于气候带较今北移 3—4 个纬距。建立的四组方程组可用于今后气候增暖时我国东部地区气候带变化的评估。

河姆渡地区温暖期古气候及生态环境可作为未来气候变暖的相似经验模式。

注释

- ①IPCC. Climate Change. 第二届世界气候大会, 日内瓦, 1990 年。
- ②王绍武等:《气候预测与模拟研究》, 气象出版社 1993 年版。
- ③赵宗慈:《模拟温室效应对我国气候变化的影响》,《气象》1989 年第 3 期, 第 10~14 页。
- ④Бу́жыком ИКО Ми, 芳子译:《区域性气候变化的预测》,《气象科技》1992 年第 5 期, 第 1~7 页。
- ⑤Бу́жыком ИКО Ми, 元来福译:《评价未来气候变化的相似方法》,《气象科技》1992 年第 5 期, 第 8~13 页。
- ⑥ Ёорзенва ИКЛИмаТический оптимум голоцена как модель глобального климата Начала XX Века МЕТЕОРОЛОГИЯ И ГИДРОЛОГИЯ, 1984(8):69~77
- ⑦施雅风等:《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的基本特征》, 见《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第 1~18 页, 海洋出版社 1992 年版。
- ⑧吴维棠:《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迹看杭州湾两岸的全新世古地理》,《地理学报》1983 年第 2 期, 第 113~115 页。
- ⑨周子康、夏越炯、刘为纶、吴维棠:《全新世气候温暖期河姆渡地区古植被和古气候的重建研究》,《地理科学》1994 年第 4 期, 第 363~370 页。
- ⑩周子康、刘为纶:《杭州湾南岸全新世温暖期气候的基本特征》,《杭州大

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待发表)。

⑪《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地图出版社 1984 年 10 月。

⑫施少华：《中国全新世高温期环境与新石器时代的发展》，见《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第 185～191 页，海洋出版社 1992 年版。

河姆渡地区中全新世温暖期 古植被和古气候的研究*

周子康 刘为纶 吴维棠

一、前言

了解过去是预测未来的基础。针对当前全球气候趋暖的现实,研究中全新世温暖期的自然环境状态是有重要现实意义的,因为它“对我们研究人类生存环境的变化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系”^①。本文作者之一(吴维棠)曾对河姆渡地区的古环境作过研究,获得了颇有意义的结果^{②③}。随着近几年来新资料的不断发现和累积^④,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河姆渡地区中全新世温暖期(距今 7000—6000 年)的古植物和古气候提供了良好条件。

二、河姆渡地区温暖期的古植被

地带性自然植被的重建,需要分析组合中出现的乔木、下层灌木和地被物。因不同种类的植物在花粉生产力、花粉大小、形状和重量以及散布方式存在着很大差异,所以沉积在某地的花粉,其属、种的数量并不和邻近地区植物的属、种的数量有相同比例。可见,对沉积物中求得的百分率给予必要的订正,是提高重建古植被精度的关键之一。Andersen^⑤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

* 国家科技攀登计划第廿七项目成果之一;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础上,提出了如下应用于沉积物中不同花粉粒百分数的订正值:

栎属、桦属、桤属、松属	1:4
鹅耳枥属	1:3
榆属、云杉属	1:2
水青冈属、冷杉属	1
槲属、栎属	2

作者首先在花粉粒百分率订正的基础上,确定地带性自然植被群落的优势种和建群种,继后据此重建古植被。

1. 种子植物区系的地理成分分布

作者根据文献^{⑥⑦⑧},对河姆渡第四、三文化层植物孢粉和遗存进行了科、属的统计*,计有 64 科 85 属,其中孢子植物 16 科 22 属,种子植物 48 科 63 属。它们含有组成亚热带地带性自然植被的主要科,如壳斗科、樟科、山茶科、木兰科、芸香科、桑科、金缕梅科、大戟科、安息香科、金粟兰科、五加科和冬青科等。种子植物区系的地理成分分布如表 1 所示。

由表 1 可见,热带成分(第 2~7, 15)计有 20 属,占总属数的 31.7%,而其中热带亚洲(印度—马来西亚)成分有 7 属,比其它类别多,说明热带成分中,热带亚洲成分具有相对优势。北温带成分有 19 属,与热带成分相当,表明北温带植物区系对本地影响较深。

按中国植物区系分区,上述种子植物中绝大部分属泛北极植物区的中国—日本森林植物亚区。区系组成上以中亚热带和南亚热带地区成分为主,占总属数的 73%。

顺便指出,蕨类植物区系地理成分的统计(表略)表明,热带成分约占总属数的 50%。

2. 地带性植被类型及其优势种的推断

* 有些植物只鉴定至科,故未将其统计入属中,蕨类及极少量未定种亦未统计入内。

表 1 河姆渡地区温暖期种子植物区系的地理成分

区 系 名 称	属 名
1. 世界分布	龙胆 (Gentiana)、悬钩子 (Rubus)、鼠李 (Rhamnus)、藜 (Chenopodium)、蓼 (Polygonum)、苔 (Carex)、香蒲 (Typha)、芦苇 (Phragmites)、狐尾藻 (Myriophyllum)、眼子菜 (Potamogeton)
2. 泛热带分布	朴 (Celtis)、榕 (Ficus)、冬青 (Ilex)、安息香 (Styrax)
3. 热带美洲和热带亚洲间断分布	楠 (Pnoebe)、木姜子 (Litsea)、桉 (Eurya)
4. 旧世界热带分布	楝 (Metia)
5.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	樟 (Cinnamomum)、野桐 (Mallotus)
6.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葫芦 (Lagenaria)、稻 (Oryza)
7. 热带亚洲(印度-马来西亚)分布	黄杞 (Engelhardtia)、山胡椒 (Lindera)、覃 (Altingia)、金粟兰 (Chloranthus)、栲 (Castanopsis)、九里香 (Marraya)、薏苡 (Coix)
8. 北温带分布	柳 (Salix)、杨梅 (Myrica)、胡桃 (Juglans)、桤木 (Alnus)、桦木 (Betula)、鹅耳枥 (Carpinus)、榛 (Corylus)、栎 (Quercus)、水青冈 (Fagus)、榆 (Ulmus)、漆树 (Rhus)、槭树 (Acer)、绣线菊 (Spiraea)、椴 (Tilia)、忍冬 (Lonicera)、蒿 (Artemisia)、茜草 (Rubia)、黑三棱 (Sparganium)、松 (Pinus)
9. 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	山核桃 (Carya)、枫香 (Liquidambar)、木兰 (Magnolia)、莲 (Nelumbo)、红毛七 (Caulophyllum)
10. 旧世界温带分布	榉 (Zelkova)、菱 (Trapa)、山桃 (Prunus)
11. 温带亚洲分布	
12. 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分布	
13. 中亚分布	
14. 东亚分布	青冈 (Cyclobalanopsis)、漫荛 (Deutzia)、南酸枣 (Choeropindias)、合子草 (Actinostemmo)、芡实 (Euryale)、枫杨 (Pterocaraya)
15. 中国特有种	喜树 (Camptotheca)

第四、三文化层下部样品中以草本植物占优势,水生植物花粉含量较高,木本植物花粉较低(占 16%~25%),蕨类孢子少量。在草本植物中,禾本科花粉占绝对优势,其中有很大比例的水稻花粉。据吴维棠^⑨分析,当时河姆渡遗址周围集中了山地、丘陵、平原、江湖、沼泽、海涂、海洋、森林和草地等各种地理景观类型。花粉谱中出现的水稻和其它禾本科花粉表明,受生态境条件和人类活动制约而发育了一些非地带性植被类型。

地带性因子决定的地带性植被应更能反映大气候特征。确定河姆渡温暖期地带性植被类型是剖析该时期古植被和古气候的关键之一,其中推断植物群落类型的优势种就更为重要了。

据第一次和第二次发掘的河姆渡第四、三文化层 3 个探方中的 19 个样本的分析统计^{⑥⑦},孢粉出现频度(某植物种或属在样方中的出现率)较高的科或属如表 2 所列。

表 2 河姆渡地区温暖期孢粉出现频数

花 木 本	属名	栎	松	枫香	栲	榆	鹅耳枥	野桐	梓木	草	杨梅	山毛榉	绣线菊	桦					
	频度	17/19	16/19	14/19	14/19	11/19	9/19	8/19	7/19	5/19	5/19	5/19	5/19	5/19					
	花粉粒百分	12.3	2.1	3.0	2.1	2.0	0.9	0.7	0.4	5.3	0.6	1.1	1.1	1.2					
	率平均值(%)	(3.1)	(0.5)	(3.0)	(4.2)	(1.0)	(0.3)	(0.7)	(0.1)	(10.6)	(1.2)	(1.1)	(0.5)	(0.6)					
草 本	(科)属名	藎		藎科		香蒲		莎草科		蒿		藜		禾本科		眼子草		伞形科	
	频度	16/19		15/19		15/19		13/19		11/19		7/19		7/19		6/19		5/19	
	花粉粒百分	36.1		1.2		12.3		2.3		2.1		0.7		9.7		4.1		0.8	
	率平均值(%)	36.1		1.2		12.3		2.3		2.1		0.7		9.7		4.1		0.8	
孢 子	(科)属名	海金沙科		水龙骨科		紫萁													
	频 度	7/19		7/19		5/19													
	孢粉粒百分	1.9		0.6		0.5													
	率平均值(%)	1.9		0.6		0.5													
备 注		植物遗存中见有大量蕨类植物和壳斗科的常绿阔叶树种(青冈栎、赤皮栲等)																	

樟科花粉发现较少,却有大量叶片等遗存发现,计有细叶香

桂(樟属)、紫楠(楠属)、牛筋树和江浙钩樟(山胡椒属)、山鸡椒(木姜子属)。壳斗科中常绿树如青冈栎、赤皮稠多有所见。表2括弧内的数据为订正过的花粉粒百分数的平均值。常绿阔叶树订正系数取2,同椴属(椴属是先长满叶子才开花)、枫香(花叶同生)取1,其余按Anderson所定系数。

一般而言,出现频度高、花粉(或孢子)粒百分数平均值较高者,在决定植被类型中应占主要地位,其乔木可定为优势种。由表2和表3可见,苦槠和钩栲(栲属)、蕈树(蕈属)、青冈栎和赤皮稠(栎属)、细叶香桂(樟属)和枫香(枫香属)可定为优势种。重建后的河姆渡温暖期地带性自然植被概况载于表3。从出现频度和花粉粒百分数平均值两者综合而言,群落的建群种可定为栲和蕈两属所属之种。植物遗存中属于栲属的树种仅见有苦槠和钩栲,属于蕈属的有蕈对。图1分别绘出了我国现代苦槠、钩栲以及蕈树各自的分布区,阴影区是上述三者共存区域。根据中国自然区划,该阴影区域属现代的中亚热带的南部地区。

值得强调指出的是:上述所围阴影区在现今的植被分区系统上属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南部亚地带的浙南、闽中山丘栲类、细柄蕈树林区^⑩,这与表3所示的重建后的河姆渡温暖期地带性自然植被的组成,特别是植被型和群丛是颇为相似的。

河姆渡地区温暖期古植被类型与现代浙南乌岩岭自然保护区(中亚热带)相对比,前者较乌岩岭植被含有更多的南方成分,其中厥类植物更为明显;与广东鼎湖山自然保护区(23°08'N, 114°35'E, 南亚热带)^⑪相比,鼎湖山自然植被中的南方成分多,其中木本植物更为突出,而相应的温带植物却少得多,苦槠已被更喜热的其它树种(甜槠)所代替,不见分布。

综上所述,河姆渡地区在温暖期地带性植被类型和组成上有如下特征:

表3 重建后的河姆渡温暖期地带性自然植被的组成

层次	中文名	学名	层次	中文名	学名
乔	樟	<i>Alizia chinensis</i>	下木	红藤忍冬	<i>Lonicera hypoglaucia</i>
	苦槠	<i>Castanopsis sclerophylla</i>		悬钩子	<i>Rubus</i> sp.
	钩栲	<i>C. tibetana</i>		夜合花	<i>Magnolia coco(?)</i>
	枫香	<i>Liquidambar formosana</i>		鼠李	<i>Rhamnus</i> sp.
	紫楠	<i>Phoebe sheareri</i>		樟	<i>Corylus</i> sp.
	细叶香桂	<i>Cinnamomum chingii</i>		绣球绣线菊	<i>Spiraea blumei</i>
	细叶青冈	<i>Quercus myrsinaefolia</i>	草	阔叶星蕨	<i>Microsorium superficiale</i>
	赤皮栲	<i>Q. gilva</i>		肉质伏石蕨	<i>Lemmaphyllum carnosum</i>
	黄杞	<i>Engelhardtia</i>		矩园石韦	<i>Pyrrosia martinii</i>
	白楸	<i>Mallotus paniculatus</i>		金鸡脚	<i>Pyrrosia martinii</i>
	栎	<i>Quercus</i> sp.		水龙骨	<i>Polypodium</i> sp.
	苦楝	<i>Melia azedarach</i>		抱石莲	<i>Lepidogrammitis</i>
	喜树	<i>Camptotheca acuminata</i>		尖咀蕨	<i>Belvisia</i> sp.
	九里香	<i>Murraya paniculata</i>		瓦韦	<i>Lepisorus</i> sp.
	漆树	<i>Rhus</i> sp.		紫萁	<i>Osmunda</i> sp.
	椴	<i>Tilia</i> sp.		光里白	<i>Hieriopteris laevisissima</i>
	南酸枣	<i>Choerospondias axillaris</i>		中华剑蕨	<i>Loxogramme chinensis</i>
	桤木	<i>Alnus</i> sp.		中国蕨	<i>Sinopteris</i> sp.
	梓木	<i>Carpinus</i> sp.		尖齿瘤足蕨	<i>Plagiogyria simulans</i>
	鹅耳枥	<i>Celtis</i> sp.		单叶凤尾蕨	<i>Pteris subsimplex</i>
	朴	<i>Celtis</i> sp.		鳞毛蕨	<i>Dryopteris</i> sp.
	榆	<i>Ulmus</i> sp.		云南小膜盖蕨	<i>Araiostegia yunnanensis</i>
	小叶樟树	<i>Zelkova sinica</i>		阴石蕨	<i>Humata</i> sp.
	山核桃	<i>Carya</i> sp.		骨碎补蕨	<i>Davaallia</i> sp.
木	枫杨	<i>Pterocarya</i>		带伏瓶尔小草	<i>Ophioderma pendula</i>
	亮叶水青冈	<i>Fagus lucida</i>	木	卷柏	<i>Selaginella</i> sp.
	杨梅	<i>Myrica</i> sp.		石松	<i>Lycopodium</i> sp.
	槭树	<i>Acer</i> sp.		藜	<i>Chenopodium</i> sp.
	松	<i>Pinus</i> sp.		茜草	<i>Rubia cordifolia</i>
	山桃	<i>Prunus davidiana</i>		蒿苳	<i>Coix</i> sp.
	胡桃	<i>Juglans</i> sp.		苔草	<i>Carex</i> sp.
	安息香	<i>Styrax</i> sp.		红毛七	<i>Caulophyllum</i>
	江浙钩樟	<i>Lindera chienii</i>		龙胆	<i>Gentiana heterophylla</i>
	牛筋树	<i>L. gkayca</i>	藤本	羽裂海金沙	<i>Lygodium polystachum</i>
	山鸡椒	<i>Litsea cubeba</i>		柳叶海金沙	<i>L. salicifolium</i>
	冬青	<i>Ilex</i> sp.		狭叶海金沙	<i>L. microstachyum</i>
下木	天仙果	<i>Ficus beecheyana</i>	植被型	阔叶林	
	瘦蕨	<i>Deutzia</i> sp.		中亚热带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	
	金粟兰	<i>Chloranthus fortunei</i>		阔叶林	
	桤	<i>Eurya</i> sp.	植被亚型	阔叶林	
				阔叶林	
木			群丛	阔叶林	
				阔叶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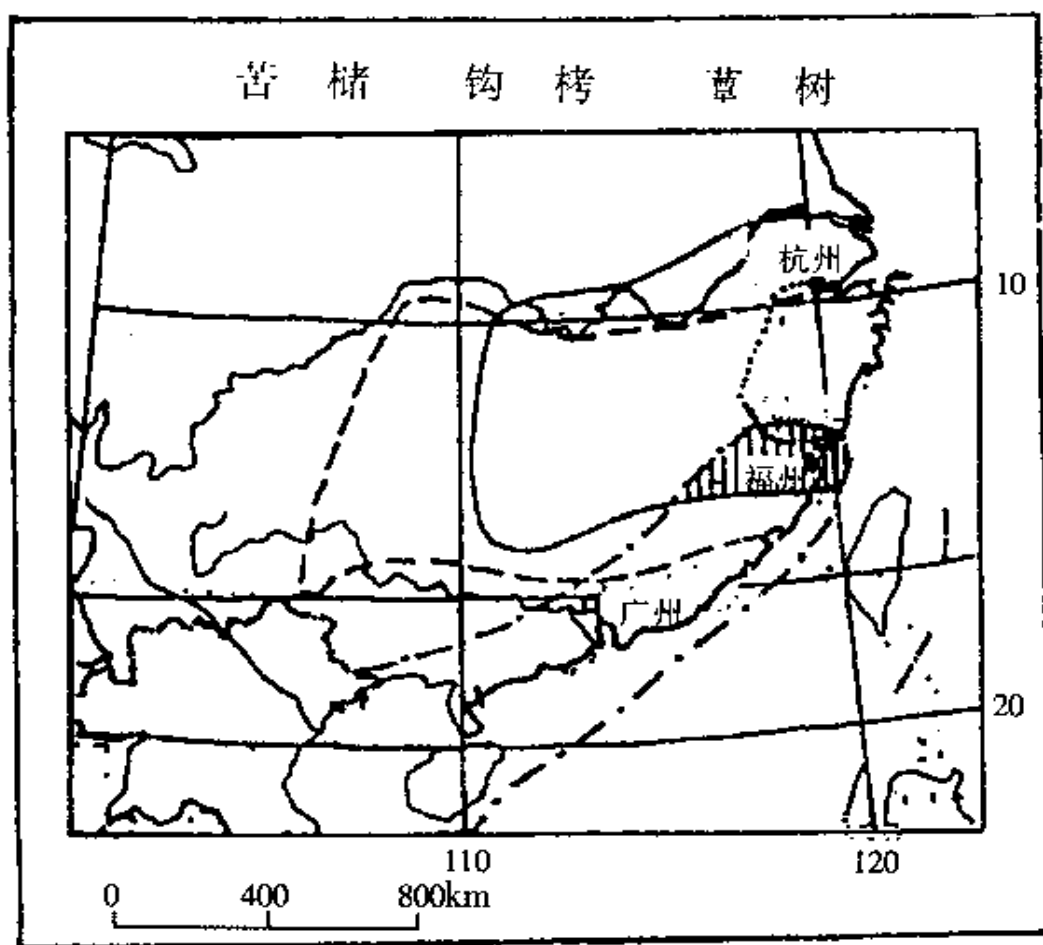


图 1 中国现代苦楮、钩栲、蕁分布

1. 种子植物区系的地理分布, 热带成分占 31.7%, 其中热带亚洲成分具有相对优势。北温带植物区系对本地区影响较深, 地带性植被组成以中亚热带和南亚热带地区成分为主, 占总属数的 73%; 在乔木和灌木中没有典型的热带属或种。

2. 群落优势种有蕁树、苦楮、钩栲、青冈栎、赤皮稠、紫楠、枫

香和细叶香桂等。

3. 建群种蕈树、钩栲和苦槠三者共存的现代分布区域属中亚热带南部地区,在现今植被分区系统上属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南部亚地带的浙南、闽中山丘栲类、细柄蕈树林区。

4. 蕨类植物多为南亚热带和热带成分,含有热带种。

5. 地带性植被类型为亚热带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群丛为栲+蕈+青冈-山胡椒-水龙骨群落。

三、河姆渡地区温暖期的古气候

河姆渡地区温暖期某些生物现生种(属)的分布及其所属的气候带如表4所示。从表4来看,众多植物种(或属)现代分布仅见之于浙南甚至南亚热带或热带。某些动物,如亚洲象、犀等,虽然历史时期栖息的北界曾达现代的北亚热带,但它们对最冷月平均温度的要求较高,据有关记载^{⑤⑥},亚洲象的生活区要求最冷月温度在10℃以上,犀牛则要求更高些。

表4中,海滩岩代表热带和亚热带环境海相气候地层。据江大勇等研究(1994)在浙江象山县爵溪镇下沙和大岙及岱山县大长涂岛三个中全新世海滩岩剖面中(其生成年代最远距今 6485 ± 210 年),热带性的贝类(16种)占海滩岩中贝类总种数的26.93%。其中8种出现于现今浙南外侧岛屿如南麂列岛,另8种则未见。相比之下,海滩岩中的贝类面貌与现今受台湾暖流控制的浙南外侧岛屿及广东沿海等地潮间带贝类面貌颇为接近。

上述特性定性地表明,河姆渡地区温暖期的气候至少要比现今的浙南地区温暖湿润,特别是冬季更要暖得多。下面试图定量地予以讨论。

表 4 河姆渡地区温暖期某些生物现生种(属)的现代分布

中文名	学名	中国分布区域及所属气候带	
草树	<i>Altingia chinensis</i>	闽粤沿海山地、琼	中亚热带—热带
黄杞	<i>Engelhardtia</i>	浙南、闽、粤、桂、川、滇	中亚热带—热带
南酸枣	<i>Choerospondius axillaris</i>	浙南、闽、粤、湘	中亚热带—热带
赤皮栎	<i>Quercus gilva</i>	浙南沿海岛屿、闽、湘、台	中亚热带—南亚热带
九里香	<i>Murraya paniculata</i>	两广、湘南、黔南、滇	南亚热带—热带
带状瓶尔小草	<i>Ophioderma pendula</i>	滇、琼、台南	热带
狭叶海金沙	<i>Lygodium microstachyum</i>	两广、闽、黔南	南亚热带—热带
柳叶海金沙	<i>L. salicifolium</i>	滇、琼	热带
褐叶星蕨	<i>Microsorium superficiale</i>	滇	热带
中华剑蕨	<i>Loxogramme chinensis</i>	浙南、华南、西南	中亚热带—热带
肉质伏石蕨	<i>Lemmaphyllum carnosum</i>	滇、粤、琼、台	南亚热带—热带
水鹿	<i>Rusa unicolor</i>	台、粤、西南	南亚热带—热带
犀	<i>Rhinoceros sp.</i>	(马来西亚、印尼)	热带
亚洲象	<i>Elephas maximus</i>	滇	热带
红面猴	<i>Macaca speciosa</i>	滇、川、粤、桂、闽	南亚热带—热带
海滩岩	主要分布在广东南澳岛—福建平潭岛		南亚热带—热带

表 5 浙南乌岩岭和广东鼎湖山自然保护区气候要素值

自然保护区名	乌岩岭自然保护区	鼎湖山自然保护区	余姚
年平均气温(℃)	17.5~18.0	21.0	16.2
最冷月平均气温(℃)	7.5~8.0	12.6	4.1
≥10℃活动积温(℃)	5600~5900	7329	5130
年平均降水量(mm)	1600—1800	1900	1300
备 注	鼎湖山资料取自文献[11];余姚资料取自气象站;乌岩岭资料取自所在基带的气象站(苍南和平阳站)		

如前所述,河姆渡地区,在距今 7000—6000 年前的古气候应介于现今浙南乌岩岭和粤北鼎湖山之间。表 5 列出了它们所在地区(基带)的主要气候要素值。参考图 1 阴影区现代气候的要素值,可以推断,河姆渡地区温暖期古气候主要要素值为:年

平均气温度约 $19^{\circ}\text{C} \sim 20^{\circ}\text{C}$ (高于现代 $3^{\circ}\text{C} \sim 4^{\circ}\text{C}$), 最冷月平均气温 $10^{\circ}\text{C} \sim 11^{\circ}\text{C}$ (高于现代 $6^{\circ}\text{C} \sim 7^{\circ}\text{C}$), $\geq 10^{\circ}\text{C}$ 活动积温约 6500°C (高于现代 1400°C), 年降水量约 $1600\text{--}1800\text{mm}$ (多于现代 $300\text{--}500\text{mm}$)。

值得指出的是, 河姆渡第四、三文化层时期的古植被中, 有现代仅见于两广和海南的蕨类植物和藤本植物。如柳叶海金沙现见于云南和海南海拔 $840\text{--}1800\text{m}$ 的混交林中, 若按气温递减率计算 ($0.5^{\circ}\text{C} \sim 0.6^{\circ}\text{C}/100\text{m}$), 此海拔高度处的年和最冷月平均温度分别也不会高于 19°C 和 11°C 。这些喜热植物之所以不能在现今平均温度和最冷月平均温度达此值的地域生存分布, 原因之一, 可能与现今年极端最低温度较低有关。似可推断暖冬也是河姆渡地区温暖期古气候特征之一。

简言之, 在距今 $7000\text{--}6000$ 年前 (属大西洋气候期), 杭州湾南岸河姆渡地区一带处于中亚热带南部, 其气候大致与现今福州一带的气候相似, 相当于气候带较今北移约 4 个纬距。

致谢: 韦直、何绍其两位教授曾对初稿提出宝贵意见并给予热情赐教, 特此致谢。

注释

- ①叶笃正:《中国的全球变化预研究》, 第 30—35 页, 气象出版社 1992 年版。
- ②吴维棠:《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迹看杭州湾两岸的全新世古地理》,《地理学报》1983 年第 2 期第 113—115 页。
- ③吴维棠:《7000 年来姚江平原的演变》,《地理科学》1983 年第 3 期第 269—275 页。
- ④江大勇、杨守仁:《浙江中全新世海滩岩中的动物群及其古气候古环境意义》,《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1994 年第 4 期第 53—60 页。

- ⑤Lamb H. H. 汪奕琮译:《气候的变迁与展望》,第 106 - 108 页,气象出版社 1987 年版。
- ⑥浙江省博物馆自然组:《河姆渡遗址动植物遗存的鉴定研究》,《考古学报》1978 年第 1 期第 95—105 页
- ⑦孙湘君等:《“河姆渡”先人生活时期的古植被、古气候》,《植物学报》1981 年第 2 期,第 146~151 页。
- ⑧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第 52 - 53 页,文物出版社 1983 年版。
- ⑨魏丰、吴维棠、张明华:《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动物群》,第 90 - 114 页,海洋出版社 1990 年版。
- ⑩中国植被编辑委员会:《中国植被》,第 100 - 200 页,科学出版社 1980 年版。
- ⑪Kong Guohui, Liang Chun, Wu Huimin, Huang Zhongliang, Dinghushan Biosphere Reserve, Beijing New York; Science Press, 1993, 1~35.
- ⑫李克让、张丕远:《中国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第 89 - 187 页,海洋出版社 1992 年版。

河姆渡人在中华文化缔造中的贡献

曾 骥

1973 年,东海之滨的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古遗址传来了喜人的讯息。该地点在农田水利建设的施工中,从地层中发现了大批乌黑的陶器残片、鹿角、石器和各种动植物遗存的混合堆积物。这些新发现导致后来在河姆渡进行的两次大规模的田野考古科学发掘^①。

河姆渡遗址的勘查和发掘表明,这个遗址的面积超过 4 万平方米,最厚的文化层堆积的平均厚度达 4 米,包括有 4 个大致衔接的文化堆积层和多个人类的活动面。其中的第四层和第三层堆积的平均厚度都超过 1 米,出土了大批木、骨、石等质料的生产工具和陶器、人工栽培稻、多种动植物遗存。在沼泽地中揭露出大面积的干栏建筑残迹及各种榫卯木构件,在居住地附近还清理了一批史前墓葬。

河姆渡古遗址的文化内涵丰富多彩,它拥有分布在各地层中的 27 个碳十四年代测定数据^②,从而可以科学地确知河姆渡文化是目前所知的长江下游新发现的较早的原始文化,它的年代可以上溯至距今 7000 年。经过考古调查,这一考古文化除了分布在宁绍平原东部之外,还跨海到达舟山群岛^③。

河姆渡遗址的考古新发现震惊了当时的神州大地,河姆渡

* 本项目研究得到香港中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中心基金会资助。

先民所创造的奇迹,使人们对中国东南沿海的史前文化的认识有了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已不可能用传统的“中心说”来解释在这片土地上与之毫无联系的这个新发现的考古文化的崭新面貌。从河姆渡地层深处的生活面上破土而出的各种文化遗物、遗迹使这个新的考古学文化载入史册并成为我国东南区的一颗明珠。河姆渡先民奋斗不息的开拓与创造,对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古文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陶器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重要发明,它伴随着农业和定居而产生,并且品类越来越多,造型日趋完善。其中,最主要的陶器自然是与人们生计关系最密切的炊器了。综观我国黄河、长江两大流域主要新石器文化的炊用陶器,大致可以区分为两个明显不同的群系,其一是黄河中上游区仰韶—龙山文化系统的鬲文化,这个系统的三足炊器酝酿时间较长,大概在庙底沟第二期文化(距今 4700 年)时期出现了陶鬲,在它的推动下,陶鬲这种三足炊器在大范围的空间分布开来;其二是长江下游区河姆渡—马家浜文化系统和黄河下游区后李—大汶口文化体系的釜鼎文化。从考古年代分析,浙江的河姆渡人和山东的后李人是这个釜鼎文化的创造者之一。在河姆渡遗址的底层,出土陶器的主要成分是大量的圜底夹碳陶质釜和与之配套使用的陶支脚。稍后,大概在浙江的马家浜文化和山东的北辛文化的古遗存中,发现在陶釜底部加塑固定的三足器—陶釜与原有的釜、支脚共存,我们称这种釜鼎为原型鼎。而后来的崧泽、北阴阳营、薛家岗、大汶口诸文化以及山东的龙山文化、河南的部分龙山文化中陶鼎便大量流行起来。从两类器物的地区分布和使用功能上看,釜鼎文化比鬲文化占有更大的优势,最明显的实例是在鬲文化形成的前夜——仰韶文化晚期,庙底沟类型的仰韶文化陶器群中,居然出现了明显的东方因素——釜、釜鼎、

灶等^④,而此类器物在浙江地区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中出现的年代要比黄河中游区早得多,创造东方文明的饮食器具应归功河姆渡文化。

人工栽培稻是河姆渡人对环境适应和对沼泽型稻作农业发展的贡献。目前在诸多学者对稻作农业的起源争论中,亚洲稻的多源中心说取得较多学者的共识。根据目前考古发现,在我国发现的几处最早年代的有人工栽培稻的遗址,都分布在北纬 $29^{\circ}36'$ ~ $30^{\circ}36'$ 之间的长江流域。其中地处长江中游的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北纬 $29^{\circ}40'$)的栽培稻,其上限年代在距今9100—8200年之间(比较保守的年代定在距今8200年之内),是目前我国史前稻作文化年代最古老的一处,发现人工栽培稻的距今年代7000年左右的遗址则有河姆渡、罗家角、城背溪、石门皂市(下层)等四处,前两处位于长江下游,后两处位于长江中游。因此,可以把长江中下游看作我国稻作农业起源的中心。但从上述几处遗址的出土考古材料对比,河姆渡是我国现知史前栽培稻材料最丰富、资料最可靠的一个遗址。在400平方米的发掘范围内,发现多层稻草、稻谷、秕谷、谷壳等遗物堆积,出土的稻秆、稻叶、谷芒色泽如新、谷粒外形完好。

河姆渡还出土了近200件农柄使用的骨耜,表明它有发达的耜耕农业。这种取材于大动物的肩胛骨,修成双肩式的生产工具的出现,还意味着最早的双肩式工具的起源和传播。著名西樵山石器制造场在距今5000多年前淘汰了细石器制造工艺,选择了双肩石器作为它的定型产品,可能是受到这种装柄式组合工具的启发。

河姆渡遗址发掘中,不少的陶釜在出土时,器壁上还粘结着稻米饭粒的焦渣,表明陶釜的专门用途。在陶器群中,釜、甑、盘、盖、支脚、闷火尊及稍晚出现的灶、鼎,均是为解决稻米为主

要食物的配套生活器皿,原始的稻作农业只有具备这样的生活水平和环境,才能够在较大范围得到传播和扩展。而上述的其它几个出土栽培稻的地点都不具备像河姆渡这样的条件。因此,在研究稻作农业的起源和传播时,不能忘记河姆渡这座引人瞩目的里程碑。

河姆渡遗址的出土科学材料中,发现了极其丰富的动植物资料,如植物中包括木本植物、水生植物、湿生植物多达 25 种,生活在河姆渡古环境的动物更多,经鉴定至少在 60 种以上。以上这些自然资源使河姆渡人成为当时最富裕的食物采集者。河姆渡人可以在摆脱饥饿威胁的环境下,从容地进行一系列动植物驯化的观察和实验,不管它的进程是怎样的缓慢,都可以引出许多首创性的发明。

显示出高水平、高工艺的各种榫卯构件,使河姆渡人创造的干栏建筑成为南中国的一种传统建筑特色。河姆渡遗址的自然环境不同于黄河流域的黄土地带,它位于潮湿度大的沼泽边缘,为了适应这种生存环境在居住建筑方面开创了我国现见的最早的干栏建筑。发掘现场出土数以千计的长圆木、桩木、木板,有许多圆木、桩木的下部削尖后插入地下 30—50 厘米,有的甚至深达 1 米。考古工作者根据发掘出来的桩柱排列及走向,分别判断出房屋和水井的建筑结构,其中有一座长形架空地面的木构建筑便是根据四组柱桩的排列加以复原的,它比北方半地穴式或地面框架房屋建筑要复杂得多。根据古建筑学家鉴定,河姆渡出土的榫卯构件类别有:柱头和柱脚柱、梁头榫、带梢钉孔的榫头、燕尾榫、双凸榫、柱头刀形榫、双叉榫、柱头透卯、带卯孔的转角立柱、直棂方木、企口板等 10 多种^⑤,河姆渡人使用原始的石斧、石镞、石楔创造了这些木构件,这本身就是难于置信的奇迹。正是它的成功,对我国古典建筑产生重大的影响。干栏

建筑是原始巢居的继承和发展,在我国华南、西南是普遍和流行的建筑形式^⑦,直到今天,许多兄弟民族地区的干栏建筑历数千年的演变而不衰。建国以来,在云南剑川海门口、湖北圻春毛家咀、广东高要茅岗等地都曾发现过各种不同规模的干栏遗迹^⑧,这些遗址的年代都要晚于河姆渡遗址,但建筑水平并没有超过河姆渡文化,因此对河姆渡文化的建筑,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会过分。

河姆渡人是舟楫发明和征服海洋的先导,在该遗址出土的珍贵文物中,与水上交通有关的遗物有在第三、四文化层中出土的六支木桨和采集的两件夹碳黑陶质的小陶舟模型器。木桨均系采用单一木料加工制成,但已有桨柄、桨叶的明显分化。其中保存较好的一件(T263④:234)残长 92 厘米;另一件有保存完好的桨叶的标本,叶长 50 厘米,宽 12.3 厘米,厚 2.1 厘米。木桨的柄部切面是方形,可容手握,柄上刻满横线、斜线组成的几何形装饰花纹。就舟船的发展来说船先而桨后,有木桨则必定有舟船,可惜河姆渡遗址未能发现木船的遗物。考古工作者注意到在遗址的第三文化层内发现一件直径约 60 厘米、中间挖空、残长 2 米的木构件,构件的一端呈尖头状,另一端已残,据分析,这构件很可能是废弃的独木舟的残骸,它在废弃后被人们用作干栏建筑物的板墙。

采集的陶舟模型,一件是方槽形,长 8.7 厘米,宽 2.6—3 厘米,高 2.5 厘米—3 厘米;另一件长 7.7 厘米,高 3 厘米、宽 2.8 厘米,两端尖,尾部微翘,舟首有一鸡胸式穿孔小耳,两侧等高,底部略圆,俯视这标本平面若梭形,显然是独木舟的式样。

在河姆渡的出土遗物中,还有大量的鱼类骨骼、蚌类的壳、菱角等水生动植物标本,其中有生活在深海的鲸鱼、鲨鱼,也有咸淡水交汇水域的鱼类,如鲢鱼、裸顶鲮等,都是人们捕捉的对

象。

以上实物资料,直接和间接地说明河姆渡人已发明创造了水上交通工具和推进工具,能够在江湖河海进行生产活动,他们具有一定的航海能力。

考古工作者继河姆渡遗址发现之后,在东海的舟山群岛上发现了一批新石器时代遗址^⑨。其中位于定海县白泉附近的十字路遗址,出土遗物近似河姆渡第三期文化,年代距今约 5500 年,说明河姆渡文化晚期,河姆渡人已使用海上交通线进行移民和海岛开发。考古学家安志敏先生曾指出,以河姆渡及其后继者为代表的长江下游的新石器文化的若干因素,可能影响到史前日本,他所列举的文化因素包括玉玦、漆器、稻作农业、干栏建筑^⑩。以上所列的项目都与河姆渡文化的内涵有关。至于这种文化的联系和传播,尽管有多条路线,但由中国的江苏、浙江直航日本九洲的东海航线应是与传播内容密切相关的最佳航线。《越绝书》卷八在谈及春秋战国期间越人的交通情况时说:“以舟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越人创造舟楫、扬帆远去的成就,其渊源盖可以追溯到 7000 年前杭州湾的河姆渡文化的贡献。

本世纪以来,在太平洋海域的许多岛屿发现了大量的有段石镞和双肩式石器而引起人们的注意。有的考古学家认为这些现象与民族的迁徙有关。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指出,在旧石器时代之后,亚洲东南部盛行不断的民族迁徙,前后大约有三次高潮。^⑪这一批批移民文化的装备中就包括有段石镞、双肩石器和生活用的陶器。寻找这些标志物的发源,就可以确定迁徙的路线和年代。

考古学家牟永抗先生,从河姆渡遗址发掘出土的石器材料中,识别出一类圆端式有段石镞,并指出发掘报告误定为“镞式

斧”，应予纠正。^⑩另一学者林华东先生同意牟说，并著文论证有段石锛起源于河姆渡文化的看法。^⑪从目前出土有段石锛的资料和有关的碳十四年代数据分析，上述看法可为学术界所接受。既然在距今 7000—6000 年间创造有段石锛的河姆渡文化成为这类石器的起源中心，我们也就有理由推断河姆渡文化曾参与有段石锛的海外传播，这一点也可以作为河姆渡人进行海上交通的旁证。

1979 年，在浙江桐乡县罗家角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文化内涵相当丰富，也可以划分成四个文化层，它的底层文化不同于以往发现的马家浜文化，在绝对年代上相当于河姆渡第一期文化^⑫，但在文化内容上却与河姆渡文化绝不相同。作为罗家角文化陶器的核心是大量有别于河姆渡的各类陶釜。罗家角各层陶釜基本上包括三种形式：Ⅰ型是少量河姆渡文化的夹碳黑陶的筒形弧腹带脊釜；Ⅱ型是新发现弧腹腰沿圜底釜；Ⅲ型是大口，口侧有鋁的筒形腰沿釜。这批有特点的陶釜中，包含了宁绍平原河姆渡文化的因素，也包括可能与山东半岛近年发现的“后李—西河”类型的大口深腹圜底釜的因素。

由于河姆渡文化与罗家角文化的融合，加上来自北方的大口釜的影响，促成了太湖地区弧腹腰沿釜的转化，形成了太湖流域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体系的区域文化。

河姆渡文化的贡献还表现在漆器、蚕桑、雕刻、凿井等多方面，这里不一一列举了。这些贡献对中华古老文明的缔造，意义深远。其中最重要的意义是由于这个沉埋地下不为人知晓的河姆渡文化本身的被发现，使长江流域有足够的理由成为我国文明发生的另一个中心或摇篮。目前，这个客观的事实，愈来愈得到学术界的认同。由此，我们应该感谢 20 多年前发掘河姆渡遗址的考古学家们的辛勤劳动，更应该感谢 7000 年前河姆渡史前

先民给我们留下的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河姆渡遗址博物馆是记录河姆渡文化的纪念碑。人类所创造的文化是永存的,祝河姆渡遗址博物馆重造历史辉煌的光彩也永存。

注释

- ①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博物馆:《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河姆渡遗址考古队:《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0年第5期。
-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91)》第111—115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 ③王和平、陈金生:《舟山群岛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3年第1期。
- 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庙底沟与三里桥》(黄河水库考古报告之二),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 ⑤湖南省考古研究所等:《湖南澧县彭头山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8期;裴安平:《彭头山文化的稻作遗存与中国史前稻作农业》,《农业考古》1989年第2期。
- ⑥祁英涛:《中国早期木结构建筑的时代特征》,《文物》1983年第4期。
- ⑦戴裔煊:《干栏——西南中国原始住宅的研究》,岭南大学1948年版。
- ⑧云南省博物馆筹备处:《剑川海门口古文化遗址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第6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发掘队:《湖北圻春毛家嘴西周木构建筑》,《考古》1962年第1期;杨豪、杨耀林:《广东高要县茅岗水上木构建筑遗址》,《文物》1983年第12期。
- ⑨同③。
- ⑩安志敏:《长江下游史前文化对海东的影响》,《考古》1984年第5期。
- ⑪金之丈夫、国分直一:《有肩石斧、有段石斧及び里陶文化》,《台湾考古志》,[日]法政大学出版局1979年版。
- ⑫牟永抗:《浙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初步认识》,《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

会论文集》第7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⑬林华东:《试论河姆渡文化与古越族的关系》,《百越民族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⑭罗家角考古队:《桐乡罗家角遗址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1981年。

河姆渡文化发现的意义

张之恒

河姆渡文化是杭州湾以南地区一种颇具特色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其早期已进入到“锄耕农业阶段”,文化时代属新石器时代中期。河姆渡文化与马家浜文化早期的人工栽培稻是长江下游地区有确凿证据的年代最早的水稻。水稻的驯化地和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的分布区,应在四明山与宁绍平原的过渡地带以及天目山脉与太湖平原的交接地区。河姆渡文化早期的“干栏式”建筑是中国现已发现的时期最早的“干栏式”建筑遗存,这对研究当时的社会经济形态,和生态环境都有重要意义。

一、河姆渡文化的文化时代

确定一个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文化时代,需从该文化的农业经济形态、磨制石器、制陶业及其他手工业的发展水平来判断。

(一)河姆渡文化时期农业经济的性质

原始农业大致可分为“火耕农业”、“锄耕农业”和“发达的锄耕农业”(有的地区可能为“犁耕农业”)三个发展阶段。

“火耕农业”亦称“砍倒烧光农业”,俗称“刀耕火种”,其特点是“焚而不耕”,即不翻土耕种;这种农业的种植程序是,先将野地里的树木砍倒、晒干、烧光,以草木灰作肥料,然后撒播或挖穴点播,既不中耕,也不除草,待作物成熟后收割其穗子或块根。

“锄耕农业”的最大特点是“翻土耕种”，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中凡是出现石铲、石耜、石锄、骨(蚌)铲等翻土工具的，都说明其文化阶段的农业经济已进入到“锄耕农业”阶段。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出土的数量众多的“骨耜”(骨铲)是一种很好的翻土工具，反映距今约 7000 年的河姆渡文化早期，该地区的人们已进入到“翻土耕种”、“熟荒耕作”的“锄耕农业”阶段。农业的发展为家畜饲养业提供了条件，根据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分析，可知当时饲养的家畜有猪和狗，水牛也可能被人工饲养。^①

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在 10 余个探方广达 400 多平方米的范围内都发现了稻谷遗存，有的稻谷、稻壳、稻秆及茎叶混杂在一起，形成了 20—50 厘米厚的堆积层。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中发现的水稻遗存，经鉴定系栽培稻的籼亚种中晚稻型的水稻。

河姆渡遗址第四层普遍发现人工栽培稻遗存，水稻堆积厚度达几十厘米。杭州湾以北地区与河姆渡文化时代相当的马家浜文化遗址中也普遍发现人工栽培稻遗存，这说明杭州湾地区在河姆渡文化早期，人们已普遍种植水稻，栽培早已越过驯化阶段，而进入到水稻栽培的成熟阶段。

根据中国现已公布的考古资料，属于禾本科的谷物性农作物(水稻、粟)的栽培要晚于园艺性农作物(瓜、果、蔬菜)和无性繁殖的根茎类作物。^②中国有确凿证据的禾本科农作物(水稻、粟)的种植要到距今 8000 年以后，距今 10000—8000 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尚未发现人工栽培稻遗存。

(二)比较发达的制陶业

河姆渡文化早期的陶器除打磨光亮外，往往有比较繁密的花纹及各种装饰，如拍印的绳纹、各种刻划纹、动物形态堆塑和

彩绘等。主要器形的釜、罐、钵、盘、盆、器盖、器座等,还有少量碗、杯、盂等。釜和支座是河姆渡文化早期的炊器,其种类和数量都很多。釜可分为敛口釜、敞口釜、盘口釜三大类。^④河姆渡文化的制陶业就总体发展水平而言,早已越过陶器制作的初期阶段,而进入到制陶业的发展阶段。

(三)发达的木器和骨器制造业

大量的制作水平较高的木器是河姆渡文化的特色之一。河姆渡文化的木器,数量多,品种丰富,形式多样,加工精细,为研究河姆渡文化早期的生产力提供了实物证据。河姆渡文化早期的木制工具有木铲、矛、匕、纺轮、槌、器柄等,木制用具有木筒和“蝶形器”等。最能反映木器制作水平的是“干栏式”房屋建筑遗存中和各种木构件,如各种榫卯构件和企口板。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出土的带有榫卯的木构件有数十件,其种类有柱头及柱脚榫、梁头榫、带梢钉孔的榫。榫头与卯孔互相套合,构成坚固的“干栏式”房屋建筑。企口板是一种衔接不见缝隙的拼板,拼接的地板牢固耐用。具有比较高的工艺水平。河姆渡文化早期的榫卯木构件及企口板的高超工艺,反映当时的木器制作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骨器是河姆渡文化早期遗物的主要部分,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共发现各种骨器 655 件。骨器大多为生产工具,器形有骨耜、镞、哨、凿、锥、针、管状针等,占骨器总数的 94%。其中属于农业生产工具的有骨耜,渔猎工具有骨镞、骨哨,纺织工具和缝纫工具有骨针、管状针、匕等。骨制的装饰品也很多,器类有笄、管、坠、珠、牙饰等;此外,还有雕刻花纹和加工精细的“蝶形器”。各种骨器的制作都比较精致,具有比较高的工艺水平。河姆渡文化早期阶段,由于骨制生产工具的发达,从而制约了磨制石器的发展,故使其早期磨制石器数量较少。

河姆渡文化早期,农业经济已发展到锄耕农业阶段,属于禾本科农作物的水稻已普遍种植;制陶业和木器、骨器制造业都比较发达;这些都反映距今 7000 年左右的河姆渡文化早期则不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而属新石器时代中期。

二、河姆渡文化发现的意义

河姆渡文化的发现对探索农业和人工栽培稻的起源,探索长江下游及杭州湾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研究当时的社会经济形态,了解全新世中期(距今 7000—6000 年)长江下游及杭州湾地区的气候及生态环境都有着重要意义。

(一)探索人工栽培稻的起源地

迄今在长江中游地区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山背文化,长江下游地区的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杭州湾地区的河姆渡文化,都普遍发现人工栽培稻的遗存。^④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距今 8200—7800 年)的陶片和烧土块上发现炭化稻谷和稻壳^⑤。尚未在遗址的地层堆积中发现如河姆渡遗址第四层那样堆积很厚的水稻遗存,目前很难确定彭头山文化时期就出现人工栽培稻。这些资料说明,长江中下游和杭州湾地区现已发现的有确凿证据的人工栽培稻遗存,以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最早,应在这两种文化分布的长江下游和杭州湾地区探索人工栽培稻的起源。

现已发现人工栽培稻遗存的马家浜文化和河姆渡文化,均分布于长江下游冲积平原和河谷平原地区,这些地区均非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地区,不是人工栽培稻的驯化地区。人工栽培稻的驯化地区,亦即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的分布区,应在马家浜文化和河姆渡文化分布区附近的山麓地带。

(二)探索长江下游和杭州湾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分布地区

黄河下游地区,距今 8000—7000 年的后李文化,分布于泰山、鲁山和沂山山系之北,小清河以南的泰沂山系北麓的冲积地带,遗址多位于高地之上。^⑥黄河中游地区的磁山文化^⑦和裴李岗文化^⑧,则分布于太行山和华北平原的接壤地带及豫西山地与南部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长江中游地区距今 8000 年的彭头山文化和距今约 7000 年的皂市下层文化^⑨,则分布于武陵山和洞庭盆地之间的过渡地带。这些新石器时代中期偏早阶段的遗址均分布于山脉和平原的过渡地区,长江下游和杭州湾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偏早阶段的遗址,亦应分布于本地区的山脉和平原的过渡地带,而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则应分布于山麓地带,亦即分布于四明山和天目山的山麓地带。

(三)“干栏式”建筑所反映出的社会经济形态

河姆渡遗址的第四层和第三层(河姆渡文化早期),发现大量木构建筑遗存。木构建筑中,一排排木桩排列有序,为西北到东南走向,系背山面水而建的长条形建筑遗存。其建造程序是,先在地面上打下数排木桩,这是房屋的基础;然后在排桩上架梁,以承托地板,构成架空的基座,再于其上立柱架梁,建成高于地面的“干栏式”建筑。在已发掘的范围内,发现相互平行的四排木桩,间距的一定的规律。就已揭露的部分来看,长度至少 23 米,宽 8.3 米,系一座“干栏式”长屋。房屋下面堆积着食剩的果壳、兽骨、鱼骨、龟甲,以及作为农业工具的骨耜,还有各种供炊煮和饮食用和陶器。

河姆渡遗址的“干栏式”长屋,从木桩排列情况可看出房屋内部有一道前廊;结合民族学资料推断,这种前廊,除作通道外,可能是未婚青年的公共宿舍和举行宴会的场所。^⑩长屋后部是

否隔成小间,无遗迹可寻。从房屋下面堆积的食剩遗物及炊煮用的陶器来看,人们炊爨即在房内。所发现的陶灶,陶釜容量都比较小,只能供几人食用,推测当时人们是以“小单位”各自为炊的。

就世界范围而言,长屋是在农业经济及定居生活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的。从河姆渡遗址下层发现的大量骨耜,堆积较厚的水稻遗存及发达的制陶业来分析,当时的农业经济已相当发达。河姆渡遗址以“干栏式”长屋为特征的聚落,其社会形态属何种性质,从长屋本身很难作出准确的判断。从河姆渡遗址下层文化遗存所反映出的总体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以及邻近同时代的马家浜文化早期的社会经济形态来看,河姆渡文化早期阶段,尚处在母系制的繁荣阶段,一座长屋可能代表一个母系氏族,抑或代表一个母系大家庭。

(四)了解 7000 年前杭州湾地区的气候及生态环境

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亦即河姆渡文化早期阶段的地层中出土的动物骨骼种类繁多,有许多动物如亚洲象、犀、猕猴、红面猴等,早已在该地区绝灭。亚洲象和犀,现今分布于热带地区的森林中,中国只有云南西双版纳地区的密林中,现在还有亚洲象群生存。猕猴和红面猴是旧大陆热带亚热带地区的典型动物,猕猴现今分布于中国西南、华南和长江流域,红面猴分布于广西、广东、福建和四川。这些动物骨骼在河姆渡遗址下层出土,说明距今约 7000 年的杭州湾地区气候温暖湿润,雨量充沛,气温比现在高。大致接近现今华南的广东、广西的南部和云南等地区的气候。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中,有生活于芦苇沼泽地带的水鸟和兽类,如雁群、鸭群、鹤群和獐、四不象等;又有栖息于山地林间灌木丛中的梅花鹿、水鹿、麂等鹿类;过半树栖半岩栖的

猕猴;还有生活在密林深处的虎、熊、象、犀等大型兽类。这些资料说明,当时的河姆渡遗址周围的地理环境应是平原湖沼和丘陵山地的交接地带。孢粉分析,花粉谱中出现了既是禾本科草原植被又是森林植被两种类型同时并存的情况,是同遗址靠四明山、面对沼泽的自然地理环境一致的。

注释

- ①浙江省博物馆自然组:《河姆渡遗址动植物遗存的鉴定研究》,《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 ②张之桓:《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第262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 ③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 ④陈文华:《论农业考古》第53-56页,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 ⑤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澧县彭头山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8期;裴安平:《彭头山文化的稻作遗存与中国史前稻作农业》,《农业考古》1989年第2期。
- ⑥任相宏:《黄河下游新发现的后李文化》,1992年2月16日《中国文物报》。
- ⑦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 ⑧开封地区文管会等:《河南新郑裴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8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1979年裴李岗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2年第4期。
- ⑨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石门县皂市下层新石器遗存》,《考古》1986年第1期。
- ⑩汪宁生:《中国考古发现中的“大房子”》,《考古学报》1983年第3期。

河姆渡文化文献目录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资料室

一、总 论

浙江余姚河姆渡发现六千年前新石器时代遗址

《文物特刊》(15) 1976年6月15日

河姆渡发现原始社会重要遗址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浙江省博物馆 《文物》

1976年第8期第6—12页

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工作座谈会纪要

本刊通讯员 《文物》 1976年第8期第15—17页

河姆渡遗址发现的重大意义

之文 《光明日报》 1976年12月7日

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浙江省博物馆 《考古学报》

1978年第1期第39—94页

细目：前言

一、地层堆积

二、遗物

(一)第四文化层的木构建筑遗迹

(二)第二文化层的木构水井遗迹

三、出土遗物

(一)第四层文化遗物

(二)第三层文化遗物

(三)第二层文化遗物

(四)第一层文化遗物

小结

余姚河姆渡原始社会遗址发掘纪要(附照片十幅)

《浙江日报》 1978年4月24日

河姆渡遗址

河姆渡遗址考古工作队 《浙江图片新闻》 1978年
第4期

试论河姆渡文化

牟永抗 《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 第97
页 文物出版社 1979年

中华民族的又一个摇篮——从河姆渡遗址看长江流域古文化

汪月启 《中国青年报》 1979年2月8日第4版

河姆渡文化遗址调查概况

刘 军 《浙江省文物考古所专辑》 1980年第1期第
79页

(附:河姆渡文化遗址调查登记表1—5)

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

河姆渡遗址考古队 《文物》 1980年第5期第1—15
页 图版2.3 (附: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墓葬登记表)

河姆渡文化的再认识

刘 军 《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 第15—
20页 文物出版社 1981年

细目:一、对河姆渡文化的认识过程

二、河姆渡文化的分布范围

三、河姆渡遗址四期是一脉相承的

四、河姆渡文化的要素

河姆渡访古记

林华东 《鉴湖》 1982 年总第 4、5 期合刊

古代中国を掘る(第五回)

村山 《人民中国(日文版)》1982 年第 7 期

河姆渡

劳伯敏 《知识画报》 1983 年第 1 期第 16 页

光辉灿烂的河姆渡文化

叶树望 《历史知识》 1983 年第 4 期第 39—40 页

河姆渡文化的历史地位

徐中舒 唐嘉弘 《中国古代史论丛》 1983 年第 8 辑

河姆渡文化——七千年长江流域的史迹

汪济英 孙志江 《人民画报》 1984 年第 2 期第 28—31 页

祖国古代文化的明珠——余姚河姆渡遗址

劳伯敏 《学习与思考》 1984 年第 12 期第 20 页

河姆渡文化

龚若栋 《历史教学问题》 1985 年第 1 期第 52 页

古老的河姆渡遗址

毛昭晰 梅福根 《文化交流》 1986 年创刊号第 14 页

河姆渡的发现与研究

刘 军 《浙江社会科学信息》 1986 年第 2 期

河姆渡文化几个问题浅议

刘 军 《印度—太平洋史前研究协会》“会刊” 1986 年第 6 期

河姆渡文化

任式楠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 第 188—191 页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 年 8 月

ホムド(河姆渡)遗迹とイネの道

毛昭晰 《日本海沿岸地域の文化交流 地域振兴》

环日本海(东海)松江国际シンポジウム実行委員会

1986 年

让七千年前的河姆渡人类文明遗址大放光彩

《文汇报》 1987 年 3 月 9 日第 2 版

也谈河姆渡文化

史红卫 《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 1987 年第 4 期第

97—102 页

河姆渡文化管窥

林华东 《民间文艺季刊》 1988 年第 1 期第 65 页

宁波沿海地区原始文化初探

林士民 《东南文化》 1990 年第 5 期第 279—284 页

关于“河姆渡”的得名

王心喜 《历史教学》 1991 年第 9 期第 53 页

发现河姆渡遗址的启示

束载璋 《浙江日报》 1991 年 12 月 3 日第 3 版

《河姆渡文化初探》序

[日]林巳奈夫 《农业考古》 1992 年第 1 期第 136 页

全面揭示河姆渡文化的著作——《河姆渡文化初探》序

陈文华 《农业考古》 1992 年第 1 期第 137—138 页

河姆渡文化研究的里程碑：评《河姆渡文化初探》

李先登 《东南文化》 1992 年第 5 期第 246—247 页

《河姆渡文化初探》评论

止戈 《中国文物报》 1992 年 7 月 26 日第 3 版

辉煌灿烂的河姆渡文化

林华东 《故宫文物月刊》(台湾)1992 年 总第 110 期

第 84 页

河姆渡文化对研究环太平洋区域文明的起源与传播的意义

陈 炎 《东南亚》 1993 年第 1 期第 49—53 页

宁绍平原良渚文化初探

刘 军 王海明 《东南文化》 1993 年第 1 期第 92—102 页

细目:引言

一、河姆渡后续文化面貌

二、与河姆渡文化的关系

三、与良渚文化的关系

结语

中国南方史前文明的代表河姆渡文化

李永飞 《光明日报》 1993 年 5 月 9 日第 6 版

河姆渡遗迹发掘の主要な成果と意义

毛昭晰 《邪马台国への道のり》 日本福岡教育委员会 1993 年

中华民族海洋文化的曙光

——河姆渡文化对探索海上丝绸之路起源的意义

陈 炎 《中华民族史研究》第 1 辑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略论河姆渡文化

方酉生 《武汉大学学报(社科)》 1994 年第 1 期第 76—80 页

细目:一、河姆渡遗址的发现和发掘

二、河姆渡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

三、河姆渡遗址发掘的重大学术意义

宁绍地区史前时期的文化

吴汝祚 《浙江学刊》 1994 年第 2 期第 89—95 页

细目：一、古代自然环境的探索

二、村落

三、农业及其有关的生产活动

四、手工业生产发展的概况

五、巫术活动

六、丧葬习俗

七、与太湖地区史前文化的关系

八、结语

文物之邦：河姆渡遗址主要考古成果

袁尧明等 《浙江学刊》 1994 年第 4 期封 2

河姆渡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邵九华 《浙江学刊》 1994 年第 4 期第 129 页

中国河姆渡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陈旭钦 黄勉免 《文物》 1994 年第 10 期第 84—86 页

河姆渡遗址为姚墟说

史树青 《浙东文化论丛》 第 1—3 页 董贻安主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5 年 3 月

从宁绍地区的遗址看河姆渡文化的发展

林士民 《浙东文化论丛》 第 21—32 页 董贻安主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5 年 3 月

七千年前的辉煌——记河姆渡遗址博物馆

姚业鑫 《浙江画报》 1995 年第 5 期第 10—11 页

河姆渡，再次震撼国际考古界

万润龙 《文化交流》 1995 年第 18 期第 17、10 页

余姚河姆渡遗址

二、专 论

对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出土稻谷和骨耜的几点看法

游修龄 《文物》 1976 年第 8 期第 20—23 页

细目：一、对河姆渡遗址第四层出土稻谷的鉴定意见

二、从河姆渡出土稻谷谈谈我国栽培稻种的起源问题

三、对河姆渡遗址出土骨耜的分析

四、从河姆渡遗址出土稻谷和骨耜试论当时的农业发展水平

从河姆渡遗址出土猪骨和陶猪试论我国养猪的起源

钟 遐 《文物》 1976 年第 8 期第 24—26 页

七千年前江南的一处“古动物园”——谈谈河姆渡遗址的古动物

张明华 《化石》 1977 年第 3 期

对河姆渡遗址骨制耕具的几点看法

华 泉 《文物》 1977 年第 7 期第 51—53 页

葫芦的家世——从河姆渡出土的葫芦种子谈起

游修龄 《文物》 1977 年第 8 期第 63—64 页

河姆渡遗址动植物遗存的鉴定研究

浙江博物馆自然组 《考古学报》 1978 年第 1 期第
95—107 页图版 1—4

细目：一、动物遗骨

(一)动物群的描述和讨论

(二)动物群反映的自然环境与人类生活

二、植物遗存

(一)植物种属

(二) 孢粉组合

从河姆渡遗址出土稻谷谈亚洲栽培稻的起源

游修龄 《光明日报》 1978 年 12 月 6 日

河姆渡遗址出土骨耜的研究

宋兆麟 《考古》 1979 年第 2 期第 155—160 页

细目:一、河姆渡骨耜的形制和使用方法

二、耜耕是比较进步的耕作方法

三、水稻栽培与耜耕的起源

从河姆渡遗址出土稻谷试论我国栽培稻的起源、分化和传播

游修龄 《作物学报》 1979 年第 3 期

又见《稻作史论集》 第 10—26 页 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 1993 年 6 月

细目:一、河姆渡遗址出土稻谷的鉴定

二、河姆渡遗址出土稻谷在稻作起源史上的意义

(一)考古发掘方面

(二)在文字记述方面

(三)在野生稻方面

(四)在历史语言学方面

三、河姆渡遗址出土稻谷与籼粳分化的问题

四、结束语

浙江宁波市八字桥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

林士民 《考古》 1979 年第 6 期第 560—561 页

碳十四年代测定报告(四)——河姆渡遗址年代的测定与讨论

钱江初等 《文物》 1979 年第 12 期第 81—83 页

先越文化初探——河姆渡文化族属试考

林华东 《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术交流专辑》 1980 年第 1 期第 104 页

河姆渡遗址出土文物

浙江省文物考古所 《浙江学刊》 1980 年第 1 期封 2

河姆渡遗址木构水井鉴定及早期木构工艺考察

杨鸿勋 《科技史文集》 1980 年第 5 辑第 63 页

一支七千年前的船桨

劳伯敏 《光明日报》 1981 年 1 月 12 日

“河姆渡”先人生活时期的古植被、古气候

孙湘君等 《植物学报》 1981 年第 23 卷第 2 期 146 页

谈河姆渡木筒的用途

吴玉贤 《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 第 190—193 页

文物出版社 1981 年 11 月

河姆渡——黄墓渡

姚业鑫 陈伟权 《浙江日报》 1981 年 11 月 21 日

七千年前的远古艺术——河姆渡图案

宋馨萍 《浙江工艺美术》 1982 年第 1 期第 7 页

试论河姆渡文化与古越族的关系

林华东 《百越民族史论集》 第 88 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

河姆渡的原始艺术

吴玉贤 《文物》 1982 年第 7 期第 61 页

细目：一、河姆渡原始艺术的分类

(一) 刻画(包括压印、拍印)图案花纹

(二) 刻画写实图象

(三) 牙雕动物图象

(四) 陶塑动物

二、河姆渡原始艺术的主要特点

1. 表现不同题材的作品在数量上有多有少, 相差很

大

2. 几何形纹样的母题集中

3. 写实图像比较突出

4. 几种艺术手法的运用比较熟练自然

A. 对称 B. 线条和色彩 C. 写实、写意和夸张

5. 器物装饰注重实用效果

6. 充分反映了生产实践

三、河姆渡原始艺术的分期

河姆渡遗址陶器的研究

李家治等 《中国古陶瓷论文集》 第 1—9 页图版
1—3 文物出版社 1982 年 12 月

又见:《硅酸盐学报》 1979 年第 7 卷第 2 期第 105 页

我国远古时期的踞织机——河姆渡文化的纺织技术

宋兆麟 牟永抗 《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 1982 年

舟山群岛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

王和平 陈金生 《考古》 1983 年第 1 期第 4—9 页

浙江定海县唐家墩新石器时代遗址

王明达 王和平 《考古》 1983 年第 1 期第 71 页

从考古发现谈宁波沿海地区原始居民的海上交通

吴玉贤 《史前研究》 1983 年第 1 期第 156—162 页

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人类头骨

韩康信 潘其凤 《人类学学报》 1983 年第 2 期第
124—131 页

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两种犀牛化石及其意义

吴维棠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1983 年第 21 卷第
2 期第 160—165 页

七千年来姚江平原的演变

- 吴维棠 《地理学报》 1983 年第 3 卷第 3 期
河姆渡文化“蝶形器”的用途和名称
王仁湘 袁靖 《考古与文物》 1984 年第 5 期第 64—
69 页
浙江定海唐家墩又发现一批石器
王和平 《考古》 1984 年第 1 期第 86—87 页
河姆渡和甌皮岩陶片热释光年代的测定
——兼论粗粒石英断代技术
王维达 《考古学集刊》 第 4 集第 321—327 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
细目：一、测量方法
二、测量步骤
三、测量结果
四、误差分析
绍兴市马鞍新石器时代遗址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中国考古学年鉴(1985)》
第 142 页
舟山群岛出土大型石器
《文物报》 1986 年 1 月 7 日第 3 版
绍兴仙人山新石器时代遗址
王明达 《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第 125—126 页
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与全新世海面的变化
郎鸿儒 《浙江地质》 1987 年第 1 期
浙江河姆渡发现原始骨笛
《文物报》 1987 年 1 月 30 日第 2 版
小议河姆渡农业
柳勇明 《农业考古》 1987 年第 2 期第 100 页

骨哨

张书敏撰文并摄影 《浙江画报》 1987 年第 6 期第 14 页

河姆渡文化鸟形象探讨

孙其刚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 第 10 期第 10—17 页
文物出版社 1987 年

在世界音乐考古讲坛上——记刘士钺

王永强 《新观察》 1987 年第 11 期(总第 403 期)

河姆渡遗址早期木构工艺考察

杨鸿勋 《建筑考古学论文集》 第 45—51 页
文物出版社 1987 年

细目：一、第四文化层建筑遗存的基本情况

二、木构件加工工艺的考察

河姆渡遗址木构水井鉴定

杨鸿勋 《建筑考古学论文集》 第 52—57 页
文物出版社 1987 年

论石楔及石扁铲——新石器考古中被误解了的重要工具

杨鸿勋 《建筑考古学论文集》 第 58—70 页
文物出版社 1987 年

细目：一、河姆渡遗址出土有石楔

二、石楔的操作

三、石楔的产生与发展

四、木材刨光的原始工具——石扁铲

五、石楔是新石器时代经济分期的一个标志

六、石楔可能是世界性原始文化的共同内涵

河姆渡原始艺术的地位与价值

龚若栋 《民间文艺》 1988 年第 1 期

原始艺术科技的结晶——河姆渡出土骨哨

华光 陆洲 《艺术科技》 1988 年第 2 期

浙东史前考古有新突破

符永才 《中国文物报》 1988 年 7 月 29 日第 2 版

慈湖遗址发掘获重要成果

——良渚文化分布东移,许多新器物前所未见

晓永 《中国文物报》 1988 年 12 月 23 日第 2 版

河姆渡人如何食用稻米

天津自然博物馆 《农业考古》 1989 年第 2 期第 292 页

河姆渡遗址出土蝶形器的研究

宋兆麟 《中国原始文化论集——纪念尹达八十诞辰》
第 391—399 页 文物出版社 1989 年 6 月

宁波市慈湖新石器时代遗址

王海明 《中国考古学年鉴 1989》 第 158 页

河姆渡饱水木文物室外冷冻脱水研究通过鉴定

沈坤荣 《中国文物报》 1990 年 2 月 10 日第 2 版

河姆渡遗址陈列室落成

徐渭明 《中国文物报》 1990 年 2 月 15 日第 2 版

论河姆渡原始艺术的美学特征

——兼论中国绘画南北差异之起源

康育义 《东南文化》 1990 年第 5 期第 80—87 页

细目:一、河姆渡原始艺术的美学特征

(一)河姆渡象形刻划艺术的美学特征

1. 刻划线条的美学特征

2. 艺术造型的美学特征

3. 构图意境的美学特征

(二)河姆渡几何刻划艺术的美学特征

二、中国绘画南北差异的起源

稚拙的河姆渡家猪形象

李纪贤 《中国文物报》 1990年8月30日第4版

猪纹钵

顾苏宁 《国宝大观》 第65页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90年8月

河姆渡遗址几何图形试析

梁大成 《史前研究》 1990—1991(辑刊) 第
110—123页

象山半岛发掘出史前墓葬群

《人民日报》 1991年1月11日第4版

河姆渡文化的“骨耜”及相关问题

汪宁生 《东南文化》 1991年第1期第240—242页

河姆渡稻谷的启示

刘军 《农业考古》 1991年第1期第107—177页

细目:一、引言

二、河姆渡稻作农业的实物见证

三、关于中国水稻的起源问题

四、中国水稻的东传问题

浅谈河姆渡盆栽五叶纹植物

俞为洁 《农业考古》 1991年第1期第310—313页

河姆渡陶器纹样初探

黄颖琦 《台州师专学报(社科版)》 1991年第1期第
72页

浙江攻克南方木质文物脱水定型难题 河姆渡遗址出土木构件得以保护

- 《光明日报》 1991 年 2 月 26 日第 2 版
- 浙江发掘塔山遗址**
- 蒋乐平 《中国文物报》 1991 年 3 月 17 日第 1 版
- 河姆渡文化与马家浜文化关系简论——长江文化探源之三**
- 王海明 《东南文化》 1991 年第 6 期第 13—20 页
- 象山塔山遗址初揭面纱**
- 《浙江日报》 1991 年 11 月 1 日第 1 版
- 象山县塔山新石器时代遗址**
- 蒋乐平 《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 第 181—182 页
- 古越族的稻作农业**
- 刘清荣 《农业考古》 1992 年第 1 期第 74—77 页
- 奉化名山后发现五千年前的人工土台**
- 王海明 《中国文物报》 1992 年 1 月 26 日第 1 版
-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菱角及相关问题**
- 俞为洁 《农业考古》 1992 年第 1 期第 236—237 页
- 河姆渡“双鸟朝阳”纹象牙蝶形器**
- 林华东 《故宫文物月刊》(台湾) 1992 年 总第 107 期
第 1 页
- 河姆渡的谷物收割与加工**
- 俞为洁 《农业考古》 1992 年第 3 期第 66—68 页
- 河姆渡文化“五叶纹”研究**
- 康育义 《东南文化》 1992 年第 6 期第 65—67 页
- 细目:一、“五叶纹”的形态特征研究
二、原始河姆渡人的审美观与价值观
- 浙江乐清古文化遗址发掘简报**
- 徐定水 金福来 《考古》 1992 年第 9 期 第
791—794 页

绍兴壶瓶山新石器时代至汉代遗址

陈元甫 《中国考古学年鉴(1992)》 第 208—209 页

河姆渡人的宗教观念和“凤”的起源

周庆基 《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 1993 年第 2 期
第 65—68 页

河姆渡文化的文化生态研究

李抱荣 《东南文化》 1993 年第 4 期第 54—69 页

河姆时期稻田的获取和整治

俞为洁 《古今农业》 1993 年第 4 期第 36—43 页

宁波慈湖遗址发掘简报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执笔者:丁友甫 王海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 第 104—118 页 科学出版社 1993 年

细目:一、地层堆积

二、上层文化遗存

三、下层文化遗存

四、小结

奉化名山后遗址第一期发掘的主要收获

名山后遗址考古队(执笔者:王海明)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 第 119—123 页 科学出版社 1993 年

慈城小东门新石器时代及商周遗址

王海明 《中国考古学年鉴》 1993 年第 114 页

鱼藻纹盆刍议

周新华 《东南文化》 1994 年第 1 期第 39—41 页

河姆渡遗址稻的硅酸体分析

郑云飞 游修龄 《浙江农业大学学报》 1994 年第 1

期第 81—85 页

河姆渡遗址文化与越族先民

杨成鎰 《宁波大学学报》 1994 年第 2 期第 1—8 页

河姆渡碳化稻中普通野生稻谷粒的发现

汤圣祥等 《农业考古》 1994 年第 3 期第 88—91 页

河姆渡文化猪形塑及猪形图案装饰器新探

俞为洁 《农业考古》 1994 年第 3 期第 139—142 页

河姆渡先民的家畜饲养业

李跃 《农业考古》 1994 年第 3 期第 275—277 页

河姆渡文化和舜耕历山

邵九华 《浙江社会科学》 1994 年第 6 期第 100—103 页

细目:骨耜、稻作、舜耕

水灾、水利、治水英雄

舜、舜迹、文化交流

河姆渡双鸟与日(月)同体刻纹

董楚平 《故宫文物月刊》(台湾)1994 年 总 134 期
第 32—33 页

河姆渡稻谷研究进展及展望

游修龄 郑云飞 《农业考古》 1995 年第 1 期第 66—70 页

细目:一、研究进展

1. 提出了长江中下游是中国稻作起源中心的新观点

2. 籼粳分化研究的进展

3. 河姆渡遗址野生稻的发现

二、问题讨论

1. 籼粳分化问题

2. 籼粳区别问题

3. 民族迁徙问题

4. 野生稻的问题

中国水稻农业的兴起——河姆渡文化遗址与共工氏

张佩琪 《农业考古》 1995 年第 1 期第 71—80 页

细目：一、河姆渡遗址地区应是共工氏的老根据地

二、二者时间是一致的

三、共工氏概况

四、水稻大面积种植及其操作

五、手工业

六、共工氏侵犯中原

七、对南北斗争的分析

八、蛮荒为什么又变成“天堂”了呢？

河姆渡遗址“稻谷堆积层”成因析

劳伯敏 《农业考古》 1995 年第 1 期第 81—86 页

细目：一、“稻谷堆积”的主要成分是秕谷、尘屑和木屑，炭化稻谷数量不多

二、“稻谷堆积”并不是先民们废弃的垃圾，而是与当时生活有密切关系的物品

三、秕谷之类物质除了作夹炭黑陶的麇和料和备用燃料外，还可和苇席一起当卧具使用

四、“稻谷堆积”中稻草数量不多，是由于当时稻草收割不易，且“茅茨”用途颇广的缘故

河姆渡遗址“鱼藻”纹盆考析

黄渭金 《农业考古》 1995 年第 1 期第 173—175 页

宁绍平原史前农业初探

王海明 《农业考古》 1996 年第 3 期第 54—63 页

- 细目:一、自然地理环境和全新世古气候古地理演变
二、宁绍平原新石器文化发现及文化序列
三、河姆渡文化的特征及其农业
四、良渚文化的特征及农业
五、结语

浅析河姆渡遗址的原始农业生产

黄渭金 《农业考古》 1996 年第 3 期 第 64—70 页

- 细目:一、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
二、发达的原始稻作农业
三、家畜饲养与农业生产的关系
四、渔猎和采集对农业生产的补充
五、定居生活和水井开凿的意义
六、结语

试析河姆渡文化原始艺术的审美特征

董贻安 《浙东文化论丛》 第 4—11 页 董贻安主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5 年 3 月

- 细目:一、写实性表现与对自然美的追求相结合的审美特征
二、线条的运用与对形式美的追求相结合的审美特征
三、象征性表现与对意蕴美的追求相结合的审美特征

河姆渡稻作渊源探析

邵九华 《浙东文化论丛》 第 33—40 页 董贻安
主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5 年 3 月

- 细目:中国稻作的起源地问题
河姆渡稻作渊源蠡测
对骨耜的看法

试论河姆渡遗址稻谷发现的文化学意义

虞浩旭 《浙东文化论丛》 第 41—49 页 董贻安

主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5 年 3 月
细目:饮食文化 建筑文化 陶瓷文化
科学技术 原始巫术和宗教 艺术
稻作文化外传 结束语

骨匕浅析

赵晓波 《浙东文化论丛》 第 122—125 页 董贻安
主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5 年 3 月

河姆渡干栏式建筑遗迹初探

劳伯敏 《南方文物》 1995 年第 1 期第 50—57 页

细目:一、位于遗址北部的干栏式建筑遗迹当年濒临湖沼,
是河姆渡原始聚落停船和烧煮食物的地方

二、干栏式建筑的立柱方法,应是将顶端有叉形的立柱,绑
扎在承重桩上的

三、河姆渡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建筑物,可能也是干栏
式木构建筑

四、当年河姆渡火灾频繁,使大片干栏式建筑成为废墟,出
土于建筑遗址的人骨架,可能是当时火灾时的殉难者

试论河姆渡出土的“陶舟”

李跃 《南方文物》 1995 年第 1 期第 58—62 页

细目:一、从船舶的理论上分析

二、“陶舟”与出土的独木舟对照

三、“陶舟”与宋代船与现代帆船的比较

四、从其它出土资料上分析

五、从使用上分析

中国江苏省草鞋山遗址和浙江省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有关植物遗体的分析结果

[日]佐藤洋一郎等 《东亚的稻作起源和古代稻作文化》

第 60—63 页 (日本)佐贺大学农学部 1995 年

河姆渡遗址

刘 军 《东亚的稻作起源和古代稻作文化》第 115—
118 页 (日本)佐贺大学农学部 1995 年

河姆渡的奇迹——史前时期的浙江农业

《浙江画报》 1996 年第 1 期第 36—39 页

河姆渡文化“骨耜”新探

黄渭金 《文物》 1996 年第 1 期第 61—65 页

细目:一、“骨耜”的加工、使用痕迹分析

二、“骨耜”相关问题的再认识

三、河姆渡遗址耕作方式的探讨

河姆渡遗址“骨哨”小议

袁尧明 《中国文物报》 1996 年 5 月 26 日第 3 版

试论河姆渡文化与马家浜文化的关系

吴汝祚 《南方文物》 1996 年第 3 期第 33—40 页

细目:一、河姆渡文化的面貌与特点

二、马家浜文化的面貌和特点

三、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是两支平行发展的不同
谱系的考古学文化

四、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之间在经济上、文化上
的交流、影响

五、结语

河姆渡陶器研究

刘 军 《东方博物》 第 1—9 页 浙江省博物馆

编 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1 月

细目:一、陶器的质地和颜色

二、陶器器形和种类

三、制陶工艺

四、陶器纹饰

浙江余姚市鳖架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

河姆渡遗址博物馆考古调查组(姚晓强等执笔) 《考古》

1997 年第 1 期第 37—39 页

河姆渡文化“五叶纹”陶块考略

黄渭金 《农业考古》 1997 年第 1 期 第 265—
267 页

河姆渡残陶画的释读——兼论河姆渡文化的原始崇拜

王宁远 《南方文物》 1997 年第 1 期第 70—75 页

河姆渡遗址发现的部分木制建筑构件和木器的初步研究

吴汝祚 《浙江学刊》 1997 年第 2 期 第 91—96 页

河姆渡舟船技术浅析

陈延杭 《海交史研究》 1997 年第 2 期 第 38—
48 页

河姆渡稻作渊源探析

邵九华 《农业考古》 1997 年第 3 期 第 87—92 页

细目：一、中国稻作起源地的问题

二、河姆渡稻作渊源蠡测

三、对骨耜的看法

试论河姆渡稻谷发现的文化学意义

虞洪旭 《农业考古》 1997 年第 3 期 第 93—96 页

河姆渡人饮食习俗

黄渭金 《农业考古》 1997 年第 3 期 第 250—
254 页

细目：一、饮食用具

二、食物构成

三、食品加工

四、炊煮方法

中国稻作农业起源研究与考古发掘

王海明 《农业考古》 1998 年第 1 期 第 78—86 页

河姆渡稻作农业剖析

黄渭金 《农业考古》 1998 年第 1 期 第 124—130 页

河姆渡周边遗址原始稻作农业的研究

赵晓波 《农业考古》 1998 年第 1 期 第 131—137 页

河姆渡遗址骨哨、河姆渡遗址陶埙

刘东升 《中国乐器图志》 第 25—26 页

中国浙江河姆渡骨哨

刘士钺 《音乐考古》

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鳄的发现

魏 丰 徐玉斌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第 19 卷
第 4 期第 375—377 页

三、专著及相关论著

《七千年前的奇迹——河姆渡遗址》

梅福根 吴玉贤编写 上海科技出版社 1982 年 7 月 92 页 32 开

《河姆渡访古》(金钥匙丛书)

劳伯敏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1989 年 3 月 76 页 32 开

《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动物群》

魏 丰 吴维棠 张明华 韩德芬编著 海洋出版社
1989年3月 文125页 图版17 16开

《河姆渡文化初探》(浙江文化丛书)

林华东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2年4月 文382
页 彩色图版6页 黑白图版8页 32开

《中国河姆渡文化》

刘军 姚仲源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3年10月
文148页 彩色图版106幅 12开

《河姆渡文化探原》

陈忠义著 团结出版社 1993年12月 文236页
图版13页 32开

《河姆渡遗址发掘报告》

刘军 姚仲源 梅福根 著 文物出版社待刊

《中国新石器时代陶器装饰艺术》

吴山编著 文物出版社 1982年5月 文360页
黑白图版289页 16开

《浙江文物》

浙江省博物馆 汪济英 林华东 曹锦炎 周其忠编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年7月 文29页 彩色
图版59幅 黑白图版120幅 12开

本书是一本浙江出土文物图录,收集河姆渡文化至明代文物精华164件,每件文物均附有图版说明。

四、相关论述

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四)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 《考古》 1977年第3

期第 200—204 页

碳-14 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

夏 鼐 《考古》 1977 年第 4 期第 217 页

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纪要

本刊通讯员 《文物》 1978 年第 3 期第 35—39 页

略谈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

——在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上的一次发言提纲

苏秉琦 《文物》 1978 年第 3 期第 40—42 页

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五)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 《考古》 1978 年第 4 期第 280—287 页

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体系的问题

石兴邦 《南京博物院集刊》 1980 年第 2 期第 7 页

关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系统的区分

张之恒 《文物集刊》 1 期第 138 页 文物出版社
1980 年

对于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几个问题的再认识

蒋赞初 《文物集刊》 1 期第 142 页 文物出版社
1980 年

我对江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几点认识

蒋华 《文物集刊》 1 期第 152 页 文物出版社
1980 年

浙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初步认识

牟永抗 《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 第 1—
14 页 文物出版社 1981 年

细目：一、浙江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类型

1. 杭嘉湖地区
2. 宁绍地区
3. 金衢地区
4. 瓯江水系地区
- 二、关于若干物质文化因素的探讨
1. 水稻种植和耕作制度
2. 带榫卯的木构建筑
3. 有段石镞
4. 穿孔石斧与钺戈
5. 釜、鼎、豆和盃
6. 玉器及琮、璧
- 三、浙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后裔

浙江历代陶瓷名窑工艺的研究

叶宏明 《瓷器》 1981 年第 2 期第 54—60 页

细目：一、关于河姆渡陶器所用的原料和窑型

二、关于我国青瓷的起源

三、关于我国黑釉瓷的起源

四、关于浙江釉陶、青瓷的工艺特点

世界谷物种植起源问题探索

程培英 《南开学报》 1981 年第 5 期第 69 页

长江中下游出土古稻考察报告

周季维 《云南农业科技》 1981 年第 6 期第 1 页

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一)

严文明 《农业考古》 1982 年第 1 期第 19—31 页

细目：一、史前栽培稻遗存发现的情况

(一)长江下游和杭州湾地区

(二)长江中游

(三)珠江流域

(四)云南省

(五)黄河流域

浙江省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点

王心喜 《杭州师院学报(社科)》 1982年第2期第
127—134页

细目:一、浙江省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分布范围
二、浙江省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绝对年代和发展阶段
三、河姆渡文化(第四层)阶段的特点
四、马家浜文化阶段
五、良渚文化阶段
六、小结和建议

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续)

严文明 《农业考古》 1982年第2期第50—54页

细目:二、野生稻的分布及栽培稻的起源问题

古代图案试析

王小勤 《艺苑》 1982年第3期第12页

中国古代的陶支脚

严文明 《考古》 1982年第6期第622—629页

原始社会骨哨

萧 鸣 《上海博物馆集刊》 总第2期 上海古籍
出版社 1982年

略谈釜甑的起源和发展

葛治功 《南京博物院集刊》 第5期第105—114页
1982年版

细目:一、引言
二、釜甑的起源

1. 古代文献关于釜甗起源的记载
2. 我国考古学上最早的釜甗
3. 关于釜甗起源问题的辩正

三、釜甗的发展

1. 河姆渡文化时期的釜甗
2. 马家浜文化时期的釜甗
3. 崧泽文化时期的釜甗
4. 良渚文化时期的釜甗
5. “几何印纹陶文化”时期的釜甗
6. 商周时代的釜甗
7. 春秋战国时代的釜甗
8. 秦汉及其以后封建社会的釜甗

四、釜甗之孑遗

五、结语

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点和发展序列

曾 骥 《考古与文物》 1983 年第 1 期第 64—69 页

细目：一、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点

二、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序列

- (一) 东北、内蒙、宁夏、新疆沙漠草原地带
- (二) 黄河中、上游地区
- (三) 黄河、长江下游，东方沿海地区
- (四) 长江中游地区
- (五) 华南地区
- (六) 西南地区

浙江的闭壳龟化石

叶祥奎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1983 年第 1 期第
49 页

长江流域——中华民族远古文明的又一摇篮

周国兴 《史前研究》 1983 年第 2 期第 37—47 页

华东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陶支座

马洪路 《考古与文物》 1983 年第 2 期第 60—65 页

细目：一、陶支座的发现与分布

二、陶支座的用途剖析

三、陶支座的类型及演变

近二十年来东南地区的考古新发现及国外学者对我国南方古文明起源的研究

童恩正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 1983 年第 3 期第 17 页

中国早期木结构建筑的时代特征

祁英涛 《文物》 1983 年第 4 期第 60—74 页

我国考古发现中的“大房子”

汪宁生 《考古学报》 1983 年第 3 期第 271—294 页

细目：一、民族学上所见几种不同的“大房子”

(一)公共住宅

(二)集会房屋

(三)男子公所和妇女公所

(四)首领住宅

(五)其他

二、我国近年发现的“大房子”遗址

(一)余姚河姆渡(河姆渡文化)

(二)西安半坡(仰韶文化半坡类型)

(三)临潼姜寨(仰韶文化半坡类型)

(四)华县泉护村(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

(五)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晚期)

(六)鄞县青龙泉(屈家岭文化)

(七)剑川海门口(商代晚期)

(八)圻春毛家咀(西周)

结语

从出土文物看浙江省的原始农业

王心喜 《浙江农业大学学报》 1983 年第 4 期第 367

页

长江下游先民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几项重要贡献

赵青芳 《南京博物院集刊》总 6 期 1983 年第 1—7 页

浙江省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及其文化内涵

王心喜 《杭州师院学报(社科)》 1984 年第 1 期第

96—101 页

细目：一、浙江省新石器时代陶器的发生和发展的特征

1. 河姆渡文化阶段陶器的特点

2. 马家浜文化阶段陶器的特点

3. 良渚文化阶段陶器的特点

二、浙江新石器时代陶器的文化内涵

1. 七千年前浙江省已经人工饲养家猪和家羊

2. 稻谷生产已是当时农业的主要部分

3. 制陶技术比较先进, 已能烧制精美的彩陶

4. 七千年前的乐器和当时的文娱生活

5. 比甲骨文早一千多年的陶文

6. 原始工艺和原始宗教

7. 陶制品在纺织业上的应用

长江下游史前文化对海东的影响

安志敏 《考古》 1984 年第 5 期第 439—448 页

为什么说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民族文化摇篮

• 314 •

- 黄崇岳 《文物天地》 1984 年第 6 期第 35 页
- 长江下游的水田农业
- 宋兆麟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 第 6 期第 9—14 页
1984 年
- 细目：一、稻作农业
- (一) 自然环境
 - (二) 农具
 - 1. 骨耜
 - 2. 木杵
 - (三) 水稻
- 二、综合性的生产经济
- 三、物质文化生活
- 四、河姆渡稻作文化的历史地位
- 第一, 我国东南地区是水稻的重要发源地
 - 第二, 河姆渡文化是中国文明的渊源之一
 - 第三, 以河姆渡文化为代表的稻作文化也孕育了古代文明
- 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 任式楠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 文物出版社
1984 年 第 125—127 页
- 长江流域是远古人类栖息之地
- 计宏祥 《化石》 1985 年第 1 期第 23 页
- 我国早期种植水稻的民族部落
- 吴汝祚 《史前研究》 1985 年第 2 期第 12—17 页
- 从哺乳动物化石来探讨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些遗址的自然环境
- 计宏祥 《史前研究》 1985 年第 2 期第 85—89 页
- 细目：(一) 江苏溧水神仙洞

- (二)广西桂林甑皮岩
- (三)江西万年仙人洞
- (四)浙江余姚河姆渡
- (五)陕西西安半坡
- (六)河南浙川下岗
- (七)西藏昌都卡诺遗址讨论

考古发现的打纬刀——我国机杼出现的重要见证

宋兆麟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 第7期第15—23

页 1985年

细目：一、民族学资料中的织机

(一)原始织机

(二)踞织机

(三)水平投梭机

二、经纬工具的演变

(一)机刀

(二)斫刀

(三)箔

三、薛家岗文化的石机刀

四、打纬刀的普遍性

(一)木纬刀

(二)骨纬刀

(三)石纬刀

(四)玉纬刀

我国新石器时代的生产工具综述

曾骥 《考古与文物》 1985年第5期第61—74页

新石器时代的鸟形装饰与太阳崇拜

陆思贤 《史前研究》 1986年第1期第55—62页

细目：一、鸟形装饰、鸟纹、火焰纹和太阳纹举例

1. 浙江河姆渡出土的双鸟太阳纹图案
2. 江苏连云港岩画上的太阳纹和鸟纹
3. 山东大汶口文化的太阳纹原始字
4. 东北近海地区发现的鸟形装饰
5. 其他

二、神话中的鸟图腾与太阳崇拜

1. 太皞和少皞
2. 扶桑与骏鸟
3. 帝俊、帝喾和帝舜
4.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三、小结

太湖地区稻作起源及其传播和发展问题

游修龄 《中国农史》 1986 年第 1 期第 71—83 页
又见《稻作史论集》 第 27—50 页 游修龄著 中
国农业科技出版社 1993 年 6 月

细目：一、太湖地区稻作起源问题

二、太湖地区稻作的传播问题

三、太湖地区出土稻谷的类型问题

(一) 籼粳问题

(二) 野生稻问题

四、太湖地区稻作的发展问题

(一) 温度的变化和粳稻的发展

(二) 人为的选择压力

(三) 历史的启发

我国新石器——铜石器并用时代农作物和其他食用植物遗存

任式楠 《史前研究》 1986 年第 3—4 期第 77—94 页

根据考古材料试论浙江省商业的起源

——浙江原始社会研究之四

王心喜 《史前研究》 1986 年第 3—4 期第 126—128 页

细目：一、浙江省母系氏族公社时期交换的开始
二、浙江省父系氏族公社时期交换的扩大
三、结束语

史前石斧的几种装柄方法

杨亚长 《史前研究》 1986 年第 3—4 期第 155—157 页

我国考古界根据新发现探索中华文明发祥地有“四大区域”

《人民日报》 1986 年 9 月 23 日第 1 版

必须重视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动物遗骸的研究

韩立刚 方酉生 《文物研究》 总 2 期第 124—126 页 1986 年 12 月

长江、钱塘江中下游新石器时代地理与稻作起源和分布

林承坤 《农业考古》 1987 年第 1 期第 283—291 页
提要：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时期(距今 7000 年)，本区古气候温暖湿润，年平均温度与降雨量分别比今日高 3—4℃ 与 800 毫米，姚江河谷平原又具有得天独厚的地貌、水文条件，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为先民提供丰富的制造工具的原料，使姚江河姆渡遗址成为本区和我国与世界栽培水稻的起源地。马家浜时期(距今 6900—4600 年)，古气候仍适于水稻生产，因水文与地貌的变化，使部分长江河谷、三角洲平原形成，促使水稻分布范围扩展。良渚时期(距今 4600—3800 年)，古气候变得干凉，使水稻分布范围缩小。

太湖、杭州湾地区的史前文化在我国史前史上的地位

吴汝祚 《东南文化》 第3辑第39—44页

细目:

一、水稻的种植

二、犁耕的发明

三、养蚕、丝织品的产生

四、榑卵结构的干栏式建筑

五、高台建筑

六、玉器的制作

七、漆器的使用

八、象牙器的制作

九、水井的发明和地下水的利用

十、水上交通工具舟楫的使用

史前中国东南滨海文化的生态学研究

乔晓勤 《东南文化》 1987年第3期第11—17页

论有段石锛和有肩石器

傅宪国 《考古学报》 1988年第1期第1—35页

细目:一、引言

二、有段石锛

三、有肩石器

四、讨论

五、结语

水稻对人类文明和人口增长的影响

[菲]张德慈著 虞文霞译 《农业考古》 1988年第1期第199—205页

细目:两种水稻耕种的发展途径

分散性特点和基因特征

耕作的实践和村落的形成

水稻和其它作为食物的农作物的比较
对所选择的文明的影响
水稻的栽培和人口的增长
稻米与各种消费者

关于稻作起源的几个问题

[日]贺川光夫著 缪晓艳译 《农业考古》 1988 年第 1
期第 206—215 页

细目：前言

- 一、石刀和石镰
- 二、从石刀到铜刀、铁刀
- 三、从爪镰看摘穗农业的实况
- 四、从旱稻到水稻
- 五、短粒型稻种的栽培起源
- 六、日本农耕的起源

结语

中国新石器时代与中国古代文明

郑 光 《华夏考古》 1988 年第 2 期第 51 页

关于中国古代稻作文化的考古学调查研究

【日】冈崎敬著 李梁译 《农业考古》 1988 年第 2
期第 293—298 页

细目：一、中国古代的米及其研究

- 二、目前所见出土的中国史前时代的米
 - (1)长江下游与杭州湾地区
 - (2)长江中游
 - (3)珠江流域
 - (4)云南省
 - (5)黄河流域

中国东南海岸的“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

张光直 《上海博物馆集刊》 第4期第143—149页

1988年

细目:河姆渡

台湾的大盆地和其他遗址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

中国的史前农业

安志敏 《考古学报》 1988年第4期第369—381页

细目:一、引言

二、聚落分布和生产活动

三、谷物的种类

(一)几种主要的谷物

(二)几种有争议的谷物

四、工具的种类

(一)农耕工具

(二)收割工具

五、家畜的发展

六、自成体系的农耕文化

越族先民的饮食与居住方式

陈剩勇 《浙江学刊》 1988年第5期第100—104页

认识古玉(三)

——河姆渡玉、大溪玉、青莲岗玉、龙山玉、崧泽玉、大汶口玉

本刊资料室 《故宫文物月刊》(台湾) 1988年总65期

第110—119页

我国新石器时代医药卫生状况探析

戴应新 《史前研究辑刊(1988年)》 第265页

细目:对自然环境的选择

居址的防潮与取暖

生活饮食与衣着

生理解剖知识

预防医学的开端

中药学的诞生

陶球初探

汪宗武 《文物研究》 第3期第212页 1988年9月

亚洲稻作农业的起源及其向太平洋地区的传播

夏应元 《太平洋文集》 海洋出版社 1988年

浙北平原新石器文化的生态学分析

徐建春 《浙江学刊》 1989年第1期第79—84页

我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农耕起源的比较研究

廖平原 《农业考古》 1989年第2期第50—56页

中国南方农业起源及其特征

童恩正 《农业考古》 1989年第2期第57—71页

再论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

严文明 《农业考古》 1989年第2期第72—83页

中国稻作起源的几个问题

陈文华 《农业考古》 1989年第2期第84—98页

细目:(一)中国新石器时代稻作遗存的发现情况

(二)中国稻作的起源

1.起源于云贵高原

2.起源于华南

3.起源于长江下游

4.起源于黄河下游

(三)中国稻作的东传

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考古学编年

曾骐 蒋乐平 《中国原始文化论集——纪念尹达八十诞辰》 第 207—221 页 文物出版社 1989 年 6 月

我国东方沿海和东南地区古代文化中鸟类图像与鸟祖崇拜的有关问题

石兴邦 《中国原始文化论集——纪念尹达八十诞辰》 第 234—265 页 文物出版社 1989 年 6 月

中国新石器时代复合工具的研究

佟柱臣 《中国原始文化论集——纪念尹达八十诞辰》 第 345—370 页 文物出版社 1989 年 6 月

中国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的考察

严文明 《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周年论文集》 第 24—37 页 文物出版社 1989 年 8 月

细目：新石器时代早期：聚落遗址的发生

新石器时代中期：聚落遗址的扩大

新石器时代晚期：聚落遗址的发展

铜石并用时代早期：聚落遗址的分化

铜石并用时代晚期：早期城址的出现

小结

史前艺术品的发现及史前艺术功能的演变

邵望平 《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周年论文集》 第 82—97 页 文物出版社 1989 年 8 月

细目：一、史前艺术品的发现

(一)彩陶艺术

(二)彩绘艺术

(三)陶器的刻纹装饰艺术

(四)陶塑艺术

(五)雕刻艺术

(六)镶嵌艺术

(七)青铜艺术

二、史前艺术的发展及社会功能的演变

从鉴藏条件看史前到商代的陶器

刘良佑 《故宫文物月刊》(台湾) 1989 年总 70 期第 92 页

关于我国新石器时代制陶技术的若干问题

牟永抗 《考古学文化论集》(2) 第 1—9 页 苏秉琦主编 文物出版社 1989 年 9 月

长江下游地区史前文化的炊器研究

陈国庆 《考古学文化论集》(2) 第 213—230 页
苏秉琦主编 文物出版社 1989 年 9 月

细目:一、太湖—钱塘江地区

(一)马家浜文化炊器的分析

(二)崧泽文化与良渚文化炊器的分析

二、宁绍地区

浙江史前文化初论

芮国耀 《东南文化》 1989 年第 6 期第 59—64 页

开展史前时期海上交通研究

吴汝祚 《中国文物报》 1990 年 1 月 11 日

漫谈出土文物中的古代农作物

陈文华 《农业考古》 1990 年第 2 期第 127—137 页

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陈连开 《北方文物》 1990 年第 4 期第 51—57 页

吴越文化和中日两国的史前交流

陈桥驿 《浙江学刊》 1990 年第 4 期第 94—97 页

长江下游新石器文化源流散论

龚若栋 《江海学刊》 1990 年第 4 期第 111 页

新石器时代的艺术品

吕可平 《浙江画报》 1990 年第 4 期第 28 页

太湖——宁绍平原新石器文化遗址分布与环境变迁的关系

徐建春 郑升 《东南文化》 1990 年第 5 期第 253 页

中国新石器时代水井的考古发现

张明华 《上海博物馆集刊》 总第 5 期第 67—76 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 10 月

细目:六千年前已经具备了水井产生的技术条件

中国最早的三口水井,两河流域水井发现的概况

越国鸟图腾和鸟崇拜的若干问题

王士伦 《浙江学刊》 1990 年第 6 期第 25—28 页

细目:一、越国本土土著部族的先祖河姆渡人是鸟图腾和鸟崇拜最早的部族

二、良渚文化的鸟崇拜

三、越国盛行鸟崇拜

试论长江下游的史前文化区域

高蒙河 《学术月刊》 1990 年第 10 期第 75—81 页

细目:一、长江下游史前文化的地理环境和人文关系

二、长江下游史前遗存的编年与谱系

三、史前长江下游的文化区系及其性质

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与生态环境的考察

石兴邦 《史前研究》 1990—1991(辑刊) 第 13—32 页

史前人类和自然生态的关系——关于动物考古学的几个问题

袁靖 《史前研究》 1990—1991(辑刊) 第

41—45 页

浙江原始手工业的产生、发展及其社会的影响

王心喜 《史前研究》 1990—1991 (辑刊) 第
103—109 页

钱塘江以南的古文化及相关问题

牟永抗 《福建文博》 1991 年第 1 期

试论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的稻作和旱作

[日]梶山胜著 刘小燕译 《农业考古》 1991 年
第 1 期第 142—152 页

细目:1.前言

2.长江下游新石器文化研究史

3.栽培植物的出土遗迹

4.从出土遗物看农作物

①稻 ②旱作物

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述评

谢仲礼 陈星灿 《农业考古》 1991 年第 3 期第
18—33 页

细目:一、引言

二、十年来的成就

三、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探讨

(一)农业起源研究

(二)农业工具研究

1.关于石铲、石斧及石镞

2.关于石犁、破土器、耘田器

3.关于竹木农具

(三)耕作方式研究

1.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踏耕与“火耕火耨农业”

2. 华北平原的“变形”刀耕火种农业

四、余论

(一)引入自然科学方法

(二)开展实验考古学研究

(三)推广民族考古学研究

试论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的稻作和旱作(续)

[日]梶山胜著 刘小燕译 《农业考古》 1991年第3期第69—76页

细目:

5. 农具

①耕作具 ②收获具 ③其他农具

水稻起源于何地?

[日]佐藤洋一郎 藤原宏志著 《农业考古》 1992年第1期第44—46页

细目:1. 云南—阿萨姆起源说的遗传学根据

2. 多点起源说的根据

3. 太湖起源说

4. 祖先型野生种的分布与水稻起源

5. 两个起源假说的区别

6. 结束语

重大的课题、解决的方法与一种假说

——略谈中国早期稻作东传日本诸问题

周晓陆 《农业考古》 1992年第1期第47—51页

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与东传日本

林华东 《农业考古》 1992年第1期第52—60页

细目:一、长江中下游是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地

A 河姆渡遗址

B 罗家角遗址

C 彭头山遗址

二、稻作农业东传日本小议

大阪湾沿岸稻作农耕的传播——弥生文化传播的系谱

[日]村川行弘著 晓柳译 《农业考古》 1992 年第 1 期第 61—63 页

细目：一、绳文时代的人口和弥生时代的人口

二、绳文晚期的后期稻作农耕的影响

三、东亚稻作农耕的起源和发展

四、稻作农耕的发展

试论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的稻作和旱作(续)

[日]梶山胜著 刘小燕译 《农业考古》 1992 年第 1 期第 100—106 页

细目：

6. 烹调具

①以杭州湾南岸宁绍平原为中心

②以长江三角洲为中心的浙江、江苏两省之间的苏南平原、杭嘉湖平原地区

③南京及邻近地区

7. 自然环境

8. 结论

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纪要

本刊编辑部 《考古》 1992 年第 6 期第 526 页

浙江新石器时代考古十年述要

刘 军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 第 1—6 页
科学出版社 1993 年

礼器“鼎”渊源探索

蒋乐平 《南方文物》 1993 年第 2 期第 102—105 页
长江下游原始稻作农业序列初论

郑云飞 《东南文化》 1993 年第 3 期第 1—8 页

细目:

一、长江下游原始稻作农具的演变

二、长江下游原始稻作类型

三、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水稻的分化

文明起源研究略说

蒋乐平 《考古与文物》 1993 年第 5 期第 36—41 页

中国稻作的起源、分化与传播

游修龄 《稻作史论集》 第 51—72 页 游修龄著

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 1993 年 6 月

细目:一、中国野生稻的古今分布

二、中国原始稻作和考古发掘

(一)河姆渡遗址的来历

(二)河姆渡遗址的环境

(三)河姆渡时期的稻作

三、中国稻作起源与南方少数民族的关系

四、中国稻作的传播与分化

(一)籼与粳的分化

(二)水稻与陆稻的分化

(三)籼稻的特殊地位

长江流域考古与中国古代文明——牟永抗先生访谈录

芮国耀 《东南文化》 1993 年第 6 期第 1—10 页

江南地区史前木器初探

谢仲礼 《东南文化》 1993 年第 6 期第 17—25 页

细目:

一、引言

二、江南地区史前木器的分类

三、有关新石器时代木器的几个问题

水稻、蚕丝和玉器——中华文明起源的若干问题

牟永抗 吴汝祚 《考古》 1993 年第 6 期第 543—553 页

龙凉冬杀 金寒玦离(上)

谈中国古代的带缺环形玉器——玦

杨美莉 《故宫文物月刊》 1993 年总 119 期第 86—93 页

玉与珉——古玉丛谈

闻 广 《故宫文物月刊》(台湾) 1993 年总 124 期第 126—137 页

细目：中国古代的认识

西方的认识

玉与珉的实例

中国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木器的应用

陈 晶 《华夏考古》 1994 年第 1 期第 54—59 页

细目：一、居住和生活设施对木材的应用

二、木器制作及用途

三、木器的干燥与加固处理方法

四、古木材鉴定与生态环境的一致性

五、木器应用与农业生产的关系

六、始产于长江下游的漆木器

从民族学有关资料看中国早期新石器遗址的经济文化类型

刘凤芹 《华夏考古》 1994 年第 2 期第 50—60 页

细目：前言

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古环境特征

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经济文化类型

结语

中国史前稻作文化的宏观透视

卫 斯 《农业考古》 1995 年第 1 期第 55—65 页

细目：一、中国史前稻作遗存的分布地点及文化谱系

二、中国史前稻作文化不同发展阶段的文化类型及分布状况

三、中国史前稻作文化不同发展阶段的生产工具

四、中国史前稻作文化不同发展阶段的炊器与饮食器

五、关于史前阶段稻谷的储藏问题

刍议籼粳演变

徐云峰 《中国农史》 1995 年第 2 期第 25—29 页

东亚的古代稻谷和稻作起源

和佐野 喜久生 《东亚的稻作起源和古代稻作文化》

第 3—52 页 (日本)佐贺大学农学部 1995 年

浙江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

刘 军 《东南亚考古论文集》 第 95—110 页 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 1995 年 3 月

细目：一、浙江史前文化遗存及其分布

二、浙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新发现

三、文化特征

四、浙江新石器时代有关问题的讨论

中国古代水稻的品种资源

游修龄 《东亚的稻作起源和古代稻作文化》 第 53—59 页 (日本)佐贺大学农学部 1995 年

长江流域稻作史实物资料的研究

《东亚的稻作起源和古代稻作文化》 第 64—72 页 (日本)佐贺大学农学部 1995 年

中国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稻谷遗存统计表

- 陈文华 《东亚的稻作起源和古代稻作文化》 第
202—204 页 (日本)佐贺大学农学部 1995 年
中国史前的稻作农业
- 严文明 《东亚的稻作起源和古代稻作文化》 第
209—214 页 (日本)佐贺大学农学部 1995 年
中国古代收获工具的基础研究
- [日]寺泽薰 《东亚的稻作起源和古代稻作文化》 第
215—256 页 (日本)佐贺大学农学部 1995 年
中国史前时代的农耕部族和稻作文化的传播
- 苏 哲 《东亚的稻作起源和古代稻作文化》 第
267—272 页 (日本)佐贺大学农学部 1995 年
略论长江、黄河两流域史前时期的太阳神崇拜
- 吴汝祚 《华夏考古》 1996 年第 2 期第 75—85 页
细目:一、主要考古资料
二、对太阳神的神秘化—人格化—世俗化
三、太阳神像与创世传说的关系
- 浅析鸟田农业和大禹治水的关系**
- 郑云飞 《农业考古》 1996 年第 3 期 第 78—82 页
- 浙江史前文化演进的形态与轨迹**
- 蒋乐平 《南方文物》 1996 年第 4 期 第 27—33 页
- 新石器时代早期陶器的研究——兼论中国陶器起源**
- 李家治等 《考古》 1996 年第 5 期第 83—91 页
细目:一、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陶器
(一)化学组成和显微结构
(二)烧制工艺
二、中国陶器起源的探讨
- 稻作的东信和江南之路**
- 毛昭晰 《中国江南:寻绎日本文化的源流》 当代中
国出版社 1996 年

长江流域文明的进程

李伯谦 《考古与文物》 1997 年第 4 期 第 12—
18 页

中国古代的日晕与神话图像

林巳奈夫 《三星堆与巴蜀文化》 巴蜀书社 待刊

(附记:此目录在编撰过程中,得到本所研究员刘军先生的
热心指导和帮助,特此致谢!)